

0022

文學叢刊

高爾基

雜感集

魯迅譯

高爾基論文選集



寫 在 前 面

高爾基的論文，也和魯迅的雜感一樣，是他自己創作的注解。爲着勞動民衆奮鬥的偉大藝術家，永久是在社會的階級的戰線上的。戰鬥緊張和劇烈的時候，他們來不及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見解鑄化到藝術的形象裏去，用小說戲劇的體裁表現出來，他們直接向社會說出自己的“心事”，吐露自己的憤怒，憎惡或是讚美。讀者羣衆，卻很幸運的，可以得到他們創作之中所含蓄的意義的解釋。高爾基的論文，都可以當做這種解釋去讀。高爾基的創作是這三四十年之中的俄國歷史的反映，而他在每一時期的劇烈事變之中，還給我們許多公開的書信，論文，隨感，那就更是正面的，公開的表示他對於事變或是一般的社會現象的態度。

文藝的反映，簡單明瞭的說句“痛快話”罷，這也包含着文學家所表示的對於社會現象的態度。高爾基自己說：“藝術家觀察着人的內心世界——心理，——表現他的偉大和卑劣，他的理智的力量和他的獸性的力量。”這裏，他明白的說出來：藝術家首先要有點兒分辨“偉大”和“卑劣”，“理智”和“獸性”的能力。這是要從一定的立場——階級的立場去分辨的。要知道對於孔孟或是黃老，對於耶

蘇基普是偉大的，——例如“溫良恭儉讓”或是“給人打嘴巴”的美德，——對於我們也許是奴性的卑劣。對於資產階級的理論家是理智的，對於我們恰好是比獸性還要惡劣的私有主義和利己主義。文藝上反映着現實的時候，作家沒有可能不表示某種立場的某種態度。他的每一個字眼裏，都會包含着憎惡或是玩賞，冷淡或是熱烈的態度……他是在可惜，是在感動，是在號召，是在責備，總之，他必然的抱着一種態度。在高爾基的創作裏，我們可以看見他所贊助的是什麼，他所反對的是什麼；而在他的論文裏，我們就看得格外明瞭，我們看得見歷史舞臺上的真正人物，看得見社會上的具體現象，這裏，代名詞變成了名詞——小說裏的“英雄”露出了真名真姓。

高爾基是新時代的最偉大的現實主義的藝術家。而他對於現實主義的了解是這樣的！他——饒恕我把他來和中國的庸俗的新聞記者比較罷——決不會把現實主義解釋成爲“純粹的”客觀主義，他不懂得中國文，他不會從現實主義“realism”的中國譯名上望文生義的了解到這是描寫現實的“寫實主義”。寫實——這彷彿只要把現實的事情寫下來，或者“純粹客觀地”分析事實的原因結果，——就夠了。這其實至多也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客觀主義”，或者還是明知故犯的假裝的客觀主義。天下的事實多得很。你究竟爲什麼只描寫這一些事實，而不描寫那一些事實？天下的現實，每天在變動着。你究竟贊助着或是反對着現實變動的那一個方向？你能夠

中立嗎？你的“中”客觀上幫助了誰？這些問題是文學家必須回答的；每一個文學家也的確在回答着，不過有些利於自己掩飾一下，有意的或是無意的。高爾基的回答是：

真實有“兩個”：一個是臨死的，腐爛的，發臭的；另外一個是新生的，健全的，在舊的“真實”之中生長出來，而否定舊的“真實”的。

高爾基的論文之中，反映着世界的偉大戰鬥的各方面。他暴露虛偽的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他鞭撻市儈的個人主義，不可投藥的利己主義。他大聲疾呼的反對一切剝削制度，一切屠殺，暴虐，戰爭……他贊助這世界上的唯一的神聖的戰爭——消滅一切剝削階級的戰爭。他歌頌勞動民衆的理智的力量——工人階級的領導和創造。他極深刻的揭破小私有者的惰性。他深惡而痛絕那些堅持“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中間立場的市儈。他暴露這些自稱“第三種戰士”的虛偽，這些“機械的公民”的真相——那就是十月之前的“機械的革命者”呵！

高爾基這本論文集裏，的確反映着新的社會建設的過程；這裏，關於智識階層，關於農民，關於工人，關於婦女，小孩子，關於文學和文化革命，關於叛徒，關於刑事犯……關於一切種種社會現象，都有透闢的見解和深刻的考察。他不曾像幼稚的革命作家似的，只限於狹隘的“戰壕裏的生活”，他看得見整個“戰鬥”。要知道“戰鬥”的目的，“戰鬥”的事實，是整個社會秩序的改變，是幾千百萬羣衆的

新生活的痛苦艱難的產生過程，社會關係的各方面的現象都在這“戰鬥”的範圍之中。

高爾基的文化革命的觀點，是和一些“文化的”文學家絕對相反的。他認為文化的基礎是勞動，他認為現代的英雄是“羣衆裏的人”。他承認自己在十月的時候做了一個大錯誤：過份估量了智識階層的革命性和所謂“精神文化”。他卻從來沒有像一些“文化專利者”的文學家和大學教授似的，蔑視羣衆，不顧羣衆，而把“博學多能”當做唯一的文化。他固然同着勞動民衆的智識份子，“把自己所知道的，亟亟乎去教給比自己知道得更少的人”，然而他自己還在每天向羣衆學習，像他在自序裏所說的：作家的情緒隨着讀者情緒的高漲而高漲，作家對於一些現象的觀察，隨着羣衆的行動而得到更確定的觀點。是的，這裏反映着空前的偉大的羣衆的戰鬥呵。

中國的讀者已經讀到高爾基的一些小說和戲劇；而高爾基的論文，還沒有中國文的譯本。這裏所選的，是一九三一年出版的“高爾基：社會論文”（publicist articles），原本上有高爾基的一篇自序。我們希望這本選譯的論文集，能夠幫助一般讀者了解蘇聯的各方面的社會現象，了解國際資本主義社會的崩潰，能夠幫助中國的文學界，更深刻的提出許多從來沒有人注意的問題，例如反市儈主義的問題等等。而且，在這裏，讀者可以知道高爾基的爲人，——是一個和氣的，發笑的老頭子，時常同“不相干的”小孩子，工人等等通信，這

時常答覆各國“智識貴族”一些不大通的問題

1932, 12, 11.

高爾基自序

這本書裏面收集了我三年來所寫的論文之中的一部分。如果有人責備我，說這些論文裏時常重複着同樣的思想，那末，這種責備是很正當的。然而，如果作者預先知道責備是可能的，而且是正當的，——爲什麼作者不把這些論文刪改一下，去掉那些重複的議論呢？我沒有刪改，因爲我要使讀者同志看見：怎樣隨着他們情緒的高漲而作家的情緒也高漲了，怎樣同一個思想越來越有了確定的形式。我想，這不但對於讀者是有教訓的，就是對於一些青年作家也是有教訓的。

M. 高爾基。

15—IV—31年。

目 次

寫在前面

高爾基自序

給蘇聯的“機械的公民”

再論機械的公民

說文化

矛盾

論白黨僑民文學

答覆

市儈

關於婦女

論叛徒

同讀者的通信

如果敵人不投降——那就要消滅他

給人道主義者

給集體農場的農民通信員的信

金礦工人的信

關於小孩子

無恥主義

關於現實

親愛的回音

答覆智識份子

歷史意義的決議的週年紀念

給蘇聯的“機械的公民”

——答覆來信——

我在蘇聯住着的這四個月之中，接到了一千多封信，其中有兩百封光景是反蘇維埃情緒的公民寄來的。許多寫信的人要求答覆，然而我體力上不能夠答覆每一個人，我在這裏一下子答覆大家罷。爲着這個答覆不致於引起疑問：究竟是答覆誰的？——我所以說出幾個寫信的人來：

這是——“一個普通人，機械地成了蘇聯的公民的”；再則“一批俄國人”；說起“巴比倫堡壘”的那個寫信的人；“在莫斯科國立大學聽過布哈林，盧納察爾斯基，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建設者的演講的人，然而請你轉告他們罷”——他要求着——“我成了一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才出了大學”；再則：“農民出身的詩人”，反猶太派；“無產詩人”，人家把他的大衣和套鞋偷去了；“以前的 melamed(1)”；“以前的崇拜者”；“市儈主義的堅信的擁護人”；還有幾十個其他的“機械的公民”。

這些公民的信，在不通和卑劣的程度上是各不相同的，然而那種

完全可以聯合他們，他們都反對蘇維埃政權，反對共產

(1) melame

——是猶太人學校裏的教員的稱呼。



主義者，反對工人階級，反對這篇文章的作者，說他是“賣國賊”，“被俄皇式的尊敬弄瞎了眼睛的，被恭維震聾了耳朵的”，還“拖着他的鼻子”，“給他看什麼地方也並不存在的成績”。在“機械的公民”，這是非常之大的特色，使他們特別狠毒的發氣的，正是蘇維埃政權和工人階級的成績，——他們很一致的，很激烈的否認成績的存在。

極大多數的寫信的人都說：他們沒有希望這些信會寄得到我這裏。我趕緊來安慰他們罷：寄到了。不但封好了的信，就是明信片也寄到了，那些明信片上面是很清楚的寫着辱罵的話的；莫斯科的郵政局工作得非常之好，這我也認為是一個成績⁽²⁾。

還有一件事要指出來的：充滿了寫給我的信的狠毒，證明了蘇維埃政權在十年之中就能夠震動這種精神上半死的，對於現實漠不關心的庸人，這樣是專制制度的統治在幾十年之間所沒有能夠做到的。

現在，“機械的公民”的震動不是“皮膚上的”了，像以前那麼樣，那時候的皮膚上的震動，曾經自欺欺人的使得他們之中的許多人自己想像着是“愛民衆者”，是“革命者”，——現在的震動卻深刻的滲入了庸俗心靈的“秘密的秘密”，引起了那裏的酸化，腐化的過程；看罷，這是幾個從庸俗心靈的深處出來的，烏黑的文字煙霧的標本。

“高爾基，說人類是永久的，即使在地球上喪失了霧圍，就是沒有

(2) 原注——順便的：請郵政局的工作人員接受我的誠懇的感謝，謝謝他們對於我的這樣多的通信的極端的注意。

了可以呼吸的空氣的時候，也會保全着，你的證據在那裏呢？如果你沒有這樣的證據，那我爲着什麼要用自己的行動去資助那注定了要滅亡的東西呢？”

第二個哲學家把第一個的問題簡單化了：

“建設什麼法律，政府機關以及信仰，爲着什麼最近的和遙遠的將來，譬如說罷，爲着共產主義的將來，而來各種各樣的限制自己和別人，這在我們方面，難道不是枉然的，完全無結果的犧牲嗎？”

第三個便堅決的簡單化和具體化了：

“我卻要呸一下：”——他寫着，——“管什麼社會，管什麼勞動，創造的號召，我是不愛人的，我只要簡單的爲着我自己，爲着我的家庭而生活”……

而最後，第四個，像普通的說法，叫做“在 i 字上加上了一點”，——我提醒一句罷，這個字母已經從字母表裏勾消了，——這第四個說：“俄國民衆不懂得自由，他們需要的是哥薩克和鞭子。”

不能夠否認，“機械的公民”的認識自己的暗藏的本質，也是蘇維埃政權的創造工作的結果，這個結果是一個很大的成績，照我看起來。

自然，我也接到別種樣子的信，而其中有一個人寫的信的一部分，很應當引出來對抗那些庸人的哲學。

寫這封信的人——“是土地上的人，以前叫做小百姓的，而現在

和大家一樣，叫做公民。”他——“這封信寫了兩星期，剛從娃兒那裏，一個紅軍的一份子那裏，學會了寫字。”他寫着：“要使從前知道了蘇維埃政權告訴的事情，唔，那就不會有什麼打仗，和那些狗崽子幹的，而錢也可以用到鄉裏的經濟，用到工廠上，上帝保佑同志們去解除一切人的武裝，那時候，我們邁開大步比什麼人都走在前了。”(3)

這種口氣的信，我也接到不少，有時候，這樣的信會暗示一種奇特的思想，覺得給“機械的公民”識了字，倒是有好處的。

公民們！你們要使我相信，說我“眼睛弄瞎了”，“耳朵震聾了”，“出賣了”，“彎曲着心靈”，這類的話，還要說下去。雖然再說下去——已經沒有地方了！可是，有一個居然說了下去，他問我：“難道你不看見嗎，一百分之九十九的全體民衆都憎恨着，害怕着你？”這個不謹慎的統計家要弄壞我的“心理”了。他也不想一想：一個人被148500個和他同樣的人所憎恨着，他應當感覺到自己是多麼神奇古怪地偉大的傢伙？在這世界上，在整個世界的歷史裏，還不會有過這麼一個人，被這麼許多羣衆所憎恨的。

公民們，說我不看見蘇聯裏面的一切壞的，黑暗的，那是完全不對的。例如，我看見了你們，而要知道——說得溫和些罷，——實在

(3) 原文是很不講文法的，有很多的白字，而沒有標點符號；可惜，譯文裏無法完全保存這種“真蹟”。

不能夠承認你們是什麼好現象。 你們寫給我的一切，引不起我的任何感想，除非是對你們的可憐的輕蔑。 我極端誠懇的對你們說，——你們的謾罵，誹謗，造謠，你們反對我個人的一切說話，絲毫也不能夠打動我，絲毫也不會使我發恨；對於一切誹謗，一切謠言，一切謾罵，我早就受慣了的，還是“從我的年輕的腳爪起”的。

你們所指出來的唯一正確的，只是爲着我六十歲生日的紀念而引起的那種熱鬧，那個“歡迎”。 正確的，這熱鬧是多餘的，雖然我並沒有因此就震聾了耳朵 但是，的確枉費了我的許多寶貴的時間。

V. I. 列寧說“紀念”——“是可笑的蠢事”，這是非常之對的，像他永久所說的一切一樣。 然而除開這一個指示以外，你們究竟寫給了我什麼，你們是怎樣寫的？ 看看罷：“我們沒有工廠”——而事實上差不多恢復了一切舊工廠，而且已經化費不止一萬萬盧布在建設着新的。

“在每一個城市裏，有五萬，十萬，甚至於還要多的失業工人，”——自然，這是可怕極了，對於那些全體居民只不過五萬，十萬的城市，尤其可怕。 而全體居民只有三萬，四萬的城市，又怎麼辦呢？ 這已經是不可能想像的了。

“俄國人民之中百分之七十五生着楊梅瘡”——你們說。 “每一個共產黨員有十個老婆。” “女孩子從八歲就有性慾的生活。” “工廠停止了，破壞了，交通也是這樣。” “也是”——怎麼樣？ 停止了還是破壞了？ “共產青年團裏面加入了以前的警察和鄉村書記官的

兒子。”一個文學家，照他的職業就應當是個通順的人，他卻說：“一般的看起文學來，我們似乎沒有有才能的人。出版的是猶太人，叫喊着他們，編輯又是他們。簡直噁心得很。”

我也噁心呢，公民，因為你這種野蠻的愚妄。我們這裏在叫喊着朔洛訶夫 (Sholokhov)，法捷耶夫 (Fadeev)，潘菲洛夫 (Panferov)，沃里諾伊 (I. Volinai)，謝美諾夫 (S. Semenov)，格拉德珂夫 (F. Gladkov)，沃略沙 (Oliosha) 等等，都是“正教徒”，俄國人。編輯“伊茲維斯啓亞”(4)的是斯克沃爾錯夫—斯鐵帕諾夫 (I. I. Skvortsov-Stepanov) 和格龍斯基 (Gronsky)。編輯“普拉夫達”(5)的是烏里央諾娃 (M. I. Ulianova) 和布哈林。“工人報”——是馬里切夫 (Malitsev) 和斯米爾諾夫 (Smirnov)，“共產青年的普拉夫達”——是科斯特洛夫 (Kostrov)。“赤新”雜誌——是拉斯科里尼珂夫 (Raskolnikov)，“新世界”雜誌——是盧納察爾斯基 等等，也都是俄國人。然而，假使是猶太人呢？你，公民，是個詩人，你以為例如巴倍爾 (Babel) 等的有才能的猶太人比你這類的基督教的鵝要壞些嗎？你錯了，公民，錯了，因為你的不通！

(4) “伊茲維斯啓亞” (Izvestia) 是“新聞”的意思，這報的完全的名稱是“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新聞”，可以簡稱“新聞”報。

(5) “普拉夫達” (Pravda) 是“真實”的意思，可以譯作“真實”報，或是“真話”報，“實話”報，聽說中國在譯做“真理”報，不知為什麼要用這毫不適當的哲學名詞。

公民們，你們的不通真是可怕。你們之中的一個寫着，“共產主義者”把我的“耳朵塞住了，使得我聽不見民衆的靜默”。然而你們自己想想看：如果民衆靜默着，我的耳朵還要什麼鬼來塞住，幹嗎？而且怎麼能夠說“民衆的靜默”，這時候，“自我批評”正在熱烈的，憤怒的沸騰着，巨大的工農通信員的軍隊正在毫無顧惜暴露着一切，甚至於國內經濟管理上的最小的錯誤和紊亂，工人羣衆正在越來越積極的參加實際生活的事業——他們自己的事業？怎麼能夠說，“基本羣衆完全不管誰，怎樣管理着他們”？你們自己也說：“報紙上充滿着消極性質的事實”，——對的！然而，羣衆造出了這些事實，他們自己就在暴露牠們，因為工農通信員是羣衆的喉舌。你們也要同意，歐洲的報紙還沒有看見過這種現象：工人羣衆對於自己的工作實行這樣的“自我批評”，沒有看見過，雖然有什麼“出版自由”，“言論自由”。我在報紙上反對“自我批評”的口氣和形式，我是因為把各種各樣不可避免的“生活裏的小事”拖到報紙上去，那些工農通信員會“替你們的磨坊加水”(6)。

而你們是誰？

你們是勞動民衆的仇敵。那個在莫斯科國立大學裏學習過的，後來“成了極端的個人主義者”出來的公民，給我寫：“俄國人的羣衆——是些壞貨，膽小的，虛偽的，不能夠共同工作的，道德程度很低的。”

(6) “替什麼人的磨坊加水”就是“幫助了什麼人”的意思。

在對於羣衆的估量上，這個青年的悲觀主義者是在胡說，然而他的估量對於你們這些羣衆，“機械的公民們”，倒是完全正確的。

你們通知我的所有那些“事實”，我都知道，我在僑民的報紙上讀過的。僑民的撒謊也不大通，然而他們始終不會永久的寫着這樣奇特的無聊的昏話，像你們所寫的。

“約翰·波里斯洛夫所預言的反基督出現了，這就是列寧。”“舊制度是現代所求不到的明星了。”“神聖的姓名——維特(7)。”“布爾塞維克是德國的偵探，高爾基，列寧的朋友，也是偵探。”

你們聽聽看，——唔，你們怎麼不怕羞的？要知道這種蠢話是布爾切夫 (Vl. Brutsev) 在十一年以前寫的，而現在，甚至於因為老朽而發了昏的僑民也怕寫這樣的話了。

“尼日尼和索爾莫夫地方的以前的崇拜者”給我寫，說我“被布爾塞維克占有了，那是些黑暗的過去的人，背上背着監獄的，”寫着，還告別着：“永別了，我們的高爾基。”嚇，這麼晚再告別！早就應當的了，公民們！順便的說：我向來就不是你們的。布爾塞維克占有了我已經二十五年。我和他們的不同，還在於一九一七年的時候——我非常的後悔——過份估量了智識階層的革命意義和他們的“精神文化”，而對於布爾塞維克的意志的力量和勇敢，先進工人的

(7) 維特是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的內閣總理。

階級認識的力量，估量得不足。關於我的這個錯誤，我已經說過了。公民們，誰也沒有保險一生一世不做錯誤，一定的，你們之中的有些人也做了錯誤了，這樣敵視的對待蘇維埃政權，對待工人階級，以及在估量目前的現實之中。

對於有些公民們問我：爲什麼“出賣了”，“附和了”布爾塞維克，我要指出來：隨便什麼人，自然是自由的，而且應當說出他所想的；永久是說出自己的蠢笨來，比把牠藏在自已心裏，像一種刺痛和噁心似的，要有益處些。說出來的蠢笨，像皮膚病似的，容易醫治些，而蠢笨藏在思想裏的時候，那就已經是“內部器官”的病症，難醫治得多。最後，說出來的蠢笨在蠢貨自己也是看得見的。

現在我回答問題：青年時代，我住在卡贊，察里程，波里索格列白斯克，尼日尼，認識了民粹派的革命黨人。這對於我是個好運氣，——我第一次看見了一種人，他們的生活利益，超過了個人的飽肚子，弄好自己個人的安逸生活的關心，他們完全知道勞動民衆的苦工似的生活，非常之好的說着改變這種生活的必要，而且相信這種可能。

不但說了，還在幹着。一個鐵路工人，擦油匠，米海爾·洛馬斯，已經在雅苦特地方受過了艱苦的十年的“充軍”生活，他假裝着做他所痛恨的小鋪子老板的生意，想要在卡贊和辛比爾斯克的伏爾加沿岸的農民之中實行宣傳。他給那青年的宣傳家維克多·亞列菲耶夫和帕甫爾·西特尼珂夫說：

要是做起革命事業來，那就不能夠討厭一切艱苦的勞動，而且應當記住：言論的根基是行動。”

在我面前經過了些奇特的人物：古謝夫，是薩拉託夫地方的小教派之中的宣傳家，他在一個塔什干附近的什麼地方，過了二十年的充軍生活，在那邊乾癟了，一半燒焦了，喫着一種什麼藥粉，然而他一到尼日尼就很結實的罵起來，罵大家忘記了革命工作。他乾癟了，像個僵屍，看來像要散成灰塵似的，然而他那麼說着，使我聽得很害羞，我怎麼一點兒也不做解放民衆的事情。而更害羞的，是聽見這個人到了薩拉託夫，立刻就開始自己的工作，而過了七個月，被一個什麼人出賣了，死在監獄裏。

像古謝夫這樣的人，自然不是時常碰見的，然而他們掉到“困苦地貧乏的生活”的濫泥坑裏，彷彿從天上掉下的石頭，我看見了：在他們之後，剩下的是人們之中的兩個波動的圓圈：年紀老一些的人，“以前”的革命者，不好意思的微笑着，張開了兩隻手，而青年對於古謝夫這類的人，是譏笑的態度，甚至於生氣。遣送到尼日尼來的一班雅洛斯拉夫斯克學院的學生佩服着列夫·啓霍米洛夫的“勇敢”這是以前“民意黨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後來成了叛徒，寫過一本書“爲什麼我不做了革命者？”

對於我，那些老革命黨人，進過監獄，充過軍的，簡直是英雄，半神聖的；我看着他們，當做是“真實·正義”的活的化身，以爲他們是

能夠砍斷這結得緊緊的，生活裏的一切糾葛的。

1891—92年，我在替弗里斯特別遇見了許多人，都是八十年代初期的幾件政治案子裏審判過的，受過了充軍和苦工的處分的。而有一天晚會上，其中的一個，叫做什麼馬爾科左夫的，聽完了關於亞斯特拉漢地方的‘霍亂暴動’的敘述，他嘆了一口氣說：

“大概，爲着管理民衆起見，還是必須要鞭子和刺刀的。”

我等待着那些以前的“爲着民衆自由的戰士”起來反駁他，——但是沒有等到。他那種話，我在普通人之中時常聽見的，而當時誰也沒有注意，彷彿這是說的最平常的，聽慣了的話。這種話起先是把我震聳了，而後來反而發展了我的聽覺，使得我的聽覺更清醒了些。很快的，我就不再奇怪以前的革命者的這類申明了，例如那個“聶察耶夫(8)派”的老頭子，一個非常之博學的人，翻譯弗洛倍爾和萊沃帕爾狄的，他說：

“我的朋友，丟開了這些赤化的夢話罷，俄國民衆永久不會滿意別種形式的管理，除開專制制度，暴虐制度。”

這些“思想”，我記錄了下來；而 1897 年，在替弗里斯的美鐵赫堡裏，那憲兵長官科尼斯斯基給我看一張紙頭，上面寫着：

“當我像你們這樣的乳臭小兒的時候，我也要幹革命的，然而在

(8) 聶察耶夫 (Nechzev) 是以前一個小革命團體的領袖，也是民意黨一類的暗殺主義的團體，自然是反對專制的。

美鏡住了三年，這病就醫好了。”

——這是誰的話？——科尼斯斯基很明顯的滿意着問。

這類的話，我聽見了很多；而 1907 年，又在“路標”集裏讀到：

‘我們應當感謝政府，牠用刺刀保護着我們，抵禦着民衆的狂怒。’

大家知道的，“路標”集是一個以前的“馬克斯主義者”史特魯維想出來的，這個人是個孤兒，游蕩的，現在他已經從馬克斯主義跳到了帝制主義。1901 年我還看見一些女學生和大學生差不多向他禱告着，那時候他是青年的“領袖”。我想，這些回憶是充分的雄辯的了。我用一個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的話來結束罷：

“在青年時期，我們大家都很勇敢的舞弄着革命的棍子，而到老的時候，這些棍子就打到我們的頭上來了。”

所有這些，雖然不減少智識階層所做的文化工作的高貴的價值，卻使得我懷疑他們“對民衆的愛情”，懷疑他們的“革命性”。

真正的革命性，我正是在布爾塞維克裏感覺到的，在列寧的文章裏，在跟着列寧的那些智識份子的演說和工作裏。我就“附和了”他們，那還是在 1903 年。沒有進黨，一直做“游擊隊”，而真誠的，永久的忠實於工人階級的偉大事業，對於他們戰勝“舊世界”的最後勝利——是不懷疑的。

我知道，公民們，我在這裏所說的一切——對於你們是沒有說服

的效力的，我知道，向你們指出蘇維埃政權在建設工人國家的道路上的鉅大的成績，是沒有益處的。我懂得，要是別人在我這地位，也不會來回答你們這些卑鄙的亂叫的信。然而我有我自己的對人的態度，這是我的經驗知識所教養出來的，我知道生活是多麼困難，人的畜生性，下流性是多麼多，我知道人對於自己的下流行爲其實是不大應該負責的，因為他們幹着這些下流行爲，是由於必要的暗示，由於意志薄弱，因為生活就建築在貪婪，嫉妒，人對人的卑鄙之至的殘忍上面。可詛咒的過去壓迫着人，使得人醜惡化；還要壓迫呢，還要醜惡化呢，如果我們不改變生活基礎的本身，不改變牠的經濟。

如果我有時候粗魯，如果我用激烈的字句，——那並不是我在侮辱，或是願意侮辱，那並不是我忘記了人是多麼不幸，他們的生活是多麼困難，他們的蠢笨和貪婪是多麼不應該由他們負責。我並不兇惡，然而我憎惡過去，而我的憎惡時常找不到充分表現的，結實的字眼。我看見過，現在還看見很多的惡劣，然而我不大喜歡講牠們。這些東西並引不起我的興趣，照我看起來，這些東西也並不是人的特色。我在青年時期，有一個問題深刻的抓住了我的心靈：怎麼會的，怎麼可能的，我們這可惡的生活產生了好人？很不容易，也不僅只在書本上，我研究了這個問題。

我深切的知道，人的基本性質——是要想更好的。這種性質，就是別種動物也有的，然而人把牠發展到了自己的基本力量，理智的

力量的程度。這是他創造出來的，而在創造着文化。能夠在自己之外和自己之內找着，比較，研究有益的和有害的，美麗的和醜惡的，——這是人的基本的生物力量。這力量推動他去創造繼續發展他的才能的一切便利的條件，而這個力量戰勝那些妨礙人的生長的一切。要戰勝的。

你們，公民們，是些帶着有機的罪過，腦筋裏帶着烏黑的污點的人。這個污點有一種能力，就是只把消極性質的現象，事實和思想吸收進去，然後再反映出來。在你們的腦筋裏，不斷的發生着一些印象的腐爛，解體的過程。這種醜惡發生的基礎自然是階級心理，這基礎是寄生蟲的心願，要想統治人，要想靠着別人的汗血生活，要想個人的安逸，享福，舒服，總之——要想那永久是罪惡的，而在我們現在更加是罪惡的生活，現在，勞動民衆已經懂得了自己爲着自己的自由勞動的權利。你們是爲自己的個人主義者，而歷史需要強健的，天才的個性，爲着要創造新的形式的生活，比過去所套在人們頭上的那些形式，要更加適宜於理智的人的。生活要求着英雄，而寄生蟲已經活完了自己的時代了。

古代的猶太聖人希萊爾 (Hillel) 說得很好：

“如果我不爲自己，那末——誰來爲我：然而，如果只爲自己，——那爲什麼又要有我？”

這是套在人們頭上的一切說教之中的最好的。我永久受着這

個指導。我的終生的工作都是“提高的玩意兒”，我的目的永久是，也將要是一個：提高人對於生活的意志，提高那對於過去所留下來給我們的現實的憎惡。

人必需要有另外一種現實，不是他們所生活慣了的那一個。我看見，創造新的現實的過程，在我們蘇聯發展得奇怪的迅速；我看見，怎樣好，怎樣創造性地，新的精力在加入生活裏來，——這是工人階級的精力，我相信他們的勝利。

我相信，因為我知道。

（這篇文章最早發表在蘇聯“新聞”報，1928年十月七日，同時，發表在“實實”報。）

再論機械的公民

看那從右邊和從左邊來的回音的數量，可見那篇“給機械的公民”的文章，有了“對症發藥”的效果。“機械的公民”生氣了，他們瘋狂的叫罵着，用“民衆法庭”來恐嚇我，而其中有幾個，在國外的，自以爲很狡猾，假裝着，彷彿他們非常之喜歡，因爲在蘇聯有“機械的公民”存在這件事實。一個國外的甚至於用這個題目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就是“好消息”，雖然存在着這樣的人有什麼好呢，——他們自己說自己：“是呀，你們是對的，——我們是不自由的，我們是脆弱的，我們生來是奴隸，忍受過鞭鞭人的壓迫，忍受過專制制度，現在忍受着布爾塞維克，”——這是一位什麼太太寫給我的，同時，她卻誇口着，說她“也爲着民衆坐過監獄”。我並沒有權利懷疑這位太太的確是真誠的“爲着民衆坐過監獄”，然而我不能夠不提醒她：有很多人爲着民衆“坐過”，只不過是因爲要想把當時坐在民衆頸項上的人換掉，而自己更穩固些坐上那地方去。不但“坐過”，而且還像那個白黨僑民的詩人，董·亞米納多說的：“走到民間去，又走回來，走得疲乏之至。”因爲“機械的公民”還活着，還在響動着，就引起了歡樂，這在那些人是很自然的，因爲他們只在想整個的勞動民衆，都來機械

地，不自由地，不抱怨地執行他們的意志。

另外一個喜歡了的人寫着：“記記看，愛甫萊謨·西林——第四世紀的作家，並非馬克斯主義者寫的是什麼：‘敵人高興起來了，他看見了他的手毀壞了自己的勞動，而用你的苦痛充滿了自己的心’。”這不見得是愛甫萊謨·西林說的，然而這是一句很熟的書，我記得在斯維亞託果列茨的書信集裏讀過的，我還覺得這裏少掉了一個關於心的字眼，——是“兇惡的”心呢。這個人勸我說真實。高興之至，看罷，這就是真實：政權應當屬於勞動者，雖然這對於野獸不大痛快，對於無事可做的人，以及“諸如此類”的一切人，不大痛快，然而這是不可避免的。

懷疑家勸告我：“你起勁些什麼？一切都自然而然的，‘蝦子倒退着走’，‘梭魚總是往水裏拖’，很知道自己存在的目的，就在於‘使得鮪魚不要打瞌睡’，而你們的那些不識字的工人，也快要躺到‘打破了的食槽’旁邊去了，像我們的整個智識階層的天鵝一樣，跌在這個食槽旁邊，不過天鵝總在‘想要冲上天’。看罷，我也‘燃燒過對民衆的愛情’……” Oh，我不相信書本和格言！唔，譬如說罷，怎麼還可以來重複一遍：“黑狗總是洗不白的”，——其實，以前的黑百黨⁽¹⁾變成了“白黨”，而粉紅的理想主義家成了烏黑的了，看見他們所心愛的“民衆”堅決的不願意過奴隸的機械生活。而且：燃燒就是酸

(1) 黑百黨是俄國一般反動派的濶名。

化，而因為腐爛也是酸化，所以許多腐爛着的人以為他們是在燃燒着明亮而鮮豔的火呢。

“從不知怎樣的，看不見的一點起，在革命和文化之間開始了分裂，——‘懷疑家’寫着，——開始了，往前爬着，越來越深刻，而引導到了這麼一個地步，‘文化革命’成了‘右傾’的來源，而‘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得到了敵視文化的性質。”這是說的什麼，什麼文化？是說的承認少數人教育多數人的權利，——為着自己的利益去教育多數人的理智和意志，而無意識的剝削他們的精力，——那樣的文化？是說的“精神”文化？鬼拿了去罷，這個“精神”，如果為着牠的生長必須要有主人和奴隸的存在，必須壓迫人，必須要血腥的屠殺！

“懷疑家”，據他自己說，是“在那個堡壘的高處——那裏人類點着了唯一的永久的真理的燈塔——來看現實的。”我個人一點兒也不知道那“堡壘”所在的地方，也不知道“唯一的永久的真理”。我想，只有實驗科學會創造真理。不知是誰，說得很好：“真理——這就是認識的工具”，而大家知道的，每一工具都要用壞的。我們現在，實驗的科學製造了新的認識工具，新的真理：物質的電子論，而關於人類社會的科學發見了一個真理，就是階級鬥爭的不可避免，以及工人階級取得政權的必要。這個不可避免和必要，有資本主義制度的可怕的罪惡在證明着，解釋着。任何一個正直的人都不能夠，也

沒有權利來說 1914—18 年戰爭之類的事實還是可能的那種生活，是理智的，文化的。在那次戰爭的幾年之中，消滅了幾千萬工人和農民，單在一個法國就毀壞了三十萬所房屋，單是一個德國就爲着殺人化費了四千萬噸以上的鋼鐵⁽²⁾。如果一九一三年政權就在工農手裏，那麼，那幾十萬萬盧布，俄國資本家用去殺死自己的和德國的工人的，用去破壞東普魯士的，可以像現在這樣應用：發展農業，工業，交通，發展勞動民衆的文化。這個極端昏蛋的戰爭爲着什麼開始的？爲着小小的一團頭腦滯鈍的百萬富翁的利益，爲着滿足他們的貪慾，滿足他們的奢侈生活的無窮的慾望。這樣，——小小的一團野獸和寄生蟲之間的爭論，弄得做工的人互相殘殺，而做工的人在各國都是同樣的不幸，他們在到處都只有一個仇敵——資本家。

自然，這是大家都懂得的，這是——“起碼的真理”，然而還要提出來說，這卻並不是我的錯處。而提出來說是應當的，因爲資本家又要在勞動民衆的血裏面來賺錢了，又在準備着把幾百萬工農送到戰場上去互相殘殺了。這個新的戰爭還要更加血腥，還要有更大的破壞。又要把許多城市變成垃圾堆，又要把幾百千萬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來破壞，搗毀，用屍首的毒氣來毒害，又要砍光，燒燬森林。

(2) 原注——不久以前有人計算過 帝國主義戰爭之中平均每殺死一個兵士，化費了五噸的鋼鐵。想想這件事實罷，牠很好的描寫着資本主義經濟方式的“賢德”。

而要知道，地面上的一切建築，都是屬於建築牠們的人的，而並不屬於那些榨取工農勞動而得到了金錢，再用這些金錢來付給建築的工資的人。在地面上的一切都是他們的勞動所創造出來的；而這世界上的主要的不幸，牠的一切痛苦，罪惡和勞動人民的困苦的來源，就在於農民和工人的羣衆始終還有盲目的，他們因為自己的盲目，始終還沒有都懂得：如果他們堅固的，親密的聯合起來，——那他們很容易從自己的頸項上把資本家推翻，資本家早就不是人了，而越來越變成更兇狠的，更加要喝血的畜生。

自然，我所講的這一切，並不是為着“懷疑家”講的，而是為着那些青年，他們正在城市和鄉村裏，起來接替布爾塞維克的老隊伍，這是些形成蘇聯工農的鉅大身體上的很好的頭腦，黨的人。

“懷疑家”，這是——“天鵝”，一隻烏黑的天鵝，他“想要冲上天”。他其實並不是懷疑家，而是浪漫家。他——整個兒的都在別人的字句裏面，這些字句之中有不少是很古舊的，以前是很有道理的，直到今天還是很美麗的字句。然而這“道理”只是外表的，貼在上面的，像殘餘的廣告紙貼在柱子上或是柵欄上似的。他寫着：“你們所以替工人服務，即使不是為着利益，那也是因為誤會，而工人，永久也不會恢復他們所破壞的那個精神文化，那個美麗的生活。”他——是消極的浪漫家。消極的浪漫主義，這是疲倦了的市儈的浪漫主義，

這種浪漫主義在狂暴的社會悲劇之後總要在生活的舞臺上出現，來代替通常走在革命之前的積極的浪漫主義。這消極的浪漫主義攙着上帝的手出現，這是他的政治玩意兒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牠裏面，有點兒什麼抒情詩似的，誘惑青年的“美麗”，說得正確些，這是文字模樣的美麗；牠很像黴菌，雖然黴菌不屬於政治，而是屬於“米科洛基”（micologie）⁽³⁾，就是菌類學的。然而消極的浪漫主義始終也是政治，——我們始終還生活在階級社會的條件裏，而在這種條件裏，大家是知道的，沒有任何東西是“在政治之外”的。

消極的浪漫主義的碧綠可愛的黴菌，目的是在於自己要復辟——說得簡單些——要修理那所謂個性，這個性其實根本就已經崩壞了，在自己的“我”的基礎上就二元化了，即使這種個性有列夫·託爾斯泰那麼龐大。消極的浪漫主義，認為如果把個性推出社會任務和社會問題之外，讓牠深入和沉溺在關於自己的感動和思索的怪癖玩意兒之中；那末，這種在生活之外的個性就可以得到已經喪失了的完整，所謂“內部的和諧”。然而消極的浪漫主義，把個性交給了牠自己，不過是使得個性的二元化和崩壞的過程更加深刻罷了。

這是太天真了，以為在階級社會的沒有取消的可惡條件之下，在一般的無政府狀態的鬥爭條件之下，在嫉妒，貪婪，不自由——時常還是——無意識的勞動之中，會有和諧的“美麗生活”的可能。這

(3) 黴菌學在俄文是 micologie，雖然英文的微生物學是 microbiology。

是太無聊，太無恥了，以爲在社會生活越來越公開的無恥，醜惡，被各種各式反對人的罪惡所毒害的時候，有什麼人——不管是什麼人——卻有權利爲着美麗的生活給自己安頓一個舒服的小窠兒。

這種消極的浪漫主義的市儈性的內容——這主義正在蘇聯逐漸的，謹慎的發展着，——其實是很明白的。這個浪漫主義沿着兩條平行線在爬着：一條是——個性向着自己的世界‘自我深入’，向着牠那微生物似的“我”；另外一條是——鑿刀和犁耙的勞動的理想化，是把復活和發展便宜的，舒服的個人私產認爲自己的目的那種勞動理想化。這裏不但是詩境，而且是便利的想像，因爲坐在農民的頸項上，比坐在工人的頸項上，要更沒有危險些，更便利些。錘子的英勇的勞動，牠錘鍊着真正新的集體生活，那些市儈，愛着“美麗生活”和“精神文化”的人的消極的浪漫主義，機體上就和牠不對勁的，甚至於是敵視的。

我們的“文化的”人之中的一個，以前——那時候還是時髦的——也自以爲是革命家，而後來成了黑百黨，他在開誠布公的時候說了：

“其實，我們這是什麼精神文化？我們有的——是酒店文化：吉潑賽的曲子，匈牙利的胡琴，總之——是酒店的浪漫主義。在這麼一小世人在那裏發着什麼議論，然而猶太人赫爾申松，比俄國人還要更好的感覺到真正的俄羅斯。”

照我看起來，這些話裏很有一大部分的真實。關於“酒店的浪漫主義”說得很好，這真有點兒什麼特殊的俄羅斯的。那個“浪漫主義的”叫喊越來得情感主義，那末，對於酒館文化的人就越有震聳耳朵的作用。不由自主的要想起來，現在這些人所號哭的“美麗生活”，他們的最有味的精神食糧的主要內容，正是高貴的酒店裏的花花綠綠，甜甜蜜蜜的醜醜東西，這是他們這些人自己與高彩烈的創造出來的醜醜東西。漂流到了國外，他們也就最能幹的做着酒館裏的“事業”，“愁悶”的唱着曲子，起勁的跳着舞。

這類人的浪漫主義，比我在尼日尼郭洛德的同住的房客尼古拉·普里亞興，一個郵電局的小官的浪漫主義還要低微，還要可憐。那個紅黃色頭髮的青年，很謙虛的，總是洗得乾乾淨淨的，穿得很整齊，看夠了聶維仁·史帕仁斯基的嚇人的無才的戲劇，自以為無希望地愛上了一個女戲子，決定要撕破自己的紅黃色的生活了。

他願意把這件事幹得很“美麗”。找到了一個“Clico”香檳酒的酒瓶，在那裏面灌滿了啤酒，把裝飾在神像上的紙花，從花插裏拔了出來，拋散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喝了一杯子啤酒，就用萊福塞式的手鎗在自己的右邊的太陽穴上打了一鎗，把兩隻眼睛打瞎了，可是仍舊活着。

他敘述着自己的這件英雄行爲，還加了一句：

“看罷，這是狡猾的命運的怎樣的嘲笑。”

而謹慎的用手杖試探着自己周圍的土地，對着他所看不見的太陽看着。

有些“機械的公民”責備我，彷彿我故意只引證一些蠢笨的信，而有道理的信卻“用沉默拋棄了”。這是不對的，公民們！我很注意的讀過這些信，而很努力的在每一封信裏尋找“客觀真理的徵象”。然而，或是並沒有這個真理，或是我的確“教養得這樣壞”，以致於對於我，“真理是化學地不同性的”。

我這裏有一封很長的信，十張並非信紙而是普通寫字的紙，寫得密密層層的；要讀完這麼一封信，起碼要二十分鐘。簽名的是“西伯利亞人們”——可見是“集體的”信。這使得牠更有意義，我也要更加注意。但是行文裏是用的第一人稱——“我”，而不是“我們”。

“我寫給你是非常正直的，並沒有用噁心而吐出來的口沫來糟踐蘇聯的鉅大，英勇的工作的目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是誰，是機械的公民呢，還是什麼別一種的人。現在我在做蘇維埃的工作。然而我來做這個工作，是在我否認了牠之後。”

我讀完了這幾句，想想“總算有點兒正經話了！”然而，嗚呼！底下仍舊是熟悉的，討厭的那麼一套：

“民衆跟着布爾塞維克走，是因為在哥爾卻克的後方，有著名的安能珂夫之類的英雄在搗亂。布爾塞維克應當替他建立紀念碑，因

爲他同他這類人，舉例說罷，占領了西伯利亞是便宜了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普里史克維支那一幫強盜，幻想着一下子打倒布爾塞維克和其他的革命黨，爲着要恢復專制制度的靴子，而在這種精神上工作着，只要在什麼地方搶着了政權。”

如果假定這是“真理”，那麼，這只是社會革命黨製造出來的真理，而社會革命黨，似乎自己也相信了，他們製造的“真理”雖然很多，可是實在製造得很壞。

底下，“西伯利亞人們”說“布爾塞維克主義執行着克爾遜等的意志和願望”，然後就批評蘇維埃的建設，很詳細的鈔襲着僑民的報紙，之後，憂愁的設想着智識階層的命運，說“極大多數的智識份子都反對蘇聯，這並非單只因爲他們——智識階層——是賣淫的，誰多給幾個錢就替誰服務，這個籠統的罪狀是蠢話，那自然是布爾塞維克所懂得的，這大概還因爲在蘇聯裏面有點兒什麼東西，使得智識階層無論如何不能夠同這個制度調和，雖然蘇維埃政府給智識階層的工資始終比較得不壞了。”

這是一個智識份子寫的，他確切的指出他屬於那一個政治文藝的機關報。照我看起來，他寫得很不好。因爲他寫了——說得溫和些罷——這幾行不聰明的話，蘇維埃的智識階層不見得會謝謝他。

“俄國因爲布爾塞維克的罪惡而要滅亡了，這是你所應當寫的，”——一個‘爲着民衆的痛苦而悲哀的人’這樣勸告我。“鐵不夠，煤

也不夠”——他叫喊着。

大家知道，鐵還夠用六十年，煤還夠用七十五年，而歐洲工業爲着這個問題很擔心，很驚慌。我覺得，資本主義的國家浪費着幾千萬噸的煤和鋼鐵去製造巡洋艦、大砲，砲彈，爲着保護自己；而因爲戰爭，我們的土地越來越貧乏了；在這件事上面，布爾塞維克並沒有錯處。一班資本家、無政府主義者這樣濫用寶貴的五金，燒燬燃料，——這正是反對勞動民衆的最可惡的罪惡之一。我們有過一個很好的，但是不大出名的思想家——因爲他太特別了——P. F. 阜朵洛夫。他的許多獨出心裁的思想和格言之中，有這麼一句：

“自由而沒有對於自然界的權力，——那就等於解放農民而不給土地。

這在我看來是無可爭論的。資本主義的制度求得對於自然界力量的權力，只不過是爲着要鞏固自己對於活的力量來源，對於勞動民衆的體力的權力。

蘇聯的工農政權的目的卻是另外一種：儘可能的把工農體力的更多的數量改造成理智的，智識的力量，而用這種力量的影響，去促進一切自然界精力服從勞動民衆的利益的過程，從爲着資本家的無意識而苦工似的勞動之中把勞動民衆解放出來的過程。鐵被搶去了，黑的煤被燒掉了，爲着毒害勞動者而在浪費流動的煤——煤油——和白的煤——電力，灰色的煤——木炭，綠色的煤——柴草；然

而還有許多煤，資本家還沒有學會利用牠們：這是青的煤——風力，藍的煤——海裏的來潮和去潮，紅的煤——太陽的精力。所有這些精力的來源，夠用幾千年呢。必須要把這些精力的利用從野獸的政權之下取出來，那些野獸把工人的體力也當做煤，而在燃燒着牠，爲着鞏固自己的罪惡事業，——這種事業是罪惡的，因爲牠浪費着地底裏的寶藏——燒燬牠們，拋棄牠們，只不過是爲着要鞏固自己對於工農的政權，對於技術的，科學的，以及其他的勞動智識階層的政權。

我看見，工農政權很明白所有這些；我看見，工農政權勇敢的向着那個方向工作。

（這篇文章最早發表在蘇聯“新聞”報，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七，同時登載在“真實”報。）

說 文 化

我覺得，對於工人階級，領會這樣一種關於文化的觀點是有些益處的。

一切稱爲文化的，都是從自我保護的本能裏發生出來的，都是人在反對自然界的“後母”的鬭爭過程裏的勞動所創造出來的；文化——這是人要想用自己的意志，自己的理智的力量去創造“第二個自然界”的結果。

第一個自然界——是無組織的。自發力量的混亂狀態，這些力量賞賜給人一些地震，洪水，颶風，旱災，不可忍受的炎熱和同樣的寒冷。第一個自然界，無意識的浪費着自己的力量在造成那些產生疾病的微生物——黴菌，在造成極有害的蟲豸——蚊子，蝨子，蒼蠅，這些東西會把傷寒症，瘧疾等等的毒質傳達到人的血裏去；牠在造成無數的有害而無益的植物和草類，浪費掉那些營養人類的穀類和果實所需要的健全的滋養料，而去繁殖寄生蟲。可以說，自然界根本就沒有造出什麼有益於人的機體的穀類，而現在我們所喫的穀類——原始人是逐漸的訓練着自己的機體，經過長期的苦痛和許多人的死亡，方才喫慣的。暗示這個的，有這樣一件事實，就是歐洲人最初用

番薯做食品的時候，引起過很痛苦的病症，這不但是一種番薯有這樣的性質。在所有這些對於人敵視而無益的寄生蟲之中，自然界也造出了他——人，——然而也同樣造成了這麼一種野獸，和其他的野獸一樣。

這一種野獸原來是最感覺得到身體上的苦痛的，固然，他發展自己的自我保護的能力也就比其他的野獸，來得更加快，更加細膩，更加多方面。自然保護的本能，教會了他在植物和草類之中分辨出對於他有益的穀類，果實和藥草，訓練動物，穿起獸皮來，住在洞裏去，想出打獵的武器，自衛的武器，以及減輕勞動的石頭工具。

人的發明力逐漸的，慢慢的發展起來；觀察着鳥卵或是果殼怎樣浮在水面上，他就造出船來，用魚刺來做針，等等。這些發明，我們現在稱為最簡單的，原始的發明，卻是創造“第二個自然界”的最初嘗試的步驟，牠們在人裏面驚醒了飢餓和性慾的本能之外的認識“第一個自然界”的本能，——引起了自然科學的萌芽：計算，測量，輕重，以及自我認識的本能，從這裏發生了宗教和精神觀察的——思考的——哲學。

科學是文化的基礎，是主要的力量，創造那“第二個自然界”的；而“第二個自然界”正是文化。

宗教和精神觀察的哲學，照我看來，應當算是屬於藝術的創造的，這是人企圖把自己的經驗，自己的情感和幻想化成形象，把自己

的感想形成思想的一種藝術。人把自己的最好的願望，自己關於全知，全能的幻想，自己要想克服“第一個自然界”的敵視人的自發力量的要求化成了神道（上帝）的形象。

對於工人階級，這樣一種見解應當是特別接近的，特別明白的，就是說：在這地球上的一切都是人的理智，想像，意志的力量創造出來的，別種創造文化的力量是沒有的。

用粗糙的一塊塊燒煉過的泥土，工人會建築出非常之好的房屋，“文化之宮”，城市。從一些不成形的一塊塊鑽石裏，他造成了，而且還在造成着“第一個自然界”裏所沒有的一切東西，——錶，鐵路橋，解剖器具，蒸汽機的發動機，印刷機器等等，——他用自己的理智使得鋼鐵也有了精神。

學者，觀察着，研究着一切存在在“第一個自然界”裏的現象，教人用這“第一個”的力量去創造“第二個”，教人關心自己的健康，延長自己的生命。藝術家，觀察着人的內心世界——心理，——表現給人看他的偉大和卑劣，他的理智的力量和他的獸性的力量。

三個人是創造文化的：學者，藝術家和工人。先進的工人階級，像我們蘇維埃的這種工人階級，應當知道沒有一種勞動是沒有文化意義的，對於勞動的愛情越有力，——那末，文化也就越高，而且如果工人階級很好的明白科學，藝術，勞動的左右全局的意義，那末，他們對於舊世界的完全一般的勝利，也要來得更加快些。

我覺得，在這樣一種對於文化的了解裏面，也就建立着新道德的基礎，這種新道德應當把工人階級武裝起來，去實行堅決的鬭爭，反對還保存在工人之中的舊世界的恥辱的遺產的一切，——反對懶惰，酗酒，殘忍，反對那種趕緊要想弄好自己和人的市儈式的安逸生活，而損害他的階級的偉大，英勇的任務的小傾向。

(這篇文章最初發表在“文化進攻”的專刊，作者自己註明“一九二八年九月十日”。)

矛 盾

“大家的雜誌”，一九二八年九月號上，在“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問題”的標題下面，約瑟夫·史太林同志說：

“爲着建設——就應該知道，應該占有科學，應該學習。堅決的，耐心的學習。向一切人學習——向仇敵，向朋友，——尤其要向仇敵學習。”“我們前面的堡壘——是科學和牠的許多部門的智識。這個堡壘，我們無論怎麼樣都要奪到手。”

那裏，在同一個標題底下 N. I. 布哈林同志這樣說：“我們的時代需要勇敢的，工作的，文化的，勞動的戰士。”“工人可以養成這種勞動的戰士的羣衆。然而爲着這個，必須要有系統的，戰鬪的宣傳文化和勞動，需要文化的實踐的榜樣，而不要武斷的空談，尾巴主義，游民的或是市僧的個人主義，玩弄那小資產階級的廢物，可惜，在我們階級的落後份子的腦殼裏，還藏着這類的廢物呢。”

顯然的——這是很好的，正確的思想，而且表現得充分清楚的。然而就在那一本“大家的雜誌”上，N. 朵里諾伊的文章裏，引證了 A. 盧納察爾斯基登載在“共產青年的真實”報的論文，說：

“我們的仇敵，最容易，最沒有危險的從社會主義的建設造出什

際過渡到新美洲的轉變，來讚美勞動，讚美專門智識和會旋螺絲釘的人，說這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建設者”。

我把這些引證出來的話並列起來，並不是要“大家的雜誌”的編輯者看見他們的雜誌所宣傳的思想是矛盾的。尤其重要的，是在史太林布哈林和盧納察爾斯基之間，在對於勞動和科學的估量上，發見了“不和諧”之點。因為，一邊說工人階級必須要占有一切部門的科學，而另外一邊，知道科學不能夠容忍玩賞的態度，而要求嚴格的專門化，可是，始終認為宣傳專門智識是工人階級敵人的狡猾的圈套；這自然是不可調和的矛盾。

在對於勞動的估量上，也是很奇怪的，不可調和的差異：一邊要求“有系統的，戰鬥的宣傳勞動”，這勞動，大家知道的，是文化的唯一基礎，而另外一邊卻認為“讚美勞動也是敵人的圈套”，說敵人要想“把社會主義的建設轉變成自己的利益——野獸的利益”。

我自然相信，可敬的同志們會解釋並且調和這種誘惑的和有害的“不和諧”，這是關於極端重要的問題的，我敢說是我們這時候的大問題的“不和諧”。

我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向讀者寫些辯論的意見，現在非常之熱烈的喜歡辯論：這樣喜歡辯論，大概因為辯論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除開文字上的勇猛，用不着什麼別的東西；而辯論所引起來的，並不是多少誠懇的願意說明白，弄清楚那個真理，而只是一種辯論家的願

意——這倒是很誠懇的，——就是願意“表現自己個人的面目”。這篇文章的目的，卻只不過要和“會旋螺絲釘的人”談一談。

我是敬重並且愛這個人的。這個人的祖宗是希臘人亞爾希美德(¹)，發明螺絲釘的人。當敵人跑進了他的城，而有一個敵人跑去殺亞爾希美德的時候，這位老科學家，已經不能夠用體力來抵抗的了，他只說：

——不要動我的圖樣。

不久以前，我曾經勸一個文學家的同志，注意這麼一個事實：

人奇妙的會美麗的抱怨“生活的困難”。還在很古很古的時代，他們就把對於生活的抱怨，表現在極美麗的詩歌，故事，傳說，謠諺，格言的形式裏。那所謂“folklor”——民衆的口頭創作和文學創作，在文字發明以前很久就發生了的——都充滿着極有才能的，在形式的美麗上模仿不來的呻吟和呼號。然而人的耕種田地——現在還是這樣耕種着，——卻是用犁耙那樣無才的，粗魯的，笨重的工具。鋸子的發明，比學會做裝飾品——項圈和鐲子——要遲得多。

非洲的有些民族，直到現在還只用一根簡單的棍子，把一頭燒焦了，就這麼掘着土地耕種，然而他們已經會用木頭彫刻出極有表現力

(1) 亞爾希美德(Archimedes of Syracuse)，是古代的大數學家，生於基督紀元前 287 年，死於紀元前 212 年。

量的木偶。這種矛盾可以指出幾百種來。

物質文化發展史的博物館可以告訴我們，人類很早就迅速的，藝術的學會了製造自我裝飾的東西和傢俱——碗蓋，木器等等，——然而勞動的工具和器械，卻改良得很慢，很沒有成效。可以得到這麼一種感想，人永久是很熱心的，很有成效的幹着製造美麗的消遣品的技藝，而減輕自己的艱難的勞動，改良勞動的工具，他倒很少關心，並且幹得很壞。想到這個奇怪的矛盾的時候，覺得人是一種奇妙的有才能的生物，但是，也就同等奇妙的蠢笨。

這個矛盾自然可以這樣解釋，就是人的勞動永久是“不自由的”，是“爲着別人的叔叔”的。但是，俄國的工人民衆已經得到了爲着自己工作的自由。也許“得到了”這個字已經不適用了，應當說：父親們替孩子們奪到了自由。但無論怎麼樣，自由總是有的了。工人階級很熱心的，爲着自己，在建設勞動之宮，文化之宮，公共宿舍，以及牠有極合法的權利去享用的一切，應當滿足牠的日益生長的文化需要的一切。

然而爲什麼同時“紅三角形”(2)報，用着全部的真實力量，叫喊着套鞋的質量——壞極了呢？

很快的學會了拉手風琴——這個極端無聊的樂器，順便的說罷。同樣快的組織了幾百個着棋的“愛美”團體。着棋是極複雜的遊戲，

(2) “紅三角形”是套鞋廠的名稱。

每一次要化費很多的時間。自然，也應當休息休息。我也沒有忘記有人喜歡讀幾本好書來休息。

然而 爲什麼伊凡諾沃·沃茲訥先斯克(3)區的許多工廠小報，齊聲的叫喊着貨物質量的不好，流氓行爲，酗酒，對於女同志的粗俗態度？着棋那樣的細膩的遊戲，怎麼樣會和粗俗，酗酒；流氓行爲聯在一起呢？我自然懂得，着棋的人和流氓可以是文化程度不同的人。然而我們現在就着起棋來，拉起手風琴來，玩起“扔傻瓜”的玩藝來(4)，是不是太早了呢，這些遊戲的人是不是應當更認真些對待自己，對待沒有文化的羣衆呢？——我們是在這些羣衆裏遊戲呀。

我們這裏，非常之迅速的產生了許多足球家，郵票收集家，手風琴家的特別“種族”，而這些“種族”的識字程度卻可悲的低微。又不由自主的，要想起“藝術”傾向和減輕勞動，增加勞動生產的必要之間的奇怪矛盾。

同志們，的確的，你們看一看罷：這是多麼羞恥的廢話，——工人的工廠小報都在抱怨着：套鞋不好，紗布不好，玻璃不好，等等。一般的“大”報也結實的證明着：我們這裏工作得不好。如果停止這一切種種的抱怨一星期，那末，一定的，這種空前的“罷工”可以給國家節省下來的紙，還不止十萬鋪德(5)呢。

(3) 這是俄國最大的紡織工業區。 (4) “扔傻瓜”是一種膠木棍的遊戲。

(5) 每“鋪德”等於四十俄斤，約中國三十斤。

怎樣抱怨着？似乎就是那些自己給自己做着很壞的工作的人罷。看來，再沒有更簡單的了：如果這些人懂得了自己工作得不好，他們就應當立刻開始學習好好的工作。然而一年一年的，一天一天的，只在報紙上把這些單調的，咬着牙齒的抱怨寫着，彷彿“一根頭髮在牛奶裏”拖來拖去。弄出那麼發酸的“抱怨”的空氣，似乎形成了這麼一種特別的，專門抱怨的，唉聲歎氣的人的典型。而這個國家的經濟始終在生長着，“會旋螺絲釘”的人勤快的在旋着螺絲釘，西歐和美國的“事務界的”人看着這種人的工作，也逐漸的，違背着自己的心願，在說起來了：

——是的，這些布爾塞維克站得很穩；大概應當停止打倒他們的企圖了。

看罷，到處都是矛盾。

順便的，亞爾貝·託瑪——是個誰也不會懷疑他同情蘇維埃國家的人，他現在寫着：

“必須正確的敘述俄國的情形。誰也不再相信那部分每天預言蘇維埃制度破產的報紙了。關於俄國事情，應當有客觀的，可信的消息。”

上面，我把“藝術”那個字眼放在括弧裏面。這是因為，照我看來，古代的抱怨專家的才能——他們的抱怨困難生活的才能是無可爭論的，——到現在，已經用盡了，退化了。當時，人當着奴隸，“為

看別人的叔叔”勞動，“給戰士挑水”，他們工作得倒不壞，而抱怨得——也非常之好。而現在——如果相信報紙的話，——似乎是工作得更壞些了，抱怨得也不高明了。然而說一般的，到處的工作都更壞了，這是我不相信的，也不能夠相信。而自己抱怨自己，來得不聰明，不好看，沒有益處，——這倒是真的。

在現代的，對於生活困難的抱怨裏面，有點兒逼不得已的情形，似乎給了這些人一個命令：孩子們，抱怨罷！於是他們很起勁的抱怨起來。事情是很容易的，也用不着聰明，也用不着才能。

我覺得，在現代的，對於生活困難的抱怨裏，有點兒什麼“職業的”在內，完全沒有那種誠懇的態度，而使得革命以前的勞苦的抱怨有那麼樣的美麗和力量的，正是這種誠懇態度。

我自然不否認，在現代的，對於生活的抱怨裏，有很多的極簡單而粗俗的市僧式的貪心。人們要想儘快的享受生活裏的幸福和歡樂，可以一點事也不做。當然，這也是人情之內的貪心，然而我以為在我們這時候，這種貪心是羞恥的，危險的。要知道在沒有屋頂的房屋裏面，沒有可能佈置得舒服的。而且這房屋的基礎，也還沒有充分的堅固和深入。

我也不否認，生活還是那麼艱難，困苦。然而要使得生活輕鬆，就只有一個法子：集體的理智的勞動。這是真正能夠使得人自由和幸福的唯一的勞動方式。只有理智的，堅決的，集體的勞動，能夠克

服一切困難。

這並不是“文字遊戲”。這句話是文化革命的正確口號。文化是小小的“偉人”堅決，謙虛，日常的勞動所創造出來的，那就是會“旋螺絲釘”的人。只有這樣的勞動，纔能夠創造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自由的工人和農民的國家。在勞動的一切部門和一切過程，都要對於一個無可爭論的事實有明白的認識：就是在蘇維埃的國家裏，勞動民衆是在爲着自己工作，而且這個工作是全世界勞動民衆的模範和教訓。

這種認識的力量可以使得一切勞動和牠的一切方式都變成輕鬆的，這種認識可以使得一切種種的勞動都變成享樂，變成快樂的遊戲，比其他的遊戲更加來得奇妙，更加來得有益。

(這篇文章最早發表在“大家的雜誌”第四期，1929年四月號。)

論白黨僑民的文學

——據D. 郭爾白夫所著書

前面這部概論，是一個要想寬洪大量而也真會寬洪大量的人所寫的。非常之好的質量。有人說，這種質量並不永久是適宜的。我倒有點懷疑。

D. A. 郭爾白夫的客觀的口氣和論斷的有根據，使僑民文學家沒有可能說郭爾白夫爲着他們所愛的俄國民衆而給他們著作的那種估量是不公平的。

然而，假使他們看見了郭爾白夫的概論，那他們這些老牌人道主義者，他們這些愛民衆，愛正義，愛真理，愛美麗的人們，他們這些“沃斯瓦格”的編輯，他們這些“干涉主義者”和俄國將軍的歌頌者，助動者，以至於馴服的奴才，自然要被他氣得發瘋；那些俄國將軍，整整四年努力破壞着俄國的經濟，用人道主義者所愛的民衆的血，灌溉了俄國。俄國將軍幹着這件事的殘酷，——照我看起來，——要比外國的干涉主義者的殘酷，還要厲害，簡直不能夠比較；而外國干涉主義者是那些歐洲資本家的政府，互相打架打得發瘋了的政府所派來的，爲的要鎮壓“布爾塞維克的瘋狂”，——說得正確些——是爲的要用

俄國民衆身上剝下來的皮，去醫治自己皮肉上的傷痕。像大家所知道的，這些沒有受過好教育的，不文明的民衆，認為這種手術對於他們是多餘的，他們倒覺得“布爾塞維克的瘋狂”是健全的理智，他們把一切敵人從自己國內趕了出去，而現在，很有成效的創造着自己的，新式的真正文化。

僑民們不願意相信這個。

“什麼也沒有創造，而是在滅亡！”——他們很一致的講。誰講這個話？

德米特里·美列日珂夫斯基 (Dmitriy Merezhkovsky)，著名的基督教裏的愛上帝者，一個小小的人物，他的文學事業很像打字機的工作，字模很容易讀，——然而沒有心靈的，讀起來很沉悶。美列日珂夫斯基把俄國叫做“牝犬”，就是雌狗。一九〇二年他寫信給A. S. 蘇沃林 (Suvorin)，請求他出幾個錢來辦雜誌：“我跑到你跟前，像尼古狄謨跑到基督跟前一樣。”他自然知道這個“新時代”的主筆和出版家，無論在外表上在內心上，都不像基督。而等到蘇沃林死了之後，他卻盡力的誹謗這個死人，弄得“新時代”公布了那封美列日珂夫斯基的卑鄙的信，而維克多·布列寧 (Victor Burenin) 題上了四句詩：

我們對一切都安靜的着着，

可是要驚奇這個神怪：

此美列日珂夫斯基的尼古狄謨也，

忽然間變成了猶大(1)。

也就是這個美列日珂夫斯基，在一九一五或是一九一六年，他在“俄國言語”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不神聖的俄羅斯”，而在文章的末了吐露了這麼一句：“我們不同託爾斯泰在一起，我們是同高爾基在一起。”他吐露了這麼一句是因為他害怕革命，他本來是個很膽小的人。“我們”——大概是說的美列日珂夫斯基的一“黨”了，這個黨並不大，有五六個人。

齊納伊達·希辟烏斯 (Zinaida Hippus)，基督教徒，是個很有些特別才能的，也就有這麼特別兇惡的人。一九〇一年，她在彼得堡信託公司的歌舞廳裏，穿着一身白衣服，背上還繫着翅膀，跑到舞臺上對着聽衆宣布：

我要世界上所沒有的，

世界上所沒有的。

過了二十年，她就要“在沉默之中”把布爾塞維克來“絞死”了，這也就是我們這世界的一切昏蛋所要的。她就這麼寫着：

我們在沉默之中把他們來絞死。

趣味是怎樣奇怪的改變了呀。

這黨裏的第三個——D. 非洛索復夫，(Filosofov)，一個非常之

(1) 猶大是出賣基督的叛徒。

好的俄國女人的兒子，那個職業的恐怖主義者——就是兇手——波里斯·薩文珂夫(Boris Savinkov)的朋友，他熱烈的擁護着暗殺P.L. 沃伊珂夫(Voykov)的兇手卡維爾達(Kaverda)。第四個，是安東·卡爾塔塞夫(Anton Kartashev)，神學教授。去年，在一次巴黎的僑民集會上，他歇斯特里地叫喊着，請大家去打，砍，消滅“布爾塞維克”。也就在去年，據“最近新聞”報的消息，捷克斯洛伐政府徵求劊子手。這個可敬的職務，有十七個候補人去報名願意應徵，其中一個是神學教授。不知道這是不是卡爾塔塞夫，然而我認為這是可能的——是他。

配做劊子手的候補人的，我看還有美爾古諾夫(Melgunov)先生，基督教徒，這個人生着一雙冷酷的眼睛，而是那本撒謊得很的書“紅色恐怖”的作者。

他在這本書的序言裏，自己就申明他不能夠“對於我所引用的每一個事實都負責”，然而事實是引用了。他知道“白色恐怖總比紅色恐怖要厲害”，而他所暴露的卻並非白色的，而只是紅色的。他知道“復辟所引起的犧牲總比革命要多些”，而他渴望着復辟。不行，這些基督教徒，這些僑民的精神上的領袖的趣味是多麼奇怪呵。

在他們的旁邊，必須擺上那個著名的黑百黨⁽²⁾馬爾珂夫(Markov)，似乎也是基督教徒，這個人有一個槲樹似的腦袋，特別的蠢笨。

(2) “黑百黨”是俄國一種殺人放火的最野蠻的反動派的渾名。

如果我沒有記錯，那他就是耶甫格尼·馬爾珂夫 (Evgeniy Markov) 的兒子或者姪子，耶甫格尼·馬爾珂夫是小說“黑土壤的田地”，“庫爾斯克的外鄉人”，還有那本很好的自傳“小老爺”的作者。而這個馬爾珂夫第二的出世，卻大概是要來證明世襲貴族的智力上的沒落的。

這一類濃毛狗式的人物在僑民之中是不少，而彼得·史特魯維 (Petr Struve)，也和他們漸漸地混合起來，這也是個名人，“過去的”人，當初人家叫他是我們的一切復生的“約翰·克萊斯特爾”。他是俄國工業發展的歌詠者。不久以前，這個工業裏的一個事業家古卡索夫，擺出了老板面孔，把他從一個報館裏很粗魯地趕了出來，雖然史特魯維很忠實的很努力的服侍了老板的。史特魯維之外，還有 P. N. 米留珂夫 (Miliukov)，大學教授，文化史家，“家庭讀書指導委員會”的一個創辦人，過去是俄國社會的勤苦的啓蒙運動者，“立憲民權主義者”，後來做過總長，總之，是個偉大的罪人。現在他組織了“共和民權聯盟”，而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自己的報紙的第二千三百〇二期上說：

“用不着 demos (平民) 有懂得立法的複雜問題所必須的智識，或是認識國家管理的技術。”

“用不着”——是用斜體字特別着重的印在上面的，這大概爲着要安慰‘聯合起來了的無用傢伙’。而也一定是爲着他們，爲着這

些“無用傢伙”起見，他在自己的報上，印着許多驚人的兇殺新聞和最齷齪的“偵探”小說，這種東西在以前的“言辭”報⁽³⁾上自然是不會登載的。這個“啓蒙運動者”就這樣結束了自己的履歷。

再還有——A. F. 克倫斯基，“亞歷山大第四”。最後一次我是在冬宮裏，似乎是在亞歷山大第二的房間裏，看見了這個人。我記得，他引起了我這樣的一種印象：像一個在淫浪的貴婦人房屋裏的青年，還只剛才犧牲了自己的童貞給那個自然界，而已經覺得自己是個有經驗的，交了好運的荒淫家了。現在，他單調的，用那種歌斯特里的體裁，寫着社論，咒罵着那些不准他坐穩在他所心愛的位置上的人。不知道現在柴爾諾夫 (Victor Tchernov) 還幫不幫他的忙，從前在這件事情上維克多·柴爾諾夫總是替他幫忙的；柴爾諾夫是個全部用“引證古書”做成功的人，而且做得不這麼高明。他也不算受了侮辱；也沒有給他坐穩那個好位置。在他的生活裏，有過兩次非常之方便的機會，使他有可能脫離政治，而做點別樣事情，在他是更加勝任的事情，——譬如，做了販賣便宜帽子的小生意。第一次，是他的朋友，那個告密的叛徒亞瑞夫 (Azef) 被暴露的時候；第二次，是他自己從國民會議裏被驅逐的時候。然而不知爲什麼，他把這兩個機會都放過了，還在政治上指導着什麼人，還在做着“領袖”

此外，要說到達林們，託林們，瑞們，(Dolins, Tolins, Dans)，還有

(3) “言辭”報(Retch)是革命前後的立憲民權黨的機關報。

這麼二十來個過去的人，過去的社會主義者，這些人物(4)，列寧在當時無情地打過他們的耳光的。所有這些數過的人，互相討厭得痛苦極了，整個兒的精神上窮困了，被瑣屑的惡毒念頭喫光了。一年一年的，一天一天的，他們在誹謗和咒罵布爾塞維克之中操練着，而比他們當初批評專制制度，官僚主義和俄國生活的恐怖，要差得多了。

所有這些人們，只有一個心願聯結着：就是要消滅布爾塞維克，而使俄國的工人民衆去向他們鞠躬，向他們這些爲着民衆而“自己受苦”的人們鞠躬，並且請求他們：

“來做國王罷，來統治我們罷。”

枉然的期待——不會來鞠躬的，不會來請求的！

我把這些人數說出來，爲的要給讀者一個概念：僑民的青年和僑民文學家是生活在怎樣的空氣裏，被誰教養着。

應當還要提起，僑民文學裏的“高雅的監督”是唯美主義者的批評家猶里·愛亨瓦爾德 (Julie Eichenwald)，在“槽”報裏當編輯的，這個報似乎是最兇惡的，最無理造謠的，“法西斯蒂”情緒的報紙。愛亨瓦爾德鼓勵着舊文學家的精神，就是在吹脹他們，告訴他們還儘在成熟起來，儘在繁盛起來呢。他寫的是扭扭捏捏的文字，好像是很緻細的，然而沒有心靈的從外國文翻譯出來的東西。而且有時候，他在自己的單調而黯淡的文章裏面，還要加進一兩句對於布爾塞

(4) 這些人物都是社會革命黨和布爾塞維克黨的“理論家”。

維兒的辱罵，然而這並不能夠使那死板的文字活潑起來。他誇獎着文學家，他的乾兒子，誇獎着那種“形象”，譬如說什麼“大聲的小釘子”，“萊沃美爾微笑着在臺上表演”，以及這一類的玩意兒：他很注意的留心着文學家的“方向”。不久以前，他在 M. A. 沃索爾京 (Csorgin) 的小說“西甫切的斷崖”裏，讀到了這麼一段聰明的，準確的話。

“那種民族是沒有天才的，如果牠在解決幾百年來的爭論的時候，不去嘗試完全打碎舊的，可恨的偶像，而且完全改造日常生活，意識形態，經濟關係，以及整個的社會制度。我要輕蔑這種民族，如果牠沒有做牠所已經做的——而停止在半路上，讓那些學究的空談家來把俄國照着英國式的模型製造起來：國會，有禮貌的警察，弄得很光滑的謊騙。”

這唯美主義者的批評家立刻就警告作者，說：“這裏，對於許多讀者，‘西甫切的斷崖’要變成走不過去的陷阱”：

“也許，這裏的陷阱還不是怎麼走不過去的，在這裏，作者要想得到均勢，卻不願意看見舊的格言和新的格言之間的區別，舊的格言是爲着兵士想出來的：‘擁護信仰，皇帝和祖國’，而新的格言是爲着紅兵想出來的：‘擁護社會主義和蘇維埃政權’——這種句子同樣是‘不明不白的，用不着的’。不是斷崖，不是豁谷，然而而是陷阱”，他寫着；這個“然而而是陷阱”，更加使我相信他對於俄文的精神是不很了

解的(5)。他也是個人道主義者，基督教徒，他在這憎恨人類的報紙裏工作着，自然不反對昏蛋們在這報上印出那種啓事：對於 P. L. 沃伊珂夫的兇手的母親，“表示熱烈的悲痛的同情”，而對於她的兒子，“崇拜他的純潔的良心和高貴的性格”。

所有這些“拉撒路”(6)就這麼在發臭，基督也不會使他們復活的了，雖然他們還假裝着相信基督有使死人復活的力量。

我讀了僑民的報紙有六年了。最初我讀着，還很天真的莫名其妙的自己問自己：

難道這些各種各樣的沒有天才的政論家，就是那些俄國智識份子嗎？——他們以前學習着，並且教育着“小兄弟”：對於實際生活要有“神聖的憎惡”，實際生活也的確是從頭到底都充滿了虛偽，惡毒和謊騙的毒汁的。難道這是他們——以前那些佩服‘謊騙’的破壞家的著作的，佩服憂悶的史惠夫特 (Swift)，無情的嘲笑着的福祿特爾 (Voltaire)，神怪似的龐大的託爾斯泰的？他們教育了自己的孩子，要他們愛那個神聖的拉曼伽的武士(7)，——那個奇妙地理想出來的形象。

(5) 這裏是俄文裏文法和修辭的問題，第一，不應當說“然而是陷阱”，應當說“而是陷阱”；第二，“然而是陷阱”在俄文裏是“no rov”，這在讀音的方面是很不深究的句子。

(6) 拉撒路復活是基督教聖經上的故事。

(7) 拉曼伽武士就是董吉詞德。

他們青年時代的英雄是斯巴達庫斯，弗臘·多爾奇諾，瓦特·秦祿爾，託馬·蒙采爾，楊·古斯(8)，以及一切企圖用自己的血肉去創造自由的人，這種自由在世界上從來不曾有過，然而對於人是非常之必要的。

他們青年時候所愛好的詩歌，是強盜的歌曲，是浪漫詭克的抗議的歌謠，是臘晴歌(9)，是聶克拉索夫 (Nekrasov) 的憤怒的詩篇；看來，他們的真正的宗教應當是“社會的浪漫主義”。

現在，所有這些都沒有聲譽了，心靈已經啞了。大概，“唯物主義者”的布爾塞維克是對的，他們說，意識形態和無情的現實衝突起來的時候，就很容易的對最兇惡的，階級的動物心理讓步了。

生活條件，無論在什麼地方，也沒有像俄國智識階層之中那麼激烈的，那麼各方面的受着批評。無論什麼地方，也沒浪費掉這麼許多的讚美：——對於實際生活的神聖的和罪孽的破壞家，像基督，裴倫，尼采，以及一切供獻生活以“並非和平，而是刀劍”的人們的讚美。俄國的智識階層，認為自己是“歐洲的先進的智識階層”，他們的情緒是最大限度的革命的。

很難懂得——這個力量的全部，這麼快的耗費在什麼上了，耗費到什麼地方去了：極熱心的積聚起來的關於民衆痛苦的智識，企圖推

(8) 這都是羅馬，英國，德國等的古代革命家和農民暴動的領袖。

(9) 臘晴是俄國古代的農民暴動的首領。

翻暴君專制的嘗試，對於使一切人惡化的那種實際生活的憎惡的積蓄，對於正義的渴望，“對於民衆的愛情”，——關於這種愛情，俄國智識份子曾經互相的說明着，口頭上，書面上，高聲的，很不謙虛的，在大庭廣衆的面前。

我從來沒有訴說過什麼“對於民衆的愛情”，我不過簡單的知道了，現在也還是這樣知道：爲着俄國農民，必須建設這樣一種條件，使他能夠很快的學會更理智的生活和工作，這種條件要能夠讓他發展自己才能的全部力量。然而我很誠懇的相信過有一種人，他們的確“愛着”民衆——他們有一種什麼超自然的感覺，是我所沒有的。將來我有功夫，再來說一說，怎樣革命的智識階層把我這種信仰掘掉了。然而在一九一七年，我始終很苦痛的觀察着：當那瘋狂了的民衆，像一座灰色的冰山似的，從戰場上滾到鄉村裏，總算仰起了他們的龐大的憤怒的臉來要土地的時候，我很痛心的看見，這個臉色用自己的現實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立刻就把智識階層的“愛情”嚇退了，立刻就把他們那個黃鶯似的心靈嚇退了。黃鶯躲進了忘卻的樹林，而市僧道理的烏鴉代替了牠。

立刻，對於實際生活的批評態度的全部力量，無情的，真正的，積極的革命性的全部力量，都被“布爾塞維克”占有了。

我沒有忘記在那幾天的自己的立場，我記得那時候 V. A. 巴薩洛夫，也是個布爾塞維克，在報紙上把自己的同志叫做“昏頭顛腦的傢

伙”，這並沒有使我替他們很生氣，雖然在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是我所誠懇的愛着的，敬重的。我當時深信，“民衆”會把布爾塞維克，同着其他一切社會主義的智識階層，都給趕走，而主要的——是會把有組織的工人一起趕走。那麼，唯一的，能夠把國家從無政府狀態之中挽救出來，而使俄國歐化的力量，就要滅亡了。靠着列寧和他的同志的非人的精力，這是沒有實現的。

然而實現的是：差不多整個“革命的”智識階層，拒絕參加革命事業，甚至於拒絕參加文化工作，而文化工作在暴風雨的時期，比“和平”時期更加必要，——假定這所謂“和平”時期在這世界上是有的罷。而在這文化工作繼續的地方，——這是很知道的——牠，這種工作，差不多永久帶着敵視奪取了政權的人的性質。我時常看見，這是習慣上的傳統的敵意，因為人是只會在口頭上“敵視”，除此之外，什麼也沒有學會。

自然，我知道始終找着了很不少的智識份子，他們仍舊擔任自己的職務，忠實的堅定的繼續自己的工作，而那工作的條件是飢餓，寒冷，新政權的憲兵警察方面的敵視的懷疑和無意識的躑躅，——這是“小兄弟”方面的待遇，這“小兄弟”對於智識階層的敵視態度，並非單是一個什麼亞契莫夫·馬赫諾夫派(¹⁰)所教育出來的，——你們都

(10) 馬赫諾夫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的派別，他們傳染着游民無產階級的心理，機械的把勞動平民和“智識階級”對立起來，認為一切智識階層的分都是反動派，無用的，該“打倒”的等等。

知道，這個罪過是要更大些的人物擔負的。

留在俄國的智識份子，直到現在還在這裏繼續着自己的英勇的工作。僑民報紙上的“從俄國來的”，“從莫斯科來的”，“從外省來的”通信，並不是他們寫的；那些不通的，無聊的信，很明顯的是在俄國以外的什麼地方捏造出來的。我親自知道，有些時候的“從莫斯科來的”字樣，應當讀做“從柏林郊外寄”。

僑民報紙所引起的我的天真的莫名其妙的驚奇，在列寧病的時候，變成了對於這些報紙的厭惡。

我在這世界上活了半世紀以上，看見了不少，讀到了不少蠢事。然而我不記得有什麼相像的事情，可以比得上那種醜惡的挑撥，那種瘋狂的叫喊，那些造謠和誣蔑——從這“文化的”僑民之中所放出來的，那只是因為一個人的病和死，這個人在復興俄國的工作裏用盡了自己的力量，而俄國正是被最蠢笨的專制制度，最可恥的戰爭和最無用的將軍們的野蠻的流氓行爲破壞了的，這些將軍們，屠殺着你們“所愛的”民衆，毀壞着許多城市，算是來“挽救俄國”的。

僑民報紙的不識羞恥，無恥主義和造謠誑騙，本來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拿來比較的，除非是他們的僞善。我並不崇拜一些政論家的文調，他們不肯分辨意見自由和用語粗俗之間的區別；而我在這一篇文章裏的語句也很激烈，這卻並非因為我願意模仿僑民報紙裏的流氓，而只是因為我沒有更確當的字眼來表示我對於他們的輕蔑和厭

惡。

最不識羞恥的，是來說布爾塞維克的“渴血症”，要知道那些組織了四年的全世界各種民族的戰鬥的人還活着，那些關心着“全世界的和平”而現在正在如此之努力的絞死，砍殺的先生們還活着。

沒有比例的偽善，是只來叫喊些紅黨的殘酷，而不提起淫昏地屠殺紅黨的事實，關於這種屠殺，白黨自己在回憶錄上那麼誇口的敘述着呢。爲什麼有時候不在自己的報紙上翻印一些這類的，譬如德尼索夫先生在“自由思想”上的那種很有教訓的敘述：

“古班的解放者，波克洛夫斯基將軍，他在梅珂普地方（一九一八年秋天）殺掉了兩千俘虜，從此之後，就沒有再捉過一個活俘虜，——他有很深的，烏黑的眼睛，軟和的，注意的，像小孩子似的，或是像幻想着的女人似的放着光彩的眼睛。‘唔，還有什麼給你們消遣呢？——他張開着兩隻手癩洋洋地說，——還是看看我的畫片集上的蘆葦風景吧……’他拿出一本粉紅緞面，鑲着四隻角的又長又厚的畫片集。第一頁上的照片：一所不這麼大的房屋，屋頂上面插着司令的格沃爾奇旗子，在屋子前面站着的是將軍同副官，就在他們前面絞死着四個人……第二頁上：是在伏爾加河岸的峭壁上滾着兩個人。都有紅軍軍官的袖章……第三頁上：是曠場，絞死着便衣的。副官就解釋了：‘捉住了幾個有主義的。給將軍去說，怎麼辦呢？——有了俘虜了。——他的答覆是：腦袋！正要絞死這些有思想

的。總之，沒有思想的，只要打一頓，給點燒酒喝，再趕出去打仗好了。而有思想的又怎麼辦呢？……’第四頁上：就這麼簡單的一棵樹，樹上掛着什麼似的……‘自然界要人用！——將軍一隻眼睛溫和的微笑着說，——我和普森一樣，受不住死板的自然界……’我們大家都笑了，走到附近一輛車子裏去喫晚飯。喝過了香檳酒之後，兩個亞爾美尼亞人（一個彈三絃的，一個彈曼陀林的）彈了很久的吉潑賽的情歌和民歌。”

這樣的敘述多得很，我很要勸美爾古諾夫注意一下，他可以從這些敘述裏，再編出一本書來。

多麼奇怪的容易忘記了那些似乎很記得住的，很有教訓的殘酷行動：像一月九日在彼得堡，十三日在里加，白克芒將軍和沃斯特塞貴族的殘殺拉特維亞人，崙能康甫的屠殺西伯利亞人，屠殺喬治亞人，以及一九〇六——〇七年“鎮壓專家”的其他功績；轟殺猶太人，在林納地方的屠殺工人羣衆，在茲拉託烏斯特，在各處；沃爾洛夫的，以及其他的苦役監獄，阿穆爾（黑龍江）的車道；以及其他的無數的血的教訓，這都是專制政府給俄國民衆的；俄國民衆本來就是傾向殘酷的，我是這麼斷定。爲着安慰‘民衆崇拜者’起見，我可以說，俄國人在殘酷方面有絕對的才能。在這種方式的才能上，我連你們也算在內，雖然你們的殘酷暫時還不過在口頭上。然而我想，如果……，

那你們會斫殺許多人呢。

自然，我並不願意替什麼人的殘酷辯護。然而必須承認這樣一件事實，就是在歐洲的民族之中，任何一個都沒有在這樣恐怖的血腥，敲打，最無恥的羣衆屠殺的大學校裏，這樣公開的，這樣用心的教育過民衆，像俄國民衆所受到的教育。大家知道的，從一九〇五年起，俄國的水手受盡了無可形容的苦痛。大家知道的，俄國兵士的生活是多麼不可忍受的困苦；多麼無情的，淫虐的鞭打了俄國的老百姓。對於你們，俄國民衆變成了這麼討厭的通紅的紅黨，就因為他們從頭到腳都浸透了鮮血。

有人想說服我，說所有這些野獸行爲都毫無痕跡的過去了，而民衆仿佛保存着什麼良善的，溫和的，特別的俄國心靈，這種心靈不記得那些痛苦，侮辱，不知道復仇，寬恕了一切。

然而，先生們，要知道這樣的心靈，那才真正是死的心靈！將來的，非常之好的俄國的幸福，是已經沒有了這樣的心靈了，即使承認在以前的什麼時候曾經有過的罷。現在，這種心靈的半死不活的夢已經醒了，這個心憤怒起來了，牠正在憤怒着，而漸漸的，表現着自己要求生活的意志，越來越聰明了，越來越堅強了。

這個心靈表現着自己的意志，並不是親熱的，並不是寬洪大量的，而是有點兒可怕的。這始終還不是健全的心靈，牠還太清楚的記着不久以前的事情，恐怖的事情，牠怕這種過去又要回來，牠被復

仇的毒汁毒害了。你們得同意：牠是有權利憎惡的，牠也的確有仇可復。而事實上，流血的俄國革命比應當預料到的流血要少得多呢。革命的流血還可以少些，如果你們這些先生們的行動客氣些，更適合些你們的才能和能力，不去糾纏在將軍們的冒險裏面，不去請求外國的干涉。革命的發展還會更安寧些，更有成績些，如果你們會忘記一下勇猛行動的人的錯誤，忘記一下你們所受到的“不方便”，你們親身受着的欺侮。然而你們既不會忘記，也不會了解，因為你們的小氣。其實，你們也是一樣的蠢笨的復仇性的，像俄國的黑暗農民，穿着軍裝，制服，兵士大衣和水手服裝的一樣。至少，在口頭上，你們也是一樣的野獸，不過是更可憐的罷了。

有人給我說，在烏里茨基被暗殺之後，一個水兵開鎗亂打，打的也許是一些絲毫沒有罪過的人，他叫着口令說：

——“向這些昏蛋，開整排的排鎗！”

之後，他就發了瘋。

太太們，先生們！我並不是犯淫虐症的，逼不得已要向你們說着我現在所說的話，我並不覺得給別人痛苦有什麼快感，而這種快感，在你們報紙的每一個字眼裏面，在你們反對俄國和布爾塞維克的每一個字眼裏面，卻都可以感覺得到。

我覺得你們大家也發了瘋了，然而並不是因為復仇心所引起的刑罰的恐怖，像那個不幸的水兵的發瘋似的，不是的；你們的發瘋，是

因為自己的兇惡。因為虛榮心重的人永久喪失了生活裏的地位而發生的那種卑鄙的兇惡。

你們這些人的利己和你們的無能是同等的，你們的自以為是也和你們的無力一樣。你們的無力是歷史的事實，無可爭辯的事實，這種無力，無論是白黨將軍，無論是“外國干涉”都不能夠幫忙的。你們記記看，那些將軍怎樣容易的使你們伺候他們的極簡單的，顯然是土匪式的目的。

從那時候起直到現在，領導你們的主要情感，只不過是自己受了欺侮的情感。這種情感是有原因的：你們在俄國文化的發展過程裏，的確起了很大的作用，你們在這個文化裏面，是充分努力的普通工作人員。然而這種工作，並不能夠辯護你們的妄自尊大，也不能夠辯護你們對於那些敢於奪取政權而現在管理着俄國的人的惡毒。他們管理着呢，——雖然你們用盡一切力量，要想不看見蘇維埃政權的成績，並且不相信這些成績。

是的，在俄國現在的管理是殘酷的，然而要知道這是在這樣的一個國家裏面：以前是每一個警察都覺得自己是恐王伊凡⁽¹¹⁾，而每一個智識份子都覺得自己是左右世界運命的人物。孔斯坦廷·列翁替耶夫和聶察耶夫的精神是相同的，朵斯託耶夫斯基和波別多諾斯

(11) 伊凡第四是俄國古代的國王，最暴虐的，所以有“恐王”的渾名。

切夫(12)也是這樣，而這些都是十足的俄國人。

你們請了“十二種言語”來反對俄國的民衆；不應當再罵什麼殘忍的了。尤其是現在，你們已經因爲自己的惡毒而完全發了瘋，只要看你們對於列寧的工作和死的那種可恥的態度，就可以見得的了；列寧的名字將要永久是俄國的光榮，關於他，我們現在的最偉大的唯心主義者，非常之好的心靈，羅曼·羅蘭就說過的：

“列寧是我們這世紀的最偉大的人，最無私心的。”

列寧將要留在俄國歷史上，而你們，被無聊，惡毒和愁悶所磨折的人，很快就要躺到自己的墳墓裏去的。也已經是時候了，爲的不要再變換一次戰線和路標。因爲雖然你們現在敵視布爾塞維克，然而難道說得來今天的“好好的”俄國人明天又要做誰的奴才呢。你們自己知道，你們營壘裏的人怎樣容易跑到你們敵人的營壘裏去。你們大概是不會錯的，懷疑着你們的許多朋友的叛變主義只是出於貪慾的動機。

你們快要跑進這麼一個世界裏去，那裏，除開你們自己之外，誰也用不着你們的兇惡，而在你們，那種腐爛的兇惡也是很痛苦的。布爾塞維克卻要留下來的。他們，從自己的目的退後幾步，又重新向着目的走去，在不了解，造謠，誣蔑，野獸似的叫喊和咕咕的空氣

(12) 這是說一些殘暴的軍閥和殘酷性的文學家、著作家，都有同樣的性格。

裏，始終在向前走着，而領導着俄國農民跟着他們走。你們的孩子要離開你們而到他們這邊來的。你們不自覺的在教會你們的孩子，使他們懂得你們的無力，你們逐漸的暗示着他們，使他們輕蔑父親，輕蔑你們這些精神上的破產者。

然而，即使這麼想像罷，布爾塞維克去了，而在你們面前，有了回到俄國去的自由的道路。你們用自己的良心的殘餘想一想看：你們現在還能夠拿給俄國民衆什麼？要知道你們的心靈裏，什麼也沒有的了，“民衆”也沒有了，你們向來不很知道民衆，而現在是完全不知道。我個人深信，你們只會給俄國增加些精神上的叫化子的數目——還是一些殘餘，——以及卑劣化的惡人的數量。你們不要說你們不會糟踐人，不會敲打，屠殺，——我不相信這種話。你們現在就在天天證明你們會幹這類事情的傾向。我深信，你們一定會殺戮許許多人。你們現在已經在詩歌裏，在散文裏，用絞刑和斫殺在恐嚇。

你們完全是白費力的說什麼愛俄國，說什麼人道主義，以及諸如此類的話。繼續以爲自己是人道主義者——習慣地，機械地這麼想，——你們總還記得，譬如說罷，反猶太主義算是醜惡東西，然而關於拉特維亞人，一般的關於“別種種族”，你們還是像反猶太派說起猶太人似的口吻。誰會相信你們的人道主義，讀着並且感覺着你們是多麼高興的指摘着俄國的錯誤和失敗，而俄國的成功是使得你們多麼真誠的痛心？！

不管你們怎麼去說布爾塞維克，然而他們是擔負了鉅大的重任，要去解決非人地困難的任務，因為這個任務是要實現全世界最賢哲的，最真誠地愛人類的人所幻想的一切。

在這些人之中，沒有你們的地位。你們的玩意兒是輸了。這是殘酷的血腥的玩意兒。我再說一遍：你們枉然說什麼人道主義。你們的惡毒是瞎子的狗，——牠自己暴露了你們的褊狹的可恥的畸形。

在歐洲，誰也沒有像俄國的智識階層那麼高聲的埋怨着生活。整個的俄國智識階層，被鎖住在資本主義國家的苦役的各種各樣的鐵樁上，這資本主義的國家僵屍化了，腐爛了，毒惡了人。他們的先生，郭果里，朵斯託耶夫斯基，託爾斯泰，很正確的說，生活因為自己的虛偽，偽善，畜生性和無恥的利己主義，所以可惡極了。

生活暴露了自己的無恥主義而更加可惡了。在這憎恨，惡毒，復仇的空氣裏，人簡直不能夠呼吸。這種空氣，越來越濃厚，很有爆發一次最後的暴風雨的危險，這種暴風雨可以破壞並且掃蕩人類的一切文化成績；反對着這種空氣而工作的，只有俄國。社會主義蘇維埃聯盟在意識上組織着全世界的勞動者。

要衝出階級，黨派，集團的畸形的相互關係的嚴密的羅網，沒有別的方法，只有一下子撕破這整個的羅網。

正是在俄國，開始了最必要的“我們時代的事業”，完成着一種企圖，就是要把生活從愚蠢，嫉妒，貪心這三條“鯨魚”上，移到理智，正義，美麗的基礎上去。這個工作，驚醒全世界一切忠實的人的真誠的注意和同情，驚醒幾千百萬人的思想。

而在“過去的英雄”方面，這種工作明顯的只驚醒他們的惡毒。我說“明顯的”，因為我深信：祕密的他們也不會不羨慕布爾塞維克。要知道，這些人是在生活着，工作着，將要生活着，而且堅決的深信，除開他們之外任何別種政權在俄國都是不可能的了。

苦役囚徒的那種心理對於他們是完全不對勁的，那種對於國家的鎖鍊和鐵樁的拜物教式的態度——是不對勁的。他們極端倔強的不理會“歷史的運命”，雖然在口頭上似乎承認這歷史運命的公律。而在事實上，他們的行為是老百姓式的簡單，他們深信：

“運命不是我們的審判官，而我們是運命的主人。”

僑民時常罵布爾塞維克，說他們“曲解馬克斯”，不“照着馬克斯”生活。這當然並不完全是這樣的；然而馬克斯算什麼。他們還要有罪孽些，他們連“照着達爾文”生活也不願意，倔強地要消滅人與人之間的生存競爭，爲的要把那種無意識的競爭所吞沒了的全部力量，都轉移過來，去進行人對付自然界的鬭爭，爲着要使自然界的自發的能力服從人類理智的利益。

而國外的智識份子，在愁悶和無聊之中唉聲歎氣着，很快的耗費着殘餘的力量，事實上只在可惜着一件事情：就是那些“心上很甜蜜的晚上”，可以圍着茶壺坐着，操練着自己的詞令，談些關於專制制度的專橫，關於對民衆的愛情，以及關於整個宇宙構造得不方便的題目。

很可能的，假使普洛美特斯(13)自己，又偷了什麼照耀生活祕密的新的火，來到他們那裏妨礙了他們的喝茶，——那麼，他們連這個普洛美特斯也要詛咒了。

(這篇文章最初發表在莫斯科“真理報”，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一日，題目是“關於 D.A. 郭爾白夫的書‘論白黨僑民的文學’。”原稿註明的日期是 5, IV, 28 年。)

(13) 普洛美特斯(Prometheus), 是神話上的偷火給人類的人。

答 覆

這篇文章——是我對於這一年來各種各樣的人寄給我的信的盡了我的力量的答覆。回答每一封信，我是沒有體力上的可能。對於反猶太派，反革命者，以及一般昏蛋的信，我不回答，也不再回答了。我看，只有那些青年人，他們因為文化程度的不夠，因為沒有組織好的日常生活的觸動和激刺引起了皮膚上的戰慄，他們對於現在的現實，提出太高的要求，現實還不能夠滿足這些要求呢，——只有這樣的青年，才值得答覆。

我想，他們並不是壞人，然而那種一定要“好的”生活，而且一定要“爲着自己”的生活的渴望，使他們變成了盲目的；他們不看見，也不了解，現在蘇聯所發展着的歷史過程，正是向着建設“好的生活”的方向很快的發展的。然而，假使寫信給我的人，永久站在那種不大通的，不負責任的，個人主義的“批評主義”的溼滑的，爛泥坑似的基地上，冒着沉沒到耳朵邊的危險，假使他們在自己裏面找不到離開這個死地的意志的力量，——那末，我想，“好的生活”輪不到他們，也根本不是爲他們的。

一切種種道理，都是從一些考察研究所得來的，小小的，簡單的真理積聚起來的。然而，在沒有寬恕的鬭爭裏面，在爲着生命，爲着“自己的個性”的恐懼裏面，自我保存的本能使得人不能夠不“狡猾地講道理”，因此，人就用狡猾字句的垃圾和灰塵掩蔽了簡單真理的光明。於是就有必要來掃清真理上的垃圾，提醒一切種種真理是怎樣產生的。

人類文化是一種生物學的現象，牠表現着，理解着，鼓勵着人要求生活的意志，——這是一種盲目的意志，凡是生物都有的：植物，蟲豸，禽獸。人開始創造自己的文化，是從他感覺到自己是比別種野獸更弱的動物那時候起的。這種‘脆弱’的感覺，使得他的自我保存的本能更快的，更有効力的發展起來。正是在人的自我保衛的本能的基礎上，發展了他的最寶貴的能力——考察的能力。這種能力，連螞蟻，烏鴉，老虎也是有的；然而人考察着，比較着，把考察的能力發達到了更有價值的——努力，要去認識生活的一切現象。後來，認識達到了純正科學的高度，而在我們現在，這種認識已經逐漸的變成本能，已經變成了人的一種生物學上的，有機的特性，像他的笑和段落分明的言語一樣。

以前這麼說着：“愛情和飢餓管理着世界”，所謂“愛情”是說的傳種的要求，所謂“飢餓”是說的肉體上的飢餓；然而在我們現在，我們已經有權利說到第三種的本能——認識的本能，智識上的飢餓。

考察，照牠的本質和結果來說，是人在反對自然界的鬭爭之中的主要的工具和正確的方法，這是人的文化發達的主要基礎。

火會燃燒；要感覺火的益處是容易的，而學會取得火的方法，卻要難得多。人看見樹木的磨擦也會發生熱度，就學會了取火的方法。人就用磨擦去取火——這方法我們直到現在還用着，擦着火柴。蠟燭，後來的油燈，是怎樣發明的呢？人晾着他所打死的動物的肚腔，遇見了晚上的黑暗，就用一塊樹木插在肉裏面，那裏是有許多脂肪的。人就看見那樹木吸收着燒熔了的脂肪，燃燒得更加明亮，更加長久些，用着這樣的“燈盞”，人過了幾千年，甚至於現在已經有了電燈，也還要用牠。

人考察了果子的或是鳥蛋的殼怎樣浮在水面上，就發明了船。後來，人做到了使鋼鐵做的鉅大的船隻，能夠在水上浮動。人看見風吹倒的樹木的根會掘起泥土和石塊來，就懂得了槓桿的意義，這是後來的機器的基礎。人考察着蜘蛛的結網，學會了織布。很可能的，人把獸皮縫起來，遮蓋自己的身體，抵抗寒冷，是學的鳥，——有些鳥會用樹葉縫自己的窠兒。現在這樣強有力的武裝着的人的一切東西，都是這樣發見的。

我們的生活還要輕鬆些，我們之間的關係還要好些，如果人知道了，記好了，這世界上除開人的意志和理智沒有別的創造力量。以爲在人之外，另外存在着什麼別的理智力量的那種概念，是從自然界

的原始性的混亂之中發生出來的，那時候的理智還只武裝着極渺小的經驗，因此，牠自己也是很渺小的。在那時候，如果有一塊石頭從山上脫了下來而往下滾，那末，人不懂得這是什麼力量在使得石頭轉動起來，他以爲在這地上和天上引起各種各式運動的力量，都是他所不能夠了解的。他被一些自然界現象恐嚇着，又被另外一些現象愛撫着，他就把他所不了解的一切都當做神道，甚至於把死也當做神道，——而死卻是停止一切眼睛所看得見的運動的力量。

有幾個寫信給我的人發議論，說到“最主要的”題目：說到愛情和死亡，他們尤其不放心的是死亡，“這是攔住了一切活的道路的”。

我很接近的知道二十多個並不這麼笨的人，他們以爲關於死亡的思索，會使他們更聰明起來。他們引起了我的各種不同的情緒；然而我公開的說，對於哲學家最不冤枉的是可惜一下那樣的時間，那時間——是額角碰在石牆上而從眼睛裏冒出了火星，他們卻要用這些火星去照耀夜的黑暗，就這樣無結果的枉費在這種企圖上的時間。

我覺得，向着這方面努力於“精神觀察的工作的熱情”，會使得“認識能力”滯鈍起來，而把“精神觀察者”引導到黑暗的角落裏去，在那裏，青年的哲學家出於自己的意料之外的，‘精神上’得到這麼一個結論：“寫完了，而覺得，這不是我，共產青年團員，馬克斯主義者所寫的，而鬼知道是誰寫的。

我想，‘講哲學’不應當那麼“精神觀察地”，而應當緻細的觀察，

不要照着書本，而要依據直接經驗的事實，運用現實的極豐富的材料；在這現實裏面，正在發展着“我們這世紀的偉大事業”——建設着“新的世界”。而且應當知道並且記得，這個現實是要縮短歷史所規定給牠的期限的，而在那所謂“哲學”方面，卻早就預先準備了許多東西，正要來阻礙“我們這世紀的偉大事業”的發展。

如果青年人只在想着：過了五十年，他們將要從地面上走到地底裏去，“到那世界空間的黑暗和寒冷裏去”，或是“到不知什麼地方去”——像他們所寫的，——那末，這就是說，這種人已經離開了生活。而生活是妒忌得很的，對於不做事的人是不肯寬恕的，所以，青年人不應當覺得侮辱，如果生活打着他們的後腦，把他們推到玄學的荒地上去。生活，——不管人的罪過所造成的那些表面上的畸形，——始終是生物學地健康的，充滿着熱血的，牠要求強壯的，勇敢的，能夠營養牠的人，而手淫家和空談家，牠是要毫無寬恕的掃光的。

我以爲，在一切“估量人的相互關係和世界的哲學系統”之中，最好的，最正確的一個，正是還沒有存在的，可是正在建設着的那一個。這系統是個什麼樣的——我不知道，而猜想牠——也不是我的事情。

關於“愛情”，我不來講了。可是，我要說，在性慾方面，——在我看起來，——青年往往放任那麼樣的胡鬧，過一個時期，這些胡鬧者要出很大的代價呢。我很誠懇的願意那嚴厲的報復期限，對於胡

鬧的愚妄和羞恥的報復，儘可能的快些來到罷。

順便的說說狗。狗對於人的友誼的情感，倒是很有益處的，可以學習一下，然而在其餘的方面，人卻不應當模倣這個四腳朋友。

✽

像我們這世界的一切現象一樣，死亡也是應當研究的一個事實。科學越來越注意的，越來越堅決的研究着這個事實。研究，這意思就是——占有。

死亡對於生活也有牠的功績，——死亡消滅着一切做完了的，活過了的，無結果地累墜着這土地的。有人可以說，死亡也不饒赦小孩子，這卻是還沒有發展的力量，牠還時常殺死一些成年人，也是沒有來得及做完自己的力量。時常，天賦很好的，對社會很有價值的人，在青年時代就死了，而無聊的傢伙和空談家，一直活到非常之老的時候，鸚鵡就要活到一百歲以上。所有這些——也的確是這樣。然而這些可悲的事實，牠們的原因並不是什麼“死亡的盲目，自發，不可克服的力量”，而是社會經濟性質的不健全和惡劣的條件。社會上有價值的人的早死的原因，通常總是體力上的過份疲乏，而這是那種對於人的關係的結果；那就是野獸似的“老板式的”對於人的關係，只把人當做勞動力看待，只想趕快的“利用”這個勞動力，唯恐怕給別的老板利用了去。大家知道的，成千成萬的工人和職員，不到時候就衰弱了，滅亡了，這是由於無恥的，下流的，而且時常是無意

識的緊張的剝削他們的力量。

人因為霍亂，傷寒，瘧疾，肺癆，鼠疫等等而死亡。然而要知道，在“文化的國家”裏，並不一定要存在着引起這些疾病的微生物呵。並不一定要在那些非常美麗的大都市的周圍，緊緊的箍上一個骯髒的市郊的圈子，使那裏的房屋塞滿了許多人，像塞滿了垃圾的地洞一樣。奢華的旅館在社會上並沒有很好的醫院那麼重要。重複這些最粗淺的真理，實在很不好意思，然而看來對於不大‘識字’的人，這是必要的。

資本家的“文化”政權的擁護者和贊助人，不能夠不自己說服自己，說如果虱子咬屁股，那末，這並不是虱子不好，也不是屁股不好，而是“自然界的公律”。不對，不好的正是市儈的屁股，這種屁股坐慣了很安靜，很舒服，很軟和的地方，——要知道正是市儈的屁股造出了，保存着那些條件：放任虱子，臭蟲，窮困，醜陋，不識字，迷信，偏見的存在，以及勞動貧民世界所病痛的一切，這個勞動貧民世界正在為着市儈屁股的舒服而不斷的工作着。

看罷，蘇聯還只剛剛開始改良兒童教育和母性保護的社會條件，兒童的死亡率立刻就降低了，並且還儘在降低着。而工人的健康更加堅固了，因為有放假制度，“休養所”等等。

大家知道的，“文化的國家”寬洪大量的浪費着金錢在生產鎗械，大砲，飛機，坦克車，炸藥，毒瓦斯，以及一切屠殺羣衆的東西。殺人

的價值越來越昂貴了，吞沒着幾萬噸的金子，這都是工人製造出來的，用租稅的形式從許多人那邊收集起來的，而那些人就因為這個，要被鎗殺，炸死，毒死，沉死在海底裏。

大砲，炸彈，機關鎗，iprit，以及這種奇妙的屠殺羣衆的其他東西的工廠主，準備着將來的國際大屠殺，他們和歐洲中世紀的貴族，決定了掠奪富裕的東方，準備去佔領耶路撒冷而“解放天主的棺材”的，是同樣的熱心，自然還要更加結實，更加精密。區別只有這麼一點：對於現代的“沒有恐懼，不受責罵的武士”，耶路撒冷是在許多銀行所集中的都市街道上，而“天主的棺材”卻在保險箱裏。

看罷——這是爲着死亡的工作；那些非常之感覺到蘇聯生活的不舒服的青年人——其實這生活還只是剛才開始在新的形式裏建設起來，——應當把自己的注意，自己對於哲學的傾向放在這一方面來。我覺得，許多青年對於個人的不舒服，侮辱，不幸的感覺，發展得太病態了。這是不好的徵象，這是生活能力發展得太微弱的徵象。生活要求強壯的，忍耐的人。

死亡，消滅着那些沒有把自己的力量完全用盡在事業裏的人，這還並不這麼有害，——這裏，人可以限制死亡的力量和工作，如果他們更注意的，更謹慎的互相照顧着，如果更大量些化費一些經費來保護健康，注意衛生，消毒，和研究疾病的原因。科學戰勝了疹疾，霍亂，喉痧，鼠疫，——傳染病，因為這種疾病，是可以過早的死掉成千成萬

的人的。醫生一天天的更加有經驗起來，成爲反對死亡的更勝利的戰士。

死亡的害處，卻在於牠暗示人對於牠的恐懼，使得有些人浪費自己的寶貴的力量，去“精神觀察地”研究哲學的“死亡祕密”。然而哲學連芥末也沒有想出來，而芥末和蓖麻油在反對死亡的鬥爭裏，比蕭本豪爾或是E. 哈特曼的哲學要有益得多。

死亡的害處，是在於因爲對牠恐懼，所以人的想像就造出什麼上帝，什麼“那一邊的世界”，以及那種愚笨的空想，像天堂和地獄。然而我們早就達到了這樣的程度：我們這些“會死的”人——鑛學工程師，鑛工，鐵匠，比地底下的火神吳爾康還要巧妙，而電學技師比辟特以前的雷電的主神，還要有能力，對於生活還要有益處。

“那一邊的世界”是在我們情感的黑暗區域裏，這種情感和原始人類的情感比較起來，其實並沒有多大的區別，因爲死的恐懼統治着這些情感，同時還有“傳種本能”的混亂的工作，那傳種本能的無理性的行動也是死的恐懼所激動的。假使“那一邊的世界”是存在在宇宙的某個地方，那末，我們一定也要發見牠的，先組織好太陽系之內的各個星球之間的交通，再弄好各個世界之間的交通。然而這可以不必十分心急，先關心着這個地球上的生活的良好建設罷。

還用得着說嗎——“天堂”是巫祝和“教會神父”的很蠢笨的空想，這種空想的作用是要對於在這世界裏受着地獄似的痛苦的人，給

一個肥皂泡似的希望，說是可以在別的地方去休息休息，這算是報償？此外，還計算着，對於上天的天堂幸福的幻想，可以在窮人的眼光裏，稍微掩蔽一下，甚至於完全撲滅那富人在地上的生活的華麗而誘惑的光彩。

死亡的害處，是在於宗教建築在對於牠的恐懼之上。在原始人類的自覺生活的初期，宗教的創造是他們的一種嘗試，要想組織自然界現象的混亂形態，而把這些現象變成類人的神道的形象，——這是民衆的創作，裏面並沒有絲毫恐嚇，而有一定的社會利益的意義，幫助思想，幻想，想像的發展，直到現在，還沒有喪失一種“藝術”創作的價值。

巫祝和教會中人，消滅了藝術性的宗教的創作，而從民衆的宗教概念裏造出了愚笨的，恐嚇的道德系統。他們用這個手段很久的阻礙了思想，宇宙認識，幻想，想像的自由發展。

對於文化的發達，特別有恐嚇影響的就是基督教，牠把古代人所造出來的類人的神道都變成了仙魔，而使這些仙魔充塞了全世界。基督教產生了成千成萬的僧侶，他們因為恐懼着仙魔的力量，就對人宣傳脫離世界，傳染給人一些黯淡的陰慘的迷信；而誰的思想是反抗這種狂妄的禁慾主義和教會的畸形化的壓迫的，他們就認為他是仙魔的俘虜，異端，大逆不道，妖魔，而把他活活的在柴堆上燒死。除開基督教之外，沒有一個宗教想到製定那種“神聖的宗教裁判”，這

種制度差不多延長到七百年，在柴堆上燒死的，就不止十萬“異端”和“妖魔”，而還有幾十萬受了比較輕的刑罰。不管基督教的那樣著名的“人道主義”，這種宗教裁判制度在西班牙直到1800年才被拿破崙所廢止，而在意大利——是在1808年；然而，在這之後還有人來企圖恢復這種制度呢。基督教反對科學的那種狂妄的，沒有寬恕的鬭爭，是歐洲歷史上的最可恥的現象，這種鬭爭直到我們現在還沒有充分完全的，明白的敘述過。教會所賞賜給文明人的道德上的野蠻化，最可以看得出的就是這樣的事實：在帝國主義戰爭的那幾年，基督教徒的德國人禱告着：“上帝，懲罰英國罷！”對着同一個上帝，禱告着同樣的事情的，是英國人，法國人，俄國人，禱告那個“博愛的上帝”，請他幫助殺人的事業。

我希望，對於這些寫信給我的人，關於他們所說的宗教的“價值”，宗教的“必要”，“宗教是生活道德的基礎”，以及是“安慰”的問題，我回答得已經十分確定的了。至於“安慰”，那末，我深信人的理智的勞動，最能夠完全的安慰人。

總之，我們這世界裏的一切其實是很簡單的，一切任務和祕密，只有人的勞動和創造，人的意志和理智的力量能夠解決。

一切複雜起來，糝糊起來，都是由於一班聰明人要“狡猾的講道理”，這些聰明人要辯護可恥的現實，而使人和他調和。

現在正是這種時候了：我們應當承認除開人的理智，在這世界上

再也沒有什麼別的理智力量，我們這地上的世界，以及我們關於宇宙的一切概念，都只是由我們的理智組織起來的，而且正在組織着。還在理智影響之外的有：冰山的流動，狂風，地震，旱災，走不過的大泥潭，龐大的森林，不生產的沙漠，野獸，毒蛇，寄生蟲，——在人之外存在着的，只有混亂和無限制的空間，充滿着一團糟的星球，這一團糟之中，人的理智和他的認識本能，也安置了，並且還在安置着整齊的秩序，同樣的有成效，像人在自己地球上安置着秩序一樣：他在這裏，使得泥潭乾燥，灌溉着沙漠，在山上鑿出道路來，打死兇惡的野獸和寄生蟲，像個主人似的“整理着”自己的地球。

也許，我們也不這麼樣了解自然界力量的本質，然而我們已經不再服從這些力量，而在統治着這些力量，而牠們馴服地替我們服務。假使這還不能夠安慰那些悲觀主義者，那末，能夠安慰他們的，就只有他們對於文化力量的不信任的情感，他們對於生活的厭惡的邏輯上，實踐上的結論了。文化史告訴我們，人的勞動所造成的智識，由科學積聚起來，還儘在生長，越來越深刻，廣泛，尖銳，而是我們的認識能力和創造力量的將來的無窮發展的出發點。因此，爲着要很快的，很有成效的發展文化起見，我們應當好好的去知道文化的歷史。

✽

我所回答的這些寫信給我的人，很不知道過去，或是完全不知道，或是不願意知道，——這個不願意知道很確定的表示要求生活的

意志的極度衰落。那些說“過去的人生活得輕鬆些 自由些”的，說“託爾斯泰否認文化是對的”，說“書籍只會製造驕傲”的，說“郭果里從自我批評開始，而終究回到了上帝跟前”的，——所有這些人，都不是正軌的，都不是健康的人，照我的觀點看起來。這一類的人，似乎是在多起來，也許是因為他們的埋怨越來越病態了，越來越高聲了。所有這些埋怨都表示個人主義的癡癡的抽搐，而且在尼日涅迭維茨克的一個農民或是市民的信裏，很確當的說了出來：“我看，在集體農場裏面，沒有我的自由心靈的自由，與其到那裏去，還不如去做流浪人。”

這個人其實並沒有“自由的心靈”，也決不會有，因為人從古以來就只在反對人的鬥爭裏生活，而不是在反對自然界而贊助人。這並不是新鮮的，而且是很簡單的思想，然而有些思想的表面上的天真，不過證明牠們的堅實的真理。人在反對着人，經常的緊張着，用盡一切力量和才能自衛着，內心裏是不能夠像應當自由的那麼自由的。社會條件，使得人只能夠有三種立場：壓迫者，被壓迫者，或是不可調和的調和者，——這樣的社會條件必須消滅。

一切都要消滅，凡是這樣或是那樣——在物體上的障礙形式裏，從自然界方面，從國家的階級結構方面，或是從‘思想的’強暴方面，例如社會的強暴，——來阻礙人的力量，才能的自由發展的，阻礙文化過程的發展的，都應當消滅。工人階級很有成效的開始了這個事

業，正因為這個事業開始了，所以引起了個人主義的臨死的痙攣。

不能夠否認，個人的行動在科學，技術，藝術方面，曾經給了，並且還在給着光榮的成績，只要這種行動完全合於指揮階級——資產階級——的“傳統”，趣味，利益的趨勢，而且正在迎合這種趨勢，那末，以前固然給了光榮的成績，以後還會給的。

然而每一次，只要個性是反對着全世界的市儈主義的利益，習慣，思想，“傳統”的，那末，他在‘環境’之中就找不着自己的地位，——這種“個性”就要被驅逐，被監禁在牢獄裏，被燒死在柴堆上。受着蘇格拉底和加里萊沃(1)的命運的，有幾十個，幾百個個性，他們企圖要動搖日常生活和思想的穩定基礎。在對於不肯諂媚的人，因此也就是不合用的人的這種迫害裏面，世界的市儈完全公開的暴露了那個可惡的兩面心靈的全部底細，那種兩面心靈對於他們是完全必要的，這是他們的自衛的手段，鞏固自己對於世界的統治的手段。

大家知道的，照他們的思想，感覺的本質上來說，市儈是深刻的個人主義的。他們也不會是別樣的，因為他們的個人主義是“私有財產的神聖制度”所造成的，這制度是市儈社會的根本基礎。市儈的一切種種哲學，目的都在於鞏固和辯護這個基礎，彷彿這是唯一

(1) 加里萊沃 (Galileo) 是意大利古代的 (1564—1642) 著名學者，數學家 and 物理學家，他證明了哥白尼的學說——地球繞日而轉的學說的。當他被宗教裁判的時候，受着非利敵打，而他的叫喊着的回答，仍舊是說：“一定是，這是轉動的！”(說的地球)。

的，把人引導到“博愛，平等，自由”，引導到“全世界的階級合作”的基礎。

這種哲學的虛偽被馬克斯的學說明確的暴露了，被那麼許多事實證明了，例如 1914—18 年的歐洲大戰，法西斯主義，而法西斯主義是因為歐洲工人階級組織得不充分，是因為工人階級還受着市儈主義影響的很厲害的毒，所以發生的，所以還存在着。

市儈的個人主義的兩面心靈和虛偽，在牠對於個性的態度上，是完全明顯的。市儈主義用死刑消滅各個個別的個性，一般的還在阻礙個性的力量和才能的正軌發展，而使得牠畸形化。個性在階級國家之中的生長，受着各種限制，像民族利益和階級利益的壓迫的複雜系統，宗教哲學和“法律”觀念的系統。這種系統的目的是要發展人的“社會動物”的本性，而所得的恰好相反：大多數人，的確被牠教成了少數人的家庭動物，而那少數感覺很強的人，却很容易的得到了壓迫大多數人的方法和手段。

‘強者’的積極性，主要的是表現在兇惡的積聚資本的過程裏，那就是合法化的掠奪，此外，還表現在反對社會的犯罪裏，這却是法律所要追究的，就是些小小的偷盜，匪徒的行爲，以及性慾上的放縱，——這可以對於精力給一個廣大的出路，而那些精力正在沒有別的用處，不能夠用別種方法去化費的時候。

在比較脆弱的人，階級壓迫的複雜系統的壓力，影響着他們的感

覺，影響着他們的“下意識”，就引起了一種莫明其妙的情緒和對於生活的恐懼，使他們像我們的原始人類的祖宗一樣的想法，而原始人類是一切種種神道和宗教的創造者，這就是使他們以為在人之外，存在着什麼敵視人的，不可克服的“事實的力量”。對於事實的崇拜使人成為消極的。

在另外一些人，被生活裏的矛盾所震動的感覺阻礙了，蒙蔽了意識的生長，然而這倒並不妨礙這些人以為他們的“意識已經決定了實質”，——這樣的‘精神情緒’使得人和現實的分離更加深入，使他成為無政府主義者，而讓他說出這種惡毒的蠢話：

“從十五歲起，實際生活這樣的耍着我，彷彿貓兒耍老鼠一樣，而現在，我憎惡一切教育的人，我比他們聰明些，我很後悔在戰場上不願惜自己的拿了鎗桿擁護過他們。”

這是已在無結果的“擁護自己”的鬥爭裏野蠻化了的人的叫喊。

資本主義的階級的國家制度，把人分做壓迫者，被壓迫者和不可調和的調和者，——這是早就無可爭論地證明了的，再來說起也是多餘的了。然而，還是要說一說，因為有許多青年人，趕緊要在生活裏占據他們的舒服的位置，大概不懂得這種趕緊的慌亂，會使得他們回到過去時代——回到那個悲劇的馬戲院，在那馬戲院的舞臺上，資本主義的現實是那麼無恥的在表現着，在那馬戲院裏，調和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是在扮演着抒情詩性的小丑。

著名的數學家愛因斯坦，全世界都承認他是個天才的人物，他想來是懂得現代的現實的。君罷，他在英文報“Sunday Dispatch”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在這文章裏，對於布爾塞維克主義有這樣的估量：

“布爾塞維克主義是奇妙的實驗。社會革命會走到共產主義的方向去，這並不是不可能的。布爾塞維克的試驗是值得做的。”

新時代歷史的主要潮流，是反對着個人主義而要在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原則上來改造生活。這不是“布爾塞維克的空想”，這是全人類的文化發展的自然的邏輯上的結果。布爾塞維克是歷史所產生的，他們是歷史的“合法的”孩子，歷史創造了他們，教育了他們，把他們放到了第一等的地位，做工農羣衆的組織者和領袖。

‘過去’很充分地肯定的告訴我們：動物性的，畜生似的個人主義，是小私有經濟的基礎，這曾經是，而且現在還是發生寄生蟲和野獸的惡毒的腐爛的基地，那些寄生蟲和野獸，因為瘋狂了的發財的熱情，而兇惡得不堪，他們會爲着自己的利益，在戰爭裏消滅幾千萬的工農，而且每天用過份的勞動，喫不飽，飢餓，疾病，在消滅着幾萬工農。

符拉狄米爾·伊里支的天才和他的同志的精力所創造的黨——工人階級的腦筋——擔負了空前鉅大的困難的工作：他們是在建設着真正平等的人的社會主義社會。

他們以前和現在工作的條件是這樣的：

活的材料，照自己的天性來講是有才能的，然而是不大識字的，或是簡直不識字的，非常之不文化的，被羅曼諾夫皇朝的專制制度和畸形的不文化的俄國資本主義所無政府主義化得非常厲害的；

農民，——占着全國人民的百分之八十五，——幾百年來被教訓得“在斧背上磨大麥”，“在草鞋裏喝酸菜湯”，被叫化子似的日常生活，苦役似的工作壓迫着，迷信的，酗酒的，被帝國主義戰爭和國內戰爭弄得完全破產了的農民，他們甚至於現在，在受了城市的革命影響十年之後，大多數還是保存着小私產者的心理，瞎老鼠的心理；

非常之會發議論的，一百年以來儘在解決着“社會道德”問題的，沒有自由的智識階層，他們用消極的怠工來迎接十月，或是手裏拿着鎗桿來積極的反抗，而一部分直到現在還在用“言論和行動”反對着蘇維埃政權，有意的無意的在實行着害蟲政策；

許多外省小城市裏的小市儈，這是資本的最馴服的奴才軍隊，這些強盜軍隊慣於用騙子的手段剝削工農的；

叫化子似的設備的工廠和作坊，而且被國內戰爭破壞了一半；完全沒有製造機器的工廠；

受着外國資本的支配，該着非常之豐富的原料，而資本家只要趕快搜括幾百萬的財富，却沒有學會開發這些原料，他們寧可掠奪和出賣民衆的財富；

非常之廣大的國家，而非常之少的鐵路，橋梁炸斷了，車輛弄破

了，又沒有汽車道。

在所有這些之外，還有世界資本階級的積極，不斷，真正的憎恨。

這只是很不完全的一篇遺產的賬目，工人階級和牠的黨所接受的艱難困苦遺產的賬目。

此外，還有這麼一種人，他們昨天的生活是那麼安寧和舒服，以致於今天的文化成績只會在他們所稱爲“心靈”的那個器官裏，引起一種狐狸的，或是狼的仇恨心。他們也許要舒服得多，如果新的現實比現在這情形還要壞一百分之一百，因爲對於他們是“越壞就越好”。也有那樣的人，他們被‘過去’磨練得那麼光滑，以致於‘現在的’事實只在他們舌頭的皮膚上滑過去；不碰着他們的精神，也不碰着他們的心。

最後，還要加上很大一批蠢才，爛貨，“破爛傢伙”，兩面心靈的“無產階級的朋友”，以及牠的許多其他的寄生蟲。

在這樣的條件和這樣的人的嚴密包圍之中，在古代的泥土，骯髒，腐爛的爛泥坑的基地上，蘇維埃政權發展了工作，這種工作的成效是明顯的，無可爭論的，奇妙之至的。

“我們的實際生活越來越殘酷了，”——有這麼“兩個人”用這樣的話向我寫出了許多人的抱怨。這是些很不知道過去的人的話，但是，這情形是可能的，因爲黨一定應當極堅決的行動，牠也的確是在堅決的行動，這種堅決性，對於被敵人包圍着的軍隊的領袖是必須

的，——這個領袖堅決的相信：這軍隊的戰士有力量可以打碎敵人。

不知因為什麼奇怪的偶然的原因，大多數寫信給我的人的意見，責罵和抱怨都是不大通的。要用年青來解釋這種不通也是不行：兒童團員還要年青些，可是他們的社會上的“通順”似乎在感覺上也比這些二十歲以外的人要強些。有些時候，覺得這一個或是那一個抱怨的傢伙故意在“裝傻瓜”。例如：

“工人應當首先在自己裏面取消階級心理。”

換句話說，就是工人階級應當在意識上解除武裝。這蠢得來連奇怪都不用奇怪的了。最可注意是，寫信給我的人，一個也不說起工人階級還必須取消市儈的習慣，趣味，拋棄市儈的心理，這種心理在工人也還是有的。

最時常的抱怨是在高等學校裏找不着位置。“不准我們去學習，”——他們寫。

這不十分對的。比較對些是要說，連工人的兒女也還不是大家都有進高等學校的可能，而使得他們大家都能夠學習，這是必要的。這個必要的理由，是在於有一種危險：別些階級的兒女，進過了高等學校，會用“智識份子”的資格來加入實際生活，然後，照着祖父和父親的榜樣，來幹那種調和‘不可調和’的“好事業”，又來解決“社會道德”的問題，總之是去“幻想起來”，想一想如果人都是“聰明的，

良善的”，那是多麼好呵。這還算是好的，而也許可以壞得多呢。寫信給我的人應當懂得，他們是生活在戰爭時期，在戰場上，在戰鬥的時候，來要求“仁慈”是偽善的，蠢笨的。

等到世界上一個奴隸也不剩，一個被打敗的人也沒有的時候，人大概就會理想地好的了；然而爲着要沒有被打敗的人和奴隸起見，——就必須毫無顧惜的鬭爭，反對那些慣於靠奴隸勞動生活的人。

說人應當良善，溫和，——這樣勸告了兩千多年了。人道主義的宣傳早就暴露了自己的完完全全的無力。十九世紀末期，文化的歐洲的基督教徒，極端佩服的歡迎了弗里德里赫·尼采，他倒是真誠的憎惡一切種種的人道主義，認爲這是指揮階級衰弱的表現。

“溫和的人是有幸福的，因爲他們把遺產留給土地，”——福音經上這樣說。馬克·土溫認爲這是說的英國資本家，他們的確在全世界各國裏面都血腥的，沉重的“留下了遺產”。不行，還是不要說起人道主義好些，有着現存的資本主義，牠正在十分關心的準備着全世界的大屠殺呢。而且“戰爭產生着英雄”，而“英雄裝飾着人類”。是的，1914—18年的戰爭產生了真正的戰爭英雄，各國的投機家——“大傢伙”，“暴發戶”，“鉅人”，“鯊魚”，——那麼神奇古怪的裝飾了人類。這些人，從工農的血汗裏吸取了鉅大的財富，很安心的繼續管理着工人羣衆的力量和意志，爲着更加鞏固自己的政權起見，組織着“法西斯主義”，陳舊的，中世紀式的，對於勞動者的壓迫方式；而工人

階級“人道地”忍受着這一切，冒着暫時回到血腥的中世紀式的黑暗裏去的危險。

如果寫信給我的人，以及一般蘇維埃公民，忽然一天早晨醒過來，深信工人階級的事業的確是“我們這世紀的偉大事業”，如果他們能夠客觀的估量蘇聯工人的意志所已經建設的，以及正在建設的一切，——那末，這些公民會覺得自己是更健康的人。一定的，這可以給他們一種力量去工作，“不是爲着恐懼，而是爲着良心”。

然而見解的形成不是在夢裏，而是在嚴厲的清醒之中。這個清醒將要逐漸好意的對待那些人，這種人本來除開自己之外，在生活裏是什麼也不看見，什麼也不覺得的，他們不會觀察，不願意學習，完全不知道過去，不能夠了解現在的極高貴的價值，不覺得工人創造的根本意義，工人們的最理智，最健全的精神——弄到臨了——正是向着人的完全解放而努力的。

卡爾·馬克斯把一切“真理”歸納到一個具體的真實，這是工人階級——新的歷史力量——所應當來實現的。卡爾·馬克斯說：

“對於人，最高的存在就是人自己，因此：使得人成爲屈服的，奴隸化的，被侮辱的一切關係，一切條件都必須消滅。”

這篇文章最初發表在蘇聯“蘇聯”報的第 292 (3828) 和 293 (3829) 號。1929 年十二月十二和十三。

市 儉

市儉——是這麼一個東西，牠被早就製定了的習慣，思想的狹小的圈子圈住了，就在這個圈子的範圍裏，自動機似的思想着。家庭，學校，教會，“人道的”文學的影響，資產階級的“法律精神”和“傳統”的一切種種的影響，在市儉的腦筋裏造成了一個不很複雜的機械，像鐘錶的機器，發條一樣，這種發條推動着市儉觀念的齒輪，推動着市儉要求安靜的那種吸引力。市儉的一切理由，可以並不損害他們的花言巧語而歸納到兩個簡單的字眼：“上帝保佑！”

當做對於國家，對於社會的要求，而在比較開展些的形式裏來說，這個理由就會發出這樣的聲浪：“讓我安靜罷，讓我要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罷。”

報紙每天提醒並且暗示市儉，說假使他是英國人，那末，他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假使是法國人，那末，他也是最好的人，假使他是德國人，俄國人，反正都是一樣：他總之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一般的說，這個“文化”世界裏的最好的公民，簡直像那個野蠻人一樣，當傳教師問他“你要什麼”的時候，他的回答是：“很少的工作、很少的想，很多的喫。”市儉，這是一個病理學上的現象，人堅固

地抓住了思想技術的時候，這個技術反而把他的思想的生長停止了。也有這樣的時候，市僧受着事變的強姦，他接受了和他不對勁的觀念，然而這些觀念就成了他的受苦的來源，彷彿生了什麼皮膚病，或是腎臟，肝臟裏有了結石病。那時候，他就時常用“止痛”方法來醫治：宗教，悲觀，酗酒，荒淫，流氓行爲等等。

爲的不使所有這些都像是空話似的，我們可以舉出一個例子：十一年以前，照着憤怒起來的俄國工農的意志，那歐洲統治者爲着增加自己的利錢而組織的四年的民衆大屠殺被停止了。市僧因爲這個政治投機家和銀行家的罪惡的，血腥的玩意兒，在肉體上和經濟上，很受了些嚴重的痛苦。這些痛苦對於市僧的“精神”生活給了些什麼呢，怎樣改變了市僧思想的自動機呢？

什麼也沒有給，一點兒也沒有改變那種閹割了的思想的習慣而機械的工作。市僧階級仍舊相信宗教是道德的基礎，以爲沒有宗教，國家是不能夠存在的，雖然已經完全明白了——資產階級國家是反道德的，是建築在偷盜，掠奪，對於勞動民衆的無恥剝削的基礎之上的。在戰爭的時候，他們認爲很自然的要請自己的上帝來幫助這個互相屠殺的卑鄙事情，其實上帝向他們宣傳的是——“不要殺人”，“愛你的親人，像愛你自己一樣”。

在戰爭之後，市僧的“人道主義”仍舊和戰爭之前一樣，仍舊只是口頭上的，現實之外的“仁愛”；這種人道主義還能夠稍微叫幾聲

保護個性，可是對於羣衆的受苦和受壓迫卻是完全冷淡的。總之，戰爭的可怕的教訓完全沒有改變市儈階級的心理，像這個教訓並沒有改變蚊子，螞蟻，田雞的習慣一樣。

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現在又在積極的準備着新的戰爭。軍事專家一致的說，新的戰爭大部分是化學戰爭了，這種戰爭的破壞力和恐怖景象要超過 1914—18 年戰爭的破壞和恐怖不知多少，簡直不能夠比較。一月十五日意大利的“Mattino”報上，一個軍事問題的著作家，似乎是杜埃將軍，敘述了海軍大將白拉維特的話：“據工程將軍布爾洛恩的計算，用飛機拋擲炸彈，只要有五百噸 phosgen 瓦斯，就可以在半點鐘之內毒害一萬公畝 (hectare) 的地方，就是巴黎那麼大的地方。”陸軍上尉白洛赫說，“一個五百基羅格蘭姆的 phosgen 炸彈拋擲到房屋裏去，可以毒死全屋子裏的人。這種炸彈爆裂開來，要散出十萬立方密達的煙氣，而這種煙氣立刻就會發生效力。如果這是在一條三十密達闊，一百密達長的街上，那末，毒氣的作用可以上升到三十五密達的高處。假使有順利的(!)風，那就這整個基羅密達裏面，凡是窗子沒有關緊的房屋都要受到毒氣。”弗里埃將軍，美國軍隊的化學供給部部長說：“一個四百五十基羅格蘭姆的 luizit 炸彈可以使紐約市的十區變成荒地，而幾百噸這種非常奇妙的東西可以把全紐約的生物，水和食物，完全毒害，而且毒氣的效力可以延長到一星期以上。”七月十一日，納爾斯保勒爵在上議院裏說，

只要四十噸砒素 (arsenic) 就可以毒死倫敦的一切居民。“正在研究着化學戰爭的方法。又在尋找着幾種生殖力旺盛的微生物,以及抵抗牠們的消毒劑。這樣,被傳染了的民衆就只能夠去請求醫治這種病的消毒劑,而這種消毒劑的發明家可以對於被傳染了的民衆——譬如傳染了鼠疫的罷——提出任何的條件。

歐洲的報紙時常登載這類關於將來戰爭的消息。歐洲的市僧自然讀到了這些文章,而應當明白這些瓦斯是要毒到他們的老婆,孩子,老頭子的。

如果在倫敦,巴黎,柏林的一個什麼曠場上,有一小班小賊和匪徒,在公開的討論着搶劫那一個區域,怎麼樣搶劫的問題,那末,市僧階層也一定要試一試去這樣或是那樣的妨礙這些“社會危險份子的”公民的小小陰謀。然而對於比較罪惡得多的,比較“社會危險”得多的入的比較破壞得厲害得多的這種陰謀,——市僧階層倒不去妨礙。

我們不來講“人道主義”。看來,單是私有者的本能和自我保存的感覺,也應當引起市僧的驚慌,恐怖;看來,市僧的有機體的要求安靜的吸引力,也應當使得他們叫喊起來:“不要戰爭!”然而他們並不叫喊。

蘇維埃政府向歐洲各國政府提出立刻解除武裝的草案,後來,再提出四年之內解除武裝的提議,——市僧階層彷彿沒有聽見這些提議。他們當然是聽見的,然而他們那種被傳統力量束縛着,壓制着

的思想自動機，使得他們把這種簡單，明瞭，意義上完全清楚的提議，當做是異乎尋常的幻想。

還有許多現象，在市儉階級看來，也是同樣異乎尋常的，幻想的：福爾通的輪船，雅白洛茨金的電燈，以及無數自由的，倔強的理智的各種各樣的勝利，這種理智是使得生活豐富，而創造文化的力量。

市儉的主要口號是：——“以前是這樣，將來也要這樣。”這些字眼的聲音很像鐘錘的機械的搖擺。市儉階層的確在退化了。他們像一條魚似的，正在“從頭爛起”。

市儉階層所認為幻想的，不能達到的，還有革命思想的蘇聯工農所提出來的目的：造成勞動的國家，脫離了野獸和寄生蟲而自由的。

蘇維埃報紙，努力的把幾百年的“木屋裏的垃圾”掃到街上去，這卻供給了市儉很豐富的“精神上的食糧”，而這種市儉，吸收着腐爛的排洩物，活潑起來了，微笑着，向自己的同志噉噉渣渣的說：“不成功的。我們的真理要占上風的。”

他們可以高興一下：要知道這是他們用一切種種的齷齪東西來弄髒的，而且還在繼續的弄髒；他們可以驕傲一下：齷齪，腐爛，骯髒，以及工農政權必須要用鐵掃帚掃出去的一切，這倒的確是他們的——市儉的“真理”，這是他們幾百年來創造的產物。

雖然相信上帝的保佑，雖然深信“那邊世界”的天堂上的美麗，

雖然有那整個兒的，虛偽的，口頭上的“唯心主義”，市儈——其實是十足的“唯物主義者”，他們首先關心這塵世間的經濟上的享福：“很多的喫，很少的工作，很少的思想。”因此，他們噉着，咕嚕着，哼着：“糖又少了，雞蛋又少了，牛油又少了……”

他們自然忘記了一切東西從一九一六年起就少了，而在白黨將軍和市儈階層的“精神上的領袖”，要來“挽救”俄國，屠殺俄國的工人民衆，毀壞他們的經濟的那幾年，這一切的“食物的滿足”差不多完全消滅了的。市儈階層彷彿不知道：譬如拿破崙的進攻莫斯科其實只好算小孩子的玩意兒，只要把牠比較一下狄尼庚，哥爾卻克，符朗格爾，以及其他禽獸化了的愛國主義者，這是最高文化的“自己地產的愛國主義者”，還有各種各樣的私有財產的“唯心主義者”所頌揚的。而七年戰爭所毀壞了的國內經濟，現在在比1914年以前更廣大的範圍裏，在技術上更進步的形式裏，恢復起來了，這種事實——市儈是不願意看見的。對於不關涉到他自己的一切，他都是冷淡的，封鎖在自己習慣的意見的圈子裏，只在噉噉查查的：“以前多些……現在少了。”而更加出力的把眼睛閉緊，不看蘇聯裏面工農羣衆之中所提拔出來的理智的人和文化的工作者的數量，是在迅速的增加的事實。這種現象在各方面對於他們都是不利的，自然也是敵視的。

俄國市儈從古以來就受着這樣的教養，他們對於理智是不信任的；甚至於是敵視的。教會很熱心的關心着這件事情，文學也部分

的幫助了這件事情。從郭果里的“通信”起，直到我們現在，在俄國的極偉大的作家之中，找不出好多的人是估量了理智的創造力量，而認識理智對於人類是有真正鉅大的功績的。L. N. 託爾斯泰還是在1851年就在“日記”裏寫着：“意識是極大的惡，總算是人所能夠達到的最大的惡了。”後來，他寫給亞爾先耶娃的信裏，還說：“太大的智識是討厭的。”他的全部道德哲學都貫穿了這種見解，在他的藝術家的巨大著作裏也反映着。采斯託耶夫斯基也是敵視理智的，他天才地，惡辣地給人表現了理智以外的強烈的力量，本能的力量。對於列沃尼德·安德列耶夫，思想是人的仇敵，而且他把思想也當做“情感的原則”看待，彷彿是一種特殊的情感。極有才能的現代作家之中的一個，把底下這幾句話放到了自己的“英雄”的嘴裏：“思想——這真是受苦的來源。誰能夠消滅思想，人類一定要紀念他的。”

自然，作者對於自己的“英雄”的情感，思想和行動，是不負責的，如果作者不把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硬套在“英雄”身上，像L. 安德列耶夫那樣幹法，而客觀地描寫這些情感和思想的發展的邏輯上的不可避免性，例如史滕達爾，巴勒扎克，弗洛倍爾所會寫的。這裏所說的，卻不是這個或是那個作者，而是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對於思想的敵視態度恰好表現在這種時候——那真正的，深刻的革命思想，組織着新的階級的意志，接受那理智的行動，那勞動和創造，而這種過程的目的，是要在集體主義的基礎上去改造整個文化，整個生活。

而在這種過程的旁邊，卻清楚的顯露着一派意見，敵視理智的意見，時常可以在一些書籍裏面，還是用尊敬的口氣，甚至於同情於革命的口氣寫的，你感覺到作家的一種傾向，也許是不自主的，不自覺的傾向，就是要想降低思想的作用，表示思想在反抗“超理智的”或是“下意識的”的無力。如果這幹的很好，那末，這也是有益處的，也就是有益處的。然而看來卻有一種什麼公律，因為這種公律的緣故，大多數的書籍寫得很壞。在這些書籍裏，因為作者技術上的薄弱，特別容易顯出市儈主義的影響，這裏，市儈主義也“在自己的內心裏”製造着毒瓦斯，雖然不是那麼厲害的，然而始終也會毒害的，尤其對於青年。

有許多書籍，讀着牠們要想起一個陳舊的笑話：禿頭問長頭髮的：“爲什麼你那頭上長了這麼旺的頭髮？”——“我這頭髮的底下，也是光滑的腦殼。”

答話也不很尖刻，然而真實的。有那麼樣的人，他們身上長着革命空談的粗糙的毫毛，卻並不是因爲要遮蓋自己腦殼外表的光滑，而是爲着要對於自己掩飾自己心靈的空虛。很可能的，東巴斯的一個工人通信員所說的正是這種人的書籍：

“翻開一本書來，讀這麼一二十頁——沉悶得很。字句是我們的，而在字句裏面沒有內容。我碰見這種書籍——真叫做遠遠的就是灰塵，小鈴兒響了，亞歷山大·薩哈勒支在來了。我們李彼茨縣裏有一個警察區長，亞歷山大·薩哈勒支，是一個好人，酒鬼：同我們

一些青年喝了酒，就來玩‘打木棍’的玩意兒，之後，就罵起皇帝來，還要罵我們：‘鬼傢伙，快點兒暴動罷，不然，這又不是，那又不是，生活在驚慌裏面。’他要起憲法來了，他說有了憲法，連皇帝的的生活也要輕鬆些。”

我引了這段信出來，不是因為這些話可以表示工人羣衆之中的一個有這麼有趣的，形象化的思想，而是要指出：羣衆裏的人已經很細膩的感覺到書籍裏的誠懇的不足。自然，這不是新鮮事情，然而不妨再提起一次。是的，市儈主義在生長着，在生出翅膀來了，你越來越時常的接到這麼樣的信，在這種信裏面有人是在抱怨着：

“生活在勝利地進攻的市儈主義的空氣裏面，實在難受”；這是一個黨外的人，老文學家寫的，——她在黨外的人之中並不是第一個感覺到市儈很厲害的在弄壞空氣。另外一個通信員，也是黨外的人，很有趣的咕嚕着：“編了一首國歌出來了，請求人家可憐一下‘老板娘’呢，多麼無聊。”

逐漸的，市儈階層弄出了自己的文學，這種文學把市儈“英雄化”了。這幹得很簡單：作者從郭果里的“外套”裏，拿出那個極渺小的亞卡吉·亞卡吉耶維支來，把伊凡·伊里支的心理供給給他，或是用L. 安德列耶夫的“思想”裏的“英雄”的心理，然後，把這樣一個生造出來的人放到現代的環境裏，彷彿就創造了新的性格。市儈讀着，快活得很：“看罷，我有多麼深刻的心理過程。”在新的書籍裏，已經

幾十次復活了那個陳舊的，熟識的馬卡爾·狄吳施慶，以及許多其他的“被屈服的，被侮辱的人”，然而這些人物的受苦，卻不是照着朵斯託耶夫斯基那樣的，而是因為“蜜糖少了，雞蛋少了，牛油少了”。

現代文學裏，越來越時常的出現着市儈階層所心愛的“不可重複的個性”——那種渴望着絕對的自由和表現自己的‘我’的人，他對於他所輕蔑的現實不願意有任何的關係。讀過了一本關於英雄的書——這種‘英雄’是用我們偉大的文字能手的材料做出來的，——現代的市儈就自己對自己感覺到一種神聖的興感，而在寫信給什麼人的時候，這樣描寫着自己：

“我的整個生活路程，都是個性的，不可重複的，不能模倣的，要知道在世界上，在實際生活裏，誰也不會再重複牠，不會再重複這種路程，這些階段，而在我之前，也沒有誰經過這種情形。”

還算是好的，假使這重複了三次的“不可……”只在信裏面自己對自己表示佩服：有時候，他還會寫出整本的書來，在這種書裏面可以找着這樣的發明：

“我的創作對於我是比酒醉還厲害，比戀愛還有力，比夢還甜。”

不覺得這句話的可疑的通順應當使他難為情，他還繼續的說。

“我不能夠說服一些懷疑家，他們以為藝術家也是普通的人，我不能夠使他們懂得，在‘創作’的陶醉那幾分鐘，我超越了普通的人，而知道了一切。O，如果我是個立法者，那我一定要寫出這樣一條法

律，給藝術家有乘着火車和飛機狂走的特權，使得尖銳的眼光可以貫穿地上的空間。”

“作者不能夠發見，他的怪僻的‘英雄’，表現得那麼厲害的要求瞬息之間的和浮光掠影的觀察，是多麼可笑和天真，而他，作者，對於這種‘英雄’還是好意的。批評界也沒有發見這個；而作者們已經尊敬自己是“精神的貴族”；寬洪大量的出版家以為所有這些都好得很，而越來越多的請讀者喫這些文字的茅草，批評家被互相的謾罵吞沒了，還在糾正着意識形態的路線，不大看見文學裏面爬進了“一百分之一百的”市儈。

虛偽雖然還生存着，然而完成着的只有真實。虛偽在牠所很早很早就建築好了的陣地上堅守着，牠不在發展，不能夠變得更狡猾些，而顯然的，越來越暴露自己的虛弱的無聊。看罷，已經過去了五十年，而資產階級的思想沒有創造出任何新的“社會哲學系統”，——沒有這樣的“系統”能夠對於資產階級充分的確信地證明：只有他們資產階級是自然界，上帝，歷史所造出來統治世界的。F.尼采想要證明生活是無意識的，虛偽是必要的，而“人對於人都是狼”，在他這種絕望的，失敗的企圖之後，再也沒有更違反自然的了，再也沒有更可恥的了；史本格萊爾的書“歐洲的日暮”，以及其他的這類的著作，公開的敘說着資產階級的智識上，意志上的窮盡，並且確定了他們在

走向完全退化的道路上的機械性和惰性的事實。就是在“歐洲的日暮”所指出的以外，證明這種事實的證據還多得很。在西歐的文學裏面，那些以前和牠根本不對勁的影響，越來越確定了：例如託爾斯泰的，朶斯託耶夫斯基的，被譏笑了的易卜生的。他的“娜拉”，“海上夫人”，以及其他的婦女，越來越時常的成了英國，法國，德國小說和戲劇的‘女英雄’，而這是證明那所謂“國家基礎”——堅固的資產階級家庭——是在動搖着了。西方的文學家，越來越時常的描寫自由的女人勇敢的打破一切市儈的傳統，爲着要求獨立的生活。這種“解放”不是口頭上的，而是事實上的：女人做了巨大的商業機關的領袖，進新聞界，進政界，幹投機事業。德國哲學博士愛萊翁諾爾·寇恩在宣傳着“女治主義”——婦女的政權。而同時，發展着性的荒淫，同性的“戀愛”差不多認爲是自然的現象，出版着宣傳同性戀愛的雜誌，合法的存在着“男色主義的”俱樂部和酒館，大資產階級之中發達着犯罪行爲，他們的淫蕩和自殺。關於所有這些現象，資產階級的報紙很不關心似的差不多每天登載着。像我們這裏的市儈主義者一樣，西歐的作家也在用史滕達爾，巴勒札克等類的藝術家和賢人的材料，製造着自己的‘英雄’，其實那些藝術家早就很好的看出了資產階級的現實生活的虛偽。還應當指出的是對於現代社會生活的批評態度是在發展，這種態度在美國文學裏發展得特別的快。

其實是在生長和完成，像科學的真實很快的引導勞動人民得到

對於自然界力量的權力，還有勞動羣衆認識自己的社會上的優越，認識他們應當取得政權的權利的真實。這兩種創造力量，在蘇聯的最近的將來就要合併成爲一個力量，反對着這兩種創造力量，反對着這個力量，那陳舊的社會虛偽什麼也拿不出來，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用來自衛，除非是大砲和毒瓦斯，毒瓦斯應當當做毒瓦斯看待，也應當當做市儈階層的“意識形態”看待

市儈的意識和道德，是要儘可能的堅固而緊迫的束縛人的意志和理智，束縛那種向着集體主義方面進行的意志和理智。我們這裏，這種道德是在毀壞着，消滅着；很粗魯的，很病態的過程：人要反對着環境，反對着自己而鬭爭。因此，發生了可悲的，可是看來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同一個目的的人，共同爲着將來而工作的同志，互相之間的關係卻是不謹慎的，冷酷的，互相對於別人的優點估量得不夠，而兇狠的，太心急的，太着重的指摘缺點。見解上是集體主義者，而在私人關係上，對於同志，尤其是對於婦女，行動上是太個人主義了。這自然是由於市儈主義，這是市儈的病態的遺產。然而人，也不能夠在十年之間就重新出生一次，不能夠在這個期間，就造出新的道德，新的“行動規則”。

可是，我覺得現在也已經是時候了，要開始製定一種生物學上——社會上的衛生學，這也許要成爲新道德的根據。這個過程的開始，應當是自覺的努力去求得更密切而親愛的聯合，這是對於要去解

決種鉅大的任務的人說的，——這些人要把幾千萬小農改造成文化的工人，改造成新國家的自覺的創造者呢。還用得着說嗎——批評界和社會論文的责任，就是要發展這種衛生學，要進行“人化”的工作，要反對毒氣的市儈主義的“意識形態”，要反對“被屈服，被侮辱的”市儈的英雄化？

我們時代的英雄是“羣衆裏的”人，文化的苦力，普通的黨員，工人通信員，軍事通信員，讀書室職員，負責工人，鄉村教員，青年的醫生和農學家——在鄉村裏工作的；農民“實驗家”和積極份子，工人發明家，總之——是羣衆的人！最主要的注意應當放在羣衆身上，應當在羣衆之中去教育出這樣的英雄。

關於這種任務還要提出來說，簡直有點兒不好意思，然而我覺得應當提起一下。我們這裏出版着一千種雜誌，也許還要多些，雜誌的數量是在增加；其中有不少，在材料上，任務上，都是重複的。這些雜誌之中的極大多數，是羣衆讀者所懂不了的；爲着羣衆的讀者，直到現在還沒有寫出極端必要的“國內戰爭史”，以及同等必要的“俄國社會等級的發展史”。給羣衆的讀者介紹些科學技術發展的過程，也是時候了。

薄薄的小冊子，已經不能夠再拿去教育人家了：他們很看輕小冊子，要“厚一點的書，結實些的。”爲着羣衆讀者的雜誌，很少。“工人”報和“農民”報所給的，照我看來，的確很好，然而還 進一

步。對於鄉村，必須有一種雜誌，給牠們介紹西方現代的日常生活，說明資產階級以及勞動者的生活。羣衆所須要的很多呢。我斷定，現在給他們的書是太少了。羣衆不需要文藝的花言巧語的甜蜜的食品，他們需要喫得飽的麵包——清楚而明白的敘說現代世界生活的真實，敘說各國勞動民衆爲着更好的將來的鬭爭。

瑞加同志組織了“Otcherkism”（報告文學），這證明他很了解羣衆讀者的需要，他們是在需要知道蘇聯的實際生活。大概，“機械的公民”又不曾放過這個機會，要來罵我“反對言論和個性的自由”，以及其他的神聖傳統了。是的，我是反對自由，從這麼一個界線起，超過這個界線，自由就變成了放縱，而大家知道的，這種變化的開始，是在於一個人喪失了對於自己的真正社會文化的價值的認識，而讓他裏面所暗藏着的，陳舊的市儈個人主義廣泛的開展出來，叫喊着：“我是這樣美妙，別緻，不可重複，然而不讓我照着自己的意志生活。”還算是好的，如果他只在叫喊，因為當他真正照着自己的意志行動起來的時候，他就要一方面變成反革命者，別方面變成流氓，這差不多是同等價值的——下流和有害。

同志們大概不喜歡我指出羣衆所不懂的高明的蘇維埃雜誌太多了，而我想，這而且是很虧本的。唔，有什麼辦法呢？這種紙張的病態的浪費，也不止我一個人指出來，我也不是第一個來說文學對於羣衆的服務不那麼充分的能幹和有效。我記得：

Giz(1),多給我們些雜誌:

他們在生產着讀者呢,——

然而我看我們的雜誌不這麼充分的理會羣衆讀者的了解程度,而能夠在應當做到的程度之內用智識去供給他們。

看罷,這些雜誌生產着辯論卻很有成效呢,然而即使你是一個比較識字的人,也不能夠永久都懂得: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爲什麼Z同志和X同志,像敵人似的辯論着呢?他們兩方面那種私人仇恨的奇怪而不適宜的口氣,是那裏來的呢,爲什麼他們那麼激烈的用利己心的滾水互相潑着呢?

也許我說得不對,這是關於政治經濟的雜誌;然而生活在敵人的嚴密的包圍之中,卻必須連術語上的爭執也發揮起來,而且是那麼一種方式,這種方式暴露着辯論者互相之間的尊敬心的明顯的不夠,同時,也就是文化程度的不夠。

然而,看罷,我這裏有許多關於文學爭論的書籍。老馬克斯主義者,以前同資產階級的批評界辯論着,會用很沉靜的口氣,因此,他們的文章在說服的力量方面是很沾光的。現在卻不能夠說,青年的批評家互相的“糾正着路線”,也學到了這種模範,——而路線在自己的基礎上就有完全直爽而明白的性質的。青年的批評界,因爲自己的倔強,卻忘記了長篇大論的花言巧語時常掩蔽了“根本的路線”,

(1) Giz ——“國家出版局”的縮寫。

而且他們的辯論，對於青年羣衆，尤其是外省的，實在很難懂。越來越時常的聽見對於文藝批評的“難懂”，“混亂”，“矛盾”的抱怨了。

“他們在莫斯科那邊，談着什麼家務事情呢，彷彿除開他們之外，在世界上就沒有別人的了，”——烏拉爾的一個“開始的”文學家這樣寫。另外一個譏刺着：“每一個人都斷定他自己是正統的馬克斯主義者；結果，大家都是正統派，還有什麼爭論呢？”

這樣的說話並不少呢。有一個說得特別可以注意的：“對於我們工人通信員，很難弄明白這麼幾十篇文章，要能夠給我們一本‘Vademecum’⁽²⁾，像布哈林的‘A.B.C.’似的，關於文學史的根本問題的小書，那時候，我們也要容易了解些主觀上的矛盾。”

這裏可以注意的，是寫這信的人指出了批評家的主觀主義。

如果批評家在會議上，而不是在雜誌上，來解決小團體的爭執和瑣屑的爭論，豈不是更實際，更有益嗎？而在雜誌上，這樣時常發見那些總是不適宜的文章，而且是“在激怒和氣憤之中”寫的。我看，召集小小的，批評家和作家的會議，爲着進行文學問題的同志性的談話，——一般的是合於“時代精神”的。

這篇文章最初發表在“文學前哨”雜誌（“Na literaturnom postu”）

第四·五期合刊，一九二九年二·三月號。

(2) Vademecum——袖珍類書（拉丁字）。

關於婦女

奇怪的是我們這裏直到現在還沒有人想到寫一本關於教會對付婦女的書，而婦女們早就應該知道她們要“感謝”宗教和教會的是什麼，尤其是基督教的“正教”教會(1)。

大家都知道的，一切宗教所規定的對於婦女的觀點多多少少是不好的，有些甚至於確定地是敵視的。我們時代之前的兩千七百年，希臘詩人海西沃德(2)在他的“神統譜”——就是關於神的來源的——那部書裏說：“齊吳斯(3)把惡——女人給了會死的丈夫”，而在“工作和日子”那篇詩裏，他還說女人是“美麗的惡”，是“人的苦痛”。猶太人的祈禱書裏，有一句簡短的，厲害的，可是對於婦女很不恭維的禱告文：“謝謝你，上帝，因為你沒有叫我做女人。”教會的神話，說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做出來的，聖經上的預言家對於女人的惡毒

(1) 俄國人把他們所信仰的東羅馬派的希臘教叫做“正教”。

(2) 海西沃德 (Hesiod)，最早的希臘詩人，生於紀元前八世紀，Bocotia 人，他的主要著作是：神統譜 (Theogony)，“工作和日子” (Works and days)，“赫爾苦萊斯的防禦” (Shield of Hercules)。

(3) 齊吳斯 (Zens) 是希臘一切神和人類的父親，是所謂天上和人間的主宰。

的詩歌，阿拉伯和印度的神話，以及其他宗教對於婦女的一切種種無窮無盡的侮辱，——這一切都證明各種宗教的巫師們，一致地要在社會上屈辱婦女。認為婦女是男子被逐出天堂的罪魁，是“罪惡的根源”，是“世界的誘惑”，這種觀點從教會方面傳達到了日常生活裏。無數的成語和格言，這樣辱罵婦女，主張不要信任她們，要打她們，——都毫無疑問的反映着教會的影響：“亞當是因為老婆被逐出天堂的”，“老婆把沃洛菲恩的頭都割掉了”，“叫你的老婆恐懼，不要捨不得責罰她”——耶甫萊謨·西魯斯(4)說；而日常生活就把這種話翻成了自己的言語：“時常打打老婆，愛情也要甜蜜些。”吉里爾·耶魯撒冷斯基暗示着：“婦女的說話，不要多相信，”而日常的成語是：“婆娘說的——是昏話，誰相信她！”“婆娘的想頭——說鬼話的念頭。”這樣的，這一類的成語，簡直是無窮無盡的練條，牠的最後一個鐵環是很可注意的：“老婆和丈夫——毒蛇和雄蛇。”

兩千年來，基督教教會一直是這麼一個源流，從牠那裏，找出許多法律上經濟上限制婦女的說法。“在上帝跟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這是使徒保羅說的教會的教訓，而這教會又教訓着：“不是丈夫為着老婆；而是老婆為着丈夫造出來的。”這樣的，諸如此類的教訓毫無疑問地肯定着：老婆，女人——是不能夠和男人平等的東西，

(4) 耶甫萊謨·西魯斯 ((Ephraem Syrus), 生於 320 年, 卒於 370 年, 敘利亞地方的一個神甫, 後來有些教會裏把他當做聖人看待的。

是“第二等人”。而這却並沒有妨礙女人們，福音經的崇拜者，承認這部書是神聖的，“人道的”書，雖然這部書的全部智慧只在於企圖暗示人家，說地上的生活，同着一切苦痛，都不是什麼別的，而只是人的預先的準備，爲的要到天上去享受永久的幸福，而人要到天上去却有一個條件，就是要柔和，要像石頭似的忍耐，要聽從教會的法律。一般的說，這個學說是要使餓着肚子的窮人，把重的認爲輕的，苦的認爲甜的。

塞普替美·脫爾土里安 (Quintus Septimius Florens Tertullian)，第二世紀的基督教作家，說基督教徒應當“爲着偶像崇拜的罪惡的恥辱，而用神聖的信仰的恥辱”去使得基督“滿意”。基督教作家的嘴裏居然說出信仰的恥辱，這種奇怪的字句是完全有理由的，——因爲基督教教會的那種狂妄的行爲，那種無情的反對批判思想的鬭爭，反對科學，極殘忍的壓迫，大批的屠殺“信仰不同的人”，牠們在油鍋裏活活的燒死“異端”和“魔鬼”；——燒死那些精神病的婦女，而更多的是那些很有才能的婦女，她們只不過對於生活的事實，拒絕遵照教會中人所命令的思想罷了。“不要殺”——這是教會所宣傳的，而這個教會讚美着基督教徒自相殘殺的戰爭，這樣的戰爭其實是爲着掠奪的目的開始的，其實是破壞着“不要偷”的信條的。教會的本身，本來是富的，他們永久只代表富人的利益；他們自己是奴隸主，也就從來沒有反對過奴隸制度。所有這些，多多少少還是可以

了解的：教會是階級的機關，他是“剝削別人勞動的階級法律的總匯，牠爲着自己階級的目的而服務，也出於恐懼，也出於良心”。牠對於婦女的敵視態度，牠要在社會上屈辱婦女的政策，却要難懂得多。可以這樣想：基督教時代以前的巫師們，在自己的職業上利於把婦女描寫成一切種種罪惡的化身，——這樣，他們可以阻礙婦女變做那種容易而有利的工作，就是在寺廟裏供養神道。可能的是：不但爲着發財的目的，而正是爲着在社會上屈辱婦女的目的，所以有些“異教徒”的宗教規定一種教會娼妓的制度。

然而單是這一種原因，還不能夠解釋基督教教會反對婦女的那種病態的惡毒。假使在這些原因之外，再加上對於禁止結婚的復仇心——基督教教會是禁止自己的神甫和主教結婚的，——那末，也不能夠完全解釋僧侶對於婦女的敵意，這種敵意發生在羅馬教會規定禁止結婚以前，而且“正教”的“白派”僧侶並不禁止結婚，禁止結婚的只有“黑派”的僧侶。

自然應當記起：“愛情和飢餓管理着世界。”傳種的本能，使男女結合起來，使得不能忍受的勞動生活的困苦條件更加複雜化了。上面已經提起過的海西沃德抱怨着：“女人不是勞動的同伴，而是浪費財產的同伴。”我們俄國的成語說：“老婆用小鉢頭從家裏裝出去的東西，比丈夫用大口袋裝出去的還要多些。”可以引證幾千種這樣的抱怨，在預言家的詩歌裏，在宣教的教條裏，在成語，故事和笑

話裏。然而所有這些話只證明同樣的一件事：這些話是有財產的人想出來的，他們有家，也的確有東西可以從家裏裝出去。

這裏，同各處是一樣的，顯然暴露了經濟要素的影響；這裏，彷彿特別表現着男主人和婦女之間的一點矛盾，婦女是男主人的管家婆，是他的妻小，在社會上是沒有權利的。這個矛盾大概在於男人和女人對於積聚財產的神聖事業的態度是不同的。可能的是：女人，丈夫的奴隸，沒有像她的老公那麼深刻的覺得自己是私有財產的奴隸；正因為婦女沒有權利，所以她在積聚私產的事業裏，不會那麼深入；她對於這種畜生事業，比她自己的主人要冷淡些。也許，直到我們現在，大多數的婦女還保存着這種冷淡。

然而，爲着要使自己在家裏，在主人的被窩裏的地位更穩固些，爲着要在那裏儘可能地多留一些時候，一直到主人年老的時候，到他已經不需要情人，而只需要醫院裏的看護婦的時候，婦女就應當緻細的照顧自己的身體，用盡一切方法保留身體的美麗，新鮮和力量，用盡一切方法裝飾自己的身體和身體周圍的一切。這個代價是很貴的，而且越來越貴了。不久以前一個美國人，百萬富翁，說了這麼一句笑話：

“我們不怕共產主義者，老婆早就要使我們破產了，比工人們來得及幹這件事要早得多呢，”——這個笑話倒不壞。

教會，不見得沒有積聚財產的貪慾，牠的目的是要鞏固自己對於信仰上帝的人的“精神上的”權力，牠總是非常之熱烈的咒罵婦女的

愛奢侈，可是，這並不妨礙羅馬教會的僧侶和牧師用瘋狂的奢侈把自己圍繞起來，也不妨礙“正教的”主教，大主教，大僧正很闊氣的生活，該着奴隸。然而婦女愛好奢侈的自然傾向，不能夠完全解釋教會中人的惡毒。這裏，真有點兒狂妄的病態。不能夠說那種禁慾主義的說教是健全的現象，所謂“肉慾的死滅”——是教會中人，上帝的奴隸所宣傳的——這是反對生活本能的鬭爭，其實照他們的學說，生活又是上帝自己創造出來的。

教會把傳種的本能叫做“姦淫”，在暗藏的形式裏宣傳着閹割主義，而認為生小孩子是污穢不潔的事情，因此，產婦在生育之後的六星期禁止參拜教堂，——產婦要再進寺廟，必須在神甫給她唸過“清淨咒”之後。

教會在這繼續的兩千年之中，很努力的不斷的暗示男人對於女人要抱着不好的敵視的態度；這種態度非常深刻的印在男人的意識上，簡直有了本能的力量。宗教的“仇視女性主義”的影響很清楚的表現在一些“學者”的書籍裏，這種“學者”時時刻刻要想對全世界證明，說女人“照她們的天性”就是“精神上受着限制的”東西，不能夠認為是和男人平等的人。從這種“學說”裏得出來的實際結論是很簡單的：女人在法律上政治上應當受着限制。也的確把她們“限制”了。她們沒有支配自己命運的權利，不能夠和男人享受同等的教育，不得到丈夫的允許就不能夠支配自己的遺產。日常生活

裏，在實際上，還有許多對於婦女是很屈辱的限制，這些限制阻礙着她們的力量和才能的正軌的發展。教會所蔭庇的“父權”，從經濟上着想而結合的男女年齡不相等的婚姻，促進自己階級的衰落，產生那種乾癟的，退化的種子。

沒有任何的疑問，如果不是這麼束縛婦女，勉強縮小她們的興趣範圍，只給她們一些妻小，母親，管家婆的責任，而且把她們從廣泛的社會工作，文化政治工作方面推開去，那末，文化發展的速度可以快一倍，因為創造的力量多出了一倍。然而資產階級的社會和國家，並不利於文化發展得更快些。資產階級寧可停止在他們已經達到的程度上，剝削着無產階級的勞動，像野獸似的吞沒他們的力量。資產階級生活得夠方便了，如果他們始終還有點兒前進，那末大家都知道的，這不過因為有那種競爭的無政府狀態，以及被競爭所激動的工業技術的進步。這種不得已的機械式的變動和真正文化的進步很少相同之點。恰好相反，資產者的文化典型，比他在十九世紀所達到的高度起來，已經降低了很多。這個低落，在帝國主義戰爭之後，特別明顯的表現了出來，那次戰爭很增加了野獸，無恥之徒和強盜的數量，而除開“法西斯蒂”之外，並造不出什麼別的“精神上的領袖”，這是我們看得見的。

✽

“家庭關係和社會關係的法律，幾千年來沒有變動，現在也並不

變動，這是任何理論都不能夠動搖的。

資產階級的全部“哲學”就包含在這句話裏面。這個貧乏的思想，被一切國家和一切時代的“聖人”，用各種各樣的詞句重複了幾千遍。歐洲，美洲的報紙和雜誌，每天都在重複着。如果這個“理論”要這樣時常的堅持的提出來，那就可見得事實上有什麼東西在反對着這個理論，所以要把牠打進頭腦裏去，像要把拐杖打進枕木裏去似的。拐杖是結實的，粗壯的，然而並非永久的，牠始終要受着時代的破壞影響。事實是很現實的，然而還並非真理，事實不過是粗糙的生的原料，可以做創造將來全人類的真理的材料罷了。資產階級很想要肯定現在的事實，使牠永久在已經形成的形式之中：法西斯蒂主義就在這一方面努力 working。然而“動作引起反動作”，——工人階級對於自由勞動的文化意義的認識，是在強有力的生長着，這種自由勞動是要解決生活的全部混亂的；工人階級對於自己應當取得政權的認識，也在生長着，而資產階級的聖賢，新聞記者，院子裏的狗和房間裏的狗，卻要非常之高聲的狂吠，拚命的喊着家庭原則的不可動搖，牠們要咬自己主人的仇敵，咬那些根本就不相信這地球上有什麼不可動搖的東西的人。

必須承認資產階級的社會，是在把婦女教育成一種低級的人。這句話，不會也不應當侮辱“弱的性”(5)，——問題是在於資產階級

(5) “弱的性”指婦女而言，這是歐洲的“習慣”。

的一種罪惡，他們是把體質的健全的，生物的基礎歪曲了。也不能夠否認，被教會中人弄糊塗了的女人，無意之中自己在參加着這種歪曲的過程。然而我們現在，似乎到了一個復仇的時期，也是無意之中的，從婦女方面來了一種對於“家庭原則”的復仇。

已經說過了，婦女的愛奢侈和“夫妻之間的不忠實”，從最古的時代起，就被教會文學咒罵的了。世俗文學也很早就跟着教會罵，然而責備着女人是一切種種戲劇和悲劇的原因，卻又很高興的，很能幹的描寫她是享樂的源頭。謨哈默德時代以前的一個阿拉伯詩人說：

“地上的天堂，是在聖賢的書籍裏，在馬背上，在女人的胸脯上。”你看，照他說起來，女人能夠安慰男人的本領，還只占得到第三等的地位。

歐洲的文學家，把女人當作消遣的玩意兒，卻給了她第一等的地位，似乎女人還驕傲着這種可疑的光榮呢。從十九世紀的下半期起，這種浪漫譎克的讚美女人，說她是“享樂的源頭”，崇拜她的“神祕的實質”等等，很明顯的開始讓開自己的地位，而來了一種現實主義的批評態度：多多少少激烈的表示不滿意於她在家庭裏和社會裏的行爲。大家知道的，在我們俄國，這是因為婦女要求教育，要求和男人平等的參加革命工作而引起來的。跟着俄國的“女虛無黨”，首先是英國的婦女，開始了社會工作和爭取獨立的運動，因此，立刻就

得到一個譏笑的綽號——叫做“藍襪子”。德國女人和法國女人，在文學上和政治上出了一些很有才能的代表，可是，並沒有急急於來學俄國女人和英國女人的榜樣。

然而，在歐洲資產階級的一切婦女之中，大概有了些什麼新的，不痛快的現象，所以，又要把她們放到教會所規定的地位上去，——就是“第二等人”的地位。瑞士有一個什麼大學教授，他的姓名我忘記了，在九十年代的中期印了一本很厚的書，他在這本書上，證明婦女是生物學上的特別種類，在一切方面都比男人低，比男人壞。同時，弗里德里赫·尼采也向婦女宣戰，這位尼采先生是想恢復有點兒發胖的“民族精神”的。威廉第二應當從他的高高的皇位上來提倡，說德國女人對於自己的國家只有三種責任：孩子，廚房和教堂。還有許多企圖，各種各樣的，都是要想證明給婦女聽，說她是——“第二等人”。資產階級的“仇視女性主義”的最激烈的表示，應當要算一九〇二年在奧國出版的鄂託·魏寧格爾的一本書，叫做“性和性格”。

所有這些現象，合攏起來，都在說明歐洲資產階級的“地心裏”發生了什麼驚慌。後來，部分的解釋這個驚慌的，是英國的“塞非來基斯德”(suffragist)的運動，——這是一些婦女要求和男人平等地參加國家的政治生活。也只部分的罷了。而更廣泛的解釋“仇視女性主義”的爆發和資產階級之中所以發生這種驚慌的，我看是 N.

F. 阜朵洛夫，一個不大出名的作家，他著過一部“一般事件的哲學”
託爾斯泰和朵斯託耶夫斯基認為他是個“天才的思想家”。

他寫了一篇關於一八八九年的巴黎展覽會的文章，——那次展覽會是爲着紀念法國大革命的一百年週年而開的，——他說，“資產階級的制度，自己也不能夠明顯的表示牠所服務的原則，牠所賴以生活和運動的理想。”照阜朵洛夫的意見，這個理想在俄國卻暴露了。

“我們一八六二年的當地的全俄手藝展覽會是近於真理了，這個展覽會幾乎發見了這個社會以前是替誰服務的，現在還在替誰服務，而一八八九年的世界展覽會也就是這個社會的表現；牠發見了這個，在展覽會的入口，擺了一個女人的像（或者妥當些說——是一位太太，夫人，妃子的像，——不管她是夏娃，愛倫，潘朵拉，歐羅巴，亞斯帕西亞……），身上穿着整個俄國工業所供獻給她的各種衣料，大概是展覽會上所陳列的衣料之中大家所公認爲最好的衣料，——這個女人的像，望着鏡子裏的自己的影子，似乎認識了自己在世界裏的中心地位（自然只是歐洲的世界），認識了自己是文明和文化的最後的原因。”

底下，N. F. 阜朵洛夫就得到一個結論，說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是膨脹了的，也就是病態地擴大了的，達到了高度緊張的性的本能；他說，生活就是“女人的王國”，就是女人的“並不沉重卻是滅亡的

統治”的各方面的表現(原注)。這種觀念的教會的來源是非常明顯的,可是,在這一次,這種觀念之中卻包含着很大部分的“壞的真理”。

一九〇一年在苦楚克·叩村子裏,住着一個肺結核的教員朵白洛克龍斯基或是朵白洛霍特斯基: A. P. 柴霍夫把他介紹給我認識了,柴霍夫說,“這位教員也寫些什麼呢,但是,沒有希望的。”這個教員,原來是一部“無結果的勞動”的作者。在這部著作裏,他統計了完全爲了給女人穿,給女人裝飾,以及一般的爲了滿足女人需要而工作的工廠。這稿子是紀念 N. N. 資拉託符臘特斯基的,寫得很沉悶,引證了駭人的數目字。記得大多數的數目字,作者是從關稅報告冊裏引來的,似乎還引用了 S. 維特所出版的那本“俄國工業發展”的書。我覺得這一部著作的手稿,是受着託爾斯泰的影響而寫出來的,反映着“民粹主義”的思想,而且很合於牠的標題——的確是“無結果的”。作者不但在生理上是一個病人,而且傳染了偉大的驕傲病,似乎還有點宗教的昏話;他還自以爲受了“俄國思想”雜誌的編輯, V. 郭爾赤夫的侮辱。——郭爾赤夫讀過了這部手稿,勸他“不要出醜,燒燬了稿子罷” 後來,我看見了 N. F. 阜朵洛夫的“一般事件的哲學”的第一卷之後,我倒記起了這部“無結果的勞動”了。

誰都不會否認,資產階級婦女所需要的奢侈品的生產,發達得像

(原注) 這裏所引證的是根據 N. A. 謝特尼茨基的小冊子“N. F. 阜朵洛夫所描寫的資本主義制度”。

黴菌或是墳場上的野草那麼快。也許並不是“因為這個原故”，然而，始終同時發展着文學上對於女人的“批評的”，甚至是敵視的態度，女人還只是當作妻小，母親，“家庭之中的第二個領袖”看待。在現代的英國文學裏，這種情形特別顯著，而英國這個國家不久以前還驕傲着“家庭傳統的不可動搖”呢。越來越多的出現了一些書籍，描寫“國家柱石的家庭”的崩壞過程，描寫着那些“不崩潰的”福爾賽特們的死滅和崩潰，這些福爾賽特們在約翰·赫爾蘇洛蒂的“薩格論福爾賽特們”裏面，描寫得非常之好；還有赫克斯黎在他的小說“通過各種各樣的玻璃”，梅克爾·亞倫在他的“綠帽子”，以及許多其他的書裏，都描寫着。

從這些書裏，你可以得到一個非常之確定的感想：如果除開數量上很少的，在社會上沒有多大影響的一部分婦女——這部分婦女是擔任着“社會工作”的，就是同丈夫一塊兒竭力在鞏固着那個根本動搖的“良好的舊秩序”，——如果除開這部分婦女，那末，其餘代表資產階級家庭的全部婦女羣衆，很努力的在那裏幫着破壞“良好的舊秩序”呢。

她們“彷彿是在本能地”爲着自己的過去時代復仇，因為教會和國家，把她們教育成“第二等人”，只用自己的肉體去給人享樂的人，而現在，就在這一種人裏面，教出了那種對於自己國家的命運，對於實際生活毫不關心的態度。而實際生活，對於資產階級的了解力，

是越來越複雜了，而對於被壓迫羣衆的認識，卻越來越明白了，這個實際生活威嚇着那“良好的舊秩序”，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悲劇的崩壞。亞蘭·卡爾特希爾在自己的書“爲什麼英國人失掉了印度”裏，指出了這個崩壞的主要原因之中的一個：“印度人完全明白了西方文明的道德上的空虛”；這裏，“西方”這個字也許要改做“英國”而“道德上的空虛”必須改做“無能”。

大家知道的，印度人對於英國文明的懷疑態度，因爲英國的失業現象而更加厲害了。那個卡爾特希爾還說：

“人也不是上帝的，也不是國王的奴隸，同樣，他也不是什麼神聖的不變的法律的奴隸。” 這樣說，其實就是放棄了以前的堅固的老陣地。印度人，一定非常之有興趣的讀着這一位印度的英國行政家的書。

自然，指出家庭的崩潰的，不止英國一國的文學，全歐洲的文學都是這樣。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戰爭之後，這個過程應當格外顯露了。文學上的表現，很結實的，越來越多的，證實那些男子的和女子的，同性戀愛的廣大發展，極多的刑事犯的紀錄，——因爲嫉妒而犯罪的增多，虐殺兒童，越來越多的墮胎，離婚，以及其他種種家庭，社會的腐化崩潰的現象。

自然，資產階級婦女的階級本能還是活着的，在一切機會，只要

她們覺得要來代替她們階級的新階級有些什麼行動反對着她們的利己主義，反對着她們的習慣和方便，那末，她們的階級本能就發作了。然而她們的階級的守舊主義表現得比較不激烈些，而且是“陣一陣的”，至於她們的“虛無主義”，她們對於現實的漠不相關的態度，她們的渴望奢侈和感覺上的享樂，卻在經常不斷的表現着。這不會不加緊資產階級腐化的過程。可惜，腐爛的過程也會傳染，而且的確在傳染給健全的人，更可惜的是，歐洲無產階級還沒有充分估計到這種資產階級病態的傳染的可能。

“誰喜歡教訓——他也就喜歡智識；而誰要是討厭暴露——他就是個蠢貨。”

這是梭羅門說的，他是個皇帝和預言家，然而他居然預見了蘇聯的自我批評的必要和益處。

蘇聯的婦女，尤其是農村的婦女，應該很認真的想一想自己對於宗教和教會的態度。她們生活裏的艱難和苦痛，也“要感謝”教會的“神聖的”法律呢，教會的法律是在幾千年來暗示婦女，說必須要奴隸地服務。教會是把婦女當作奴隸看待的，而無神論者的聶克拉莎夫說：

命運是有三副重擔。

第一副——是和奴隸結婚，

第二——是做奴隸兒子的母親，

第三——是服從奴隸直到進棺材。

聶克拉莎夫說這個話的時候，他是指着農奴制度講的，然而就在農奴制度廢除之後，農民仍舊是自己的破破爛爛的經濟的奴隸，是私有財產的奴隸，這私有財產是我們生活的一切不幸，痛苦和醜惡的基礎。在這私人經濟裏面，農民的老婆從不可追究的時代起，就在自己的肩膀上擔負着苦工似的勞動，直到現在還擔負着，不到時候就吞沒了她的力量。她同時又是洗衣服的，又是餵牲口的，又是烤麵包的，又是奶媽，又是織工，又是裁縫，又是種園地的，又是燒菜的，又是挑水的，又是打掃洗澡房的，——不容易數清她的“家庭責任”，這些責任簡直把她這個人降到家畜的地位，而且這個家畜的價錢比馬還要便宜些，雖然馬所做的工作要比農民婦女少得多，連比都不能夠比。

然而現在，在她跟前展開了一種可能，可以脫離永久的苦工，可以成爲和男子同等的“第一等人”，男子向來是只承認自己是這樣的人的。她應該明白，私有財產是一條鎖鍊，牠束縛着她的自由，無益的吞沒她的力量，不給她的理智發展，不給她的能力發展，——“撲滅着心靈”，像一個農婦給我寫的。她應該明白，如果她自己認爲或者覺得比男人笨些，那末，這正因爲教會和資產階級的國家“撲滅了她的心靈”，因爲誰也沒有想使她比男人聰明些。大家都利於有相反的情形。

能夠把婦女從苦工似的生活裏救出來的只有社會主義，集體的

勞動。工農政權很有成績的開始了根據集體的原則來改造生活。這件事情是極端困難的，——要使得幾千萬人明白：舊式的生活對於他們是不利的，無意識的，人類的自由理智完全可以保證輕鬆的，豐富的，有趣的生活的可能。這事情是艱難的：幾百年來，人被訓練得只會畜生似的過活，各個人只顧自己，只為自己；大家還不大明白怎樣可以有別種生活。

不大明白，然而已經在建設着這種新的秩序了；蘇維埃的國家很快的建設着工廠，機器，一天一天的富有起來，再過幾年，就什麼也不缺少了。我們這裏，一切創造出來的東西，都是爲着大眾的，而不是像別些國家裏似的，專門只爲着一些選擇出來的人。這種工作是要把人從奴隸制度裏而解放出來；婦女應該把自己所有的力量，把整個的心靈都放在這個工作上。而她，特別要好好的了解：教會是她的古舊的，不肯放鬆的，最殘酷的仇敵。

這篇文章最初發表在“伊茲維斯啓亞”（即“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新聞”報——下同）第66（3913）號，1930年三月八日；同時發表在“我們的成績”雜誌第三期，1930年三月號。

論 叛 徒

當須要說明太別致的現象的時候，總要把牠同更普通些的，更明白些的某種東西去比較，就是要尋找“類似物”。然而叛徒卻是階級國家的天性的那麼特別而可惡的產物，簡直沒有什麼人，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同叛徒比較。我想，同叛徒去比較，甚至於要侮辱了傷寒症的蝨子。

在叛徒之中，耶符諾·亞瑞甫 (Evno Azef) 算是特別出名的了，他是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的委員，這黨的“戰鬪團”的領導者，維克多·柴爾諾夫，波里斯·薩文珂夫，以及這個政黨的其他領袖的私人的好朋友，這個政黨在自己的歷史上，給了那個猶大(1)——亞瑞甫那麼巨大的地位。像大多數的英雄一樣，他也是“吹大了的”，其實，他是一個神奇古怪地“簡單的人”。他自己也很了解自己天性的奇妙的簡單，而在自己寫給柏林市警察總監的字條裏，對於他同黨的朋友給他畫上的“偉大領袖的背光”(2)，提出過抗議。可以假定

(1) 猶大是出賣耶穌基督的叛徒。

(2) “背光”(orcol)是碑像頭背後的光圈——佛像也有的，——這裏是說革命前亞瑞甫逃在柏林時候的事情，那時候社會革命黨還把他當做領袖。

他的抗議不但是出於自衛的動機，而且是很誠懇的。一九二六年國家出版局出版的 B. 尼古拉耶夫斯基 的“亞瑞甫的結局”，可以證實我關於亞瑞甫的“誠懇”的意見，是有很結實的理由的。

還是在一八九三年，亞瑞甫就自覺的，經過了考慮的選定了叛徒的職業，決定了自己要做奸細的工作，當作自己的“生活的道路”，“生活的方法”，而一直不變的走着這條道路，直到碰住為止。碰住了，搖動了，然而沒有跌倒，而是從政治，從革命方面跳到旁邊去，舒服的，安寧的躺到富麗的市儈窩兒裏，陪着一個“奢華的女人”，這是個公主式的娼妓；她在一九〇四年，安慰過契里爾·羅曼諾夫的“戰鬪生涯”，“在滿洲的戰場上”，在他的專車裏。契里爾·羅曼諾夫，就是那個現在在國外自稱爲皇帝的，或者又給自己加上了什麼別的響亮的官銜。亞瑞甫同這個咖啡戲院裏的“奢華的女人”，還是在他當着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的時候，認識的。

他是個胖胖的，厚嘴唇，情感主義的人。在寫給姘頭的信裏，他自稱爲“你的唯一的兒子”，“你的小爸爸”。他給她寫得那麼動情：“我怎樣的要想你在這裏一塊兒洗澡呵。”“你是我的唯一的親近的人，這麼親近，以致於我感覺不到我們之間的任何區別，什麼地方是你，什麼地方是我，——我也知道了，這不是一句空話。”

我想，這裏可以相信這個猶大，——他在這裏所講的，的確不是一句空話，雖然同維克多·柴爾諾夫和黨裏的其他中央委員有過多

年的友誼之後，似乎也很難感覺不到自己和娼妓之間的“任何區別”。然而就是在市僧之中，也可以碰見同隨便那一個憐水坑同樣深沉的性格。

亞瑞甫很幸運的避開了自己的革命朋友和警察朋友，開始過那種“美麗生活”，那就是理想地教養出來的市僧，從普通的商店老板直到總長和王公大臣的生活的特色。他玩着紙牌，玩着交易所的玩意，給自己的姘頭買些金剛鑽和銀碗盞，同她去洗洗海水浴，總之是旅行旅行，——有幸福地活着。他錢是有的，——黨的經費他是毫無監督的化費的，爲着絞死的人警察也很大量的付給他價錢的。

一九一五年，柏林警察把他關在監獄裏去了，他在那裏讀着無政府主義者馬克施·史替爾納爾的著作，“唯一的人和他的私產”，這是一部可以叫做市僧個人主義的福音經的書；他讀着龍白洛左的“天才和瘋狂”，亞爾策巴塞夫的“沙寧”，然而比讀書更勤快的，是“幹着交易所的投資”。那個“奢華的女人”，說他“一般的不大喜歡讀書”。坐在監獄裏，他記起了上帝也是爲着市僧的方便而造出來的，就在給那個“奢華的”傢伙的信裏面寫：“上帝應當給我力量。靠着上帝的幫助，我可以忍受一切。”

而且，可能的是他一生一世都信仰上帝的；也許，這是他的立場和工作的一種雜誌性所用得着的：必須要說服自己——在革命黨人和警察，在忠實的人和下流的人之上，還有第三種人存在着，對於這

第三種人，那兩方面都是同樣的沒有分別。上帝的所以造出來，本來就不是要使得人偉大起來；而是要使一切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地認識自己的渺小。正因為這個目的，“教會裏的偉大的神甫”，宗教裁判官和獨裁者要用“火和劍”來堅定上帝的存在；正因為這個目的，我們現代的憎惡人類者之中的愛上帝的人，也要來堅定上帝的存在。

然而也可以這樣想：亞瑞甫，這個職業的猶大，感覺不到革命黨人和警察之間的任何區別：這一些在打死省長和總長，那一些在打死幾百個忠實的，英雄情緒的青年。猶大在兩方面的營壘裏都有朋友，他們相信了他的組織屠殺的異乎尋常的本領；而他，爲着要賺些錢來過“美麗的生活”，就向右背叛左邊，向左背叛右邊，向右出賣左邊，向左出賣右邊。這個兩面三刀的工作用不着任何意識上的遮蓋，任何理論和辯護的理由。亞瑞甫沒有辯護，他簡單的向左邊說：

“你們還要什麼？我幫助了你們殺死你們的仇敵。”同樣的他對他右邊的朋友說。藝術家，職業上傾向於想像的人，可以把亞瑞甫描寫成一個深沉的，甚至於悲劇式的個性，這種個性信仰叛徒事業是自己的歷史任務，因爲自己憎惡人類，所以就有這樣的信仰，因爲復仇性的願意消滅人，不管他是誰。在腐爛的市儈之中，什麼都是可能的，這種對於人，對於生活的態度——絕望了的人的態度——也是可能的。

不久以前，“Neue Freie Presse”（新自由報）的記者，在布哈

萊斯特認識了一個小小的宗派的代表，這個宗派進行着很厲害的宣傳，而在居民之中有了相當的影響。這個宗派的信徒自稱為“克里斯倩”(3)。他們的學說非常之可以表示我們時代的特色。

“克里斯倩”的宗派是發生在美國的。那裏，他們有幾千信徒。這“克里斯倩”的公社在倫敦和巴黎也有。這宗派的學說，登載在底下的法文的印刷品——他們的綱領裏面：

“我們應當竭力使人類死完。我們所謂生活，其實只是幻象；而我們的最高目的應當是死。我們的第一等的責任，因此，就是幫助人類的死絕。本宗派的信徒不過性的生活，而且應當儘可能的使得別人也沒有小孩子。我們應當儘可能的喫得少些。我們越喫得少，我們的生活越壞，我們就越快的和死接近。我們不得已在死之前還要過的這些日子，應當貢獻給禱告。要高聲的誦讀聖經和讚美詩。‘克里斯倩’不吸煙，不喝酒精品。他們不和人見面，過着孤獨的生活，而準備着死。”

那個維也納的報館記者，同這宗派的一個指導者愛倫·克洛茨談了話，她給他說：

“我們走到了事物的盡頭。我們覺得一切發明，一切救濟人類的學說，都是枉然的。社會主義，素食主義，自然主義，以及其他的

(3) 就是“christian”——基督教徒的意思，因為恐怕和普通的“基督教徒”混淆，所以譯做這麼四個字。

救濟人類的萬應靈藥，都是無意識的，胡鬧的。法西斯主義也不能夠給什麼。我們知道，在我們現在，許多不信仰的人又回到宗教方面來了。然而這也是無用的。一切都是幻象和欺騙。我們深信，人是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什麼也做不成功的。人應當消滅。自殺卻不能夠解決問題，因為大批的自殺是要發生震動的，反而要使活的人產生求生的意志。不行，應當慢慢的死，使地球都變成沙漠，而地球上的人絕種。’

然而這種病得要死的人的哲學，對於被稱爲“偉大的奸細”的耶符諾·亞瑞甫，也是不對勁的；要誘惑他這一類的人，這種哲學是沒有用的。藝術家碰見這種惡劣材料，也是一無辦法，因為那個“奢華的女人”關於他的生活的結局的公開的表白，已經把這個藝術材料弄壞了，無可救藥的了。在猶大—亞瑞甫的形象裏面，很明顯的有點兒像公牛的地方：公牛在屠場上的責任，就是引誘自己的公牛同志到屠夫的屠刀下去。總而言之，耶符諾·亞瑞甫是個典型的，甚至於很簡單化的市儈，他像這一種半人類的一切屬員一樣，有本領爲着個人的舒服而背叛一切和一切人，出賣一切和一切人。極有才能的“簡單主義”的諷刺畫家沃拉甫·古爾白朗遜畫了一張完全正確的亞瑞甫的肖像：臉是胖胖的，厚嘴唇，像豬似的毫不關心的小眼睛。在這個胖胖的嘴臉上，當再加上那個沒有精采的聲音，和那種永久向着下面的什麼地方，向着自己的腳底下講話的神氣。

“一切都是相對的”，卑鄙齷齪一也是一樣。亞瑞甫的工作範圍比較得是狹小的，規模並不大。有人問列沃尼德·安德列耶夫：他關於亞瑞甫事件的意見怎麼樣？這位作家的回答是：“一點兒也不懂，不知是怎樣的一件家務事情。”

現代的叛徒——別謝多夫斯基，德米特里耶夫斯基，以及其他(4)，——工作的規模要大得多，他們所背叛的不是個人，不是幾個團體，而是企圖背叛工人階級。自然，他們的企圖不能夠給什麼特別有力的效果，除非是暫時的，不長久的，又使白黨僑民的喘着氣的希望活潑一下。我自然不把別謝多夫斯基們去比猶大—亞瑞甫那種智力上滯鈍的，不通的，各方面都很有限量的傢伙；他們比他還要渺小得多，還要卑鄙齷齪。他們自然是些磨練過的頭腦的人，有很發展的謊騙的本領，只要用得着，也會並不那麼壞的假裝着“民衆”的誠實的朋友。他們大家都是那麼一班智識階層的典型，這種智識階層是有自己的“歷史”的——痙攣地從右邊到左邊，又從左派到右派的搖盪的歷史，定期重復的放棄“半世紀來的平民智識份子的傳統，首先就是拒絕替被壓迫階級服務——這是在社會生活上，而在私人生活上，是拒絕責任心的命令”，——V. V. 沃洛夫斯基關於“叛徒”的實質是這樣說法的。

(4) 別謝多夫斯基等是一九二九至三〇年蘇聯駐在外國的使領機關裏的一些叛徒。

不久以前，叛徒之中的一個，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發表了自己的“懺悔”，而在這篇文章裏承認了：“我們是奴隸：我們需要先生，領袖，預言家。”這倒是對的。他們很甘心的跟着隨便什麼領袖爬，所希望於每一個領袖的，也永久是一樣：也許，這個領袖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條件之下，會擴大一些“市僧式的幸福”罷。

八十年代的初期，在警察靠着迭加耶夫們的幫助撲滅了民意黨⁽⁵⁾之後，他們這些“前革命黨人”，就“聰明了起來”，開始宣傳爲着個人的道德上的完成起見應當放棄革命事業，他們說，“只有個人的道德上的完成能夠改變社會制度。”一九〇五——〇六年革命之後，他們在“路標”集裏，由彼得·史特魯維領頭，——這史特魯維以前是馬克斯主義者，而現在是帝制主義者，然而對於自己倒是忠實的，仍舊是那麽一個空談家，他一生一世都是這麼一個傢伙，——開始給“賢哲的歐洲市僧”唱讚美歌和祈禱文，也宣傳了道德上的完成，宣傳了回到宗教去，回到教會去。

在我們這時代，“過去的人”很明白的看出了：工農政權簡直不打算擴大市僧式的幸福的範圍，完全是認真的決計要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而且一點兒不懷疑各國無產階級還要來模倣自己的榜樣，——在我們這時代，“過去的人”又來說起“聖經的真理”和底下這些話了：

(5) 民意黨(Narodnaya Volia)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俄國革命黨。

“宣示的真理，並不在於愚昧和強暴所保障的死法律裏，而在人的上帝式的自由意志裏，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模樣造出來的，然而要達到這個最高自由，就應當在“最後的，最偉大的鬥爭”裏衝出去，而首先要灑脫哲學的魔術和蜘蛛網式的結構的羈勒，爲着要看見那“最重要的”，而達到智識的源頭。科學，建設在比花崗石還要堅固的基礎上，也應當這樣建設；然而形而上的真理，却要在上帝式的自由意志的世界裏去求得，在那裏，天主“在一無所有之上維繫着大地”。在這上帝式的自由意志的世界裏，存在的成爲不存在的；而經驗的真理，我們在這裏受着時間限制，爲着日常的需要而求得的，不會成爲永久的，不變的真理——必然的。然而能夠走到誓約之地的，只有那樣的人，就是不回顧的走着，不摸索腳底下的基地，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也不問爲着什麼。”

你們看罷——這是很陳舊的歌曲，而且歌得很沒有才能。說“到誓約之地去”，就是到市儈式的幸福那裏去，應當要“不回顧的走着”，“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不問爲着什麼”，這是他們撒謊的。他們向來就很知道應當爬到“什麼地方去，爲着什麼”，他們在十月之後立刻就懂得了這個，當時，他們對工人政府實行怠工，當時，他們去服侍狄尼庚，哥爾卻克，符朗格爾們，以及各種各式的匪徒，破壞我們國家經濟的匪徒；他們在工人階級勝利之後，暗暗的爬到工人政黨裏來，來替蘇維埃服務的時候，也是知道“到什麼地方去，爲着什麼”的，——他們的爬來，是爲着要做暗探，去安慰那些政客化的僑民，而且爲着他們以前的主人的利益，用各種方法來妨害我們。

最特色的是，在一切大事件裏的叛徒，總是用同樣的關於個人

的道德上的完成”的說話，來掩蓋他們的叛變，用同樣的必須回到宗教，教會裏去的說話，來掩蓋他們的叛變。這在我們這個時候是特別來得出色，我們現在，只有鬻子和瞎子，才會不看見教會已經明顯的，無恥的，暴露了自己的最下流的階級實質，暴露了自己對於銀行家和工廠主的奴隸式的，奴才式的關係；似乎教會還從來沒有這樣完全的赤裸裸的顯露過自己的“秘密的秘密”。

這些“過去的人”奇妙地不愛乾淨，他們的記憶力奇妙的薄弱。他們曾經“誠懇的，熱烈的”氣憤着基督教會的主教把一個基督教徒列夫·託爾斯泰開除了出去，這難道很久了嗎；而我已經聽見，他們現在都在靈感地吻着主教的手了，有一個僑民文學家就在大庭廣衆之間幹了這麼一套把戲。一九〇六年之後，安納託里·卡閔斯基就做了些公開的色情狂的小說，詩人羅斯拉夫列夫歌頌了猶大，米哈伊爾·亞爾策巴塞夫在小說“沙寧”裏面，讚美着，頌揚着十足的，妄自尊大的賤貨，而彼得·史特魯維在“俄國思想”上發表了“希臘正教的神學論”，在“路標”集裏還給歐洲的市僧唱了讚美歌和祈禱文，——十月革命之後的僑民也是一樣，連“讚美歌”和“尿道發炎症”之間的區別，就算是聲音上的區別罷，他們也沒有能力分辨的了。

看罷，他們現在又在歡迎“第三次的僑民”，那些小騙子了，他們那麼興奮，彷彿芝加哥的匪徒跑來幫助他們的渺小了。似乎，只有約瑟夫·赫森，無恥惡毒得可笑的一個小報的編輯，倒覺得別謝多夫

斯基是在胡說，而指出他的書裏面“有許多不明白的，沒講到底的地方”，必須詳細的解釋，別謝多夫斯基究竟——

“信仰着什麼，希望了什麼；什麼使得他燒燬他所崇拜的，而崇拜他所要燒燬的。”

解釋其實是用不着的。別謝多夫斯基自己公開的敘述了自己：

“資產者的兒子，估衣商人的兒子；以前是極端的無政府主義者，國防派，後來是立憲民權黨，右派社會革命黨，到布爾塞維克改變的時候，已經成了左派社會革命黨。”

後來，爬來給工人階級服務，而現在做了工人階級的叛徒。這裏，我也可以引證一下聖經：“狗回到了自己的狗窠裏去了。”而那個約瑟夫·赫森——也是最腐化的，最滑稽的人物之中的一個，他們坐在“巴比倫的河岸”上，做自己的下流性格的俘虜。他簡直像耶利米(6)一樣的寫着：

“唉，現在不止一個英國政府在給紅色的莫斯科講交情呢，”——他悲哀的寫着。——“歐洲不會，也不肯抵抗布爾塞維克。不會自己維持自己，自我保存的感覺的削弱；也許，甚至於是對自我維持的權利的認識的削弱，——歐洲對於布爾塞維克，對於自己的殖民地，對於自己本身，難道不是喫着這些苦頭嗎？在自己去叫了美國人，日本人，印度人，黑人，來把自己打碎了之後，在‘自己給自己造成了那麼一個歷史的糾葛’，就是在最好的情形之中，在這幾十年以內也是跳不出去的了；——這樣之後，還只說歐洲聯合起來反對英國的關稅政策，保護自己的錢口袋，——那不是可憐的呼號嗎？”

(6) 耶利米 (Jeremy 或 Jeremiah)，聖經舊約裏的預言家。

赫森寫得好。可是，不會相信他就能夠幫助歐洲。在他的報上，那個小叛徒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發表了自己的“懺悔”——一篇很蠢笨的文章。有一部份還是關於我的。引證出來：

“……有一個人。我們把他儘可能的理想化了。我們忘記了：這個人是個什麼出身。各方面都寫信給他，——這是啞吧奴隸寫給他的。從深刻的心靈裏，用眼淚，用血寫給他，敘述自己的生活，請求他的回音，請求他給個意思，怎麼辦。我們的時代——是個信條的時代。我們需要先生，領袖，預言家。除開他，還有誰能夠出來說話，擁護他所終生擁護的——似乎是這樣罷，——擁護人的個性呢？而他答覆了。我們讀着他的文章，真是莫名其妙。他極粗魯的，極不可憐的，把伸給他的手推開了，他向着打開在他面前的心靈唾罵了。從那時候起，他對於我們已經是不存在的了。我們詛咒了他。”

這樣的人，完全沒有幽默的感覺。“詛咒了”！唔，怎麼能夠寫出，甚至於印出這樣的昏話：“詛咒了”？要是一個蠢貨，或是白萊陽式的美國人，或是主教，那才會在二十世紀的下半期來詛咒什麼人。貴族派頭的特色是：“我們忘記了這個人是個什麼出身。”這些可憐的無聊話裏面，有一點是對的，就是我在三十年前就寫了這種“過去的人”，然而我沒有擁護他們，我不過表現了他們。現在，我又要來寫別謝多夫斯基，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等等“過去的人”了，這些人，自然比我在三十年前所寫的那些，還要有害些。說最後一批的“過去的人”寫了些痛哭流涕的信給我，也是對的，然而說他們請求我給他們什麼意見，那就沒有這麼一回事；沒有的，這是他們——他們之中

的最無恥的，最不通的——倒給我說了一些意見：在這些出主意的顧問之中，也有那樣的人，——如果他們就在我的左近——我簡直要痛打他們一頓。跳到了“沒有埋葬的死人的墳場”上去，跳到了“過去的人”那裏去，這些小小的，可是很惡劣的叛徒，自然要想引起白黨僑民的“無事可做的政治家”的注意和贊成，這種注意對於他們簡直是必須的，而那些“政治家”，無聊的，愚蠢的造謠，誣蔑蘇聯的工人民衆和他們的領袖，已經有十年了。被歷史壓碎了，因為俄國的現實生活就是沒有他們參加也在非常之好的進行着，他們就恨毒起來了，尤其因為甚至於歐美的資本家——也“痛心嫉首的”——承認了蘇維埃國家的無可爭論的建設成績，他們就更加恨毒了，這些腐敗的僑民，自然很高興的聽着“第三次僑民”的誹謗謊騙的空談。然而聽是聽着，已經不相信了。這是感覺得到的：不相信了。

因為惰性的關係，因為習慣的關係，他們還在自己的報紙上，互相的安慰着：俄國的民衆快要來叫我們了，快要來叫我們了！看罷，民衆方面要派出四萬代表來，他們來給我們說，像古時候對“瓦里亞格人”(7)說的一樣：

(7) 俄國古代歷史的傳說：當時“民衆”沒有國王，就派代表去請求“瓦里亞格”人來統治；其實這些瓦里亞格不過是些武士，做當時商人的保鏢的（像前幾年中國四川軍閥的“護商隊”一樣），等到武士擱取了政權，就造出這樣的“俄國聖經”來，說是“民衆”去請他們來統治的。

“我們的土地，因為工農的勞動，現在是更富饒了，更豐富了；請你們來做國王罷，來占有這些土地罷。”

那時候——他們夢見了——他們用強盜奴僕的資格駕臨了，因為家庭裏的秩序，總是奴僕管理的，而在資產階級的國家裏面——就是在各方面的，法律化的掠奪裏面，——總是那一部份的智識階層來服務，來辯護的，這種智識階層永久宣傳着“道德上的完成”，而規定些宗教，民族，階級的信條。

然而所有這些，都是“幻想”和“夢想”。誰也不會來叫你們到什麼地方去。現實是悲哀的，無希望的。不久以前，他們之中的一個，醫治好了自己的“智識階層病”，在工廠裏做着工，用這樣的話描寫了這個現實：“我們的生活怎麼樣？很壞。大家都罵夠了，互相憎惡着，誰也不相信誰。青年非常的困難，他們差不多不知道家鄉，俄國話也忘記了。而老輩的僑民，越來越得勁的給歐洲資產階級唱着自己的‘國歌’：——‘我呀，不幸的老板娘呀，你可憐可憐罷。’這個‘國歌’是一隻小調，叫做‘Bubliki’，美國人已經把牠編進了狐步舞的音樂裏去了。資產階級，自然是又聾又啞，他們自己也是那麼艱難地生活着。”

這篇文章最初發表在 1930 年七月三十一日的“自由”報（“伊塞維斯啓亞”），以及“國外”雜誌第二期，一九三〇年八月號。

同讀者的通信

親愛的亞列克賽·馬克西莫維支！

想寫這麼一封小小的信的意思，我是在讀着你那篇“說 Soliteur”的論文(1)所得到的感想之下發生的。

在“真實”報上的你的許多論文，以及這一篇論文裏，我得到了這樣一種感想：你是在用書信經常的“轟炸着”那麼樣的人，他把自己的其實很渺小的痛苦當做全世界的悲痛，把無謂的眼淚當做受盡艱苦的心裏的珍珠，他把內心的空虛當做生活的空虛，他把自己個人享福的希望的滅亡當做一般幸福生活的滅亡，他覺着自己要沉下去，而他所坐慣了的溫暖的濫泥坑，他那有限世界的濫泥坑是在乾枯了，他就以為滅亡的並不是他，而是整個無窮的世界。覺得自己的日子快完了，他，這個 Soliteur，就叫起來，喊起來，鬧起來，而這種叫喊真

(1) “Soliteur”的意思——據高爾基說，在法文是“唯一的”，同時，又是蝨蟲的一種；他在那篇論文裏，是用這個字來比方市儈的——市儈自以為是天下唯一的人，一切妨礙了他個人的都是“最壞的”，同時，市儈一定是社會的寄生蟲——像蝨蟲似的——要毀盡你肚子裏的脂肪。這篇“說 Soliteur”的論文，發表在“我們的成績”雜誌上，一九三〇年，六月號。

是到處都聽見。

沒有什麼奇怪的，這些絕望的呼號也飛到了你那裏，希望“一句溫暖的知心話”。

幾百萬人之中，那些覺悟過來的，起來迎接生活的人，也寫信給你嗎？我想，自然也寫的，然而不見得會有很多的人。不見得會有很多的人，因為這樣的人更加沒有顧惜的批評着，比較公開自己的歡樂；更加在行動上自信些，比較在文字上浪費。然而，如果我們的著名的諷刺家在當時都念着自己的讀者，那末，在我們這時候，讀者和作家之間的親近而密切的聯繫就更加必要了。

這就是爲什麼我決定要來說幾句關於“我們的成績”雜誌的話，而且我想，你不會當做這是願意來恭維你一下，你是不需要這樣的恭維的。

“又來出版一個不需要的雜誌了……”soliteur 似乎是這樣寫的；這是很明白的，因爲對於 soliteur，凡是要把他從身體裏趕出去，凡是要肅清身體裏的寄生蟲的一切，總而言之，凡是真正有益處的藥方，都是不需要的。而“我們的成績”這個雜誌是非常之好的藥方，牠是需要的，很需要的！這是需要的，因爲寄生蟲還沒有都藥死，健全的，堅強的身體上的傷痕還沒有都醫好。這是第一。第二，這雜誌的需要，還有別的目的。

我們現在的人應當（也正在）成爲這麼大的人，就是要看得見

全國，要生活着我們這廣大的整個的蘇聯的生活，而我們始終還只留在自己的角落裏，只看見同樣的一些街道和人物，同樣的一些牆壁和屋頂，經常的只看見同樣的一個地平線。而只要世界縮小到了這麼幾堵牆壁裏面，那自己的“我”就會極大的生長起來，一直到彷彿做了皇帝的地位。爲着要使得每一個人不再以爲“地球是繞着他在旋轉”，太陽是只落在他的田地上，爲着要使得他不再覺得，不再認爲他是“地裏的鹽”，——爲着這個起見，必須要把他所生活的世界擴大起來，移動他所看得見的世界的狹隘的地平線，加強他的眼睛和耳朵，扯長他的手和腳，增加他的腦筋，等等，使得他成爲廣大的集體之中的經常的一份子，使得他脫離那惡劣的烏龜殼，而把人抬高起來，去認識真正集體的體力和智力行動的偉大力量。

現在，應當使得人能夠把自己的損失和許多人的損失去比較，把自己的缺乏和一切人的缺乏去比較，把自己的成績和整個蘇聯的成績去比較。不能夠消極的等待“挽救一切的技術”的來到，不能夠，因爲連技術始終也是停滯着的勞動，不能夠，因爲教育和文化是有極大意義的動力，這可以在新社會的一切建設者（在不知多麼遙遠的各種各式地方建設着的）之中，贊助那種要求行動的經常的渴望，必須使得每一個建設者都能夠生活着，歡樂着整個國家的勞動者的成績。你所編輯的這個雜誌就在執行着這種作用。

我，A. M.，住在彼爾謨。你到過這個城市，也許記得這個市僧主

義很豐富的小城。現在，自然許多情形都改變了：開辦了化學研究院，農業研究院，獸醫研究院，以前的師範科和醫科也改組了研究院。極大的“Uralseparator”工廠生長了起來，開辦了電車，在城的附近建築着鉅大的造紙廠，烏拉爾煤油礦也在不遠，等等。總之，文化的和經濟的生活改變了，然而在生活的速度上，離得猛烈發展的城市，譬如說罷，像諾沃西伯爾斯克，哈爾珂夫，伊凡諾夫，莫斯科，甚至於斯維德洛夫斯克，還很遠呢。

住在這個很沉靜的城市裏，自然，很需要經常的認識全國的偉大建設，爲的要生活着，感覺着這個空前的生長，而使得要求工作的熱忱把自己燃燒起來，固然，在報紙上，在其他雜誌上，也寫得很多，然而很正當的比較得多注意缺點和“破綻”，像現在的說法，而不大注意成績和成功。然而，不見得會過份估量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的宣傳的意義。“我們的成績”這個雜誌就在做着這件大事業，那“建設着的蘇聯”也是非常之好的雜誌。

今天早晨，我和同志們很喫了些苦頭。自然，你是知道的，現在喫飯問題（以及工業品）還沒有完全弄好，尤其在外省的城市裏。這樣，今天我們一直到十二點鐘還沒有地方喫早飯：兩個飯堂關了門，還有一個是站隊擠得很，而又沒有地方可以買喫的東西。自然，別人還要餓得多些呢，然而我們青年人，是沒有耐心的。簡直想喫得不得了，於是在最大的“熱忱”的時候，“一切種種的那樣的”思

想，就在腦筋裏爬起來了，像下雨之後的蟲似的。要用點什麼東西把牠們按住，扼殺，毒死才好。這裏，單是一種物質的食物是不夠的，還要有精神上的“藥水”。喫過了飯之後，我就跑到市立圖書館裏去，看了一看，讀了許多雜誌，其中就有“我們的成績”，不由自主的，覺得那些朝上的糊塗思想實在難爲情，可恥，那些思想比較這些“農業機器建築”，“耕種汽車建築”，“德尼泊爾建築”，以及其他數不清的“建築”的偉大，是多麼無聊，多麼微小呵。

今天是我的休息日子，我決計到碼頭上去。從前的碼頭生活，我還是從你的描寫裏知道的，然而不久以前的情形，我始終還有些記得。那邊，從前有無數的小鋪子，果子鋪和喫食鋪，而現在是空空洞洞的，什麼也沒有買的！我覺得我們的缺乏和窮困。然而看一看劉比莫夫的美麗房屋旁邊，那加謨河岸上正在建築的鉅大的水泥房屋，還有冒着煙的，在上面是 Motivilikhu，在下面是 Uralseparator，我的情緒就改變了。“不對，——我想，——我們的窮困正是我們在豐富起來的證據。”整個問題都在於要使得集體的內容變成自己的“我”的內容，集體的法律變成自己的法律，集體的生長變成自己的生長，集體的歡樂和成績變成自己的歡樂和成績。我公開的承認，A. M.，——這對於我們，對於青年人，也是一件難事。有時候，這會引起內部的不很輕鬆的鬥爭，然而沒有鬥爭，生活是等於沒有，是的，簡直沒有生活。必須要看見自己努力的結果，看見遙遠的企圖的成

績，看見目的的快要達到，自己確信這個目的的可以達到，使牠不致於成爲‘將來’的沒有認清的烟霧，而是明亮的指路的星。你的雜誌很有成效的執行着這個任務。這雜誌經常的表現社會主義建設的成績，使牠們接近我們這些遙遠的地方，很有興味的解釋牠們的歷史意義，而在教育着怎樣爲着將來而生活，而興奮。願意你十分康健和以後工作的成效。 許多人之中的一個，負責工作的大學生，出身是農民，教育是孤兒院的，上。 24. VII. 50.

※

我們公布這封信，因爲寫這信的人——是幾百萬之中的一個，他們是“覺悟過來的，起來迎接生活的”。沒有疑問的，他經過了很困難的道路，然後才進了大學。二十年前，像他這樣的人是進不了大學的，雖然他似乎是個很堅強的人。然而在那並不“善良”，並不很“老”的，可是始終已經離得我們很遙遠的時候，埋沒的正是堅強的，勇敢的人。到大學的道路，對他們是關斷了的。這樣的事實，就是在我們這時候，從孤兒院裏，從“流浪兒童的部落”裏，以前的“社會危險份子”，“破壞法律的份子”的勞動部落裏，都可以進得到大學，這個事實——也是十月革命的偉大成績之一。

寫這封信的人很謙虛，他沒有寫上自己的姓名，——他問：“幾百萬人之中，那些覺悟過來的，起來迎接生活的人”也寫信給我嗎？是的，我接到很多勇敢的，謙虛的，小小的“偉人”寫來的信，他們的勤

快的工作造成了這樣的空氣，使得人不能夠不“起來迎接生活”。這種信很多，簡直沒有公布的可能，也用不着公布：寫這樣的信的人很知道自己的目的，任務和解決這些任務的道路。然而他們不大知道他們工作的總結，很少知道他們的工作多麼深刻的滲入羣衆，他們所創造的英勇勞動的空氣怎麼樣影響一些人。這個大學生講得對：我們現在的人應當成爲這麼大的人，就是要看得見全國，要生活着我們這整個蘇聯的生活”，而且——我再說一遍罷——要像他那樣，工作着，教育出像他自己那樣的勇敢的勞動英雄。

我這裏還有些別人的信，正是說的這件事情；等一個時期，我要把牠們搜集起來公布，而現在先發表兩三封信的片段。例如西土鐵路的一人寫：

“就這麼樣，我，被剝奪公權的，被侮辱了的人，在這裏，在這同一樣精神的各種各色的人之間，明白了‘認識生活’而參加生活的改造是多麼偉大而興奮的快樂。懵裏懵懂的我，晚上撒了一身沙土，一條蛇把我嚇得要命，像在澡堂裏似的出了一身汗，總之是“燙得出眼淚”，而同時，我心裏的一切冤苦和教會式的貴族主義也跟着汗一起出掉了。說句真話，我真要叫苦，看着半野蠻的啓爾吉茲人，巴史啓爾人那麼興奮的工作着，那種興奮，我起初不但覺不到，並且也不懂得。現在，我經過了這個學校，覺得自己完全在自己的地位上了。”

還有，從北方邊境，卡列里亞來的聲音：

“這裏很嚴酷，冬天簡直可怕。麵包也不多。不做詩了，做起散文來，散文也寫不好，筆底下寫出來的不是那些字眼。而且我懂得，我的要弄文學並不是當牠一種輕鬆的勞動的，這裏也不會有輕鬆的勞動，——不，找不到的。只好和大家一樣的行動起來。而這裏的一個主任，很好的一個小夥子，他說：“你獨個兒在自己的鼻子底下讀些什麼？你高聲的讀出來，還可以幹幹識字運動。”我就幹起這件事情來，我很喜歡，覺得自己可以做一個不壞的教員。工作之後還要做教員是有點兒困難的，但是學生們贊助着，同他們在一起很有趣。他們的問題積聚了那麼許多，我自己也要學習起來才好，而書沒有。”

再則，還有一個例子，足見我們的現實是怎樣的在使人“起來迎接生活”。寫這封信的人自己說自己：

“我以前是看守所裏的時常的客人。看見監獄裏的同伴，怎樣毀壞一些書籍，用來做紙牌，做烟捲。我也參加了這樣的把戲，並不知道這種行爲，比在外面幹的事情，還要是更加嚴重的犯罪。我不大會讀書，差不多要一個個字母的拼起來，從來沒有讀完過一本書。”

然而後來，他拿到了一本書，居然“讀完”了，而“在這本書裏，知道了人的每一個行動都要受到報復的。”

他不但學會了自由的讀書，“傳染了讀書的慾念”，而且——自己是個賭鬼——“卻成了一切毀壞書籍，而把這個寶貴東西變成紙牌

的人的死敵，那紙牌真是可怕的社會的惡。”

這個人現在在遙遠的西伯利亞森林裏做工，在樹膠工業裏；他自己學習着，還教別人，甚至於還學着寫呢，已經寄了些稿子來給“文藝學習”雜誌。

這是一封特別有意義的信。牠表示着：甚至於從監獄裏——以前從那裏是沒有人能夠找到社會有益工作的廣大道路的了，——而在我們這裏，只要他願意，就很容易走上這條道路。我所引出來的事實並不是例外。在莫斯科附近的波爾塞瓦，就組織了一個勞動公社，那裏有好幾百以前的囚犯和浪人，很好的工作着，有很高等的勞動訓練，有些可以每一個月得到一百五十盧布的工資。他們那裏，有設備得很好的毛織品部，靴鞋部，木器部，還有滑冰鞋廠，很好的公共宿舍，給單身人和有家眷的人住。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在工作之後還進夜學校。

我們太不知道這些很有成績的試驗——教育以前的“法律破壞者”和“社會危險份子”的試驗，而在我們這裏，像波爾塞瓦的勞動公社不止一個。還有不少“勞動部落”，那裏許多小“浪人”和小偷也變成了熟練工人，農業研究院的學生，大學生。

所有這些表示着什麼？這是說，自由勞動的影響甚至於深刻的滲入了“生活的底層”。我想，在全世界，在整個世界史裏，無論什麼時候勞動也沒有這樣光明的，確信的暴露自己的神話式的力量，可以

改造人和生活，只有現在在我們這裏，工農的國家裏，勞動才暴露了這樣的力量。自然，對於那些除開少數剝削多數，少數使得多數奴隸化的過程之外不會有別的生活概念的人，這是不會使得他們喜歡的。奴隸主不會喜歡工農對於自己取得政權的權利的認識發達起來，對於勞動力量的認識發達起來；而勞動的力量是解決一切生活的疑謎的，這是能夠根本改變可恥的條件的唯一力量。

歐美的資本家，很知道新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者的嚴厲而困難的工作對於他們的“美麗生活”有怎樣的危險；資本家對於蘇聯的那種野蠻而無力的憎恨是很自然的。這個憎恨跟着我們在組織新生活的事業裏的成績的生長而一塊兒生長着，然而牠的無力也在生長着。

商人憎恨着，然而他首先是商人；他恨着自己的敵人，然而他同時又在武裝着自己的敵人，供給他們機器，以及更加保證蘇聯工人階級所要實現的那個理想的勝利的一切。在這個例子上，最足以看得出資本主義世界的無政府主義的個人主義。

那個大學生的信裏面，最寶貴的是他對於“沒有鬥爭就沒有生活”的認識，他的話是對的：“必須要經常的看見自己努力的結果，看見遙遠的企圖的成績……目的的快要達到……使牠……成爲明亮的指路的星。”

這是對的。對於每一個工人，每一個農民，每一個爲着好的‘將

來'的積極戰士，——生活和工作都要輕鬆些，如果在他面前開展着他的階級的鉅大勝利的圖畫，如果他一個月一個月的，一年一年的看着工農全體衆羣的集體勞動的生長，看着各種勞動的成效和成績。

事實在教訓着，教養着，永久是事實；思想是跟着事實來的，而不是走在事實前面的。各種戰線上的“破綻”，——一個人對於勞動的國家意義沒有充分清楚的認識所引起來的，沒有完全消滅的市儈式的個人主義，要想快些，更加舒服些弄好自己的個人生活，過去時代所遺留下來的罪過：酗酒，懶惰，對自己的階級和集體沒有責任心，——所有這些都是有的。然而這裏必須記得，我們並不是生活在過去的黃昏裏，而是在明亮的白天。一切污點和陰影，我們看得很清楚。每天我們的報紙都在毫無顧惜的照耀着牠們，也許明亮的光線使得陰影更加黑暗些，比牠們事實上的黑暗還要深刻些。

然而陰影是有的。這是可恥的，這應當沒有。這也一定要沒有的。工農的先進隊伍的創造精力的源泉越是廣大，越是迅速的生長，那末，他們越發要堅決的，毫無顧惜的丟開那些人，那些人因為市儈式的個人主義的動機，認為把自己的力量，加入士人階級和他們的偉大目的的創造精力的猛烈的總潮流，是不可能的。

資產階級的國家怎樣看待“罪犯”呢？有一個美國報紙回答了這個問題。牠說：

“1921 和 1922 年之間從馬薩楚塞特監獄裏釋放出去的五百零十個人的生活，被調查過了。結果是可驚的——百分之八十的以前的罪犯，差不多立刻就恢復了以前的生活方式。

調查者所研究出來的是：這五百個罪犯之中，有一半是不滿十四歲就離開了家庭的，只有八十個人曾經進過什麼團體或者宗教的組織，而其餘都是這麼聽其自然的，無家可歸的浪人。

有些時候，監獄的確稍微改變了一些罪犯的性質，雖然他們仍舊是流浪人，無事可做的，酒鬼，然而已經不用以前那種眼光去看自己的生活方式了。

然而一般的說來，馬薩楚塞特的調查表又證實了舊的結論：——監獄對於青年的罪犯，是真正的罪惡大學。”

這篇通信最早發表在“我們的成績”雜誌，第十·十一期合刊，1930 年十一月的讀者通信欄，標題是：“大學生來信”和“回信”

如果敵人不投降——那就要消滅他

工農先進隊伍的精力，被馬克斯，列寧的學說組織着，領導了蘇聯的勞動民衆去達到這樣的目的，這目的的意義可以用三個簡單的字眼表現出來：創造新的世界。在蘇聯，甚至於兒童團的小孩子也懂得爲着創造新的世界，新的生活條件，就必須：使得在個人的掌握和腰包之中沒有積聚鉅大財富的可能，這種財富到處都是從工農的血汗裏擠出來的；要消滅人與人之間的階級分裂，消減少數人剝削多數人的勞動創造精力的一切可能；要暴露宗教和民族偏見的惡毒的謊騙，這種偏見使人互相不了解，互相隔膜；要從勞動者的生活裏，掃除那幾百年的奴隸制度所教養出來的野蠻和齷齪的日常生活裏的習慣；要消滅一切——凡是阻礙勞動民衆認識自己的生活利益的一致的，一切使得這種認識不能夠發展，使得資本家能夠製造屠殺，把幾百萬勞動者送上戰場去互相殘殺的，——這種戰爭的根本目的永久是一樣：就是鞏固資本家的掠奪權利，鞏固他們的無意識的壓榨的貪慾，鞏固他們對於勞動者的政權。

最後結算起來，這就是：創造對於大衆，對於每一個個人，發展自己力量和才能的自由條件，創造對於大衆都是平等的，達到那種高度

的可能，現在能夠達到這種高度的，卻只有例外的，所謂“偉大的人物”，還要枉費許多多餘的精力。

這是幻想，浪漫諦克？不是的，這是現實。工農的敵人，才把這種羣衆建設新世界的運動叫做幻想：浪漫諦克，這種人——像不久以前寫信給我的那個“俄國女人”一樣，——他們代表着“有教育的，歐化思想的一個薄薄的階層”，他們像她所寫那樣，深信：

“理智——是少數人的特產，不能夠在羣衆裏去找理智的。”“文化——是少數有很大的天才的人所創造的。”

那“俄國女人”的這些話，很粗魯的，可是很正確的表現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全部意義和整個兒的窮乏，表現了資產階級思想所能夠對抗無產階級羣衆的精神上的復活的一切。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精神上的復活——這是無可爭論的現實。蘇聯的工人階級，走在各國無產者的頭裏，非常之好證實着這個現實。他們對自己提出了巨大的任務，他們的集中的精力很有成效的在解決着這種任務。解決之中的困難是很大的，然而只要你要——你就能夠！十三年前的工人專政，工人階級，以前差不多是沒有武裝的，沒有鞋襪的，沒有衣服的，飢餓的工人階級，把歐洲資本家所武裝得很好的白黨軍隊從自己國內趕了出去，把干涉主義者的軍隊趕了出去。

十三年來建設着自己的國家，雖然有少數忠實，誠懇，真心替工人階級服務的專門家，然而也有許多卑劣的叛徒，他們非常之可惡的

使得自己的同伴丟臉，甚至於使得科學的本身都丟臉，在世界資產階級憎恨的空氣裏，在“機械的公民”的毒蛇似的噓氣裏，這些“機械的公民”幸災樂禍的指摘着一切小錯誤，缺點和罪過，這種條件的艱難和可怕，連工人階級自己都還沒有清楚的概念，——在這樣的地獄似的條件裏工作着，工人階級發展了，非常之奇妙的動員着真正革命的，創造神奇的精力。

只有工人和黨的英雄的勇敢，——黨是表現工人的理智的，表現革命羣衆的理智的，——只有這種勇敢，才能夠在現在這種不利的條件裏，實行這樣的功績，例如，按照 1929—30 年的計劃，要提高工業生產一百百分之二十二，而事實上達到了一百分之二十五；集體農場應當擴大到二千萬公畝，而事實上達到了三千六百萬公畝。同時，化費着自己的力量在建設工業，領導農村的改造，工人階級和農民還從自己的羣衆裏，不斷的提拔出幾百幾千的天才的負責人員，衝鋒隊員，工人通信員，作家，發明家，以及一般的——新的，自己的智識力量。

在國內，極狡猾的敵人在組織饑荒來反對我們，富農用恐怖手段對付集體農場的農民，暗殺，放火，各種各樣的卑劣手段，——一切活完了歷史所給的時期的人物，都在反對我們，這使得我們有權利認為我們還在國內戰爭的狀態之中。這裏就有一個自然的結論：如果敵人不投降，——那就要消滅他。

在國外，反對蘇聯的創造工作的——有歐洲的資本。牠也已經活完了自己的時期，而註定要滅亡的了。然而牠還想要，也還有些力量來抵抗不可避免的命運。牠和在蘇聯內部實行着害蟲政策的叛徒聯繫着，而這些叛徒儘在用自己的下流手段，幫助牠那強盜似的陰謀。

班加賚，1914—18年歐洲屠殺的著名的組織者之一，綽號就叫做“班加賚-戰爭”的，這個人幾乎斷送了法國資本家的玩意兒，還有以前的社會主義者白里昂，著名的酒鬼昆爾肯赫德勳爵，以及資本的其餘的忠實奴才，正在準備着基督教會的教主所讚美的對於蘇聯的強盜式的進攻。

我們是生活在同世界的整個資產階級戰爭的條件之中。這使得工人階級一定要積極的準備自衛，準備擁護他們為着自己所已經建設的一切，為着教育各國的無產者，而在這十三年之中建設新世界的英勇犧牲的工作。

工人階級和農民應當武裝起來，記住着，紅軍的強大的力量已經勝利的打通過一次世界資本主義的襲擊，那時候自己還是沒有武裝的，飢餓的，沒有鞋襪的，沒有衣服的，自己的指導同志，還是不很知道軍事行動的狡猾的。現在我們有了紅軍，這種軍隊裏的每一個戰士都很知道他們將要為着什麼而作戰。

如果歐洲資本家，因為恐懼着不可避免的將來而完全發了瘋，居

然敢於把自己的工人農民派出來反對我們，那末，必須用言論和行動這樣的打擊那些蠢笨的頭腦，使得這個打擊變成對於資本的腦殼的最後一個打擊，而把牠送進墳墓裏去，這墳墓是歷史完全按照着時刻給牠掘好了的。

這篇文章最初發表在蘇聯“新聞”報第 314 (4161) 號，1930 年十一月十五，同日發表在“真實”報上。

給人道主義者

“民權主義作家國際聯合會”的總書記呂西安·克訥先生，請我參加他們這聯合會的文藝機關報的工作。這聯合會的目的——是“民權主義作家的接近”，——牠的主席團裏有羅曼·羅蘭和辛克萊，這是我所很敬重的人。然而同時，在主席團裏還有大學教授亞爾貝·安斯坦，而在委員會裏，有亨利·曼。這兩個人，不久以前同其他許多人道主義者一同簽名在德國“人權保障同盟”的抗議書上，反對蘇聯把組織飢荒的四十八個罪犯處決死刑。

我完全相信在所謂“人權”之中，並沒有犯罪的權利，尤其不會有反對勞動民衆的犯罪的權利。那四十八個人的行爲的難以形容的兇惡，我是很知道的；我知道他們所做的事情，比芝加哥的和辛克萊的“屠場”所描寫的屠宰公司老板，還要罪惡，還要惡劣。飢荒的組織者，他們籌畫了反對勞動民衆的卑劣的陰謀，激起了勞動民衆的正當的憤怒，因為工人的一致性的要求，而被處決了死刑。我認爲這個死刑是完全合法的。這是民衆的判決，民衆生活在艱苦的條件之中，工作着，犧牲着，不顧惜自己的力量，勇敢的，有成效的努力創造着勞動的國家，脫離那些野獸和寄生蟲而自由的國家，並且也脫離那

種用自己的人道主義去掩蔽野獸主義和寄生蟲主義的人。

很明顯的，我對於這四十八個人的死刑的估量，是和“人權保障同盟”的估量絕對不同的。因為 A. 安斯坦和 H. 曼，同“人權保障同盟”是同意的，所以，很自然的，我同他們之間的任何接近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拒絕參加“民權主義作家國際聯合會”的機關報。

過去的三年之中，一些民權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的機關報，還請過我好幾次。我都沒有答覆，——現在我來改正一下我的無禮罷。我的答覆是給羅曼·羅蘭，辛克萊，伯訥·蕭和威爾斯的，他們的姓名在呂西安·克訥的信裏面提起過，而他們的意見對於我是並非不關緊要的；我想，我正應當對他們解釋我對於選定了人道主義做自己的職業的智識份子的態度。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之後，歐洲的人道主義者先生們，被彼得堡街道上的屠殺工人羣衆所激怒了，給尼古拉·羅曼諾夫上了“血腥的”尊號，其實他在這件罪惡以前早就很配得上這個尊號的了。然而他們並沒有向法國的銀行家抗議，當時法國的銀行家供給了血腥的俄皇許多金錢，幫助他在絞架上，在苦工刑場上，在監獄裏摧殘了幾千更寶貴的俄國人。抗議的時間是很夠的，俄皇的恐怖延長了三年。一九一〇年，我同威廉·沃斯特瓦爾德，李卻爾德·德美爾，沃朗·愛登和辛克萊，參加了一個國際的智識份子的團體，這團體的目的也是歐洲人道主義者的“接近”。而一九一四年，威廉·沃斯特

瓦爾德和李卻爾德·德美爾卻也是第一批簽名在反對英國的血腥的宣言上的人。就在那一年，極大部分的俄國作家學者，——也是人道主義者呵！——做了一篇叫喊得很惡劣的東西，公布了，這是反對德國人的，但是不反對戰爭的本身。這就是那些智識份子，他們現在坐在巴黎和柏林，無才的，蠢笨的，在造謠——誣蔑蘇聯的工農國家，用醜態的謊騙毒害歐洲人道主義者的腦筋，宣傳武裝干涉蘇聯，就是暗示着新的世界戰爭的必要。在這一次，他們這些熱烈的抗議過“德國的野蠻”的人，倒很願意看見德國的，以及其他一切的“野蠻”，來到曾經是他們的祖國的國家裏，來反對他們曾經認為是自己的“同胞”的民衆。

我認爲必須說明，我向來沒有簽名過什麼抗議書，去反對德國的，或是其他的戰爭的野蠻。我知道，戰爭是整個的野蠻行爲，在戰爭的時候，互相沒有得罪的人要自相殘殺着，被別人強迫的放在必須自衛的狀態之中。我知道，戰爭是資本家所組織的，目的是在於鞏固那種秩序，使得“和平”時期的每天的“野蠻行爲”，成爲普通的現象，而且還在於他們自己要發財，卻並不是爲着民族的利益；民族——這只是勞動民衆，他們的經濟利益是國際性的；我知道，資本主義是各國民衆的傳染病。我否認那種秩序有存在的權利，那所謂秩序，使得資本家之間的戰爭成爲不可避免的必然，而這些戰爭都要用勞動民衆的力量去進行，而且是要消滅勞動民衆的。人權的保障

者，對於戰爭，對於這個非常之下流和無意識的事情，卻並不抗議。蘇聯的完全一般解除武裝的提案——馬克西謨·李脫維諾夫同志向國際聯盟所提出的，——人道主義者卻並沒有贊助。

一九一八年，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壓倒了德國，並且在波戰爭所毀壞了的俄國組織了強盜式的侵略，目的是要把俄國變成自己的殖民地，是要掠奪俄國，像他們掠奪了德國一樣。人道主義者却沒有注意這個事實，這種事實簡直使“文化的”歐洲回到科爾特斯(1)和皮薩洛(2)的時代去了。

“人權保障者”沒有聽見法國將軍弗朗塞·德·愛斯彼爾在沃德薩暗示自己的兵士：

——“俄國人都是野蠻傢伙和混蛋！不要同他們講禮，鎗斃他們好了，從老百姓起，直到最高級的代表。”

然而這種野蠻人的奇特的叫喊，俄國的人道主義者是聽見了的，他們那時候同他在一起，現在也還準備着幫助隨便那一個白癡，只要他能夠受着自己資本家的命令來斫殺轟炸蘇聯的勞動民衆。

(1) 科爾特斯 (Cortes) ——一個西班牙的武人，他用極殘酷的手段征服了墨西哥 (生於 1485，死於 1547 年)。

(2) 皮薩洛 (Francisco Pizarro) ——也是一個西班牙的無智識的軍閥，極端殘忍的屠殺了印地安人民，後來西班牙軍隊裏內鬥，他自己也被殺了 (生於 1476，死於 1541 年)。

所謂人道主義者是不是很奇怪的人呢？印度，中國，非洲，巴萊斯汀的事變一點兒也沒有激怒他們，他們自己國內的事變也一點兒沒有激怒他們，對於民族主義，反猶太主義，排外主義的動物式的本能的發展，他們是冷淡的，對於資產階級國家的陳舊的，洒遍了血跡的建築裏，差不多每天都在表演着的戲劇和悲劇，也是冷淡的。他們並不想抗議萊孟德·班加賽的卑劣行爲，這個人幾乎斷送了法國，而現在又在努力的計劃着屠殺工農的新事實了。證明資產階級國家的健康和理智不見得高明的，正是這個事實——牠們的命運竟被班加賽之類的渺小的人物管理着。

是的，現代這世界裏，人道主義者的工作是多得很。可以提醒一下天主教會的首領：在二十世紀來宣傳十字軍征伐，這最好也不過是 *misanthrope* ——就是人類憎惡家的幽默，這種宣傳和“文化的利益”沒有絲毫共同之點，而人道主義者最喜歡講“文化的利益”呢。可以問一下基督教會的神父，難道 1914-1918 年戰爭期間他和他領導的教會所處的立場，對於他很有趣嗎，——那時候基督教徒互相殘殺了幾十萬呢。然而，不知爲什麼，在全世界裏面，人道主義者和“人權保障者”只注意着一塊地方，這就是社會主義蘇維埃聯盟所在的地方。

最奇怪的是他們這些識字的人，居然認爲可以並且很便當的相信那種無聊的謊話，說蘇聯是由個人專政的，其實這裏專政的顯然是

幾千百萬工農羣衆的集中的精力，天才符拉狄米爾·列寧，他的學生和朋友的理智力量所組織的精力。這個專政的目的，是要在蘇聯的全體民衆之中教育他們的意識，使他們認識自己的權利是在於創造文化生活的新的形式和新的條件，建設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個目的並不是“幻想家和野蠻人的任性”所定出來的，——像那些因為憎惡而假裝着愚蠢和瘋癲的人所說的，——這個目的是歷史的意志所提出來的，歷史的意志無可爭論的證明着：作為文化發展的基礎的個人主義已經枯死了，已經過完了自己的時期了。爲着發展人的意識，用得着對於人的強暴嗎？我說是用得着的！還沒有這麼一個時候，爲着達到這個目的而不用強暴呢。文化就是理智所組織的，對於人的動物式的本能的強暴。在歐洲的學校裏鞭打着小孩子，正是爲着要他們做家庭和社會的馴服的奴才，——像他們的父母一樣的“文化傳統”的保護人。我很勸告歐洲的教育家，爲着私有本能的表現而鞭打小孩子，同樣要暗示小孩子有權利鞭打他們的父母——爲着積聚金錢的貪慾，而且這種積聚的方法就是他們父母自己所合法化了的掠奪。

在蘇聯的工人羣衆之中，有叛徒，賣階級的，以前的“國家主人”的偵探在行動着，——這些主人要想恢復自己的統治權利；——很自然的，工農政權要打自己的敵人，像打蠶子一樣。這些過去的主人，這些過去的人，卻有歐洲的資本家，歐洲的寄生蟲在贊助着他們；資

助着他們，希望能夠滿足自己的病態的，瘋狂的掠取慾望。而蘇聯的工農很有成效的建設着自己的國家，建設的條件卻是全世界資產階級方面的憎惡，這階級已經退化的了，已經用盡了自己的精力的了，沒有能力創造什麼文化，而只不過順着惰性的力量在行動罷了。

這個退化階級究竟要的是什麼？牠要在別人的頸項上再稍微坐一忽兒，再靠別人的勞動來生活一忽兒。稍微！牠自己也不打算長久的存在了。牠的一個馴服的奴才——古斯塔夫·愛爾威，勸告德國的資本家和法國的“接近”，在“勝利”報上公開的說出了自己主人的謙虛的意見。他說：

“德國最好是和莫斯科斷絕關係，同波蘭共同組成反對俄國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壁壘，而來參加經濟上的一切辦法，爲着保護文明的利益而抵抗共產主義的野蠻。俄國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崩壞和資本主義的恢復，——這是應當記住的——對於歐美的工業可以保證有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到五十年的工作。”

看罷，資本家只要稍微延長一下：二十年以上，五十年以下的習慣的，安逸的，喫得飽飽的，沒有光彩的，不負責任的，放縱的生活。就爲着保證自己的“幸福的生活”，他們又在準備着把自己的幾千百萬的工農和殖民地奴隸，派出來打仗，而且是要攻打一萬萬五千萬人民的國家，這個國家的軍隊裏的每一個戰士都知道他們將要爲着什麼而打仗。資產階級在自己的全部歷史裏，還沒有把自己的非人的

獸性，表現在現在這樣的公開無恥的，下流的形式裏呢。

然而究竟是怎麼回事？爲什麼最近兩年來，歐洲的資產階級特別起勁的，特別無恥的暴露自己的非人的本質呢？對於這個問題，以前的保守黨議員亞爾土爾·霍普京遜，在英國雜誌“帝國評論”上，給了非常明顯的答覆。他“收買人心似的誠懇的”寫着：

“我所要特別着重的通知讀者的，——就是假裝着相信五年計劃不會成功，這是蠢笨的。在許多部門裏計劃已經超過了，這是事實。我要竭全力來警告讀者：以爲五年計劃要失敗，那是會產生錯誤的，因爲事實上五年計劃已經達到了那麼廣大的成功，簡直要變成威嚇整個文明世界的危險。”

霍普京遜非常之恐懼的描寫着蘇聯變成脫離世界資本主義支配的國家的前途。他口裏冒着口沫的號召着攻打蘇聯的戰爭。他在那篇文章的結論裏，提出了這麼一個堅決的警告：

“鐮刀和錘子將來對於歐洲會像過去的半月形⁽³⁾一樣。這也許是對的，所謂‘誰舉起劍來，他就要死在劍底下’。

然而以後的五七年歷史將要告訴我們，誰不舉起劍來，他要死得更可恥。”

這一個過去的人比古斯塔夫·愛爾威要聰明些。他一點兒也沒有提起“共產主義的野蠻”，因爲他大概很懂得共產主義和野蠻是

(3) 半月形是土耳其的國徽，這是說以前回教徒征服歐洲的事實。

不能並存的。他不像別的白癡似的，亂叫些“文化的滅亡”，共產主義要破壞牠了。他的狼叫，正是恐懼蘇聯變成不受世界帝國主義支配的國家所引起來的。

人道主義者先生們，看罷，引起私有財產者的恐懼的是什麼，憎惡蘇聯的原因，誣蔑工農政權和生活，誣蔑牠的民衆的原因在什麼地方；這個民衆的奇妙的精力已經開闢了新的，全人類復生的時代，人道主義者先生們！請你們准我提出這麼一個天真的問題：

爲什麼你們不提出抗議，反對那種國家制度——那是容許極少的少數精神上破產的人來支配大多數人的生活，用自己的罪惡來毒害大多數人，使他們窮困，愚昧，把幾千百萬人的民族送上戰場去自相殘殺，無意識的爲着武裝浪費極大數量的鋼鐵和土地裏的其他寶藏，這些寶藏是屬於勞動民衆的，應當保證他們的將來的？

你們不覺得這個無意識的制度，是你們柏拉圖式的幻想着的，真正的全人類文化的生長的障礙嗎？

這篇文章最初發表在蘇聯“新聞”報，1930年十二月十一，同時登載在“真實”報。

給集體農場的農民通信員的信

你寫了一封很好的信給我，福明同志！

這樣簡單，明白，並“不狡猾的講道理”，每一個農民，每一個工人將要這樣想，這樣說，這樣寫，只要他們懂得了符拉狄米爾·伊里奇·列寧的，和他的忠實的學生的簡單而偉大的思想，——這種思想在實際生活裏實現出來，鞏固起來，被你，福明同志，這樣的人的勇敢的勞動實現着，鞏固着；你們這樣的人，可以叫做“田地裏的衝鋒隊員”。

尤其是你的底下這幾句話，說得特別響亮：

“在鄉村裏是很困難的，富農和他們的幫手非常之妨礙工作，誘惑貧農離開集體農場，拒絕交出糧食給國家等等，然而我們知道，我們一定要達到自己的目的的，不但我們這裏，就是在外國也是一樣；而現在受着的艱難和困苦，將來回憶起來都要不相信呢。是的，有時候是有點兒困難，然而始終應當說：事業進行得很快，貧農了解我們布爾塞維克。”

說得好，同志們！應當想着，越到後來，貧農越發要瞭解列寧的簡單明白的真理，——這個真理自己要跑到頭腦和心裏來的。

幾千年來，貧苦的農民做苦工似的替大大小小的土地私有者做工；幾千年來，他們看慣了那種喫得飽飽的富農生活是建築在奴隸勞動之上的，看慣了，一個人要有十個人替他的做工的時候，他才能夠喫得飽飽的過活。貧農看見了，那些坐在他們背脊上的，吸着鄉村裏的汗血的“喫公家的富農”怎樣發達起來，發胖起來，怎樣變成商鋪的老板，酒館老板，地主和工廠主，他們看見了富農使貧農破產，吸收更多的人去替他們做雇農的工作；他們看見了所有這些現象，而自己覺得沒有辦法，他們就發生了一種見解，以為也不能夠有什麼別的辦法，以為這種生活秩序是永久規定了的，沒有什麼力量可以來改變這個情形而幫助貧農。教會贊助着，鞏固着這種見解，暗示着：勞動和世俗生活的受苦，替富人做工，這都是保證人在天上去享受永久的幸福的，而收受一點小錢，就把做到死的貧農拖到墳場上去，拖到墳墩裏去。

許多貧農也是明白的：田地上的個人的私有經濟是絞死他們的圈套；他們看見了，正是在鄉村裏，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不斷的生長着，鞏固着他們敵人的糾纏的羅網，富裕的老百姓，“喫公家的富農”；他們看見了，鄉村是在教育着掠奪別人勞動的人，教育着剝削者和資產者，而在大多數農民的心裏，深深的種下了一種心願：無論怎樣都想自己也變成富農。

你們，同志們，自然知道那種富農心理——“心靈”，——連貧農

也是有的。

爲着這個去責備他們——是不行的，他們沒有看見從黑暗的，叫化子似的苦工生活裏，有什麼別的出路，誰也沒有指示他們，說土地私產存在的時候，極大多數的農民，就只能夠過着窮困，不識字，不自由的替富人當奴隸的生活。

然而在勞動民衆的世界裏，在工農的世界裏，像鮮明的火光似的，爆發着，燃燒着列寧的偉大而簡單的思想：貧農們，你們要懂得，小農的私有經濟是人的經濟平等以及一切種種平等的主要障礙！組織集體農場罷，把土地對於你們的沉重的權力從自己肩膀上丟掉罷，用機器武裝起來，用科學武裝起來，學習從土地上拿到比以前所給的多出一百倍的糧食罷。

你們以前是自然界和土地的奴隸，——現在要做牠們的真正的主人，教育你們的孩子，使他們做農業專家，醫生，工程師，教員，讓他們學會科學，而把你們從幾千年的黑暗的，半飢不飽的，畸形的生活裏解放出來。多給點糧食，這種糧食會變做機器，鞋襪，衣服，很好的房屋——不是那種沉悶的木屋，——很好的學校和小孩子的託兒院，很好的道路，來還給你們；你們的糧食會變成一百倍來還給你們，爲着你們的幸福，爲着使大家都發財，一切農民都發財，而不是幾百，幾千個富農。假使不能夠這樣，那就要回到以前的情形，那就是一個人有三隻牛，而另一個人只有三隻麻雀在院子裏，而且連牠們也沒有

什麼可喫的。

富農和富農的幫手寫信給我，罵着：在皇帝手下，什麼都有的：也有釘子，也有靴子，也有馬，也有手帕。

什麼都有，不過不是大家都有；而工農政權要解決極大的任務：要使得蘇聯一萬萬六千二百萬人民之中，每一個人都有輕鬆的，健全的，理智的生活所必須的一切，要使得人不會為着一塊麵包互相掐住了喉嚨，要使得每一個農民和工人都覺得自己是國家和國內的無數寶藏的主人。

這是不是可能的呢？這已經在很有成效地進行着，甚至 歐洲的資產階級，——不久以前還誇口着自己工業的強大的發展，而現在，看着我們工廠裏的工人要在四年之內實現五年計劃，——就愁悶起來了，他們說着，他們寫着：如果五年計劃實現，蘇聯和牠的民衆將要不受我們工業的束縛，將要不需我們的貨物了。

無論什麼時候，無論在世界上的什麼地方，工人從沒有像我們這裏似的刻苦犧牲地工作，趕緊的用一切農民所需要的東西來武裝農民，而且還要用農民向來沒有看見過的東西來武裝農民。

工人的社會主義競賽，衝鋒隊運動，工人在五年計劃終了以前自己銅定在工廠作坊裏面，以及其他許多運動，造成一種確信：靠着工人在工廠作坊裏的英勇的工作，鄉村裏，田地裏的生活和工作一天天的輕鬆了，貨物要快像廣闊的波瀾似的流到鄉村裏來了。不相信在

這樣緊張的勞動精力之下——這種精力是工人羣衆所發展的，而且正在發展着，——城市還沒有能力好好的給鄉村鞋襪衣服，還沒有能力用機器來武裝鄉村，那是蠢笨的。

工人和農民的黨員，一天天的深刻地感覺，明瞭自己是國家主人的任務，——自己應當減輕農民的生活，增加糧食的收穫，擴大畜牧事業，果園事業的責任。工人，紅兵，青年團員，甚至於兒童團的小孩子，都在進行着發展土地生產力的鉅大工作；貧農，組織在集體農場裏的，也開始了解自己在田地裏的工作的極深刻的國家的意義。我們要勝利的，福明同志！

不久以前，我見着了三百個衝鋒隊員，他們坐着自己製造的一隻輪船，從列寧格拉到沃德薩去，在訥亞帕爾（意大利——譯者注）停了三天，離我住的那個城不遠。我跟他們玩了三天，看見他們怎樣聲明要求加入黨，——我過了幾天好節，親愛的同志！我們的工人民衆好得很！幾百年來，打着他們的嘴巴，用腳踏着他們的臉，用刀背槌着他們，在監獄裏磨折着他們，在西伯利亞的充軍地方磨折着他們，成千成萬的鎗斃他們，——他們什麼都受過了，什麼都忍耐了，而現在，他們站了起來，從自己的肩膀上丟掉了那些寄生蟲和野獸，而在經營着，不斷的，勇敢的工作着，還是生活在黑暗裏面，生活在艱苦的條件裏面！

偉大的民衆，偉大的精力在他們裏面燃燒着，照耀着我們這星球

的整個勞動世界。

唔，好了，我也寫夠了，希望寫得還不沉悶。

緊緊的握你的手，福明同志！ 替我熱烈的慶祝同你一起工作的同志。

這封信是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寫的。

金礦工人的信

高爾基同志！

希望你不會生氣——我們叫你同志，而不叫先生。你們那邊，在意大利，不比在蘇聯，——還都是先生呢。而我，老實說，再也打不起精神來，認真叫一聲先生！

我們的信的目的，是要通知你：我們在亞爾丹黃金工業裏工作，現在正在樹林裏，在森林裏。我們周圍幾十公里 (Kilometer)，一個活人也沒有，除開在總路那邊有幾個工人住着，他們在路上打掃雪，使得汽車可以走；而在前年這時候，在這地方不但汽車不能走，就是騎馬也很難走過，夏天是只能夠單人騎馬走，用馬車是簡直不行；看罷，生活是怎麼前進着，人是怎麼快的征服自然界的困難！這樣，我們只有到總路那邊去，才能夠碰見人，而其餘三方面幾百公里都是不斷的荒涼的森林；我們這裏有六個人，砍了些樹木，搭了所小房屋，裝好了地板和天花板，而在天花板上沒有什麼屋頂，就只堆上了好些泥土，很和暖呢！在窗洞裏沒有玻璃，卻綑上了白布；我們的窗子有六十生的密達長，六十生的密達闊。

我們的工作是找金子。我們是國立黃金工業托辣斯派來探訪

的，我們在泉水裏，在河裏都要探訪，要找着新的金礦。自然，我們做探訪工作的工人很多。很大的一隊呢。這樣，工作完了，晚上，坐在我們的小房屋裏，讀着你的書，盡我們的能力去了解牠；批評着你，大家坐在小桌子的周圍，這桌子是先用兩個木樁放在地板上，釘上一根木棍，上面鋪上幾塊厚木板，拼齊了，另外一頭就釘在牆壁上，——桌子倒不壞呢。我們坐着，親愛的同志，就在這張桌子周圍，爭論着：——有幾個說你不會回我們的信的，另外幾個就爭論起來了：馬克西謨·高爾基不是官僚，雖然住在外國，也很忙。

我們通知你：我們這條路線上會有金子的。我們說的話是靠得住的，現在有的是很好的“礦種”，這一種“礦種”裏是有金子的，雖然我們是礦工，所謂“差一年就是一禮拜”(1)，——然而我們始終懂得的。要知道我們蘇聯，工人也提拔出來擔任職務，我就是工人——提拔出來做監工的。我要做報告，寫表格和“試掘坑”的日記。我們這裏很簡單：在我支配之下有四個工人，在兩條路線上做工，每一條路兩個工人。工作是這樣的，譬如說，跑到了一個泉水旁邊，或是一條小河旁邊，就工作起來罷！穿過河一直尋到對岸，再掘起“試掘坑”來，就像掘地洞似的，一密達八十生的密達長，一密達四十生的密達闊，一直往下掘，越掘越深，直到掘着泥土層，或是岩石，再也

(1) 俄國的俗話，意思是十分近的，極其近的，這裏也有極其偏僻的，極其淺薄的意思。

掘不下去了！照着河身的闊度，我們一個一個的“試掘坑”掘過去，隔開二十密遠就掘一個；如果掘着了金子，那末，就在這些試掘坑之間再掘起補充的試掘坑來，那就要隔開十密遠一個了，越下去距離就越近。在你，一定是不懂得得？我們“Soyuz-Zoloto”⁽²⁾有掘地的機器，叫做“凱斯通”機和“英謨派爾”機；“凱斯通”和“英謨派爾”之間有很大的區別，第一種是汽機的，而第二種是手搖的。

生活着！糧食的定額是很大的，夠得很；麵包和粟米還有得剩下來呢，肉是一個月三十斤，白牛油兩斤，糖一個月五斤，麵包很好，半白的，總之生活很好。雖然工人是新做工的，然而這些孩子們工作得很好，我們這裏有兩個就是從鄉下雇來的，做着工，兩個都是青年，都只二十一歲，以前從沒有做過工，然而你想想，事情做得快，再好也沒有了！

長官在我們這裏也是有的，然而不是像你們意大利那樣的；我們這裏，不論是工程師，是技師，是我這種小職員，是工人——大家平等，就是平等的官銜，平等的待遇。大家都像弟兄一樣，誰也不罵誰，晚上說說笑話，讀讀書，早上嚴格的執行自己的工作。

我們這裏有一個“媽媽卡”，她也爭論着，說你不會寫信給我們這些森林裏的人的。“媽媽卡”是這淘金地方的稱呼，“媽媽卡”，——就是管家的能，她給我們燒飯洗衣服。她對於隨便什麼人都是

(2) “Soyuz-Zoloto”就是“全蘇聯國立黃金工業托辣斯”的縮寫。

“媽媽卡”，只要是她照料的。

對不起——寫醜了。

這樣，我們對你有一個很大的請求：給我們說，讀什麼文學，才能夠好好的懂得作家的文字；要好好的運用俄國言語，懂得書法，將來會做作家，這應當讀什麼；買什麼書看，才能夠發展腦筋。請求你告訴我們這個，你可以不必付郵費，我們還不窮，還有些儲蓄金，酒也不喝，沒有傳染着這個，不像以前的淘金工人。

忘記了告訴你：我們還有兩對鹿，我們用鹿拖木柴到“路線”上去放火；這裏時常可以碰見永久冰凍的地方；泥土永久不溶化的，而應當要掘起這些泥土來，在這種地方，我們就放火，使得冰塊溶化開來。我們的一隻鹿是蹣腳的，可是氣力很大，很會拖柴！“區委”給我們送了棋子和書來了，我們做完了工，大家就回去，坐下來讀書，着棋，以後再派到新的地方去工作，那邊也是什麼都有的。

唔——祝你一切都好，我們稍微空談了一頓了，荒廢了你的寶貴時間。

再請求你一次——回答我們罷。

沙土諾夫，諾夫郭洛德切夫，柴爾諾夫，瓦魯耶夫，孔諾普林。

1930年十二月二十七。

帕甫爾·馬特維耶夫·沙土諾夫，他的同志們和“媽媽卡”。

誠心的慶祝你們，森林裏的同志們！

讀了你們的信，心上又快活，又難過。快活——因為時常有你們這樣親愛的信寫給我，都是工人寫的，建設新世界的人寫的，從全地球寫來，甚至於從蘇聯的地底下——東巴斯礦業區裏寫來；唔，如果有這許多人寫給我信，可見得我對於工人是有用的，我對於他們總有點什麼益處，這當然使我高興，給我增加工作的力量。

難過——是因為來不及答覆大家，時間不夠，還因為譬如接到了你們的信，很想要跳到你們那裏來，到森林裏，同你們一塊兒掘“試掘坑”，燒起柴堆來，親熱的談一談，——我喜歡做工，也喜歡燒柴堆。可是已經不能夠“跳”的了！六十三歲，雖然工作能力還不覺得怎麼衰退，唔，始終有點兒老年人的衰弱感覺了，而且也不是可以“跳”的時候了，時候是越來越嚴厲了，要極緊張的注意着自己，蘇維埃作家是擔任着“睜着兩隻眼睛看”的責任的。

社會主義建設和五年計畫的成績，社會主義競賽的發達，衝鋒隊運動的發展，集體農場的發展，以及工人階級和黨所創造的其他許多事業，所有這些，打擊着我們敵人的希望，引起他們的絕望和對於蘇聯無窮無盡的工人力量的恐怖。他們也懂得，他們感覺到，工農國家的強有力的生長，要使他們不可避免地消滅，滅亡。因為恐懼，因為絕望，他們早就想拿着機關鎗，坦克車，飛機，毒氣彈撲到我們身上

來，然而他們的無意識的，不人道的剝削的貪心造成了這樣的情形，看罷，現在在歐洲和美洲有將近三千萬的工人沒有工作，而把鎗砲放在這幾千萬人手裏，叫他們來反對我們——是一件很冒險的事情，——完全可能的是：那些鎗砲和機關鎗不向着資本家所要打的方向發射。在紐約——北美合衆國的京城——以及其他城市裏，失業和飢餓的工人成千成萬的跑到街上來，搗毀商店，——這是這個萬萬富翁的國家裏向來沒有的現象，這個國家不久以前還誇口着自己的財富，也的確有非常之多的黃金和糧食。現在在美國，甚至於用小麥在火車頭裏生火，因為沒有銷路，沒有人買。

在全世界，糧食，黃金，鐵，煤油，煤，以及地裏的一切寶藏都在資本家手裏，而工人——什麼也沒有，除開或者餓死或者消滅老板的權利。資本家用工農的力量積聚了這麼許多的貨物，以致於工人已經無事可做了。這叫做“經濟恐慌”；很難懂得：怎樣才跳得出這個圈套，資本家也許根本跳不出來的了。

我們工農國家裏面，沒有失業工人；爲着建設工業和新式的生活，國家的工人已經不夠用了。我們沒有那種錢口袋，把工人或者農民做出來的錢收藏進去，——我們做出來的每一個盧布，都拿去買機器給集體農場的田地，給工廠作坊，建築工人的住宅，改造舊的而建設新的城市。

同志們，你們所掘到的每一格蘭姆的金子——在森林裏面艱苦

勞動的結果，——都是用來減輕工農的生活的，工農是國家的唯一主人；這些金子都要用來建設那種捉住自然界精力的機關，像德涅普爾建設(3)，安迦洛建設(4) 等等。

資本家作主的國家裏，極大多數的民衆的金錢化費在武裝上，拿去供給教堂和神甫，僧侶，拿去窮奢極慾，用在粗魯的，蠢笨的奢侈品上。我們還有許多必需品不大夠用，然而蘇聯一切工廠作坊裏每天做出來的東西，都是工人做給農民用的，做給自己用的。在森林裏，在田地裏，在地底下，在海面上，——到處，無窮無盡的工人力量很快的創造着糧食，魚，肉，衣服，燃料，木材的儲蓄，蘇聯每一個公民能夠享有一切必需品，而且還有得多餘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你們六個人，躲在西伯利亞的荒僻的森林裏，應當知道這個工農的鉅大的不斷的勞動；工農決定了自己的非常之好的目的：要使得大家都變成經濟上平等的，健康的，識字的——文化的人。我寄給你們一種雜誌，這雜誌儘自己的力量，注意我們國內勞動和創造的發展，注意國內工業農業的發達——這個全世界第一個工人國家的建設。

資本家的國家裏，人要是學會了識字，讀了些書，就是積聚了智

(3) 德涅普爾建設是烏克蘭地方德涅普爾河上的水電站，現在已經造好了。

(4) 安迦爾建設是安迦爾地方的鋼鐵工業大聯合。

識之後，他就像積聚了金錢似的，——儘在誇口着自己的有學問，彷彿商人誇口着自己的財富一樣。你們，蘇聯的英勇的工人，積聚了智識，就一定應當分給比你知道得更少的人，這是你們的“同志的”責任。這樣，學習罷，教育罷；而我，永久準備着儘我所能夠的幫助你們。謝謝你們的一封好信。

而“媽媽卡”說錯了，——我回答了！爲着這個錯誤，要罰她一下——叫她燒一頓特別好喫的飯給你們喫。你們大概有鎗罷，打野鳥嗎？你們打幾隻“松鷄”來，叫她煎給你們喫。

同志們，最好是能夠來同你們一塊兒喫這頓飯呵！

唔，好罷！誠心的慶祝你們。從莫斯科有人寄書給你們，其中有一本是彼得洛夫的“波萊爾”——正是敘說淘金事業的恢復的。

緊緊的握你們的腳爪。

23.-1.-31.

剛才接到晚報，——法國的內閣又倒了，而去年他們前任的賄賂案還沒有審查完呢。爛得快得很！

這兩封來回的信最初登載在“我們的成績”雜誌第三期，1931年三月號，在“讀者通信”欄裏。

關於小孩子

一個女孩子從烏克蘭寄了這麼一封信⁽¹⁾給我：

“喂，你聽好，高爾基，你會不會像老爹爹和爸爸那樣生氣，那樣咬自己的孩子，那樣打我們？你要是到蘇聯，也許會到基耶夫，那就離我們很近了，只有一百里，我要求爸爸放我到基耶夫去，假裝着去禱告上帝，也許我可以見見你。

你說罷：人是多麼醜陋，多麼下賤，要是我是個窮人，人家也不奇怪我了，而現在我看，就算給我見見世界也好，我還沒有見過世界上的人呢，你是怎麼窮的呢？”

不知道這個漢涅幾歲了，然而他同他那“老爹爹和爸爸”過活是不會甜蜜的！一定也是這樣痛苦的生活，使得維亞脫卡省的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子寄了這麼一封信來：

“老爹爹高爾基，請你答復我一個問題；我同小朋友和孩子們爭論着‘脫離’這個字⁽²⁾是什麼意思。我說這意思是‘離開木屋’，完全脫離鄉村生活，爲的要換一個另外的生活。但是大家都笑我空想，連先生都笑我。他是老人，我還可以原諒他，而自己的人也笑我，實在可氣。在鄉村裏生

(1) 這封信的原文是烏克蘭文的，標點符號大半是用錯的（以下幾封信的信都有這種“毛病”，可惜譯文裏已經不能夠保存這種真蹟了）。

(2) “脫離”在俄文是 *izbavifisia*，彷彿是俄文“*izba*”（農民的木屋）加上 *vit'sia* 似的，所以這女孩子有這麼一種杜撰的解釋。

活真煩悶，我們這裏只有四個兒童團員，可是，什麼也不能做。大家不喜歡兒童團的團員。”

一個兒童通信員，安德留史卡，寫給我的信，也是關於這個煩悶生活的，在這種生活裏“什麼也不能做”。可惜我把他的第一封信遺失了，可是我記得安德萊的信裏面他是這樣訴苦的：父親禁止他讀書，還要打他，以致於他從家裏逃出來，又被捉回去，殘酷的痛打了一頓。他在信裏問我：怎麼辦呢？他要學習，他要做“有益的工作”。並且說，如果再打他，他要“燒房子”，而自己“逃出去做野孩子”。我寫了信給他，沒有勸他燒房子，可是，如果他沒有別的出路，還是逃到莫斯科來罷。我還寫了信給他的父親，但是我的信對於他的父親沒有發生什麼效力，只要看下面安德萊的來信就明白了。

“M. 高爾基，你好！

安德萊寫信給你，不要怕，你是知道我的，我已經寫給你幾封信，在所有的信裏面，都是寫的關於野孩子的問題。

現在我不想做野孩子了，我已經從自己的家裏逃了出來，離開了我的父親和母親。現在進了‘巨人’兒童集體農場，關於這個農場，我想你在報上讀到過的。這個集體農場，離開我的家有八百俄里，至少，

現在，請你聽聽我怎樣到集體農場裏來的。我要學習——母親和父親不准我，爲了這個還打我，爲了做兒童通信員也打我。我對於父母沒有什麼捨不得了。我曉得，對於我還要不好呢。我時常同我的先生很要好。他給我出許多主意。但是，我的情形壞極了，我就決定要逃到什麼地方去，我告訴先生我要逃到“小朋友”結社那裏去。

我的先生沒有勸我，可是他給了我三個盧布，我還在父親那裏偷了三

個城市。

我隨到火車站，要買到莫斯科去的兒童車票，他們不給我，還說：你是從家裏逃出來的。我說我到諾沃舍白列夫那裏去看朋友，他們就給了我到莫斯科的票子。走了，但是來查票了。發問題給我，幾歲？我說十歲。他們要帶我到 OGPU（政府保安局）去！我就哭起來，裝出小孩子的樣子。

不叫我到 OGPU 去了。我高興了，當然，誰也沒有發覺我。我同野孩子交了朋友，但是後來就離開了，——覺得我將要變成混蛋。離開野孩子之後，就跑到“小朋友”的編輯那裏，——我出席兒童通信員大會的時候在她那裏住過的。耶卡乞爾·耶夫要把我送回去。我就恨起來，哭着自己的命運。我在莫斯科住了一個多月，後來那位女編輯送我進了兒童集體農場。

在集體農場的生活

我初到集體農場的時候，小孩子們怕我，避我，不過過了一個星期，他們就慣了，同我住在一起，很要好，還很高興。我進了一個共產青年學校，從前叫做察察洛夫的，雖然已經在正月裏，但是我插進了五年級。先生們怕我。他們考問我，以為我不會知道什麼的。可是，來了一個好機會。出題目叫我們寫文章了。於是我們就寫了。讀起來，我的一篇算最好，先生走來問我，我就回答。第一個學期的考試到了。考罷。可以說我是全班的一個模範學生了，選舉委員會的時候，我也是候選人了。

關於我們的經濟

我們有六公畝田地，兩匹馬，一隻牛，四隻豬，很快就可以得到二十四隻兔子，十隻雞等等。

但是，我們缺少一個農場的圖書館，你可以寄點什麼書給我們讀讀嗎？我們等着。

安德萊。”

從這封信裏面，可以看得出這孩子說到自己的成績，有點兒自稱自讚，可是，關於他的成績，青年學校的教員也給我證實了。我以為這孩子還有一件事可以自稱自讚的，因為他的確“脫離”了，克服了那種肉體上聯系着私有財產的力量，這種聯系在農村的小孩子裏很早就發展的，而且特別來得深刻。

不久以前，在一個外國報上，登載了這樣一件事實：

“在法國帕齊埃爾地方附近，一個農民巴爾·普家裏，來了一個流浪人，他請求主人准他在草堆上過一個夜。

這個偶然跑來的客人，在第二天早上，要想感謝他們的伙食和寄宿，自己提議在菜園裏相幫他們工作。主人很願意的答應了他。後來，他做得累了，汗流滿臉的跑到廚房裏，就把放在桌子上的一瓶酒拿起來喝。這給那農民的一個6歲的（原註）兒子看見了，他就罵那個流浪人。那人沒有注意他這個小孩子，笑了笑，還是繼續喝他的酒。於是立刻就出了意外的事情。那孩子跑到鄰近的一間房屋裏去，拿下掛在牆壁上的一支步鎗，自己裝好了子彈，悄悄的躲到門口去，幾乎是對準了那流浪人放了一鎗，子彈打中了他的心臟，這客人就這麼完全被打死了。

那個小兇手居然還這樣鎮靜，甚至於對着他的父母和跑來的工人們，都說那客人是自殺的。直到後來，他才把實在的情形告訴了憲兵。”

看罷，這樣的事情，比較像三個盧布，以及為着要逃到可以學會“有益處的工作”的地方去；而想燒掉父母的房屋 都要嚴重得多呢。

十月革命的無可爭論的非常之好的成績之一，就是男女孩子們

（原註）——這裏大概是印錯的，應當是9歲，因為6歲的孩子還舉不起步鎗來——高爾基法。

已經本能的感覺到：“現在看來已經可以過着更好的生活，如果還要過着像我們父親那樣的生活，那真是笨得很。”這是一個十二歲孩子的信裏的話。這孩子卻喫了很大的苦頭，因為他要想暗示他的父親和叔叔，說用馬鈴薯餵牛可以得到豐富的牛奶，而父親不相信他，這位小改革家就去偷他叔父的馬鈴薯，暗暗地餵給牛喫，牛奶真的好了起來，但是，叔父把這位改革家“在犯罪的地方”當場捉住了，就打了他一頓。這樣的小戲劇，在鄉村裏應該一天天的多起來了，鄉村裏“父與子”的矛盾一天天的劇烈起來，而且也應當劇烈起來了。孩子們非常之好的生長着。

還有十八個初級小學生的信：

“親愛的高爾基同志！

多謝你寄給我們的抄寫本和教科書，我們也送一點禮物給你：第三次的“工業化”公債票，這是出賣廢物得來的錢買的；再則，還寄上我們自己的照片——我們學校裏“集體化和收穫節”的展覽會上拍的。高爾基同志！我們有一個大問題請求你：爲了那些孤兒和貧兒，我們決定在學校裏開辦一個食堂，——最近這些孩子因爲家裏沒有東西喫要不來上學了，——我們這區的地方機關沒有錢來維持，所以我們向你請求：請幫助我們的事業，雖然少許寄些錢來，也好的。高爾基同志！我們知道懇求是不好的，不過我們把你當同志一樣看待，希望你不要拒絕我們的要求。

請你寄張自己的照片給我們，而且要畫上你住的房屋。

我們本來想不寄公債票，而寄一雙滑冰鞋給你的，後來才記起了在意大利沒有冬天。

同志的敬禮！

利亞霍夫斯基初等小學的學生。”

唔，多麼聰明的好小鬼頭呵！

另外一個這樣的——西伯利亞，依爾庫斯克的小孩子寫了“關於我們學校的一點兒”

“我想——你一定知道革命以前的學校。新的學校完全不是那麼樣的了，在學校裏，我們可以勇敢的隨便提出什麼有興趣的問題。”

從蘇聯的別一個邊境——從南方，——一個小通信員告訴我：

“一個身體很衰弱的老婆婆教我們讀書。她打着可笑的頭燈，甚至於眼鏡都會掉下來。可是，她什麼都知道，像一個莫斯科的大學教授，隨你問什麼，她回答得都是刮刮叫的。她把你的信讀給我們聽，講解得非常之好。老爹爹，你自己寫封信給我們罷，我們讀着你的書呢。”

帶便的說罷，大學教授 A. 青格爾也說了：

“現代的學生對於書籍比從前的學生要敬重得多。”

還有些小通信員，住在北方離白海三俄里的地方，他們向我“愉快的問候”。願意我“一切都好”，“尤其是身體好，而在對於勞動者很有利益的工作裏，得到成功”，他們通知我：

“在我們這裏，有兒童團員一隊，但是，不是所有的孩子們的父母都允許的，因為有些父母很頑固的擁護着宗教。”

也有這樣的信：

“親愛的老爹爹高爾基！

我們瞞着父親把他合照的照片偷偷的寄給你。他不肯的。而我呢，非常之想把自己也寄給你。我們怎樣的想看見你本人呵，不僅只在照片上看看。當心，長壽些呀；請你替我們學校寫這麼一本書。你要是到了我們這裏，那才是過節呢。我們等着。

瓦瓦和亞爾卡沙·察爾珂夫。”

有很多小孩子寫信給我。自然，這是我以為光榮的，而且我有這光榮的權利。我深信，在蘇聯不只我一個文學家，就是別的文學家，也受着孩子們的同樣的注意呢。

可是，我更堅決的相信，在資本主義國家裏，不會有得到小孩子們這樣注意和同情的作家，像蘇維埃的小孩同情我們蘇維埃作家一樣。是的，在那裏沒有這樣的作家，而且也不會有，因為那裏還沒有社會革命所產生的小孩。那裏，能夠寫出這樣的話來的小孩子，還不會有：

“親愛的老爹爹！

我們，全蘇聯兒童通信員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來到‘我們的成績’雜誌的編輯部，為的要參觀雜誌的工作，並且得到老同志們的經驗。

我們參觀了這個工作，答應我們的名譽兒童團員(3)——編輯主任，供給這個雜誌一些材料，就是我們怎樣參加‘四年之中完成五年計畫’的建設工作。”

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小孩子是另外一種派頭。譬如巴黎的白黨僑民報“最後消息”九月九日登載着紐約的一個新聞：

“帕德遜 (紐約州) 的四個孩子，在這一學年開始的時候，以‘名人’的資格進了學校。他們開了乘坐自行車的新紀錄，在 1285 小時之內跑過了 9581 英里。在這 1285 小時之內，他們繼續不斷的輪流着在自己的房屋周圍繞圈子，日夜不斷的一英里一英里的計算着。如果他們的父母不叫他

(3) “我們的成績”的編輯主任就是高爾基，他這六十多歲的老頭子是公舉出來的“名譽兒童”，——這是那邊的一種風俗。

們在學期開始的前一天停止乘車去休息，那末，這些小英雄還可以多陶些呢。”

六月裏，在同一個報上還記載了這樣一個奇怪的孩子：

“在書店的陳列部裏發現了一本新書，在雜色的封面上寫着：‘胡佛總統的生活’。

這本書的著作者不久以前才滿十一歲，他的姓名是威廉·馬契。這位年青的總統傳記家，在序言裏說到他‘成爲作家’的動機。他聽見有些作家賺了很多的錢。而威廉·馬契也需要錢，並且想發財，所以他就拿起筆來。他的結論使得實際主義的‘洋鬼’（4）佩服極了：‘我請求書販子儘可能的把這部書多賣幾本，這樣可以幫助我積聚資本’……

在這本書裏，對於女人特別注意。十一歲的傳記家，很天真的說到胡佛在斯湯復爾德大學裏遇到他的未婚妻，以及他們之間的‘浪漫史’和結婚。在這全段的敘述裏，充滿着一般性質的議論：關於女人的狡猾，關於男人在婚姻之中的作用等等。這本書有了很大的成功。”

我並不是主張肉刑的一派人，但是，假使有人把這位著作家打一頓，我決不反對。我認爲小孩子寫着底下這樣的話，倒着實要自然得多：

“你好！請你教會我著書。我已經寫了一些文章。我叫做古訥爾。我快要到九歲了。請你告訴我，你寫小說不是寫自己的時候，難道你是爬到人家去偷聽了再寫的嗎？總之，你給我說說罷：不是關於自己的書是怎樣寫的？

現在我就把自己最後的一篇小說寄給你。

馬那珂夫斯基

（4）“洋鬼”是 yankee 的譯音，還是美國人的外號。

有一次，我的同志愛弟亞跑到我這裏來。這是一九三〇年四月十四日。他說，馬耶珂夫斯基自殺了，抬到醫院裏去了。救護車。

到了第二天，我在‘工人的莫斯科’報上讀到了：‘馬耶珂夫斯基的屍體停放在蘇維埃作家聯盟的俱樂部：莫斯科，沃洛夫斯基街，52號’。

我們當然是去的。

——到了。

——看着。

——有很多的人。

——站了隊伍。

——最後，走進了大廳。看一看。

——鼻子是紅的。而在馬耶珂夫斯基的腳旁邊站着青年團員的‘名譽崗位’，在側面還站着一位畫家，在畫着馬耶珂夫斯基的象。完了。”

這——很發笑，但是，這完全是八歲的小孩子的天真的創作；而且可以深信，這樣的小孩子長到了十一歲，決不會議論着那些關於‘女人的狡猾，男人在婚姻之中的作用等等’。很顯然的，他在“小朋友”的雜誌和報章上，可以找到發表自己作品的地方。

我們的小孩非常之喜歡文學工作，而且他們有自己的雜誌和自己的報紙，——在那裏，他們可以學習着敘述生活，描寫生活，這是很好的。不久以前，“農民報”出版了一本兒童文集‘我們在‘巨人’集體農場裏的生活’。這文集的編纂者是佛雪沃洛德·列別吉夫，就是那本寫得很有才能的“北極的太陽”的作者。

在這本文集裏，小孩子做着詩和散文，敘述他們在‘巨人’農場裏

怎樣的生活。我現在從列別吉夫寫的這本書的序言裏，把很值得注意的幾行引在下面：

“寫這本書的是耶蘭村的兩個學校的學生：初級小學和青年學校。耶蘭是伊爾比茨克區裏的一個很大的村莊。這地方的居民完全是種田的農民。寫這本書的小孩子，年齡在十二到十七歲之間，他們還記得國內戰爭。他們的早期的兒童時代，是在困苦的貧農和雇農的條件之下過去的。他們的父親是戰爭之後的傷兵，殘廢的。這些小孩子，從六至七歲起，就開始在鄉村中參加了農業經濟的工作。而且時常不是在自己的家裏，而是被窩農雇去的。這些孩子們，還很記得東家對他們的虐待。自從驅逐白黨出了這個邊境之後——就是農民反對哥爾切克的游擊戰爭之後，——最積極的農民就開始組織公社了。

把陳舊的木屋從鄉村裏搬出去，用了最後的力量，在離開私人經濟較遠的空地上，建設了新的房屋，——公社就這麼出現了。

公社裏的居民決計永遠同舊的關係隔斷：牲口，工具，都放到公共的經濟裏去，建設了公共的食堂。小孩子用不着留在家裏了，可以放到幼稚園和託兒院去。

農場需要耕種汽機，可是公社沒有力量置備；各個農場相離又很遠，他們正在找着共同的領導。

一九二九年，耶蘭，貝卡洛，茲訥孟三個區域的公社和勞動互助社，開了聯席大會，決定了聯合起來組織一個集體農場，以克拉斯諾泊良區（紅田區）為中心。

整個集體化的紅田區就是這樣產生的。

這個區域裏還有好些私人經濟。一方面集體農場得到了耕種汽機，供給那些公社和勞動互助社，聘請了農科專家來整頓這個有組織的大農場，而另一方面，這‘巨人’農場的角落裏還有小農在用犁耙耕種田地，——這些

小農暫時還不能夠決定加入集體農場裏，他們以爲‘巨人’農場裏的農民財產是要失散的。

農民緊緊的抓住了自己的個人經濟，因爲這是從他們的父親那裏繼承下來的，——這種經濟對於他們是習慣了的；也因爲‘巨人’農場裏還很少這樣的人，能夠給他們解釋新經濟的力量。

而貧農家裏和公社裏的孩子，却到耶爾青年學校裏來學習了。他們看見自己經濟裏的公社社員怎樣在同富農鬥爭，他們是在這個鬥爭之中教養出來的。

孩子們的生活並不豐富，——他們住在公寓裏，喫着大鍋裏燒出來的飯菜，食品是集體農場送來給他們的。他們的教科書很少，而可讀的書幾乎完全沒有。

孩子們初初從農家出來，到處聽見一般文化和農村經濟的發達，他們願意知道，願意聽聽別地方，莫斯科，工廠建設等等的消息。他們問起到他們那邊去的同志：普希金和屠爾格涅夫是不是還活着。

他們除出列寧，史太林，卡里寧的名字之外，還聽到以上兩位的姓名。可是，讀到的書很少。有些孩子弄到了書裏撕下來的幾頁，他們就在這些紙張上讀着一些文學家。

總算從莫斯科去了幾位先生，在‘巨人’裏開辦了兩個青年學校，一個集體農場的學徒學校；還有一個高級的農民大學，到這裏來學習的有一百五十個成年的集體農場的社員。

這個大學裏有一個青年先生，他的姓是契察洛夫；一個女孩子却以爲他就是做‘崩裂’和‘沃白洛莫夫’那兩部小說的契察洛夫，其實這位文學家早就死了。

這些孩子們關於在莫斯科做些什麼，關於他們所讀到的，聽到的那些人是不是還活着，都沒有一個清楚的概念。不過，他們知道在莫斯科和別的城市裏寫什麼，做什麼，都應當看作他們的成功，有利於公社的。

很明白的是——孩子們等待着完全的改變，要求先生教會他們新的生活。

我看見過一個小雇農來到‘指南星’公社，他是被東家開銷了的。

關於他，公社什麼也不知道。他並不是公社社員的親戚，但是，在這裏每一個雇農都是自己人。立刻，叫那孩子到飯堂裏去喫了飯，就給他住在公社的房屋裏。他就同大家共同生活起來。不但如此，而且還派他到村裏去學習。於是這小孩子公社的共同生活裏，又增加了一個年青孩子。

孩子們是這樣加入公社的：有些同着父親一起來的，另外一些是丟了父親來的，還有些是離開了東家跑來的，——總之，他們和舊的鄉村生活的聯繫完全斬斷了。也有這樣的情形：孩子們勸告父母去進公社，否則就恐嚇他們要脫離家庭。這本書上，孩子們就寫着一些頑固的老人爲着要在集體農場之外去過舊式的生活，就拋棄了一切親戚；還說到那些舊式的老太婆，她們還生活在故事裏面。什麼耕種汽機對於他們是‘世界的末日’，‘這是反基督的印牽’。‘巨人’那裏，大部分的教堂被居民自己關閉了。他們把教堂改做俱樂部，居民已經不記得要敬神。做禮拜也廢除了。

青年學校的學生就開始寫起這本書來。”

在這篇序言裏，有特別重要的價值的，自然是這兩句話：“孩子們勸告父母去進集體農場，否則就恐嚇他們要脫離家庭。”我個人從這些話裏，得出這樣的結論：孩子們開始證實和確定“社會主義蘇維埃聯盟”的名號裏的“社會主義的”字樣的意義。

其次，我認爲現在是組織一種特別的機關報的時候了：這種報紙應當告訴蘇聯所有的父母：在整個廣大的聯盟裏，孩子們怎樣在想着，怎樣在工作着。

古時候的格言：“雞蛋不能夠教雞”已經明顯的喪失了自己的那種陳腐和守舊的意義。第一，“大家都是從雞蛋裏爬出來的”，而第二，說到小雞，牠們之中卻有很多是從老鷹窠裏飛出來的了，大多數受着了實際生活的嚴厲手腕的教養。他們受着生活的鍛鍊，而且積極的參加着新世界的建設事業。可以證明這種參加的事情很多，我只指出其中的一件事：一九三〇年的春天，就是革命的第十三個年頭，“貧民”農業實驗所和中央兒童農業站印行了一本在農業方面給兒童團，小學生，青年實驗家，青年發明家的羣衆的實驗工作大綱：這個大綱組織蘇聯各地的各種各色的兒童工作——農業的化學化，新的植物的種植法，簡單的種植方案，菜園學，果園學，消滅植物的和其他的寄生蟲的方法。這“貧民”實驗所供給了 125000 種實驗材料給兒童團。實驗所的任務，是要像工廠作坊裏的“發明運動”一樣的規模，來開展蘇聯的“綠色發明運動”，（實際生活裏還沒有產生一個更適當的術語，——能夠確定這種運動的全部深刻的意義的字眼還沒有）。

“我們相信，蘇維埃國家可以在兒童團員，小學生，青年實驗家之中，得到幾十個，也許幾百個米楚林，都寧，畢爾彭克；他們所要給人類的，不僅是農業種植上的新方法，收穫的增加，而且還能夠發明新的植物和新的種類。他們要在田地裏，果園裏，菜園裏，舉行一個整個的革命。”

而且，這樣吸引兒童參加廣大的文化革命性質的積極工作，這並不是唯一的事實。還應該注意的，是兒童自己發起了這樣直接參加實際生活的事業。

彷彿這是常例——一般的父親總不很知道自己的孩子，我們這裏的父親，似乎比較資本主義國家裏的父親，要知道得多一些。多一些，但是，還沒有知道到應當知道的程度。因此，我再說一次，必須建立一種機關報，把孩子們的工作告訴父親們。

自然，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小孩子也相當的參加實際生活的事業——參加父親們的事業。

——英國諾爾福克地方，在一次夏天，在選舉運動的時候，保守黨黨員康克的兩歲的女兒，騎着一匹蘇格蘭的‘泊尼’馬，在市集的日子出現在曠場上，她的小馬的衣披上寫着：

‘請選舉我的爸爸。’

——從康士來的消息說，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傑克·李却爾英坐在樹枝上已經有一百四十小時了，他父親和母親無論怎樣也不能夠把他們的兒子從樹上拖下來。有幾十個男孩子和女孩子都模仿了他的辦法，其中有幾個要超過李却爾英的紀錄。這些‘體育家’的父母弄得一點沒有辦法，只好站在樹底下鼓勵他們的勇氣。

——在紐·傑爾西，四個男孩子輪流乘坐一部自行車，已經有九天九夜了，他們聲明還要繼續下去，直等到自行車的輪子壞了為止。

——成年人並不比小孩子落後，有四個年青人，坐着汽車用倒退的走法，從聖·路易到紐約去，要想在二十六天之內走完這個路程。

——彷彿動物園裏的野獸也傳染了這種奇怪的新紀錄。至少報上的

消息是這麼說，有一個穀子用尾巴掛在樹上已經有三天了。

——紐約交易所破產風潮之後，一個七歲的密斯脫給自己的父親說：如果你要像 G. R. 先生一樣的自殺，那末，你得先給我一百塊錢，使我能夠開始自己的生意。”

我從白黨報紙上剪下的材料之中，可以引出三十件這種笑話似的事實，不過我以為用不着再說下去了。那些白黨關於自己的小孩子也寫得很悲哀。

譬如說俄僑的女子幼稚園的情形罷：

“牆壁上掛着的圖畫是：大行皇帝（謝洛夫畫像的翻版）；保羅·亞歷山大格維支大公；公爵夫人帕萊。這裏，也就掛着郡主伊林納·保羅洛夫納的肖像，沉思的處女的面容。中間是圓的銀鏡框，題着‘1841—1866’字樣，亞歷山大第二皇朝的盛典，他和他的兒女；彼得堡，高加索，謝沃斯託泊爾，而旁邊就是輝煌的宮殿，——一些灰黯的羣衆在聽着宣言書(5)。

彷彿“一切都還像樣”，然而女孩子們說的俄國話卻是這樣的：

“——知道嗎，她死了，把她埋葬好了，但是，突然的她又活了起來(6)。”

“孩子們互相之間寧可說法國話：‘俄國話總是那麼困難，簡直不懂。’法國的圖畫雜誌很通行。時常可以聽到這樣的說話：‘我 ici!’‘你 dépechez-vous’, 給我 sucre, s’ il vous plait’ 等等。俄文寫得通順的，幾乎一個也沒有。

前幾天就有一個小姑娘，已經是成年人了，她用沒有重音的俄國話問：

(5) 這大概是畫的亞歷山大第二一八六一年頒布解放農奴的宣言書的景象。

(6) 俄文動詞“正在埋葬”和“埋葬好了”是不同的，而這些女孩子已經不知道這種差別了。

請你告訴我，我要寫 [a (而) 現在]，在 a 字後面應當寫硬號嗎？(7)

——俄國話那麼可笑，怎麼這樣普通的女人名字‘秀讓娜’，在俄國話裏是稱呼男人的呢！

——你這是從那裏聽來的？

——怎麼呢，不久以前，不是一個秀讓娜救了俄國皇帝嗎？”

這所謂“秀讓娜”(Suzanna)者，其實是一齣著名的歌劇裏的英雄伊凡·蘇薩寧(Ivan Susanin)。

“——照你的意見，生活的意義是什麼？——她問。

——照我們的呢？

——呵，很多，我們這裏，有人說：生活是爲了家庭，嫁人，教養孩子。

也有人說是爲了上帝，爲了要做好事……可是我想起來這都不是的。生活應當爲了自己，爲了自己的快樂。

這些女孩子把生活的經驗，以及書上讀到的一切，她們所完全不會了解的，都混淆在一起。”——這位僑民作家就做了這樣一個結論。

但是，這樣的事，沒有像英國對付兒童的態度來得有趣味和有教訓。

“倫敦，七月十八日。

昨天在衆議院裏出了一個極大的亂子，是這個機關裏從來沒有的，會議一開始，就有一位衆議員責問內務總長：九歲的孩子被法庭判決了打四鞭子，是不是真的？內務總長對於這個問題給了肯定的回答，但是他並不責備法庭的這種行爲。”

狄更斯的著名小說早就使我們知道，英國的小學生是受的怎樣

(7) 俄文的舊文法有所謂“硬號”，通常只會用在子音後面，在 a 後面是無論如何也不會用的。

的教育。狄更斯死於一八七〇年，至今已經有六十年了。但是，以前自由主義的“俄國紀錄”雜誌裏的著名記者，現在是我們的兇狠的敵人，史克洛夫斯基—狄沃納沃在巴黎的白黨報上記着以下的消息：

“在白洛蘭萊——一個小小的矇矓的城市，從倫敦‘維克多利亞’車站過去二十五分鐘的火車路程，——那裏的警察審判處在審查着保護兒童會所提出來的一件案子。被告是一個‘男女高等學校’的校長吉爾達·費倫夫人。這學校裏有十一個寄宿生，年齡從五歲起到八歲止。他們生了極厲害的皮膚病，病在頭部（應該是疥癬——高爾基注）。寄宿在費倫夫人學校裏的孩子們的父母，都是外省的律師，醫生和經紀人。這些人的收入並不多，而又要竭力的顯全‘面子’。所謂‘面子’的法典裏，有這麼一條規則，就是要把孩子送到私立的寄宿學校裏去學習。結果，就來了這位費倫夫人。她在一所宏大美麗，周圍有花園的房屋裏，設立了寄宿學校，這樣的房屋，使一般收入少的父母們能夠在自己的朋友面前誇口：‘呵，我們的孩子在那裏面讀書呢。’這所房屋從前是屬於一個鄉紳的，他現在已經住不起這樣的房屋。可是，那位校長却在這裏‘賺錢’了。所謂‘賺錢’，當然是從孩子們的伙食上和學習上來剝削。一九三〇年，完全復活了狄更斯小說裏所描寫的風俗。費倫夫人的‘高等’學校裏，孩子們穿得很壞，喫也喫不飽，而校長自己却穿得很講究，喫得很飽。在堂皇華麗的學校房屋裏，沒有校醫，因為一年多沒有付錢給醫生，所以醫生也不再到學校裏來了。重病的孩子躺在那裏沒有人照料。‘校長’沒有功夫，——她到跑馬場去了。而那些五歲到八歲的有病的孩子們，單獨的留在學校裏，癱軟的，飢餓的。但是，爲什麼這樣小的孩子，還應該養在家裏的孩子，要送到寄宿學校裏去呢？因為孩子們在家裏動蕩無常‘生活’的母親。這些外省律師，醫生的謙虛的妻小，也願意像倫敦有錢的太太們一樣的去跳舞呢。費倫夫人的案

件不但證實了狄更斯的‘斯契爾斯學校’⁽⁸⁾還活着，而且那些爲着顧全‘面子’，或是其他原因而把孩子送進這種學校裏去的父母也還存在着。”

很明顯的，這是些市儈，抱定了“活一天算一天”的主義。抱着這種主義的人，對於長久和鞏固的生存可能，是已經不希望的了。

“家庭”對於他們已經不再是國家的“基礎”。

就是這個狄沃納沃，在一個非常之混蛋的“今天”報上還寫了一篇小文章，論到英國學校裏的一種野蠻風俗，叫做“當差制”的。

“什麼叫做‘當差制’呢？每一個小孩子進了英國的寄宿中等學校，在一個相當時期裏，要受‘班長’的支配，這種班長取得‘一班之首’的地位，却並非由於功課上的成績。‘當差的’應該執行‘班長’的命令，拿茶給他，替他跑腿，受他的差遣。如果‘班長’的命令執行得不迅速，不正確，那末‘當差的’就要挨打。新學生在學校裏經過了一年，他自己也成爲‘老頭子’，那時候，又輪到他去支配別的新學生了。

比較軟化的肉刑，幾乎在每個英國學校裏都還維持着。中等學校和小學校都是一樣。有時候，這種肉刑的結果，發生悲劇。於是這類事件就鬧到公堂上去。父母們告發打他們兒女的先生，他們所抱怨的，却並不是一般的肉刑制度，而僅僅只是責罰得太嚴厲了。雖然我可以說出好幾件關於學校裏打孩子的案子，但是，我記不起有一件判決詞是反對學校裏的體罰的。通常判決詞總是反對父母的，雖然有時候審判官也認爲責罰得太‘厲害’了一些。

‘當差制’是英國的老風俗，在學校裏很頑固的保持着，報紙上轟動一時的鬧了起來的時候，才委任了個調查委員會，從各方面去研究‘當差制’，而得到以下這樣的說明：供給證據的證人之中，有些是絕對反對‘當差制’

(8) 就是林琴南譯的“滑稽外史”(商務印書館出版)。

的，他們引出奇特的野蠻的欺侮孩子的例子，但是，另外一些證人，却說‘當差制’是很好的一種制度，是教養品性所必須的。

在納爾遜地方（蘭開夏州），審判官和陪審員審着一件十四歲的小孩子自殺的案件，這孩子名字叫做傑弗里·費爾赫斯特，他是一個牧師的兒子。讀者大概知道英國鄉村裏的神甫，通常是屬於高等階級的；平常，這種神甫要算是主子（lord）的小兒子，他每年可以有 1800—2000 金鎊的收入。傑弗里·費爾赫斯特在復活節的假期裏還是住在家裏的。他在學校裏，成績不但好，而且是刮刮叫的。當開學的前一天，這孩子應當離開家庭到學校裏去了。他在這學校裏的學習還是一九二九年九月才開始的。他在家裏的時候，一直很快活。那天他同父母告別之後跑進了自己的房間。他的母親在夜裏十一點鐘再去看這孩子的時候，他已經死了，是自己吊死的。——他是一個最有幸福的孩子，——他父親在公堂上說，——我能夠叫出一百個證人來證明這件事。傑弗里所在的地方，總是自笑聲的。他無論做什麼，都是帶著快樂的。這孩子時常有最愉快的情緒，誰也想不到他會自殺。

證人解釋這孩子的死的原因，說是完全因為他不願意回到學校裏去，以及他討厭那個‘當差’制度。

每一個新學生在一禮拜之中要執行班長（就是學生的頭子）的二十個命令，而且所發的命令都是無可商量的。所謂當差制度就是要替班長服務。‘當差的’是新學生，應當馴服的聽班長的使喚，跑來跑去，執行他的各種委託。如果班長的命令，他執行得不迅速，那末，他就要挨打；而且‘當差的’一定要燒茶，燒肉等等。已經死了的傑弗里不能夠充分迅速的執行班長的命令，因為他很用功，正在努力的準備着七月間的考試。有些‘班長’對新學生非常野蠻。‘指揮’傑弗里的一個孩子也是這樣的。

這樣說來，你相信傑弗里自殺的唯一原因，是學校裏‘當差’的職務威脅了他？——審判官問死人的父親。——是的。我深信是這樣的，——

那證人回答。——這孩子在家庭裏完全是幸福的，他的學習又很好，沒有任何別的原因使他要自殺，除開那‘班長’的奇怪的粗暴。

塞德堡學校的校長和幾個教員也做了證人。

那位校長是擁護‘當差’制度的。照他說，這個制度不但在本身沒有害處，而且相反的，學校裏大家都‘愛護’這種制度，‘當差’簡直是英國教育制度所必需的。校長的解釋是——照我的意見——他繼續的說，——用紀律去教育這樣的孩子，並不是不好的。給校長這麼一說，這問題簡直弄不明白：如果‘當差’制度這樣好，那末，傑弗里爲什麼自殺呢？大概那些陪審員並不完全同意校長的意見。他們判決了傑弗里死的原因。在判決書上說，這個孩子的死是因爲那個粗暴的‘當差’制度。傑弗里的自殺引起了英國報紙的許多議論，但是，反對‘當差’制度的論文比擁護這種制度的要少得多。”

你們看罷，在僑民報紙上登載這樣的事實，他們是資產階級文化的崇拜者，是社會主義文化的狠毒的敵人，他們對於自己的祖國一天到晚的造謠，在祖國已經沒有他們的位置，而且不會有的了。他們在自己的報上，還登載着關於德國的孩子的這樣一個消息：

“柏林的一個小學校出了這麼一個題目給學生做文章：

‘你所想像的天堂是怎樣的？’

要拒絕寫這個文章是不行的。十歲到十一歲的可憐的小孩子，不管願意不願意，要絞盡腦汁去想：在將來的生活裏，等待着他們的是怎樣的幸福。

於是有些孩子就這樣寫：

——天堂是一個地方，那裏時常是靜悄悄的。鳥兒在樹枝上唱歌，明晃的太陽照耀着。誰到了那個地方，再也不願意離開的了。上帝輪流的拜訪天堂的居民，同大家談話。

——在天空裏，可以玩，可以唱，可以跳舞，可以跑，要怎樣就怎樣。最

好笑的東西，在桌子上堆着一大堆。我再也寫不出什麼了，因為這是再好沒有的了。大概天堂裏是這樣的。

——天堂在天上，在雲的上面，人還不曉得怎樣可以飛進去。可是，我想有些飛機飛上去之後不見了，——也許是飛到天空裏去了罷，他們不願意講出來，因為怕別人去妨礙他們。

最後，班裏一個最小的學生，很簡單明瞭的說：

——天堂裏什麼都有。”

他們回答得這樣巧妙，用不着再來解釋這裏的悲慘的意義了。

可以作為補充的，是“柏林交易所郵報”上的一些小孩子的話：

“小小的彼得很熱心的收集着芬尼（德國銅元），裝在撲滿裏：有人問他要用這些收集來的錢去買什麼。彼得回答說：

——只要買麵包，我非常想活得長久！

在聖經班上，一位女教員鼓勵小孩子什麼也不要害怕，如果我們害怕起來，只要叫上帝好了。孩子就把這個話告訴父母，自己還補充了一句：

——但是先生沒有告訴我，叫上帝的電話號碼是多少。”

這個報的一個女讀者說，他們同着自己的小兒子弗里茨到影戲院裏去，那裏在表演着羅馬時代的馬戲院，兇猛的野獸正在喫着基督教徒。小孩子問這是什麼意思，母親就給他解釋，說以前有過這樣的時候，那些殘酷的人把基督教徒給老虎和獅子去咬死。弗里茨睜開了眼睛，出神的看着這個影片，並且說：“唔，那隻老虎多麼可憐，蹲在後面，沒有喫着呢”。

我們可以假定，這是呆笨的德國諷刺的標本，而並不是“生活裏

的事實”。然而德國孩子過着困苦的生活這件事實，在德國的文學裏一天多似一天的證實了。家庭生活的困苦使孩子們惡化，——這就是十二年來德國所出版的幾十種書籍的題材。亞珂白·瓦塞爾曼的小說“家庭”，大概是一九二六年出版的，特別明顯的描寫着資產階級社會裏的孩子的情緒。這部小說裏，一個著名的律師弗里德里赫·勞定的女兒對她父親說，整個的教育制度完全是虛偽的。她，十六歲的女孩子，不相信先生，不相信學校的利益。她覺得，“她一定要走過的那個門，正在她的面前關住了。”同她那樣年齡的人，大多數同樣的不滿意生活。他們要求着“新的，真正新的。她們無論如何也要創造一個幸福些的，好的世界。她們要消滅一切舊的虛偽，一切陳腐了的法律。她時常覺得在這個世界裏，她同她的同思想的同伴和成年人形成了敵對的營壘。她和許多人一樣，在母親和父親的家庭裏走着，好像一個外國兵。”

自然，這一切都不很確定，但是這是一個騷動；一般的生活條件是這樣，這種騷動起來之後不見得會沒有效果的。至少，這種騷動更加要搖動“家庭”——市儈的國家基礎。

我想，這些記載，用七月廿三日從紐約來的這麼一個消息來結束，倒是很適當的：

“一些國會議員——屬於受着委任去調查共產主義者在美國的行動的委員會的，——參觀了共產黨員辦的一個幼稚園。

國會議員一到那裏，孩子們就唱起國際歌來，噓他們，向他們罵著各種各樣的侮辱的字句。後來，在這野營裏的成年人，也跟着小孩子們齊聲唱起一隻歌來：

‘我們恨死你們！滾你們的蛋罷；
滾到鬼那裏去，再也不要回嚮罷！……’

有幾個國會議員，竭力想把這個當做開玩笑，甚至於企圖答覆那一個責備政府敵視蘇聯的演說者。

參觀的結果總算沒有什麼大亂子，然而這是全靠警察來幫助了議員們。’

在莫斯科舉行全蘇聯兒童團大檢閱的時候，一個看客問中央亞細亞的一隊兒童：

——你們是那一個民族？

他得到的回答是：

——我們是兒童團員。

這彷彿是一個笑話，然而這是的確的事實。跟着這個，另外一個看客低聲的說了這麼一句：

——呵，真正開始了消滅民族偏見的時候了。

這一個大結論，自然不是從那一個小小的字眼裏得出來的，而是從那全社會主義蘇維埃聯盟之中集合起來的四萬兒童的盛觀，——從這個“新的烏兒”的檢閱的空前盛觀裏得出來的。

這個驚人的盛觀，也就使中央亞細亞的孩子們忘記了自己種族的名稱，而回答了一個新的字眼：

——兒童團員 (pioners)!

這篇文章最初發表在“我們的成績”第二期，1931年二月號。

無 恥 主 義

— 答 覆 來 信

你問：

“難道現代生活的無恥主義，不使得你，M. G.，氣憤嗎，難道那些在黯淡的現實之中看不見出路的人的絕望，使得你真誠的喜歡嗎？難道生活的無窮的戲劇，還不破壞你的哲學的安靜嗎？”

請你准許我通知你一聲，我最不是哲學家，“安靜”是我本來就沒有的。如果我是個安靜的人，——那末，你這類的人，你的同志，也不會這樣起勁的注意我了，這種注意裏面，惡毒是那麼可憐的同文字上的明顯的無力，以及在智識份子奇怪的不通，互相混合在一起，——我只能夠用忘記過去來解釋這種不通的原因。

我們來說一說無恥主義罷。一九〇八年，在“文學的崩潰”那本集子裏，發表過一篇小小的文章，正是“說無恥主義”的。這篇文章的開始是：

“……世界生活的速度更加快起來了，因為青春的覺醒的強有力的驚慌，越來越深刻的滲入了生活的地心裏，到處都感覺到叛逆的震動，——內在的精力認識了自己的創造的能力，而在準備着行動了。

慢慢的，然而準確的，在民衆之中生長着自我認識，社會正義的太陽在燃燒着，而在將來的青春的呼吸之中，很顯然的，融化着偽善和偏見的冷酷的外殼，無恥的暴露着現代社會的畸形的骨骼——人類精神的監獄。

幾百萬隻眼睛燃燒着歡樂的火燄，到處閃爍着憤怒的閃電，照耀着那積聚了幾百年的愚蠢和錯誤，成見和虛偽的陰雲；我們——是在民衆的全世界復生的佳節的前夜(原註1)。

.....

.....

人要是知道民衆是無窮盡的精力的源流，是唯一能夠把一切可能的變成必然的，把一切幻想變成現實的源流，——這些人才是有幸福的！因為他們永久有活潑的，創造的感覺，覺得到自己和民衆之間的有機的聯繫，現在，這個感覺應當生長起來，使他們的心靈充滿了偉大的歡樂和創造新文化的新形式的渴望。人類復生的徵象是很清楚的，“文化社會裏的人”似乎看不見這些徵象，可是，這並不妨礙市儈們都覺得全世界的大火災不可抵抗的接近了。

積聚財富的過程的滯鈍的工具(原註2)

他們只能夠來擁護自己的無希望的立場，而躲藏在自己“文化”的擁

(原註1) 虛點是俄皇文字檢查會的馬蹄的痕跡。

(原註2) 又是檢查的痕跡。

繫的籠子裏去，這是暗示他們，而且使得他們的心靈死去的那種見解，就是說，資本的政權是永久合法的，永久不可動搖的；他們現在，甚至於已經不是自己主人的奴隸，而只是主人的家畜。

奴隸卻在重新變成人呢，——這是生活的新的意義！……”

這是我寫的，你看罷，這是在我們現在以前的二十二年之前。我想，對於當時的時代，這是一篇並不壞的文章，——而且安納託爾·法朗斯，在寫給我的信裏面，很恭維的讚美了牠，法朗斯卻是不大肯稱讚人的。我很想恢復這篇文章的全部，也許牠可以使你相信，這二十二年以來，我對於你這類人的態度並沒有多大的改變，很難說我是“智識階層的最好信條的叛徒”，我也不是“靠着智識階層的幫助而發展出來的”，我卻克服了智識階層要想“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模樣”來教養我的企圖，那就是做資本的家畜或是房間裏的狗，——要扮演這種純粹化的智識階層所心愛的腳色，我原來是沒有本領的。

我很可惜，我不能夠恢復這篇“說無恥主義”的文章的全部，我這裏沒有原稿，而我那本“論文”的俄文版，1916年“Parus”所出版的，卻被文字檢查會“逛”過了，好像一隻餓着肚子的豬羅在園地裏逛過了一趟。然而，還有這麼一段，沒有被文字檢查會喫掉：

“無恥主義也用自由來遮蓋自己——尋找着完全的自由，——這

是牠的最下流的假面具。

借着最有才能的作家的嘴，文學一致的證明：市儈要求完全的自由，而暴露了自己的“我”的時候，那就是在現代社會之前站起了一個畜生。

顯然的，這是不可避免的現象，不受作者意志的支配的。他們的努力是可敬的，明瞭的，——他們要想給一個很有教訓意義的人的形象，完全脫離了偏見和傳統的束縛的人，那些偏見和傳統正是把市儈聯繫成整個的社會，而束縛個性的生長的；他們要想造成“積極典型”的英雄，那種英雄從生活裏拿着一切，而什麼也不給生活。

出現在小說裏的英雄，多多少少尖刻的證明着自己的權利，要只做他自己，實行着許多自我解放的功績，要脫離社會感覺和思想的俘虜，如果周圍的人不在剛好的時候扼殺他，或是他自己沒有殺死自己，那麼，在一部書的結局裏，一定在市儈的讀者面前，出現一隻新生出來的小豬獃，——像一隻小豬獃，這還算是好的。

讀者皺起眉頭來，讀者不滿意。凡是有‘我的’地方，那裏就一定要存在完全自治的‘我’，然而讀者看得見，一個‘我’的完全自由，必然的要求其他一切代名詞的奴隸地位，這是一個陳舊的真理，而每一個人都在努力的忘記牠。市儈太時常的看見這種情形，因為在生活的實踐上，在每天爲着舒服的生活的殘酷鬭爭裏，人越來越變成殘忍的，可怕的，越來越不像人。而同時，這樣的野獸對於擁護最神聖

的，善良的私產，卻是必要的。

市僧慣於把人分做英雄和庸衆，然而庸衆在消滅着，在變成社會主義的政黨，他們威嚇着，要把小小的市僧的‘我’從地面上掃開；市僧就叫英雄來幫助自己，——於是來了一個盜賊似的；貪婪的傢伙，帶着瘋狂的野豬或是俄國官僚的心理。

而對於這個怪物，要來擁護私有財產的神聖權利的怪物，那所謂人的個性的神聖權利，卻是不存在的；就是對於私有財產本身，他也用征服者的眼光來看待。

一方面——是赤色的九頭蛇，別方面火龍張開着喫不飽的嘴巴，而在牠們的中間，放浪的亂竄着一個小小的人，同着他的叫化子似的私產。

雖然私產對於他——是苦工腳鐐，奴隸的鎖鍊，他卻愛着這個私產，他對於私產很忠實的服務，永久準備着，擁護私產的完整和權力，用着虛偽和狡猾的全部力量，只要在他的能力範圍之內；他永久準備着用一切手段，從上帝和哲學起直到監獄和刀鎗，來辯護私產的存在。！”

我覺得，從這些話裏，只能夠得出一個結論：現在我所說的，和我向來的話是一樣的。我的朋友；後來是我的“仇敵”，列沃尼德·安德列耶夫，在他一九一三年寫給 A. V. 安菲鐵亞特洛夫 的信裏，說我

是“無產階級的武士”——這句話自然是太響亮了，太恭維了，然而說了這句話，只不過是爲着要說：

“他往上往下的推着現實主義的西齊甫的石頭⁽¹⁾，他那無產階級的神奇的，預言似的夢，儘在算學的四個規則⁽²⁾上操練着。總而言之，要知道現實的只有我所不愛的，而我所愛的，我所要的，——永久是非現實的。”

這發表在“Federatia”出版的“Requiem”那本書裏，這是安德列耶夫的很可悲的錯誤，對於他，也和大家一樣，不應當看輕算學的四個規則，這些規則是科學的基礎。而關於無產階級自由的“神奇的夢”，關於他們的創造意志的力量的——這個夢，在蘇聯卻成了英勇的現實。

你通知我：“我們現在這時代，越來越無恥了。”

完全是對的。我並不自以爲是預言家，然而我認爲自己是一個並不壞的觀察者。從我寫那個資產階級制度的無恥主義的時候算起，到現在，已經二十二年過去了，看罷，這無恥主義在資產階級的機

(1) 西齊甫石頭的古典是：神話裏說有一個皇帝叫做西齊甫，他偷了上帝的祕密給人類，因此被罰作苦工，永久在山上推石頭，那石頭推到山頂上之後一定又會滾下來，又要再推。

(2) 就是加減乘除。

體裏，像癩皮膚似的發展着。然而你猜到這個卻太遲了，而且你的猜測已經很難幫助你站到更正直，更積極的立場上，來對付全地球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可是，假使你不來暗示我什麼溫和的規則，而更注意的看一看你周圍的情形，那末，對於你一定要更有益處些。你看看罷：

資產階級國家的像煞有介事的門面，似乎完全塌臺了，誰要是願意看見，他就可以看得見歐洲市儈的石頭籠子的內部，是個什麼情形。經濟恐慌在發作着，——這是野獸們的榨取的病態的貪慾的結果。越來越時常的有許多銀行倒閉，越來越起勁的那些銀行家在偷盜着，靠着一些政府人員和國會議員的小小的幫助，這些人都是資本的馴服的奴才。歐美市儈生活的奢侈，越來越無恥地誇張，無意識和粗俗；市儈的消遣，越來越瘋狂，越來越純粹的只剩得性慾上的放縱，性慾上的淫浪的性質。不久以前，一個什麼報界的賢人說，“工業的進步是工人的父親”，——他忘記了加上一句：而資產階級是工人階級的兇惡，愚蠢，淫蕩的後母。幾百萬工人，他們的妻小，孩子，都在挨餓，同時，卻有幾百萬噸的小麥賣不出去，而把牠當燃料燒燬。有些地方的資本家，節省着自己的錢，減低工資，還要說：國家對於工人的津貼應當停止，因為這種津貼使得飢餓的人惡化，變成懶鬼。

歐洲的飢餓的工人，那麼勇敢的——其實這種勇敢非常值得積極的應用呢，——他們無結果的耗費着自己的力量，在忍耐性上操練

着；他們之中，發展犯罪的行爲和自殺；報紙差不多每天登載着：整個家庭忍受不住飢餓的苦痛和屈辱，用煤氣自殺了；父親和母親自殺之前，先把自己的孩子殺死，爲的不要使孩子們留在這市儈世界裏做野孩子和叫化子，這也不是難得發生的事情了。

你敢否認這種事實的豐富嗎？

“關心”工人階級幸福的那些職業的熱心家，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因爲貧血症和無才而喘氣的第二國際的黨員，在衰老的時期，忘記了究竟誰是工人階級的死敵，他們似乎要想說，可是還不敢對自己的羊羣說：“儘可能的少喫些罷，而更有益處的是——完全不要喫罷，因爲我們的資本主義祖國是在危險之中：別些民族的工人的資本主義祖國正在張牙舞爪的對着牠呢。”

爲着要使得歐洲工人不這麼注意蘇聯，——這種尖銳的注意是很自然的，蘇聯建立了無產階級的專政，而強有力的發展着真正社會主義的建設，——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例如老朽的卡爾·考茨基之類，把自己的死氣沈沈的市儈道理的沙礫，散布在工人的頭腦裏，無恥的，無才的誣蔑共產主義者，從資產階級的報紙裏採取着謠言和毀謗的材料，還要利用俄國僑民的報紙——這是顯然虛偽和腐敗的材料。

在製造對於蘇聯勞動民衆的誣蔑和誹謗的事業裏面，不自然的，神奇古怪的，那些被工人打倒了的俄國將軍，從蘇聯趕出去的神學

家，主教，黑百黨報紙(3)的記者，以前俄皇時代的工廠主和銀行家，那時代的文學家——以前是激進派，——都聯合了起來，這整個的垃圾堆和醜陋傢伙，都是被無產階級的偉大革命的颶風從本國裏掃蕩了出去的。

這各國無產階級的敵人的俄國的和歐洲的黨徒，卻有“梵諦岡城(4)”的主人決定來做他們的頭腦，這個人看來是很愚妄的，也實在應當是愚妄的，因為他相信自己在這地球上代表着基督，代表着“博愛和溫和的上帝”。他提議叫僧侶們“替受苦的俄國民衆”禱告，可是他對於俄國民衆的生活和工作並沒有清楚的概念，而這個民衆，他們的三百個努力的工作人員，其中大多數是黨外的人，來到納亞頗爾(5)，帶着憂愁的驚奇說：“這裏是多麼窮困，孩子們是多麼病態，工人的住宅是多麼可怕！”

我說到歐洲的“大”人物和小人物，歐洲的智識階層，報紙和新聞記者對於蘇聯的態度的極端愚妄，我並沒有絲毫誇大，看罷，這裏就有這種笑話似的愚妄的一種證據：在“Maltino”報上，1931年一月四日登載了一個維也納的電報——

(3) “黑百黨”(Tchiornosotnia)是俄國反動派的渾名。

(4) 梵諦岡是羅馬教皇的駐在地，俗名教皇國，在意大利。

(5) 納亞頗爾(Neapol)——意大利的名城。

俄國鬚鬚的時式。

那宗法社會式的長鬚鬚，以前是那麼使得彼得大帝生氣，以致於他的宮廷執事都應當剃光，而現在在俄國又成了時髦了。然而看來不是因為審美的原因。如果細細的想一下——長鬚鬚有許多好處：使得買領帶的錢可以多餘出來，又能夠使得胸部溫暖，不致於傷風，同時又會妨礙臉上的那副資產階級的神氣，因為臉上沒有茅草就要露出來的。不過有些人天生是紅黃色的毫毛的，却不能夠不犧牲自己下巴須上的茅草，因為俄國人不管什麼布爾塞維克的精粹，現在仍舊是很迷信的，他們認為紅黃色的毫毛的人，是會帶着不好的運氣來的。”

這種無聊的笑話，歐洲報紙上差不多每天都登載着，連著名的拉魯斯氏字典上也有這樣的記載；這裏甚至於有這麼樣的蠢話：

自暖茶爐 (Samovar)——這是一種盛淡水的器皿，有一個或者幾個龍頭。

分裂派 (raskoliniki)——俄國的一種宗教派別。有三種：raskoliniki, rakolin ki, raskolinisty o

伊凡第三有“良善的”綽號。

伊凡第四叫做“恐怖的”，因為他用棍子打死了好幾個老婆。

狄尼庚將軍——著名的軍人，受了克倫斯基的命令同布爾塞維克打仗的。

不久以前，在意大利的一個報紙上登載了德尼泊爾建築的照片，而下面加上了這樣的解釋：“西伯利亞的新生活。沃比河上的德尼泊爾建築的風景，這電站的電力將要供給沃木斯克城的工業和電燈。”

自然，這些都是小事情，無關緊要的，然而一天到晚，一年到頭，儘

把這種無聊東西往歐洲工人的頭腦裏塞，而那些叫慣了“民衆的博愛”，“民族的聯合”，“文化的危機”的人，似乎忘記了世界上的大不幸之一正是愚妄，他們卻並不出來反對愚妄的宣傳，甚至於沒有看見這種愚妄。

不但如此，除開這種對於蠢笨，虛偽，謠言的傳佈的冷淡態度之外，在市儈世界裏，正在實行着各種各樣的反對勞動民衆的許多很大的罪惡和下流行爲，這種行爲並沒有遇見歐洲智識份子方面的任何抗議；而那種歐洲的智識階層，像孩子似的天真的，繼續“認爲自己是創造和保全歐洲文化的力量，這是根據於基督教的人道主義的文化；而且他們始終在向前走着，始終在尋找着愛情，博愛，平等，”——這是照你的說法。

從這句話裏看起來，可見得你是在說但德“地獄”裏罪人，他們“向前走着，而把自己的臉對着後面”。

我認爲這種關於“全人類的愛的真實”的說話，是極端的無恥，因爲這時候，凡爾賽條約所煽動的民族仇恨心正在越來越旺的燃燒起來了，歐洲的資本家努力的在武裝着，準備着新的全世界的大屠殺，而且差不多每天在“世界的文化的中心城市”裏打死工人，僅僅爲着他們要想喫飯。比較這一類的空談家要正直得多，那個野蠻化了的劉登多爾甫將軍，最近申明了自己憎恨猶太人，現在又寫信給薩亞爾白留肯城的一個報紙，說“真正的德意志人，不會是基督教徒的。”

看罷；這才是一貫的思想！而這並不是唯一的事實：現代的歐洲軍人，因為砲隊和馬隊，因為政治和宗教，甚至於因為科學而完全野蠻化了。

無恥的，無意識的來說什麼“全人類的真實”，這時候，正在大家的眼前，不受懲罰的籌備着反對勞動民衆的血腥的陰謀，在這種陰謀之中，“民權主義的智識階層”，這樣或是那樣，也要不可避免的彼捲進去的。資本家，和他們用練纜牽着狗似的領導着的市僧，造成了這種現實，這現實是那麼無恥，甚至於可以這樣想：經濟恐慌彷彿是資本反對勞動人民的一個鉅大陰謀的一部分，恐慌是用人工的手段維持着，故意造成這麼許多失業工人的軍隊，爲的要把他們變成兵士的軍隊。這是空想？也許是可能的。然而更可能的是，我們又要親眼看見一次百萬富翁所組織的叫化子之間的全世界的戰鬥。這樣想法的不止我一個人，例如天文學家，大學教授萊斯里·瓦特，他在十二月間出席克里夫倫德的天文學家會議的時候，也說了：

“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資本主義要想用戰爭來達到解決恐慌的目的。”“用戰爭來自殺——瓦特說，——是資本主義制度的邏輯上的終點。”

你說我不看見真實？我卻看見兩個。

一個真實是你們的，那是陳舊的，老朽的，瞎了一隻左眼的，沒有

了牙齒的，吸收着牠自己所製造出來的腐爛東西。

另外一個是年青的，倔強的，該着無窮的精力的，牠向着自己的高尚目的前進，不回頭看，有時候也會跌到深坑裏去，那是舊的真實的奴隸，在牠的困難道路上，敵視而仇恨地故意掘下的。

真實之中的一個：在蘇聯，勞動的人，在布爾塞維克黨和工農政權的領導之下，在艱苦的條件之中工作着，很有成效的建設着自己的新國家，平等人的國家，而這個鉅大的，勇敢的工作，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復生的開始，是全世界的 Renaissance（復生運動）的開始。

另外一個——卻是蠢笨的，猥瑣的，惡毒的真實，這個真實是生長在蘇聯之內和之外的頹廢派所心愛的。這個真實恨恨的指出來，說一萬萬六千二百萬的蘇聯人民，還沒有都穿起絲絹和呢絨；說十三年的工人階級專政，還沒有把二千五百萬家的小私有者的個人主義者都變成社會主義者。那些精神上的叫化子的真實，雖然還活着，然而已經在很快的喘着氣，牠的贊成人的一切瑣屑的指摘，其實都只有這麼樣的結論。

P. N. 公民，你看罷，我是知道真實的。

這篇文章，最初發表在蘇聯“新聞”報第 21 (4236) 號，1931 年一月三十，同日登載在“真實”報。

這文章裏提起安納託爾·法朗斯關於 1908 年高爾基的“說無恥主義”

論文的批評，那是因為那篇文章同時發表在法文雜誌“Documents du Progrès”上，而法朗斯曾經讚賞過的。

關於現實

在孟塞維克案件審判的時候，被告薩爾慶德很謙虛的說：

“是的，你們是對的，困難是誇大了的，積極的成績是說小了的。”

被告雅苦波維支像懺悔的罪人似的興奮着，承認他給“社會主義消息”報⁽¹⁾所寫的通信“整個兒都是空想”。這案件裏的滑稽腳色，無限制的自我戀愛着的“學者”蘇漢諾夫，承認了繼 1925 年起，五年以來他一直給璫和亞白拉莫維支的卑劣雜誌寫了“空想出來的論文”。我要提醒的，是這璫和亞白拉莫維支就是 1905 年到巴夫爾·米留珂夫⁽²⁾那裏去“喝杯茶”的二十六個“社會主義者”之中的人物，因為那件事情，V. 伊里支曾經很厲害的打過他們的耳光。所有的罪人，已經被判決了的，以及等待着工人階級法庭的審判輪到自己的，——他們除開自己的直接行動之外，除開實行那種使得國家受着極大的物質損失的害蟲政策之外，——還在許多年之中，繼續混在蘇維埃公民和黨員之間，在自己的周圍，散放着懷疑，消沉和恐慌的空氣。他們的這種行爲也是犯罪的，也是害蟲政策，可是已經是所

(1) “社會主義消息”是孟塞維克在維也納出版的機關報。

(2) 米留珂夫是俄國立憲民主黨的首領。

謂“精神上的”了。這種玩意兒是要降低那些人的情緒，那些人卻正在不顧惜自己的力量，生活在艱苦的日常生活條件之中，幹着全世界意義的偉大事業呢。最近，我讀了馬里安娜·雅洪託娃的一篇戲劇“沃德·泰祿爾”的原稿，戲劇寫得很鮮明；在這篇戲劇裏，那鐵匠泰祿爾，1381年組織農民暴動去反對英國封建諸侯的，說得很好：

“……每一個敵人
都在自己裏面保存着過去的傳染病，
而用一些言論，充滿着毒汁的，
充滿着過去形式的美麗的，到處散布着那種病症。”

這是對的，無可爭論的。每一個害蟲都在毒害着環境，只要牠混到了這環境裏面；而我們知道，一些黨員和黨外的人，傳染了這種病症，是怎樣各種各式的表現出來的。日常生活的條件贊助了，並且還在贊助着消沉，懷疑，恐慌和悲觀的病症的傳播。並不是個個人都那麼康健，可以抵抗得住敵人的毒害，還差得遠呢，——而敵人正在腐爛，社會地解體。並不是個個人都在理論上有那樣好的武裝，可以反攻充滿着毒汁而蒙上了美麗形式的言論。而主要的是，並不是個個人都能夠看得見真正的現實狀況，還差得遠呢；許多人還在從過去的觀點上，遠遠地，斜着眼睛來看現在，許多人還是看不見，懂不到現在的主要行動者——是自由的，社會主義地組織了的，非常之有生產效能的工人羣衆的精力。傳染的影響是怎樣的呢？我記得有這樣一件事情：一九二八年，發表了我的關於“機械的公民”的論

文。有一個人，——我和許多別人早先認為他是個正直的，誠懇的革命者，然而他現在同其他的害蟲政策者一塊兒被捕了，——這個人⁽³⁾給我說：“你是在和傻瓜辯論，然而要知道還有些並不笨的人，他們의思想和感覺同你的機械公民是一樣的。”我當時反駁了他，說我同他們辯論的那些人，在他們的環境裏是典型的。“是呀，那是自然的，——他說，——然而他們의思想，你可以在更美麗的形式裏找到。”

過了幾天，我又在一個詩人那裏聽見了這種責備。這種責備，還有些人寫了匿名信來向我提出。機械的公民的有些思想的確蒙上了“美麗的”——因此也就是有力的形式。然而照意思來說，始終還是些機械地思索的人的思想，對於他們，工人階級和牠的領袖，黨所創造的現實，是有機地不適合的，敵對的。

孟塞維克案件卻開展了這些思想的整個練條，一個鐵環又一個鐵環的展開來。自然這也應當是這樣。不能夠說我自以為是“先見者”，預言家，然而我的職業就是文學家，那就是觀察者，大概可以比其他職業的人看得更遠些。

這裏，一切都是很簡單的：對於現實的注意，長期的對於現實的觀察，產生了一種堅定的信仰，知道最有才能的，最有力量的教育者，這就是現實。自然，這是殘酷的教育者。牠所教訓的最好的事情，

(3) 這是說的里亞贊諾夫 (Riazanov)——著名的馬克斯主義老據家。

牠所暗示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按照着牠的指示而去改變牠，爲着大多數人的合理的利益，而反對指揮的少數人在牠裏面所安放的那種下流，卑劣和殘忍的醜態。我們現代的現實，集體的，社會主義地組織了的工農羣衆的精力所創造的，——是人類歷史上空前奇妙的現象，牠的教育力量真正是神奇的。

這樣：我們的教育者——就是我們的現實。敵人誇大牠的消極現象的力量，而說小積極成績的意義。然而等到他們自己做了被告，他們立刻就承認我們現實之中的成績是超過消極現象的。因爲他們自己也是消極現象，所以可以相信他們：用他們的聲音在說話的，正是生活裏的那種混濁，——工人階級所應當戰勝而且一定要戰勝的。是的，這種聲音是應當相信的。我有一個朋友，他的爲人是很直爽，很正直的，雖然不是黨員；他在審判那案件的時候，旁聽了三天，給我寫了：“印象是這樣的：這些人早就想找一個方便的機會來申明他們是混蛋，現在總算得到了這個可能，所以完全誠懇的在說着自己。”

自然，這是犯人的誠懇，被現實所捉住了的，被消滅的恐怖所引起來的。然而這始終也是一種誠懇。其中有一個，承認他“不知怎的沒有看見那幾千百萬人所看見的”。這卻是“爲着救命的謊話”，這是顯然的謊話：不會看不見這麼厲害的，這麼改變得認不出來的，那集中了的工農羣衆的精力在十三年來改變了舊的現實，以及

這種精力建立了多麼結實而不可毀壞的為着將來的現實的基礎。

不會“不看見”成績，而在五年之中幹着“說小”成績的事情。然而罪犯的懺悔永久有點兒像嘔吐，一種機械的過程，永久要包含着多多少少的謊話。騙子懺悔着，有時候也會說：“我比你所想的還要壞得多呢，看罷，我關於自己說得多麼誠懇，因此，他應當饒恕我。”

這是噁心得很，然而並不因為這個而使得被判決了的孟塞維克喪失了他們的價值：他們一致的承認，工農政權在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上，成績已經超過了困難，這個事實的證據還在於那些害蟲政策者，困難的組織者，很有成效的被捉住了，從現實之中掘出了。

現實勝利地迅速的發展，走上了完全戰勝過去的道路，幾千幾萬人的聲音很有力量的說着自己的勝利。看罷，農民 I. 諾維珂夫，“號召加入集體農場的事實”的小冊子的作者，告訴我：

“地理學家 P. 謝美諾夫·天山斯基在著名的“俄羅斯”那部著作裏（1902 年版，第二卷），指出中央黑壤區的農民，因為沒有可能在自己的窮困田地上養活自己，被地主的地租和俄皇的捐稅壓迫着，還是在前世紀的七十年代，就爭先恐後的移民，

‘在家裏我們一定餓死，而到那邊，在邊境上，也許我們可以不死，’農民那麼說着——死在邊境上；空着一雙手從邊境上回到自己家裏，也是死……

現在說起來，這對於中央黑壤區是陳舊的老話了。1928 年，在這區域裏還有八萬一千個失業工人，而現在那邊的勞動力不夠用了，缺少了十八萬一千個工人。所有這後，還有其他許多現象，——例如兩年以前，中央黑壤區裏每一百個居民之中只有三十八個識字的人，而到今年年底，不識字的人

就可以完全沒有了，——這些成功的原因都只是三個：蘇維埃政權，工業化和集體化。如果以前的中央黑壤區裏豐富的是地主……飢民，失業工人，不識字的人，那末，現在的中央黑壤區裏，豐富却是工業，集體農場，以及經濟上健全的，文化上簡直不認得的人了。奇怪的是所有這些簡單的，可是在政治意義上很偉大的事實，怎麼會滑過了農業經濟的“通人”，像孔德拉啓耶夫，察克諾夫等的注意的。”

還有沃謝啓亞的聲音：

“……我們採取一切辦法來鞏固蘇聯的國防，我們要在四年之中完成五年計畫，我們在沃謝啓亞，到1931年春天就要實現整個區域的集體化（二月六日沃謝啓亞已經有百分之七十五集體化了），要在這個基礎上完全消滅富農階級——這是蘇聯之內資本主義寄生蟲的最後的靠山。在資本的國家裏，少數民族和工農民眾，生活在帝國主義野獸的極殘酷的壓迫之下，在日益厲害的資本主義危機的背景上，資產階級的社會正在野蠻化；而在蘇維埃的國家裏，整個羣衆親密的，照着列寧主義的，建設着社會主義的文化。過去，被俄皇制度殘酷的壓迫着的落後的沃謝啓亞，在1913年只有百分之十的識字的人，而現在，已經達到百分之六十的總數。在一九三一年，肅清不識字狀態的工作，就可以完成。單在一九三〇年一年，沃謝啓亞所出版的書籍，等於這個民族存在的一百二十五年之間所出版的數量。”

還有白列若夫史程納——以前的沃德薩區：

“……全區已經有百分之九十六的雇農，貧農，中農的經濟在集體農場裏了，在第二個‘布爾塞維克的春天’這就要成爲整個集體化的區域了，這個區域要永久息滅那勞動的鄉村民衆的敵人階級——富農。”

還有亞謨夫洛西耶夫卡——東巴斯區——的消息：

“像在整個的蘇聯一樣 我們是在整個戰線上開展着社會主義的進攻。

到一九三一年春天，我們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貧農中農經濟已經在集體農場裏面，而在這區域裏，純粹是社會主義的工業。無產階級有了集體農民的強大而眾多的支柱，消滅着國內的主要敵人——富農階級，——就要更加鞏固自己的立場了。”

還有遙遠的西伯利亞邊境說：

“我們，西伯利亞邊疆，利白里興區，普洛斯科·謝尼史村的雇農，貧農，中農，積極的參加了消滅俄皇的將軍哥爾却克的鬥爭，恢復了被搗毀的，被燒掉了個人經濟，幾百年來都用舊的方法工作着；完全恢復了經濟之後，我們承認恢復着個人制度的經濟，不可避免的要生出富農來，同時也要產生無產者，而彷彿忘記了在我們田地裏所流的血是爲着社會主義的了；完全見到了這一點，我們今天集合起來開會，自由的討論了這個問題，決定由十三家的經濟合組農業勞動協社，把生產資料，土地，牲口和種籽都作爲公有，預定吸引其他的個人經濟加入協社，而用公共的方法來耕種整個的地面；在今年春天的農業運動裏，要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九十的耕種地面，用這樣的方法根本消滅私有財產。”

還有斯塔洛魯斯基的蘇維埃大會寫着：

“我們，開着蘇維埃大會，宣布自己是執行五年計畫的第三年——左右全局的一年的一切任務的衝鋒隊員。我們擔負在工業方面執行並且要超過預定的工業財政計畫，有成效的實行春天的耕種，到春天，就要使得這個區域的農民經濟之中的四分之一都集體化，而且要鞏固我們的國防。我們知道得很好，如果我們實現了這個任務，那末，我們就要更有力了，更堅強了。最近史太林同志說得話：落後的是要挨打的。我們不願意挨打。”

從符拉狄卡夫卡茲，九百十三個工人科學生，五十二個大學生，這是二十八種民族的人，寫着：

“最近，一百六十隊工人科學生的志願衝鋒隊出發到北高加索的小民族的各個區域裏去了，他們的一定的任務是：把蘇聯共產（布爾塞維克）黨所決議的‘第二個布爾塞維克的春耕運動’的偉大的現實任務，傳達到每一個勞動者；招收小民族的學生來加入工人科；實行識字運動；實行工人科的工藝化。”

而從白俄羅斯的澤地裏來的聲音是：

“在很大的暴風雪和極厲害的冰凍天氣‘蘇維埃國家’集體農場做完了工作，而做了總結。在集體農場裏有二百四十公畝土地。其中二百畝是耕種的田地。收穫的數量完全滿足了區委集體農場部的預定計畫。蕎麥磨出了175“申特訥”(4)，小麥——883，燕麥——910，大麥——992，番薯——1929。總收入22937盧布23哥比。種了三十五公畝的蕎麥。付給國家，除開大家的糧食，還多餘560“申特訥”，由集體農場的會員均分了。集體農場有1885盧布的放款。現在這集體農場已經開始第二年的存在了，非常之熱心的來執行第二個布爾塞維克的春耕運動。最近，集體農場同非集產的農民共同募集經費來建築航空艦隊——“克里謨·沃格塞洛夫”號，“集產農民”號，“OGPU”號的飛船，還有其他的飛船，這是回答西歐的干涉主義者的；並且加緊軍事訓練，組織航空化學會的隊伍。白俄羅斯澤地的慶祝。”

還有：

“難閉斯維德洛夫斯克二百五十基羅密達，有一個小小的城市沙德林斯克——十三年以前——是個“沃苦洛夫的城市”(5)。在這個城市裏，現

(4) 申特訥 (centner) 等於五十個基羅格鬥姆，大約等於中國的七十五斤。

(5) “沃苦洛夫的城市”是高爾基的一部小說，描寫俄國外省城市中的市儈的，這部小說的名稱就成了一切“醉生夢死”，“死樣活氣”的市儈城市的通稱。

在却有了工廠的七年制學校，成人入學校，師範學校，農業學校，工人科，許多初等學校和各種各樣的訓練所，我們這訓練所也是其中的一個，是準備工人投考高等技術學校的。

我們這訓練所是養成將來的無產階級的專門家的。我們訓練所的經驗完全證明了史太林同志的話的正確：我們要占有科學，爲着要更有成效的，用更快的速度去建設社會主義。在這訓練所裏十個月，差不多完全沒有什麼基礎的工人，也能夠用加緊的工作和堅決的布爾塞維克的志願，達到中等學校的程度。

三月一日是我們這訓練所開辦的週年紀念。在這一年以內，已經畢業了二百十三個人，他們現在在烏拉爾的高等技術學校裏學習。四月十五日，又要有四十五個人畢業了。

我們希望已經實現了科學和勞動的聯繫，而在高等技術學校畢業之後，那就是質量上很高等的科學程度和清楚的馬克斯·列寧主義的革命前途互相聯合了。我們和西歐相反，資本主義的西歐正在退化，正在宣傳着拋棄科學，而我們却深刻的了解文化遺產的價值和創造無產階級文化的必要。

我們充滿了這樣的確信：我們一定要創造出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的文化價值。

就在我們的眼前，對於勞動的態度是在變更着，創造着新式的非常之好的人——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在共產主義的原則上根本改造着人的日常生活，人的相互關係。英勇主義變成了日常的事實。

今年，烏拉爾經濟之中有了 1,600,000,000 盧布的投資。預定的草案上，要比去年增加鑄鐵的總生產百分之七十七，煤——百分之九十九，銅——百分之一百分三十，鐵礦——百分之一百四十五。三十九個新工廠，總共的建築費有 650,000,000 盧布，就要開始工作了。這種速度是世界上從沒有見過的；而蘇聯的，部分的說，我們烏拉爾的無產階級深信這些任務是會實現的。今年，我們烏拉爾的工業裏要增加 385,000 個新工人，失

樂在我們這裏已經沒有了；我們這裏每一隻空手都是寶貴的，而在外國，幾千百萬的工人不能夠不換錢，而一錢不值的出賣自己的勞動。”

一月和二月這兩個月中間，我接到從蘇聯的各地寄來的這樣的信有二十三封：都是新現實的創造者寄給我的，在這新的現實裏，勞動的英勇主義成了“日常的事實”。我們的報紙也在每天登載着這種“日常的事實”。

我們所很知道的“沃苦洛夫的城市”，變成了社會主義文化的中心。這好像是講故事，然而這是事實。巴史啓里亞和烏茲倍克斯坦，西伯利亞的荒僻的森林和卡列里亞，莫爾達維亞和楚瓦希亞，——大家都齊聲歡樂的和驕傲的說：復活了新的生活，站了起來了，工作着，了解我們工作的深刻意義，我們的黨——我們的領袖萬歲！

舊世界聽見這些聲音，聽見我們鉅大的工作的聲響嗎？有很多的徵象，可以說他們是聽見的。這舊世界對於我們的敵視和不可調和的態度，我們是很知道的。然而這舊世界是不一致的，越來越時常的從牠那裏傳來了對待蘇聯的別種態度的證據。最近幾天，我就接到一封信，寫這封信的人很知道歐洲，很會觀察，他關於歐洲的智識階層這樣寫：

“很有趣的，看見在法國和英國那麼有興趣的，那麼注意的觀察着俄國，這並不像惡狠狠的咬牙齒，他們是那麼誠懇的驚奇着俄國所走的偉大的步驟。”這個“興趣”和這個“驚奇”是可以用事實來證

朗的，然而我們等一等罷。讓這種事實多積聚些。

散佈懷疑和消沉的人，小小的虛榮主義者，癩鬼，工人階級的新寄生蟲的候補人，都應當注意的聽聽這些聲音。牠們所講的都只是一件事情：在蘇聯，工農的政權，理智和意志在創造着新的現實。這現實——整個兒都在我們的成績裏，這些成績是在不斷的發展着，生長着。舊的現實很快的在喘氣，在消滅了。沒有任何的力量能夠使得舊的現實復活而再生了。凡是要想學會正直的生活和有生產效能的工作的人，都應當在我們的成績裏來學習；在這些成績裏，才有生活的真正的和行動的意義。無論什麼時候，自我學習的概念還不會有過這樣深刻的意義，像我們現在這樣，這時候，全蘇聯的勞動民衆，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正在組織着那樣的力量，——歷史所決定要來改造整個世界的力量。

向你們自己所創造出來的新的現實學習罷。錯誤也是有教訓的，符拉狄米爾·伊里支說的：“只有什麼也不做的人才不做錯誤。然而要記得，別人是在更加熱心的，更加巧妙的幫助我們做錯誤，而且很狡猾的妨礙我們的建設。舊的現實是在害我們，這就是那些要想恢復牠的人幹的。直到我們把舊的現實從日常生活的條件裏完全掘掉為止，牠總是要害我們的，所以——應當把牠從自己的內部掘掉。然而，我們是要掘掉牠的，好像我們的掘掉那些以害蟲政策為職業的人，掘掉那些醜陋，殘忍，下流的舊世界的馴服的奴才；而

界的腐爛的解體，比蘇聯的新世界的建設要快得多呢。

這篇文章最初發表在蘇聯“新聞”報，1931年四月二十日，同時登載在“真實”報。

親愛的回音

親愛的同志們，對於我六十四歲的慶祝使得我非常感動；誠心的感謝！感謝你們對我的親愛和注意，在我是似乎太時常了，然而這是你們不好，而不是我。唔，好罷，我們同意：個人和羣衆互相同情的回音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個人多多少少成功的，確定的在自己裏面反映着羣衆的積極情緒，羣衆是在執行着歷史上必要的革命工作。

同意了這個，我們應當從羣衆和個人親愛的回音的事實裏得到一些簡單的，在我看來是很有教訓意義的結論。第一個——是羣衆的無可爭論的教育力量：羣衆的精力充實着個人，而個人把這種充實的力量反映給羣衆；關於這個，我已經不止說了一次。再則：個人越是能夠在思想上和形象上消化並且表現羣衆的情感的精力，那末，個人在社會革命上的價值也就越大。再則：資產階級社會教育着並且改良着個性，是要個性做自己的階級目的的奴才，——這個階級的政權和力量，是根據在對於多數人的體力的剝削之上的。在資產階級的國家裏，個性的自由發展是受着限制的：——種族，民族，階級，宗教的觀念的限制，“民族文化的特殊”思想的觀念的限制。

我們的國家建築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在這個國家裏限制的觀

念消滅了，個性得到了自由發展自己的一切力量和才能的權利。這裏，自然有人要對我說：這是不對的，因為蘇維埃政權反對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以及其他一切“自由”，那些“自由”是資本制度的擁護人所誇口的，而在事實上並沒有這些“自由”，這是說騙。

我們的國家確定了個性的完全和廣泛的自由，使牠脫離那些幾百年來阻礙和限制牠的發展的觀念。我們的國家也要反對個性，如果這個性是在代表和宣傳一些限制個性的智識力量自由發展的觀念。這正是資本家政權所根據的觀念：階級，種族，民族，宗教。蘇聯的工人階級，以牠的黨為代表，承認這些觀念是有害的，這些觀念使得人惡化，敵視勞動人民的羣衆；工人階級推翻這些觀念，而禁止牠們的宣傳。這完全是對的。那實是可笑的，愚蠢的董·吉訶德主義：——如果在工農的國家裏面還來宣傳完全敵視工農的觀念，那些要想給勞動民衆證明他們的當奴隸是合理而不可避免的觀念(1)。

同志們，弄到臨了，我所說的都是你們並不比我知道得少些的事情。這在我是時常會這樣的，假使不是永久這樣。這所以這樣，是因為我經過你們的頭，而在給“第三種戰士”說話，關於他們，我在不

(1) 高爾基所說的“階級”的觀念正是這種意思，而並不是“階級意識”的意思；他指貴族和資產階級的種種學說——企圖辯護對無階級的政治經濟思想上的統治的——都叫做“階級的觀念”，不管牠們表面上披着什麼虛偽說騙的外衣。

久以前寫過的。我又接到了他們這種人的好些信，在這些信裏，他們繼續擁護着自己站在資本家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立場的合法性。同這種“戰士”去爭論，是不值得枉費時間的，因為他們的蠢笨是不可克服的。這種蠢笨在他們是生根在骨髓裏的了，——一直要到末日為止。

然而在他們的背後還站着許多人，也在喜歡那個“第三種人”的，“之間”的立場。自然，這個立場並不是“之間”的，而是在旁邊的，——這是強盜的等待立場，躲在自己的無恥的廢話的樹林子裏，等待着戰鬥的結局，而出來打劫。這種人住在各種各式的外省的角落裏，這種角落越是遙遠，越是荒僻，那就對於他們越發方便的可以在自己的周圍散布一些反猶太主義，浸禮會主義，市僧式的無政府主義，以及其他“自由思想”的毒汁。我想像得到那種靜悄悄的城市和“第三種戰士”的靜悄悄的私語；這些對着青年的私語，使得被私語家所包圍的青年的耳朵都震聾了，而那些小思想的毒汁正要毒害青年對於生活的積極而健全的感覺。思想也和人一樣，是在死亡，解體；而腐爛着的思想的屍毒，也和其他的屍毒一樣，是會傳染的。荒僻地方，狗熊角落裏的青年，雖然渴望着智識，卻還沒有充分的必須的力量，去有效的抵抗私語家所放出來的毒氣。在新歷史的創造者的社會主義精力所執行的鉅大工作的明亮的背景上，那些灰黯的，煙霧似的市僧主義的污點，特別看得清楚。自然，這些污點是在消

散，消滅，然而始終不要使得牠們的最後的滅亡，會在青年身上再來延遲這麼一天。

這篇文章最初發表在蘇聯“新聞”報，1931年四月二十，同時登載在“真實”報上。

答覆智識份子

你說：

“歐洲的許多智識份子開始感覺自己是沒有祖國的人，我們對於俄國生活的注意是在生長着，然而我們始終不明白：蘇維埃國裏究竟是怎樣的情形？”

蘇聯裏面，是在進行着一種鬥爭——勞動羣衆的理智地組織起來了的意志在反對自然界的自發力量，在反對人裏面的那種“自發性”，這種“自發性”，按照牠的本質，其實並不是什麼別的，正是個性的本能的無政府主義，這是階級國家，對於個性的幾百年來的壓迫所教養出來的。這個鬥爭就是蘇聯現在的現實的基本內容。誰要是真心願意了解以前的所謂俄國之中的文化革命過程的深刻意義，那就他只有把這個過程當做爲着文化的鬥爭，爲着文化創造的鬥爭看待，然後他才能夠正確的了解牠。

你們西方的人，對於蘇聯的各種民族抱定了那麼一種態度，這種態度，我不能夠說牠是合於自以爲全世界所必須的文化的代表人的身份的，因爲那是商人對於買主，債主對於債戶的一種觀點。你們記得，俄皇的俄國借了你們的錢，向你們學習過思想；然而你們忘記

了，這些借款給了你們的工業家和商人很多的利錢，而十九·二十世紀的俄國科學就形成了強有力的支流，匯合了整個歐洲的科學研究工作，現在，你們在藝術方面的創作已經這樣明顯的，悲哀的萎靡下去，你們已經靠着俄國藝術的力量——思想和形象——生活了。你們不會否認，俄國的音樂和文學，同科學一樣，早就成了整個文化世界的財產了。看來，這個民族在一世紀以內，就在精神的創造方面，達到了和歐洲許多世紀的成績同等的高度，這個民族，現在又得到了自由創造的可能，牠似乎應當以歐洲智識份子方面，受着比現在更深切的注意和研究。

現在難道還不是你們極堅決地提出歐洲資產階級和蘇聯民衆生活目的的區別問題的時候嗎？要知道現在已經夠明白的了：歐洲的政治領袖，不是在替什麼“整個的民族”利益服務，而是在替資本家的許多集團的利益服務，這些資本家集團正在互相的敵視着。這是對於“民族”完全不負責任的商人之間的敵視，這種敵視造成了許多危害人類的罪惡，例如 1914—18 年的歐洲戰爭；這種敵視使得各民族之間的互相不信任的“自發性”更加深入了，把歐洲變成了好些武裝營壘，躑躅着極大數量的民衆勞動，黃金和鐵，去生產大批屠殺人類的工具；這種資本家之間的互相敵視，使得世界的經濟恐慌更加厲害，而經濟恐慌躑躅着“民族”的物質力量，降低着智識力量的生長；這種野獸和商人的敵視，還在組織着第二次的世界大屠殺。問一問

自己罷：這是爲着什麼？總之，如果你們真心要治好你們的難受的疑惑和對於生活的消極態度，那麼，給自己提出些關於社會秩序的極簡單的問題，不要給自己沉溺在一些空話裏面，而要認真的想一想資本主義存在的目的，說得確當些，是牠的存在的罪惡。

你們智識主義者，“認爲文化是寶貴的，文化的全人類性的意義是無可爭論的。”這樣？然而在你們的眼前，資本主義在歐洲內部，每天不斷的毀壞着你們所寶貴的文化，而在殖民地上，用自己的不人道的，無恥的政策，毫無疑問的在製造着歐洲文化的敵軍。如果這個野獸的“文化”在黑種大陸和黃種大陸上教出了幾千同樣的野獸，那末，不要忘記那邊還有幾萬萬被掠奪者和乞丐。印度人，中國人，安南人，在大砲前面低下了頭，但是，這並不是說，他們是在低頭崇拜歐洲的文化。他們也開始了解了：在蘇聯建設着形式上意義上都是另外一種的文化。

“在東方生活着的，是異教徒和野蠻人，”——你們這樣說，並且爲着證實東方的野蠻化，你們指出東方婦女的地位。我們就來談談野蠻人罷。

在歐洲“Music-Halls”（1）的舞臺上，表演着幾十個，幾百個赤身裸體的女人。當你們看來，這種大庭廣衆之間玩着女人的裸體的把

（1） Music-Hall——“音樂廳”，是歐美大城市裏的一種娛樂場所，大抵都是些低級趣味的，“輕鬆的”音樂，跳舞戲，裸體舞等等。

戲，是不是應當引起歐洲智識份子的母親，妻小，姊妹的某種抗議呢？我並不是從“道德”的觀點來說這種無恥玩意的意義，而是從生物學的和社會衛生的利益上着想。對於我，這種下流的，惡劣的玩意兒——毫無疑問的是歐洲資產階級腐敗化和野蠻化的證據。我深信，男子和女子的同性戀愛的明顯而迅速的增加，——可以用經濟，就是家庭生活的昂貴來解釋的，——同時，也就因為這種醜惡的，在大庭廣眾之間對於女人的糟踐，而更加快起來。歐洲資產階級野蠻化的徵象太多了，你們也不配來說東方人的野蠻。加入了蘇聯的那些種族的農民，非常之好的學習着了解真正文化的價值，以及婦女在實際生活裏的作用的極重要的意義。中國的一些已經建立了蘇維埃的省份裏面，工人和農民也了解這種價值。印度人也要了解的。我們這星球上的整個勞動民衆，都應當了解。他們的自由道路在什麼地方。在整個地球上，他們正在爲着這種自由而鬥爭呢。

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裏，越來越兇猛的發展着一種鬥爭，這是在爭奪着煤油，鐵，這是爲着要武裝起來再來屠殺一次幾千百萬的羣衆，這鬥爭是爲着爭奪少數人在政治經濟上壓迫大多數人的權利。這種卑劣的，無恥的，罪惡的鬥爭，是一些爲着無意識的積聚金錢而追逐的，因而野蠻化了的人的小小集團所組織的；而世界上一切教會之中的最虛偽，最罪惡的基督教教會，卻在頌揚着這種鬥爭。歐洲智識階層所驕傲的，這樣寶貴的“人道主義”，被這種鬥爭完全殺死了，

毀滅了。無論什麼時候，智識階層，還沒有這樣清楚的暴露自己的無力，這樣不識羞恥的暴露自己對於實際生活的冷淡態度，像他們在二十世紀所暴露出來的；而這二十世紀是充滿了如此之多的悲劇，在這世界上製造着指揮階級的無恥主義。在政治方面，極有威權的指揮着智識階層的情感和思想的，是一些投機份子，資本家集團的馴服的執行他們意志的人；那些資本家集團交易着一切有人收買的東西，結果，永久是做的民衆精力的交易。這裏，我在“民衆”這個字眼的意義裏面，不僅包括工人和農民，還有小官吏，資本之下的“職員”軍隊，總之，智識階層也包括在內，——這個智識階層，在資產階級社會的齷齪的破爛衣服上面，始終還是很鮮明的補綻。

熱中的在口頭上尋找着所謂“全人類的”理想，各種言語不同的智識份子其實只在自己的民族的，階級的偏見和成見上，互相的看着。因此，鄰居的缺點和罪過要比優點對於他們的興趣大得多。他們這樣時常的互相攻打着，以致於不知道誰挨打了多些，或是誰挨打了少些，因此是誰更值得敬重些。資本主義暗示了他們互相的懷疑主義的不信任，而很巧妙的利用着這一點。

他們沒有了解十月革命的歷史意義，簡直沒有在自己裏面找着力量和願念，出來反對 1818—21 年資本家的血腥的，掠奪的干涉。蘇俄的政府要是逮捕一個大學教授，帝制黨，陰謀家，他們就抗議了；

然而他們的資本家強姦安南，印度，非洲的民衆的時候，他們是冷淡的。如果在蘇聯鎗斃四五十個極惡劣的罪犯，那他們就叫喊着“禽獸的兇惡”；而如果在印度，在安南，用大砲機關鎗屠殺幾千幾萬毫無過失的人，那就人道的智識份子謙虛的沉默了。他們始終還不能夠估量蘇聯的積極力量十三年來的工作結果。政治家在國會裏和報紙上暗示他們，說蘇維埃政權的工作完全是要毀壞“舊世界”，他們就相信的確是這樣。

而在蘇聯裏面很快的發展着一種過程，就是勞動民衆取得全人類文化所創造的最好的和毫無爭論的價值，這些價值的取得和發展的過程。舊的世界自然是在毀壞着，因為必須從個性的智識力量的各種各式的限制之中，從階級的，民族的，教會的思想和迷信之中，把個性解放出來。蘇聯的文化過程的基本目的，是要把全世界的人聯合成一個整個的人類。這個工作是人類歷史的整個過程所指出來的，所暗示的，這個工作是全世界的，不僅只是民族的“復生運動”(renaissance)的開始。關於這個，以前只有個人幻想着——康帕訥拉(2)，託馬斯·穆爾(3)，桑·西蒙，傅立葉，那還是在工業技術方面沒

(2) 康帕訥拉 (Companella) 是十五、六世紀間的意大利的一個僧侶，著有“太陽城”一書，是最早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者。

(3) 託馬斯·穆爾 (Thomas More) 是和康帕訥拉同時的英國人，他著的“烏託邦”(Utopia)，就是“烏託邦社會主義”得名的由來。

有實現這種幻想的可能的時候。現在，這些可能已經有了，烏託邦主義者的幻想有了科學上的基礎；而實現這種幻想的工作，已經有幾千百萬的羣衆在做着。再長大一輩人，單在一個蘇聯裏面，在這個戰場上的工作者，就將近要有二萬萬人了。

不願意或是沒有能力了解的時候，才要信仰。

小私有者的階級本能和情緒，階級社會的盲目的擁護者的哲學，使得智識主義者‘信仰’在蘇聯的個性是被鎮壓的，被壓迫的，說工業化是用強迫勞動進行的，彷彿埃及的建築金字塔。這不但是簡單的造謠，而且是如此之明顯的造謠，只有完全喪失了個性，喪失了力量，生活在十足的衰落狀態之中，十分踴躍智識精力和批評思想的人，才會把這種謠言當做真話。

肯定的打消這種‘鎮壓個性’的傳說的，就是在實際生活的各方面：在藝術，科學，技術的各方面的人才，數量上正在迅速的增加。在整個民衆都參加着文化工作過程的國家裏面，也不會有另外的情形。

在二千五百萬家的“私有經濟”之中，在這些被羅曼諾夫皇朝的專制制度和“土地資產階級”的壓迫所束縛的不大識字的和完全不識字的農民之中，現在已經有一千二百萬家明瞭了集體經濟的合理和對於他們的利益。這種工作的新的形式，要使得農民脫離他們的守舊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脫離小私有者的動物性的性質，而解放出

來。這種新形式可以給農民許多自由的時間；他們可以利用這種自由去消滅自己的不大識字的情形。1931年，蘇聯裏面受着教育的有五千萬成年人和兒童，這一年要出版的書，有八萬萬本——總共有3,500,000,000“印刷頁”(4)。人民的需要已經到了五十萬萬頁了，然而工廠還來不及製造這麼許多紙。智識的飢渴是在生長着。蘇聯十三年來組織了幾十個科學研究館，新開辦的大學，技術專門學校，所有這些學術機關都充滿着青年學生，而從工農羣衆之中不斷的提拔出成千成萬的傳達文化的青年。

資產階級的國家是否曾經提出過，並且會不會提出吸引全體勞動民衆來參加文化事業的目的呢？歷史對於這個簡單問題的答覆是否定的。資本主義的幫助勞動人民智識上的發展，只不過限於工業商業的成效所必須的，有利的範圍。對於資本主義，人的用處只不過當作多多少少是一種廉價的力量，當作現存制度的擁護者。資本主義沒有發展到，也不會發展到了解真正文化的目的和意義——是努力發展和積聚智識上的精力。爲着要使這種精力不斷的發展，並且儘可能的迅速幫助人類運用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和一切供獻，那就必須解放體力上的精力的最大限度的數量，使牠脫離資本家，野獸和勞動人類的寄生蟲的狹隘的，貪慾的利益之中的無意識的，無政府性

(4) 俄國的所謂“印刷頁”就是中國印刷界的所謂“幾開本”——譬如“十六開本”，就是十六頁等於一“印刷頁”；俄國的一“印刷頁”大概等於申報一大張。

的工作。資本主義的意識代表，完全不會想像到人的個性是智識精力的極巨大的儲蓄器。不管那一切口頭上的狡辯和掩飾，少數統治多數的那種政權的擁護者的意識形態，本質上其實是動物性的。

階級國家是照着動物園的模型構造的，在那裏，一切禽獸都關鎖在鐵籠子裏，——而在階級的國家裏面，這是些多多少少巧妙的構造着的思想的籠子，這些思想把人類分裂開來，使得他們對於利益統一的認識和真正全人類的統一文化的發展，差不多成爲不可能的。

我難道要否認在蘇聯裏面個性是受着限制的？自然不否認，不的。在蘇聯，個性的意志每一次都要受着限制，只要這個性的意志是敵視的反對着羣衆的意志的，——羣衆已經認識了建設新式生活的權利，已經提出了這樣的目的，——這種目的，是個性，甚至於超越自然的天才的個性，所不能夠達到的。蘇聯工農的先鋒隊伍，向着自己的最高目的進行，英勇地在自己的道路上忍受着許多表面上的，日常生活裏的不方便和障礙。

個性爭持着自己的假自由，自己所習慣的，幾百年來教養出來的“鐵籠子裏的獨立”。封鎖着作家，記者，哲學家，官吏，以及資本制度機器上的其他一切磨得很光滑的小件頭的籠子，自然比較起農民的籠子來是還更方便些。農民的發臭的，齷齪的木屋，他的“私有經濟”，使得他要經常不斷的自衛着，抵抗着自然界“自發”力量的壞脾氣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強暴，資本主義國家是在農民身上剝着七層皮

呢。在卡拉白里亞，在巴瓦里亞，在匈牙利，在白萊塔尼亞，在非洲，在美洲，農民的心理並沒有多大的區別，假使除開言語上的區別。全地球上的農民，大致同樣的“無能爲力”，同樣的傳染着動物性的個人主義。在蘇聯，農民轉變到了集體的勞動，逐漸的消滅着這種土地奴隸的特殊心理，這種叫化子似的私產的永久俘虜的特殊心理。

個人主義是外來的，從階級社會方面來的對於人的壓迫的結果；個人主義，這是個性抵抗強暴的無結果的企圖。然而要知道自我保衛並不是什麼別的，恰好是一種自我限制，因爲在自我保衛的狀態之中，智識精力的生長過程就遲緩了。這種狀態對於社會和個性是同樣有害的。“民族”化費着幾十萬萬金錢武裝起來，去反對鄰近的民族，個性化費着自己的大多數的力量來自衛，去抵抗階級社會的強暴。“生活是鬭爭？”是的，然而這應當是人和人類反對自然界的自發力量的鬭爭，應當是爲着取得對於這些力量的權力的鬭爭。階級國家把這種偉大的鬥爭，變成了爲着占有人的體力上的精力，爲着剝削他們的極卑鄙醜惡的爭奪。十九·二十世紀的智識份子的個人主義和農民的個人主義，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而只有表現方式上的差別。智識份子的個人主義更花花綠綠些，更光滑些，然而同樣是動物性的，同樣是盲目的。智識份子站在民衆的鐵砧和國家的錘子之間，一般的說，他的地位自然是很艱難的，很戲劇式的，因爲現實對於他，通常總是敵視的，因此，就時常發生一種觀念，就是智識份子的被

庸浮的思想，把自己所處地位的條件的艱難和不方便，推廣到整個世界，而在主觀的世界感覺的結果，就出現了哲學上的悲觀主義，日常生活裏的懷疑主義，以及其他的畸形思想。大家知道的，悲觀主義的家鄉是東方，尤其是印度，那裏的卡斯特式的⁽⁵⁾社會制度真正達到了狂妄的程度。

社會的階級制度的現實，束縛着個性發展的自由，因此，個性就到現實範圍之外去尋找自己的位置和安逸。譬如在上帝裏去尋找。勞動民衆；尋找着自然界自發力量對於他們的有益的，或是有害的現象的解釋，“異教式的”⁽⁶⁾美麗地，把這些現象變化了類似人類的形象，不過這些形象比任何一個個人都要更加強有力些。民衆把自己所有的一切美德和罪過，都分配給自己的神道；沃林普斯山(Olympus)和亞斯迦爾德山(Asgard)上的許多“神”，——其實是擴大了的人⁽⁷⁾。吳爾康(Vulcan)和託爾(Thor)就是鐵匠，同隨便那一個鐵匠都是同樣的，他們不過更強大些，可是還說不上更巧妙些⁽⁸⁾。勞動民衆的宗教創造簡直是藝術的創作，這裏面沒有神祕，而完全是現實主義

(5) 卡斯特 (caste) 是印度的，埃及的“階級”——“等級”的名稱，印度有婆羅門，貴族，平民，賤民四種“卡斯特”，是極端嚴格的等級制度，和其他國家的等級制度都不相同，絕對的不准賤民“高升”；所以這裏就用音譯，免得混淆。

(6) “異教式的”是指非基督教，尤其是“古代希臘文化式的”說的。

(7) 沃林普斯是希臘神道的“洞府”；亞斯迦爾德是挪威的“洞府”。

(8) 吳爾康是希臘神話裏的火神，託爾是挪威神話裏的雷神。

的，並沒有脫離現實的，這裏，很肯定的覺得到勞動行為的影響，目的其實是在獎勵這種行為。民衆的詩歌創作之中，也看得出這麼一種事實的認識，就是講到臨了，現實並不是神道所創造的，而是人的勞動精力所創造的。民衆是“異教徒”。甚至於基督教變成了鋼定的國教之後一千五百年，在農民的概念裏，上帝仍舊是古代的那種神道：基督，馬東娜，聖徒都在這世界上走着，干涉着人的勞動生活，像古代希臘和斯肯狄納維亞的神道一樣。

個人主義是在“私有經濟”的基礎上發生的。民族一層層的堆積着，建設了一個集體；而個人因為某種原因分裂出去，脫離集體，也就是脫離那種不斷創造的現實，就製造了自己的唯一的上帝，理智所不能達到的，神祕的上帝，他的任務——就是辯護個人的獨立和權力的權利。這裏，必須要有神祕，因為如果用理智，就不能夠解釋個性的自我權力的權利，不能夠解釋“自我專制”。個人主義使得自己的上帝有了全知，全能，超越理智的性質，這就是單獨的個人所想要有的一些性質，然而這些性質卻只有在集體勞動所創造的現實之中才會發展。這種現實，永久落在人的理智之後，永久只在理智以下，要知道創造現實的理智雖然很慢的，卻在不斷的完善起來。如果不是這樣，那麼，現實就自然可以使人滿意；而滿意的狀態，卻是消極的狀態。現實是人的‘理智的意志’的無窮盡的力量所創造的，這現實的發展決沒有停止的時候。而神祕的個人主義的上帝，卻永久是不

動的，沒有行動的，在創造工作上死的，他也不會是別的樣子，因為他反映着創造工作上的個人主義的內部的無力。無一個識字的人，都知道個人主義者的宗教玄學思想的無結果的動搖歷史。我們現在，這些“精神觀察的”動搖的無力，暴露得無可爭論的清楚了；個人主義者的哲學的完全破產，已經顯露。然而個人主義者，仍舊在無結果的尋找着生活的“謎”的答覆，他不在勞動的現實裏去找，這種現實卻是各方面發展着的，而且像革命似的迅速，——他反而在所謂“自己的‘我’的內心”裏去尋找這些答覆。個人主義者繼續保存着乞丐似的“私有經濟”，不願意使得生活豐富而有效果。他只在爲着自我保衛而“自我深入”，他不是在生活，而是在逃避，他那種“精神觀察的行爲”很像聖經上的一個英雄——沃難(9)。

馴服地服從着資本主義國家的暗示，歐美的智識份子——文學家，政論家，經濟學家，以前的社會主義者而現在的投機家，像甘地那一類的幻想家，——自覺的或是不自覺的擁護着資產階級的階級制度的基礎，這種制度確定地阻礙着全人類文化過程的前進運動，——在這過程裏，勞動民衆的創造新的現實的意志的積極作用，一天天的擴大起來了。智識份子自以爲他們擁護着“民權主義”，雖然民權主義已經證明了，而且還在繼續證明着自己的無力。他們擁護“言治自由”，雖然報紙抓在資本家手裏，而只能夠替他們的無政府性的，

(9) 沃難 (Onan) —— 未詳。

不人道的，罪惡的利益服務。智識份子替自己的敵人做工，要知道東家永久是夥計的敵人，而“階級合作”的思想是天真的無意識，像羊子同狼講交情一樣。

歐美的智識份子是在替自己的敵人做工，這種情形特別明顯的，不識羞恥的暴露出來，——只要看他們對付蘇聯工農羣衆所開始的文化革命過程的那種態度。這個過程的發展，是在歐洲資產階級的極端敵視的空氣裏面，是在他們的強盜性的攻擊蘇聯的威嚇之下。這兩個條件的壓迫，差不多完全可以解釋一切消極性質的事實，而蘇聯工農的敵人卻最喜歡特別着重的指摘這些事實。

特別熱心和惡毒的指摘蘇維埃現實之中的這些消極現象的，是政客化的俄國僑民，歐洲資產階級報紙的報告人。他們這些僑民是誰？大多數是政治上的失敗人物，虛榮心重的小人，然而卻是些“大希望”的人。他們之中有些要想做馬薩里克，有些要想做白里昂，有些——邱吉爾，還有許多要想做福特⁽¹⁰⁾，而所有這些人的共同的特色，卻是用了“不中用的手段”想去奪取指揮的地位。我很熟悉他們的道德上和智識上的渺小，這是他們在 1905—07 年第一次革命之後就暴露了的，之後，他們每天在國會裏表現了自己的無才，而到了 1914—17 年，這種無才就暴露到了極點，他們還算是“反對專

(10) 白里昂是法國以前的內閣總理，邱吉爾是英國以前的外交總長，福特是英國的汽車大王，馬薩里克——未詳。

制的戰士”呢，自然，他們始終是擁護強國主義的。他們做了大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治上的自我認識的組織者，得到了一些名聲：總之，他們是市儈的意識代表。有這麼一句俗話，叫做“沒有魚的時候——蝦也要算魚了。”他們在俄國的實際生活裏，就起了蝦的作用，他們儘在往後跳。這是智識階層在革命時代的通常的作用。

然而他們的可恥的作用，不僅限於政治上經常的“改換路標”(11)和忘記“安尼巴洛夫的宣誓”。從一九一七年起，他們服侍俄國的煤油工業家，紡織工業家，煤礦工業家，磨坊老板和地主，同俄皇時代所剩下來的一些將軍在一起，而那些將軍卻在輕蔑他們，認為他們是叛徒，是俄皇的敵人。在俄國歷史上，他們所留下來的紀念，卻是做了俄國民衆的叛徒。在四年之中，他們進行着叛變，把“自己的”民衆出賣給你們的資本家，歐洲的智識份子先生們呵！他們幫助狄尼庚，哥爾却克，符朗格爾，猶乾尼茨，以及其他職業的殺人兇犯，幫助他們破壞自己國家的經濟，而那時候俄國的經濟已經被那個全歐洲的恥辱的四年大屠殺所搗毀了的。歐洲資本家和俄皇的將軍們，得着這些被輕蔑的人物的幫助，屠殺了蘇聯的幾十萬工農，燒燬了幾百個鄉村和哥薩克的田莊，破壞了鐵路，炸斷了橋梁，毀壞了一切可以

(11) 一九〇七年，俄國文人後悔“參加”革命，就出了一本集子，叫做“路標”；一九二一年有一些文人悔變了，發成蘇維埃革命，發出了一種雜誌，叫做“改換路標”，後來，又有些重新反革命，這裏高爾基是諷刺他們的。

毀壞的東西，爲着要完全消滅自己國家的力量，而把牠賣給歐洲的資本家。問問他們看：爲着什麼他們屠殺了民衆，破壞了民衆的經濟？他們會不識羞恥的回答你們，說是：“爲着民衆的利益”，而不說起爲什麼“民衆”把他們從自己國家裏趕了出去。

從 1926 年起，他們幫助了無數次的反對工農政權的陰謀的組織。他們當然否認參加了這些罪案，雖然那些陰謀罪犯——他們的朋友——已經承認了曾經用“關於蘇維埃工作的，完全虛偽的消息”報告過他們的報紙，自然，陰謀家方面又是受着這些賣國賊的報紙的指導的。

歐洲的先生們，你們的人道主義，因爲四十八個淫虐專家，飢荒的組織者，受到了應當受的死刑的處罰，而激動起來了，這很奇怪！爲什麼，在你們的城市裏差不多每天警察都在屠殺毫無罪過的工人，你們倒並不憤激？那四十八個壞蛋，比杜塞爾多爾夫地方的淫虐專家區爾滕(12)，就是那個被判決過九次死刑的脚色，還要可惡。我不知道蘇維埃政府沒有把這些陰謀家公開審判的動機，然而我猜得着的：有些犯罪手段的惡劣對於敵人是太得意的，而把惡劣手段教給敵人，

(12) 區爾滕案件大概出在一九三一年初，似乎中國報也曾經載過，現在只記得有過這麼一件案子：一個人專門引誘青年女子結婚，結婚之後不久就把她們謀殺，他總共殺死十一個女人，然後才被破案。高爾基在這裏所說的，不知道是否就是這件案子。

那就未免太天真了。順便的說：如果我是德國的公民，我是要反對公開審判那個區爾滕的，因為階級社會製造了，而且還在製造着很多很多的淫虐專家，我就不知道有什麼理由，可以辯護公開宣傳淫虐主義而提高罪犯的技術程度的必要。再則，我還要請教請教：爲什麼大學教授 S. F. 柏拉圖諾夫，那樣一個帝制主義者，被捕了，歐洲的智識份子就出來擁護“個人自由”，然而如果這個個人是共產主義者，你們就漠不相關了。

如果你們願意知道俄國僑民凶惡到什麼程度，可以讀一讀爲着反對蘇聯民衆而籌款的募捐宣言，這宣言印在巴黎的僑民帝制黨的機關報“復生”上面。

領導這個極下流的把戲的，是“大主教大人安東尼，俄國國外正教教會西諾德教區主席”。看罷，這就是這個狂妄傢伙的原文：

“我用上帝所給我的極力，讚美每一個反對紅魔政權的武器，凡是在暴動隊裏或是單獨復仇的個人，爲着這個俄國事業和基督事業而喪身的人，我都赦免他們的罪孽。首先，我讚美‘俄國真理全民兄弟會’的一切武器和戰鬥，這兄弟會，用言論和行動，爲着上帝和俄國，實行着堅決的反對紅魔的鬥爭，已經不少年了。上帝的仁慈要降給每一個加入這個兄弟會或者幫助兄弟會的人，

大主教安東尼。”

很明顯的，這個大主教，基督教會的首領，是在讚美着對於民衆自由的壓迫和恐怖行動。你們難道不覺得，這樣的宣言，教會裏的

人對於屠殺的這種讚美，——那種教會中人顯然是兇惡得變成了白癡了，——在“文化國家”的京城裏是不大合式嗎？你們難道不以為你們應當對這位“大人”叫一聲，“噓”，“滾蛋！”嗎？這個俄國神甫的野蠻行爲，不但是俄國僑民兇惡化的徵象，而且是歐洲智識主義者對於社會道德和社會衛生問題的極端可恥的冷淡態度的徵象，是不是？而你們還要說“東方的野蠻”！

你們相信俄國僑民的報告。這樣。自然，這是你們“自己的事情”，然而我懷疑這是你們的權利。我懷疑，因為你們明顯的不理會對方的——工農政權方面的——報告。蘇維埃的報紙不遮蓋現實的消極現象，蘇維埃報紙是建立在極嚴格的自我批評的原則之上的，牠們沒有什麼垃圾是怕“拿出木屋”去的(13)。蘇維埃報紙是在幾百千萬羣衆之中工作着，這還是些不大識字的人，也不能夠怪他們不大識字；然而正直的人應當記着，不大識字的人是很容易做錯誤的。此外，還要知道，僑民報紙所靠牠生活和安慰的那些謠言和誹謗，大多數還是根據蘇維埃的自我批評的事實而製造出來的。

我個人在莫斯科，在列寧格拉的報紙上和集會上，對於自我批評的過火曾經提出過抗議。我知道國外的僑民怎樣貪心的，怎樣熱烈的抓着一切，只要可以稍微滿足一下他們反對蘇聯工農的那種病態的惡毒心思。不久以前，我在蘇維埃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這是

(13) 俄國俗話：“垃圾不要拿出木屋去”——等於中國文言成語“家醜不可外揚”。

關於白菜謔(14)的書的，因為這本書出版的時候，被一個老的，可是不緻細的，不大通的文學家弄壞了。於是乎僑民報紙“槽”報的編輯，約瑟夫·赫森，很蠢的，兇惡得可笑的老頭子，立刻就發表了一篇社論，滑稽的高興着，說是：“甚至於高爾基都批評蘇維埃政權了！”他很知道我向來不客氣的要當面說真話，只要有人工作得不緻細，不忠實，總之是不好。然而他不能夠不添上許多謠言，像任何一個僑民“政治家”一樣。

有一種特別的“真實”，這種“真實”只能夠做厭世主義者的精神上的食糧，做懷疑主義者的精神上的食糧，他們的懷疑是由於愚蠢，再則，就做冷淡的人的精神上的食糧，為的要辯護自己的冷淡。這是陳舊的，腐爛的，喘氣的“真實”，這是給豬喫的碗腳。這種真實，在蘇聯裏面正在被新文化的建設者的先進隊伍克服着，消滅着。我看得很清楚，我很知道這種真實妨礙着正直的人的工作。然而我反對用這種真實去餵養，去安慰那些很公平地被歷史消滅了的人。

你們問：“在工農之中有沒有不滿意的人，引起他們的不滿意的是什麼？”不滿意的人自然是有的；如果十三年的工作的結果，就已經使得一萬萬六千萬人在一切需要和願望方面都完完全全滿足了，那才是非常之奇特的事情。不滿意的原因，正在於十三年的工作，政

(14) 大概是 Alfred Edmund Brehm (1829--1884), 德國人，主要的著作是“Illustriertes Thierleben”。

權機關還不能夠滿足勞動民衆的迅速生長的文化需要。不夠的多得很，也就有不少人咕嚕着，抱怨着。這些抱怨可以說是可笑的，因為這是太早了，太不加考慮了，然而我不說這些抱怨是可笑的，因為這些抱怨裏面很肯定的包含着對於政府力量的確信，以為政府能夠滿足國內的一切需要。自然，不滿意的，甚至於積極反對着蘇維埃政權的工作的，還有一部分富裕的農民，他們以為革命應當使他們變成大地主，而把貧民交給他們支配，放在他們的掌握裏面。自然，這一部分的農民反對集體化，贊成個人經濟，雇傭勞動等等，而這些都不可避免地要引導到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復活的。然而這部分農民的把戲已經失敗了，他們的抵抗集體經濟是無希望的，不過由於惰性罷了。

工農羣衆的最積極的隊伍是不抱怨的，他們工作着。他們很知道，政權是他們自己，他們所缺少的，所需要的一切，只能夠靠他們自己的精力去取得滿足。正是這種對於自己能力和權力的認識，引起了那些社會主義競賽，衝鋒隊運動之類的現象，以及其他勞動與奮，勞動的英勇主義的無可爭論的徵象。這種認識的力量，使得許多企業裏的五年計畫在兩年半之內就完成了。

工人懂得最主要的，是他應當明白政權是在他們手裏。在資產階級的國家裏面，法律是在上層，在國會裏製造出來的，而且是為着鞏固指揮階級的政權而製造的。蘇聯的立法，卻是產生在下層機關

的，在鄉村蘇維埃裏，在工廠作坊委員會裏；考察一下任何一個法令的進程，就很容易懂得每一個法令的目的——不但是滿足勞動羣衆的真正需要，而且是他們文化程度增高的明白的證據。

蘇聯的全體工農羣衆逐漸的開始了解，他們的物質生活的豐富和文化發展的過程，被歐美資本家故意的，敵視的阻礙着。這種了解，自然很可以幫助他們政治上的自我認識和對於自己力量的認識的增長。

如果歐美的智識份子不聽那些說鬼話的叛徒，而認真的，正直的想一想蘇聯裏面現在所開展着的過程的歷史意義，那末，他們就可以懂得這個過程的意義——是一萬萬六千萬民衆在取得全人類文化的無可爭論的價值；他們也就可以懂得，這些民衆不但是在爲着自己工作，而且是在爲着全人類工作，是在表現給全人類看：理智地組織起來了的生活意志能夠創造出怎樣的奇蹟。

說到臨了，必須問一問：歐美的智識主義者要不要新的全世界的屠殺，這種屠殺是要減少他們的數目而使得他們更加無力，更加野蠻化的？蘇聯的工農羣衆不要戰爭，他們要建設‘平等的人’的國家。然而如果有人來進攻蘇聯的工農羣衆，那末，他們一定全體起來抵抗，像一個整個兒的集體，他們一定會勝利，因為歷史也在爲着他們工作呢。

這篇文章最初發表在蘇聯“新聞”報的第 138 (4345) 和 139 (4346) 號，1931 年五月二十一和二十二日，並且登載在同日的“真實”報 (“Pravda”)。作者自己寫明 “Sorrento (意大利)，1931 年，四月六日。”

歷史意義的決議的週年紀念

最近有人告訴我，說在意大利的一個城市裏，有二百個中學畢業的青年去投考大學，而結果，只有四個人考取。偶然的，我知道了在那些不准再受教育的青年之中，有好幾個是很有才能的，其中有一個是俄國人，——他“落選”的原因是拉丁文不好，雖然他在中學的時候，教員一直說他是“拉丁之王”，而且在其他功課方面也都是第一名的學生，向來把他作為其他學生的模範，每次升班都是免考的。對於這種要想受到高等教育的青年，為什麼這樣嚴厲的“挑剔”呢？是教育原則上的嚴格主義？其實，卻有理由可以設想這裏隱藏着什麼別的原因：那就是恐怕智識階層的生產過剩。資本主義的國家沒有地方消納他們。

正因為這個原故，在一年以前德國幾個大報發表了好些論文，很雄辯的勸告青年不要去進大學，因為德國的有教育的人正在嫌多，他們都沒有事情可做，資本家的國家認為增加他們的數量是有害的。關於這種智識份子的“有害的多餘”，我們還可以看美國的“額角低的人”——就是庸人，中等資產階級，——反對“額角高的人”，就是智識份子的鬥爭，這種鬥爭表現着那種中世紀式的野蠻現象，例如著名

的“猴子案件”，在有些州裏，還在禁止學校裏教授達爾文主義。更確定的表現這種現象的，就是“法西斯主義”，用一切力量來反對工人階級，鎮壓一切的文化努力，也就是要阻礙他們的智識上的精力的發展。

資本主義恐怕那種智識上的精力，牠所已經不能夠消化而為着自己的利益去利用的，會移轉到敵視牠的工人階級方面去，會同樣“出於良心”的替他們的偉大目的服務，像智識份子替資本主義國家的鐵籠子的建築服務一樣。糾纏在自己的羅網裏，資本主義成了很畸形的守舊主義者，牠的一切努力越來越窮困的只限於保持牠的雖然還是指揮的，可是已經動搖的地位。牠已經不再需要創造者的智識份子，發明家，如果這個智識份子不能夠發明新式的大砲和機關鎗，毒瓦斯，以及將來反對無產階級的戰爭所必需的一切，因為只要是戰爭，不管是那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所開始的，不可避免地都要屠殺大批的無產者。各國的無產者應當堅決的知道：他們將要被人家強迫着拿起武器來自相殘殺，一切資本家的戰爭，尤其是他們反對蘇聯的戰爭，並不是什麼別的，而只是他們要想，即使暫時的，也要鞏固自己對於工人的政權的企圖。對於資本主義，只要有那些智識份子就夠了，——那種智識份子是在證明着一切現存的都不能夠改變成別種樣子，說資本主義是文化的源泉，因此，也就是人類的恩人，說工人的生活和命運並不在資本的掌握裏，而是在上帝的掌握裏，說女人首先是母親，是雌性，比較男人起來是低等的生物。資本主義所需要

的智識份子，只是馴服的奴才；只是毫不抱怨的執行那個階級的命令的人，那階級是多多少少給他些喫得飽的麵包的。對於資本主義，無產者的智識份子，是危險的，越有天才就越危險。可惜，無產者的智識份子，還不大懂得自己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的作用，還不看見走到那把他當做同志那麼歡迎的地方去的道路。

蘇聯的工人階級和農民極端的需要智識的精力。他爲着執行自己的偉大的歷史任務，需要無數的這種精力。一年以前，正在德國報紙勸告青年不要進大學的時候，蘇聯黨的第十六次大會和中央委員會，通過了實現普及初等教育的決議。現在，我引出平民教育委員長 A. S. 布白諾夫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對黨的中央和總書記 V. I. 史太林的報告：

“爲着實行普及教育，已經準備了並且派出了六萬新的教員，主要是派到農村區域去的。

“羣衆學校的教員，非常之積極的參加了普及教育的實行。他們之中，成千成萬的人表現了創造的自動力和鉅大的精力，爲得實現黨和政府的決議，克服那些社會主義的開展的進攻道路上的階級敵人。

“兒童的普及義務教育的實行計畫，在中央委員會 1930 年六月二十五日決議的週年紀念的時候，已經實現了而且超過了預定計畫。蘇俄（自治共和國除外）初等學校的學生總數已經達到 38,709,937 人——等於平民教育委員會的預定計畫的一百分之 105.7。單是初級學校學生的增加，比較 1929—30 年，就增多了百分之 28.4。各個自治共和國的初級學校學

生的總數達到了 1,506,013 人，——等於預定計畫的百分之 101.8。

“如果前一個教育年度 1929—30 年，學校裏平均容納了學校年齡的兒童總數的百分之 71，——在農村區域這個百分數降到百分之 63.2，——那末，本年度，蘇俄（自治共和國除外）學校所容納的學校年齡的兒童已經達到了百分之 97.1，而自治共和國——百分之 87.9。

從十一歲到十七歲的兒童，今年受着教育的已經有 1,392,146 人，去年只有 90000 人。蘇俄（自治共和國除外）招收新生的名額有 45,335 人，或是預定計畫的百分之 131.1；而各自治共和國的招收新生的預定計畫被超過了百分之 21。”

再則，烏克蘭平民教育委員長 N. 史克萊普尼克 同志的報告：

“在蘇聯共產（布爾塞維克）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實現普及的義務的初等教育”的決議的週年紀念的時候，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平民教育委員會向蘇聯共產（布爾塞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和烏克蘭共產（布爾塞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報告：——黨關於實現普及的義務教育的指令，在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疆域以內，一般的已經實行了：八歲到十歲的兒童，已經加入初等學校的有了百分之 98.2，（去年只有百分之 76.2），其中在城市裏有百分之 99.8，在東巴斯——百分之 99.4，在少數民族區域——百分之 95.2；在七年制學校的第二等——四年畢業的學生有百分之 76，（去年只有百分之 55.5），其中：城市裏——百分之 93.9，東巴斯——百分之 93.4，整區集體化的區域裏——百分之 72。十一歲到十五歲的兒童受着教育的有百分之 85。

“保證了教育兒童都用本國話，而少數民族兒童的學校網也擴大得很多了。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內的八歲到十歲的俄國兒童，受着教育的有百分之 93，猶太兒童有百分之 99.3，德國兒童有百分之 97.4，波蘭兒童有百分之 96.9，保加利亞兒童有百分之 96.3 希臘兒童有百分之 96。

“我們在開辦學校方面有了空前的廣大規模，同時，在學校工藝化的改造事業上，也有了很大的成績。百分之75的七年制學校已經鑄定的附屬了企業，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而改組成了工廠七年制學校和共產青年學校。”

這些報告用不着解釋了。我覺得向讀者提起這些報告來說，倒是應該的。這些報告堅決的着重的，再指出一次蘇聯的國家制度和資本主義的國家制度之間的不同。同時，這也說明着，除開在工業上武裝我們國家之外，肉類，牛油——你們讀者所不夠的，——是用到什麼地方去的。1931年七月二十五日的“伊茲維斯啓亞”報上說：

“蘇聯的工人區域裏，從今年起，普及教育要達到七年的制度。在1931—32年度的新學年，實行一切兒童的普及的七年教育的問題，將要是文化建設的中心任務之一。七年制學校的普及教育的實行，工廠學徒制度改成七年教育的堅定辦法，——這是我們在實行我們黨關於‘一切兒童和十七歲以前的青年的普及工藝教育’的綱領的道路上，做了一個左右全局的步驟。”

資本主義不需要智識的精力——牠不能夠消化這些精力，不能夠利用這種豐富的精力的全部。然而此外，資本主義還在害怕理智，因為牠開始模糊的懂得：牠的存在在歷史上已經是不需要的了，不合理的了。阻礙着自己的青年要求高等智識教育的企圖，資本主義彷彿是在剝奪青年發展自己的理智到辯護資本政權所必需的範圍以外去的權利。這是下流的，然而是有先見之明的。失業的智識

份子——是無產者，他在爲着生活的鬥爭裏，應當和無產階級攜手。他越是聰明，也就越危險。

蘇維埃政權在智識上武裝全蘇聯幾千百萬青年的道路上，實現了極偉大的革命必要的步驟。“七年制學校爲一切人”——這是實行全體青年在發展理智的權利上的平等化。七年制教育的實現，這是造成向着最高目的前進的條件之一，這種最高目的，資本家的代表說是“社會的烏託邦”，幻想，空想，然而這是向着人類共同生活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方式前進，一切都要是社會上合理的，誰也用不着強迫，因此，作爲強迫組織的國家也要完全消滅。“七年制學校爲一切人”，這是有極深刻的歷史意義的事業。

自然，我們不能夠停止在“七年制”上。我們國家的一萬萬六千萬人民，需要幾十萬科學，技術，藝術的高等教育的工作人員。我們的確有許多東西要學習，我們只不過開始知道自已的國家，開發牠的原料的富源，研究牠們。資本主義國家的土地已經掘空了，研究過了，用盡了。我們的富源——卻是資本家嫉妒我們的原因，我們的國家制度——是他們憎恨我們的原因，這是每一個兒童團員都知道的。他們，資本家，要想把我們的國家變做自己的添補牛奶的牛，要想從蘇聯工人的血裏面擠出金子來。我們這裏，每一個勞動的盧布，都用來建設工廠和學校，用來解放農民於他所習慣的苦役似的工作之下，用來消滅鄉村和城市之間的區別；而資本家，掠奪自己的工

人和農民，正在武裝着來反對我們。資本主義國家的軍費畸形的增加着。看罷，這是這種費用增加的數目字，這些費用都是要用來重新屠殺幾千百萬工人民衆的，都是要用來毀壞城市，破壞經濟的：

軍費支出（以百萬盧布爲單位）

	1914年	1923年	1930—31年
<u>法國</u>	280	258	457
<u>英國</u>	385.3	520	537
<u>美國</u>	268.5	680.8	817
<u>日本</u>	197.2	234.5	234.4

從這些數目字裏只能夠得出一個結論：資本主義，這是野獸的組織，這些野獸公開的，無恥的在準備着新的血腥的罪惡，來反對各國的無產階級，因爲——已經說過了——一切戰爭都是反對勞動民衆的戰爭。

資本家敢不敢實行這個新的戰爭呢？沒有疑問的，他們已經決定了要實行這個戰爭，他們所想的只是這個戰爭，不斷的在武裝着，而虛偽的說着什麼解除武裝。他們能不能夠組織這個對於幾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的新的屠殺呢？能夠回答這個問題的，只有歐美的無產階級，兵營裏，工廠裏，田地裏的無產階級。早就是決定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了，這個回答簡單而明瞭——就是共產主義政黨所勸告全世界勞動民衆的。各國的無產者應當明白，他們爲着資本家做

工，其實是在爲着自殺做工。他們應當明白：唯一可以允許的，甚至於在歷史上是必要的戰爭，——只有全地球的工人階級反對全地球的資本家的戰爭，這一班少數的資本家，是在把勞動者的世界引導到退化和滅亡的道路上去。他們應當明白，蘇聯的工人階級，是自己國家的全權的主人，正在向他們指出勞動人類的復生的道路。

資本主義的世界正在深坑的邊沿上，而無產階級的歷史責任——就是把這個活完了自己的日期而在腐爛着的世界，推到深坑裏去。

這篇文章最初發表在蘇聯“新聞”（伊茲維斯啓亞）報上，1931年八月十四日；同時登載在“真實”（普拉夫達）報上。

高爾基論文拾補

關於真實的教育

一九三三年六月，蘇聯的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完成。這是一個極大的工程：從沃訥慈湖起到白海邊爲止，總共有二百二十七公里，沿路建築了許多鉅大的水利工程：十九座“水閘”；十五座陸岸；十二處“落水坡”；四十九處“水壩”；三十三條小運河。白海運河的完成使蘇聯北部的物產：森林，漁業，礦產等等，立刻可以開發，立刻可以從北部轉運到列寧城區域。而這一個工程是很艱難的，中間大都是高山。岩石，要打山洞，要築水門汀的陸岸，要發明好些水利工程上的新方法；所有這些工程在二十個月之間完全完成了。而且承辦這次工程的，是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勞動營”——就是許多刑事犯，反革命犯的勞動實習營。白海運河建築委員會能夠在幾個月之內教育這些罪犯，使他們覺得爲着新生活的建設勞動是他們的唯一出路；他們之中，有反革命的工程師，有賭徒，有流氓，而在白海運河完成的時候，他們有許多得到了紅旗勳章，列寧勳章，其中 12,484 人完全改罪，59,510 人減刑，而 500 人取銷以前的判決。高爾基這篇論文就是爲着這件事做的。譯者誌。

現在，我們先引一篇“職業流氓”加洛茨京的文章，作爲參攷：

幸而沒有逃走

“人家給我說，要我到卡列里亞去開什麼運河，我立刻就決定了：——逃走！”

逃走是我的專門學問。我是時常從勞動營，預審處，監獄裏逃走的。

逃出來了，把真姓名隱藏起來，搶掠一陣，再被捕吧。於是乎再逃走，又換一次新的姓名。這是做慣了的事情！

因此，很高興的走吧。你們送我去吧，我想，我可反正一樣是要逃走的！

走到了。看了看。從這里逃走倒不是容易的。路遠得很！

我決定等幾天再逃。而做工，自然沒有想做。我來搬灰桶？！沒有這麼回事！

立刻就把我“放到”RUR（嚴密管理連）裏去了。唔，RUR就RUR，我反正是一樣！甚至於更好些：這里各人喫各人的！……

有一次，我們的教育主任魏託施京到RUR裏來了。他一來就說開了，勸我們組織一個“集體”，自己申明願意做突擊隊。自然，大家立刻就笑了他，罵了他。罵得來，沒有什麼再厲害的話了！要是別人，也許立刻就逃走了，他可不走，儘在說着：

——不願意嗎？——他說——不願意自己組織“集體”，也好。那末，你們加入別的“集體”吧。

倒像不是一樣的！

——突擊隊員，這樣也有，那樣也有，——魏託施京接着說——他們受着優待，加工錢。飯食也好些，還受人敬重……

我聽着，心上想：他一定在撒謊。想來誘惑我們，叫我們去做工罷了。後來，我忽然想了想：唔，我去試試看！看別的營裏是個什麼生活。並非大家都在RUR裏坐着。

我走到教育主任跟前，說：

——好吧，把我的名字寫在“集體”名單裏。不過，你瞧着，你要是撒謊……

加入了集體。大家那麼問我，試我，蓋我。只能夠答應他們一塊兒做工吧。

於是做起工來。給了我一套新的制服。飯食再好也沒有！我就很很的賺工錢了，給了我第一名的口糧。我做到了百分之二百！

自己也說不出來：在這“集體”裏我變了個什麼樣子。似乎換了個人！起勁得什麼都忘記了，儘要做，儘要開運河。那次徵求補充短工的猛進隊（在分水小運河那邊）我就自己去報了名。回來，得了個突擊隊的徽章。我完全同‘過去’割斷了關係：我很驕傲了這個徽章，現在還是驕傲着，無論如何也不離開牠的了。而這徽章是要人永久做突擊隊員的！

我現在是個自由的公民。我很快活：幸而那時候沒有逃走。因為在這里，在這白海建築工程的地方，我找着了生活裏的立足點！

提前釋放的 P. A. 加洛英京。”

*

我們這時代，資產階級的，所謂“人道主義”——也就是仁愛主義文化的虛偽，完完全全，無可爭論的，極無恥的暴露了。社會世界的一切現象，都是人的生活行動所造成的，這種生活行動的力量也就在暴露着一些現象的反人道的意義，那是人道主義派的花言巧語和所謂“法律”所隱蔽着的。在我們這時代，只有白癡和“拿筆桿的騙子”才會說：仁愛同自私自利——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和“靈魂”——可以並存。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實際上差不多完全只表現於造醫院——這算是人的機體的修理工場。大家知道的，越是寶貴的當心着材料，那末，這材料也就越發不會破毀，越發有用處。對於人，這個剝削的材料，這個勞動力，那自私自利的資產階級卻總是那麼白痴式的，絕不可惜的態度，而且反對着他們自己的規律——很不

“經濟”的。醫院並沒有表示，也不會表示：統治階級關心着保護勞動民衆的健康，要想造成這樣的條件，可以預防勞動民衆的疾病，預防精力的浪費和早期的死亡。醫治破毀了的人的支出，資產階級可以用製造無數的醫藥材料，器械，丸散等等的收入來抵消，而且還可以賺一百倍的錢。疾病對於商人是發財的法門。

對於掃除文盲，消滅“民衆”的愚昧，資產階級也算是關心的，但是，牠僅只要製造些識字的奴隸和資產階級統治的擁護者。自然，牠一定會再減少“牠所耗費”的教育文化經費，如果技術上可以用鋼鐵製造奴隸，警察，各種各式的小職員。之後，牠大概還要叫自己的技術家，用洋鐵皮去製造宗教哲學的神甫。如果在這樣的機器人裏面，放進幾張銀行家和尊敬的軍事工業家演唱的留聲片子，——那末，這比活的神甫要便宜得多：牠不會要求什麼，而且禁用。繼續發展着這種便宜的事情，還可以用橡樹或是蔴皮做些議員出來，叫他們坐在國會裏，要他們說什麼就會說什麼，而用不着喫飯。於是那些不安份的小人物，像工人和農民之類，可以大大的減少，也許——因為實在無用——簡直用一種什麼人道的方法，把他們完全消燬。

上面所說的，聽起來似乎是一種悲慘的幻想，假使我們不知道製造鋼鐵奴隸—robot—的企圖已經開始了，而且有幾次的試驗很有成績；不久以前歐洲的報紙上說，紐約公演了鋼鐵警察的試驗，而在一個什麼地方，想出了，並且製造了一個機器僕役，用電氣做原動力的，

甚至於也有點喜歡偷東西的脾氣。

一切都可能。資產階級的世界不但虛偽，而且心理上是病態的。他的報紙——是謊騙，謠言，醜惡的黑幕和淫虐症的故事的來源，——時常敘述着超越一切悲慘幻想的事情。例如，有一家報紙這樣記載着：

“美國的瘋人的數量，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多。

這個數目還在不斷的增加，政府方面焦慮着克服這種民族危險的鬥爭。

有一個著名的心理病學家計算了：如果心理病的發展照現在這種速度繼續下去，那末，過了七十五年，美國全體人民的一半都要坐在瘋人院裏，而其餘的一半應當來養活他們。這悲慘的預言即使有點兒誇大，那末，至少，最近十年來心理病增多的數目字，很明顯的指示着驚人的現狀。

在十八州裏，從 1921 年到 1931 年，心理病者增加了兩倍。

1931 年，紐約支出了 47,000,000 美金，爲着養活 73,000 瘋人；比較起 1921 年來，這是增加了 350%。

在馬薩諸塞州，稅收的五分之一是用來養活瘋子的。”

越來越多的——越來越平淡無奇的——記載着自殺的增多，尤其是德國，那邊的熟練的智識份子真正的沒有出路；自殺者之中，有大學教授，律師，審判官，戲劇家，醫生，——這些人，都是資產階級化費了很多的經費栽培出來的。從我的觀點上來看，自殺是很合理的行爲，這是個性的自我審判，他認識了自己的行動或是不行動的罪惡。在德國的人，自殺是因爲行動已經不可能的了，不行動就要窮困，屈辱，餓死。

暴露資產階級世界的病態的事實，簡直數不清，同時，越來越明顯的表演着資產階級思想的無力，全世界商人的智識能力的窮乏。資產階級的生活——是一條無意義的罪惡的鏈條；最大的罪惡在前一世紀的三十年，四十八年，七十一年，做過了；而在這一世紀，商人們也已經做了一些“事業”；正在籌備着的全世界大屠殺，應當使得1914—18年的屠殺黯然無色。

從波羅的海岸到太平洋，從北冰洋到後高加索和帕米爾山麓，卻在幹着偉大的，絕妙的，全世界所需要的事業，這就是用集體勞動的真實來教育人。我再請讀者注意白海—波羅的海運河的建設，這又是一件事實，極明顯的證明着我們的教育制度的成功。蘇聯的敵人說，社會罪犯的勞動是強迫的。這自然完全是說謊，這是階級仇恨的盲目的謊騙，這些人必須這樣或是那樣的踐踏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因為這個國家使得他們恐懼。再則，這就是資本主義奴才的冷血的造謠誣蔑，爲着一塊麵包，他們就來造謠，胡說。這些奴才很知道：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裏，被判決的，監獄裏的囚犯都必須要做強迫的勞動，而且也是那麼不人道的——像十月之前沙皇的俄國所執行的苦役一樣，引起着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的廉價的，習慣的，偽善的憤慨。這些奴才並不愚蠢到這種地步，以致於不懂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對待“罪犯”的態度的根本不同。資產階級認爲自己所製

造出來的破壞法律者，都是無可救藥的，牠堅決的永久的把罪犯從自己的社會裏趕出去，而有些，像在美國，簡直因此專門化起來。資產階級的懲罰就是復仇。

對於無產階級的審判廳，罪犯是資產階級的產物，而且，大多數的工人階級的仇敵，是因為他們愚蠢，誤解。無產階級的獨裁者，只在這些敵人的階級本能表現得特別惡劣和反人道，只在他們的確是“人樣的禽獸”的時候，才消滅極少數無可救藥的；而同時，無產階級獨裁者，很有成效的重新教育着許多社會危險份子，改造他們的性格，表現着，發展着好些對於社會有價值的才能。在這十五年以來，我們“政治保衛局”的移殖地和公社裏，教育出來了幾千高等的熟練工人，大概，農學專家，醫生，工程師，技術家就不止一百，這都是以前的流浪兒童和“法律破壞者”。在資產階級的國家裏，這種事實是不可能的，恰好相反，那裏爲着小小的——比較起大資產階級的行動來，這的確是小小的——犯法，而使得像著名的文學家 O. 亨利 那樣有才能的人，也埋沒在監獄裏。很可能的，如果沙皇政府不殺掉革命家尼古拉·啓巴爾赤支，那也許俄國比歐洲早發明飛機二十年呢。

在白波運河的建設裏，好幾萬各種各樣的社會危險份子，敵視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人，參加了工作。這許多人之中，大半是盜賊，“富農”——生了根的私有主義者，農民羣衆的剝削者。這裏，值得提起一下：所謂富農，就是那些“喫公社者”，辣朱華耶夫們，郭魯

帕耶夫們，以前的自由主義，平民主義，民權主義的出版界和文學界，那麼鮮明的，那麼能幹的，帶着那樣的“公民的憤慨”，描寫了的。而現在，“前任的”民權主義者，僑居在國外，卻儘在吵鬧着，叫喊着——像失掉了主人的狗似的——哀悼着這些富農和“喫公社者”的命運，其實，這就是他們向革列伯·烏斯彭斯基，薩勒特柯夫—史赤德林，以及其他極忠實的人生教師，學習着憎惡，而沒有學會的。國外的一切黨派的民權主義者吵鬧着，叫喊着，造謠，說謊，只不過因為他們沒有能夠同大大小小的一切種種“喫公社者”，一塊兒來參加對於工農羣衆的剝削。沒有能夠，也永久不會能夠的了，因為富農還會變成工作人員，而他們，這些僑民，很快就要死盡死絕了。

在白波運河的建設裏，怎樣發展了重新教育社會危險份子的過程，怎樣使他們變成對於社會有益的份子，用了怎樣的方法？對着這些各種各色的法律破壞者，害蟲，敵人的隊伍說了：必須開闢一條運河，聯絡白海和波羅的海。

你們應當造成二百二十七公里的一條水路，你們要在森林裏，池沼裏去做工，要轟炸岩石，改變過于峻急的河流，用“水閘”的方法，把水升高到一百零三公尺。要做泥土工程，要掘起二千萬立方公尺的泥土，要搬掉一千萬立方公尺的土地。我們需要在最短期間做完這個工作。你們可以得到很好的飲食，很好的衣服，鞋襪，住宅，你們將要有俱樂部和電影場，此外，政府暫時不能夠答應你們什麼了

你們的工作，可以證明你們應當得着什麼。

這些將來的戰勝自然界，組織自然界力量的戰士的隊伍是很複雜的，自然，他們的情緒也是很不一致的。在“政治保衛局”的勞動改正營裏，教授着文字和政治常識。人總是聰明的，蠢笨極難得是天生的“才能”，這時常是資產階級的階級強暴的結果。這幾萬人之中，找着了不少懂得要他們去做的工作的偉大的國家意義。體力上健康的人，慣於克服抵抗的，想要“表現一下自己”了。卡列里亞的瘋狂的河流和池沼，田地和森林，都堆滿了石塊，這都是流冰的“自發的工作”，——這裡，有的是鬥爭的對象。有些人，也就模糊的猜到了人同人鬥爭的無意識，這是資產階級式的日常生活條件硬套在頭上來的一種鬥爭；他們猜到了替資本主義做工的無意識，這總是在製造窮困的。這個隊伍裏，有判決了十年監禁的“害蟲”。其中有一個，年紀已經有六十歲了，當審問他的時候，他說：“如果外國的干涉者來了，我立刻就要幫助他們。”在過去，他做過許多困難的技術工作，得到了偉大的聲名和財產。他自己說：“我的生活好極了，就只沒有喝過鳥奶。”他被判決了十年，在營裏坐了兩年；而1933年春天他在自己的自傳裏寫了：‘在卡列里亞的森林裏，在技術人員的棚舍裏，我懂得了真正的工作是什麼……技術家是什麼，如果他後面有着工人羣衆，堅決的，充滿着精力的，知道自己努力的目的的……’

“我雖然老了，可是，還是不會發許多哲學議論，在野營裏，用勞

動來重新教育——這是非常之健全的，非常之美麗的思想。至於這思想的實際應用，那不用我來說，請我們這邊的兩千突擊隊員來說吧，他們都很早的提前釋放了。”

像他這樣的工程師還有好幾個，他們在工作之中表現了“極端的自我犧牲精神和精力”，其中有一個，隊長對他的批語是：“在工作之中積極的勤懇和堅決。社會工作方面也盡量的表現了自己。雖然是殘廢的（少一隻腳），卻到處去巡視，到處用政治上尖銳的有意義的演說和自己的工作的榜樣，提高當地野營裏的工作人員的熱忱和建議，使得他們超過原定的生產計畫，訓練着新的幹部。”

自然，這些勞動英雄都提前釋放了。然而在這之前，他們差不多有五百天儘在一堆幾萬個“社會危險份子”之中鑽來鑽去，而且那些人都知道這些工程師是“反字號裏的”。可是，雖然是些“反字號裏的”，工作卻非常認真。這種事實不會不引起那些人的奇怪，即使那是些很遲鈍的人，而奇怪就要引起“爲什麼這樣”的疑問。對於這個問題，那些用自己的行動引起這種疑問的人答覆了，而在這裏工作的，總共不過幾十個“可怕的赤克斯蒂”⁽¹⁾也答覆了。

富農怎麼工作的呢？例如波德林的第一區裏有一隊，三十二個富農。在五月下旬，他們的工作超過了一切紀錄——做到了生產計

(1) “赤克斯蒂”—— Tchekist, “非常委員”的意思，以前蘇聯的“政治保衛局”的名稱叫做“非常委員會”。

畫的百分之 256，他們的工作是搬運軟土。甚至於在換班的來了之後，這一隊還是不肯放手。弄得這區的區長要下命令調開他們。

“第一號命令的責任隊”大半是富農。他們在第六區裏做着岩石地面的工作。他們執行了一百分之 130—150 的計畫。爲了生產工作的高度紀錄，他們得着了獎賞，上了“紅版”。

這樣的生產隊有幾十隊。這同自然界的自發力量鬥爭的集體勞動，在野營的工作之中，怎樣影響了那些生根的私有主義者呢？富農向來自以爲是鄉村之中的最好的人物，是鄉下人之中的“貴族”，他不但會剝削別人的勞動，而且自己也是田地裏的很好的工作人員。他這個掠奪者，自己覺得比他所掠奪的人要聰明些，勇敢些。他慣於輕視那些流氓，懶鬼，他向來以爲：如果你窮，那末，可見你笨，你不好。而這裡，他這樣自尊自貴的驕傲的人，卻看見那些流氓，懶鬼，小偷以及一切種種亂七八糟的，無政府主義化的小百姓，居然會工作得比他還好。在他的眼前，以前的流氓，流浪人，法律破壞者——他這個私有主義者的憎惡所極端痛恨的人，居然成了熟練工人，隊長，勞動的組織員，而且有些已經在領導着他的工作，——這主要的是因爲他們比他這位“老板”，鄉下的土皇帝，更好的了解了勞動的技術。這不會不打擊着富農的“心靈”，這引起了他的好勝心，而使得他同他所輕視的，他所痛恨的人競賽起來。

這些人之中有好幾百拒絕工作，申明：“無論你們拿我們怎樣吧：

我們反正是工作的了！”他們從早到晚在棚舍裏的床上翻來倒去，弄得齷齪得不堪，甚至於掃一掃地也不肯。亂唱些歌曲，用自己杜撰的紙牌賭錢，互相的打架。有時候，他們煩悶得發瘋起來，就拆壞床坑，打碎玻璃。這樣的“暴動”之後，“可怕的赤克斯蒂”之中的什麼人自然要跑到他們那裏去。同志們警告他：“瞧着，小心些，他們會打死你的。”“不要緊”——他說，就爬進了這些兩脚黃蜂和牛虻的窠裏去了。他們迎着他辱罵，吹口哨，向他叫喊着：“不用來勸告，我們不做工！”

於是開始所謂“強迫”，——關於這“強迫”，整個資產階級，一切商人，爲首的是基督的羅馬天主教會的爵士和王公，宣傳着“愛人”，爲着要從人身上得到些“義捐”的，——他們都那麼兇狠的，那麼默謐的，大聲疾呼的叫喊着。而事實上，對於這些被階級社會所無政府化的人的“強迫”，不過是極簡單的使得他們認識一下真實——這是可怕的真實，他們這些人都是這個真實的犧牲。

——怎麼樣，孩子們，你們不肯做工呀？“反字號的”也在做工，那些比你們壞，比你們更有害的人，也在做工，而你們一定要喫白食，喫工人和農民，蘇維埃國家的主人的麵包，你們願意像老鼠，黃鼠狼似的做寄生蟲嗎？你們都很年輕，你們的生活遠大得很，用點心想想吧：爲什麼你們挑選了這條破壞法律，犯罪的道路？

他們之中，很少人想過“爲什麼”的問題。這裡，強迫他們研究

這個問題了。這問題很感動了一些人；同這樣的人單獨的談話，教育他們，使他們變成“真實”的宣傳者鼓動忠實的勞動。過不了多久，那些不怕最高的刑罰——死刑——的人，卻害怕自己的名字寫上“黑板”了。害怕“新冶報”上把他描寫成一隻“水淋鷄”了(2)

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的輿論，用着這種“強迫”方法，得到了怎樣的結果呢？不管是誰寫的小小的一兩篇文章，決不能夠完全的報告白波運河建築裏所做到的成績。這要寫一本書才行，現在這書已經在着手編輯。而我這篇文章的結論是：教育出來了大批的熟練工人的隊伍，懂得水利工程的技術的；這隊伍可以去做莫斯科—沃爾加運河，BAM，喀默森堤壩的工作，以及我們國家所需要的其他的鉅大工程。

從“罪犯世界”裏，吸引了造成了幾百個有才能的人，例如以前的一個女賊，現在成了很有才幹的彫刻家。

幾萬個以前的法律破壞者恢復了公民權，或是縮短了懲罰期間。

這充分美麗的，懇切的證明着：用真實來教育是多麼有益處，可以給多麼好的結果。

(2)——蘇聯每一個工廠，或是建築委員會，都有自己的小報，這“新冶報”就是白波運河建築委員會的機關報；這種小報上時常登載工作的成績，批評管理委員會和工作人員的缺點，討論工作改良的方法。再則，每一個工廠都有“紅板”和“黑板”，工作好的寫上“紅板”，壞的就寫上“黑板”。

譯 論 輯 存

哥 德 和 我 們

L. 卡美尼夫

哥德逝世的百年紀念正是蘇聯進行着偉大的建設的時候。這事情是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變革，是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完成，是被壓迫人類的幾千年的幻想的實現，是“從必要世界跳到自由世界”的真正實行。蘇維埃國家用那不屈不撓的意志的偉大的努力，用那歷史上從沒見過的速度，在敵人的兇惡的叫罵之中，自覺地有計畫地進行的事業，似乎同哥德所服務的世界沒有任何共同點。蘇維埃國家，難道是考察哥德的棺材，發掘哥德的文件，遊玩哥德的陳列館的時候嗎？不是哥德自己也說：“超過棺材前進罷！”

偉大改造的領導者，蘇聯的共產黨，在自己的最近一次會議上，哥德百年紀念的前幾個星期，決定了：“第二個五年計畫的基本政治任務，是要完全消滅資本主義的份子，一般地消滅階級，消滅那些產生階級區別和剝削的原因，克服經濟上和人的意識上的資本主義殘餘，把國內的全體勞動人民都變成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自覺的積極的建設者。”

哥德不但會不懂得這個決議的意義，甚至於會不懂得牠的字句——我們離得他已經有這樣遠了。可是，在這些字句裏面——這些形式很謙虛而內容上很偉大，實際上開闢着人類歷史的新時代的字句裏面，也有他這個思想家和藝術家的一滴勞動在內。不但如此，將來人類記憶之中的哥德的存在，也只限於他的勞動有多少是走進了這些字句的範圍。在這範圍之外，一切都只配塞進歷史的垃圾桶。

在歷史上所肯定的哥德的形象，是個沃林辟式(1)的人物，是生活的最寵愛最幸運的孩子，是自己運命的主人翁，達到了內心的外表的和諧，超越了人類思想和人類歷史的矛盾的。老頭子竟滿意這個形象，至少是沒有提出抗議的。然而這個形象——是說謊，而且是自私自利的說謊。這是市儈思想所製造出來的神話，爲的要證明在這個被矛盾所撕碎了的世界裏，的確有和諧的人和幸福的運命的可能。真實的卻是：哥德的運命——是一場沒有結局的悲劇。不然，他也不會寫出新時代的最偉大的悲劇——“浮士德”，也不會創造那偉大的否定者——美菲斯託費爾(2)的形象。不是枉然的，哥德關於自己的偉大作品的英雄——自然也是關於他自己——寫了：

(1) 沃林辟式的 (Olympian) ——天神式的，希臘的眾神住在沃林辟山上，所以天神也叫做“沃林辟”。

(2) 美菲斯託費爾 (Mephistopheles)。

唉，在我的胸中兩個心靈生存着，

永久互相的激視着……

而過了許多年，他在自己的“歌曲”集的導言裏，那一首標題很有趣的“導言的悲歎”裏，又重複的說：

這世界上是‘不調和’在統治着。

你難道會不自己和自己不調和嗎？

F. 恩格斯暗示了哥德生活裏的基本矛盾，他把哥德和黑格爾對比着說：“黑格爾(3)和哥德一樣，在自己的部門裏是個真正的宙士，沃林辟(4)，然而他們兩個人都沒有能夠完全擺脫德國市儈主義的精神。”

吳爾甫岡·哥德是法蘭克福(5)的富有的貴族的兒子，是韋馬的總長，是法國大革命的敵人，是好些反對法國大革命的小冊子的作者。在那封建壓迫的殘餘和資本主義的萌芽交錯着的世界裏，他歌頌着和諧，秩序，溫順，節制，法律和對於法律的服從。而我們的導師——最偉大的革命家，毫無寬恕的暴露着一切種種謊騙和一切可能的偶像和傀儡的——馬克斯和恩格斯，卻說他是“天才”，是“德國

(3) 黑格爾 (Hegel)。

(4) 宙士—沃林辟 (Zens-Olympic) ——“沃林辟”見注(1)，宙士是希臘神話裏的主神。這裏是說哥德在文學方面，黑格爾在哲學方面，都是第一等人物。

(5) 法蘭克福 (Frankfurt) ——地名，德國有兩個 Frankfurt，一個是在萊茵河上的，一個是在奧得河上的，這裏是說的第一個。

人之中的最偉大的”，“不馴服的，嘲笑和輕蔑世界的天才”，“真正偉大的”，“強有力的詩人”。

從資產階級的文藝學的觀點上來看，哥德的矛盾是無從解釋的。爲着要說明這種矛盾，資產階級的文藝學就製造了一種特別的理論，照這理論說起來，正是哥德同統治階級的妥協挽救了他。根據這種觀點，正是這妥協造成了哥德的最偉大的精神價值和不朽。這種理論的階級根源簡直用不着去暴露，只要用指頭指出來就夠了。其實，這種理論是無從證明的，同事實矛盾的。

應當直接的說：哥德遺產之中凡是妥協精神所造成的，歌頌妥協的，認爲妥協是政治的倫理的尺度，是“法律”的高位，是“完美”的範疇的——這一切都是哥德的醜醜襯衫，我們用不着，也決不來替他洗刷。這讓資產階級世界去幹罷，他們早已走到了這種地步——在自己的黎明時代的偉大人物之中只會看見和鑑賞他們的“背面”了。

哥德的偉大不在於他的歌頌妥協，而在於他忘記了這個束縛他的妥協，反對着妥協而戰鬥，衝破這個妥協。哥德的不可超越的偉大，正在於他的詩歌是他的階級的熱烈的青春時期的化身，在光輝的形式之中，鑄鑄着人的奔放的快樂，這樣的人，全副武裝着，反對那幾千年來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的中世紀所造成的偶像和傀儡對於人的身體和心靈的統治。

沒有疑問，老哥德是對的，他關於自己的最偉大的作品——悲劇

“浮士德”說：“這永久印下了人類精神發展的一個一定的時期，那時候人類所受的一切磨難使得他痛苦，他所不安的一切使得他激動，他被他所憎惡的束縛着，他被他的幻想興奮着。”

十八世紀革命危機所產生的幻想是很龐大的。實際上，這是一種剝削方式代替別種剝削的事情。然而戰鬥者所幻想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是想要使人脫離那些束縛他的身體和精神的一切桎梏而解放，是要真正的自由，要全般的友愛。反對着封建制度和牠的宗教——基督教所建立的各方面的奴隸制度，資產階級在個性主義的旗幟之下鬥爭，肯定人的自由的和幸福的生活的權利。青年的哥德就出來做這種個性主義的歌頌者。

哥德在他的悠久的幾十年的事業之中，他的全部創作的主要樞紐，正是個性的肯定和發展的思想。哥德採取個性表現的一切可能的形式，把個性放在各種各式的形勢之中，把牠同地上和天上的一切想要使人屈服的力量對立起來，他歌頌着個性的生活權利，愉快權利和幸福權利。

沃林登(6)的驕傲的巫師，
他們對於我的力量
想要享受什麼權利呢？
力量是我的，牠們的運用也得由我。
就是對於最高等的巫師。

(6) 沃林登 (Olympus) —— 希臘眾神會衆的山名。

我也是一步都不讓的。

.....

我——大家也是一樣——

要承認在自己之上的

雷神的權力嗎？ 不的！

哥德在非常之好的，美麗的詩句裏，宣布了後來費爾巴赫(7)所說明的：“我們的事情，不是那種受了閹割的，喪失了血肉的，抽象的東西，而是——整個的，行動的，各方面的，完美的，發展的人”。列寧在自己的哲學鈔本上，引用了這句話，並且寫上了：“這是先進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理想。” 哥德就在這個理想還有真正革命的意義的時候，在宣傳這個理想還帶着革命的性質的時候，歌頌了牠。這是一個性主義的理想，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個性主義，因為牠是先進的資產階級反對農奴制度的一切形式的鬥爭的旗幟，然而正因為這個原故——牠是革命的。

這個個性主義的歷史意義，也是費爾巴赫所發露的，他在自己的宗教講義上關於這個名詞寫了：“我用這個名詞來對抗神學，或是上帝的信仰……我對於這個字眼的了解，並非人與人之間的利己主義，……而是人對於神學的偽善，宗教的和投機的妄想，以及政治的專制所對他提出來的不自然的非人的要求，表示一種自我承認和自我肯定的態度……簡單些說，我對於利己主義的了解，也只是一種

(7) 費爾巴赫 (Fenerbach)

自我保存的本能。因為這種本能的力量，所以人不致於犧牲自己，犧牲自己的理智，自己的情感，自己的身體……去給那些精神上的驢子和羊子，政治上的豺狼和老虎，哲學上的蟋蟀和鴟梟。”

哥德所實行的戰爭，就是反對着這些中世紀的，一切種種奴隸制度的，文化上的貧乏和窮困的“老虎”和“鴟梟”的。他用自己的詩歌的事實，內容，形式，題材，去向牠們挑戰。他用自己的“詩的口號”負着人的情感和意識的力量去反對牠們：

我是人——我不知道什麼安靜……

做一個人就是要做一個戰士……

這裡，應當記起偉大的革命家赤爾訥塞夫斯基(8)。他認為“藝術異乎尋常地能夠把科學所得到的概念，傳播到廣大的羣衆裏去”。大家知道的，赤爾訥塞夫斯基認為科學是改變人類羣衆的生活條件的工具。這裡就應該說，哥德的詩的確“異乎尋常地能夠”幫助許多概念的傳播，這些概念贊助着對於中世紀的最後的勝利，貶斥着那些使得幾千百萬人的思想上精神上的奴隸制度合法化的情感和概念。有幾百個人同費爾巴赫同樣地思想，就有幾千個人同哥德同樣地感覺。固然，在十九世紀，讀着哥德的那幾千個人之中，大多數是沒有從這裡做出什麼實際的結論來的。然而關於這一點，以後再說……

(8) 赤爾訥塞夫斯基 (Tchernyshevsky)

那一時期的哥德的一切英雄：葛茨·封·白爾里亨庚(9)，普洛美修(10)，謨罕默德(11)，浮士德(12)——都是暴動者，都是社會的，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以及藝術的法律的破壞者。詩人自己，爲着要表現他們的反叛的心靈，他們的熱情的抗議，他們的尋找生活的新的意義，也就摧毀着貴族的和宮廷的詩歌的文學桎梏和“高尚的風格”，在下層平民之中，在民歌，傳說和故事之中，在市場的篷帳裏，去找題材和形式，復活了皮匠詩人漢斯·薩克斯(13)的節奏，在自己的劇本裏充滿了“普通人”的“粗俗的”語句，這正刺着那些聽慣了他之前的光滑的韻調的耳朵。——在這個時代，他所心愛的形式是那種抒情詩，或者戲劇的詩篇，着重在主要英雄的獨白的，這主要的英雄描寫着自己的志願以及他的反抗他前面的障礙的鬥爭。

關於那時候他所創造的詩的形象的世界，應該同馬克斯說培根(14)的唯物論一樣的說：在那世界裏，“物質用自己的‘詩的情感的’光彩向着整個的人微笑。” 這個光彩自然是一種活的抗議，反對那種禁慾主義的道德——反對那種逃避自然和消滅肉體的主義的，而基

(9) 葛茨·封·白爾里亨庚 (Goetz von Berlichingen)

(10) 普洛美修 (Prometheus)

(11) 謨罕默德 (Mahomet)

(12) 浮士德 (Faust)

(13) 漢斯·薩克斯 (Hans Sachs)

(14) 培根 (Bacon)

督教——統治階級的奴才——要羣衆來服從這種道德，他們自己卻不一定有服從的義務。對於哥德，自由的人的情感，是這些解放傾向的化身，不能夠給牠規定什麼章程的，牠也不承認自己之上還有什麼任何“超人的”標準的最高權利。所以恩格斯說：“哥德在放浪者的羅馬悲歌之中，的確是偉大的，是有天才的，”他有些異教精神的詩，而市僧的偽善主義卻認為這是放浪的詩歌。恩格斯自然認為這些詩不過是那種狂暴的傲慢的反映，那種傲慢一般的不願意保存任何一個公認的威權，任何一個幾千年農奴制度所合法化的傳統。

哥德，正在反抗這些傳統的抗議之中，是恩格斯所說的“不馴服的，嘲笑和輕蔑世界的天才。”“哥德——恩格斯接着說——是太廣大了，是太積極的天性，太血肉了，他不曾在塞勒⁽¹⁵⁾式的逃避到康德⁽¹⁶⁾理想裏去尋找窮乏的救星；他太銳利了，不會不看見這種逃避始終不過是用浮誇的窮乏來代替平凡的。”哥德與其要一切種種的浮誇，寧可去找別的道路：滲入活的現實的生活裏去，同着生活的一切矛盾，同着生活的挫折和高飛，歌頌着人的最高價值——自我犧牲和勇敢。

O, 威權的上帝們，
崇高的天上的上帝們！

(15) 塞勒 (Friedrich Schiller)

(16) 康德 (Kant)

我們的胸中只要保留
放逐生活的愉快，精神的勇敢，
——那時候，上帝們呵，
我們用不着你們的高天。

那時候的哥德的詩，如果沒有恐懼的去了解牠，不要那種對於許多世紀的奴隸制度所造成的思想上道德上的偶像的資產階級式的恭敬，那末，牠執行了後來費爾巴赫所說明的教訓，費爾巴赫對自己的聽講者說：我的目的，是要“把你們從上帝的朋友變成人的朋友，從信仰者變成思想者，從禱告者變成勞動者，從陰間生活的候補者變成地上生活的研究者，從基督教徒——照他們自己所承認的‘半獸半神’——變成人，變成整個的人。”人應當堅定的在這現實的地上立定腳根，而拋棄那種到上面的天上，到上帝的意志，到超人的道德裏去找着自己生活意義的想頭。

讓創造生活的人生活罷——
這就是我的學說！

哥德在自己的“飲宴歌”裏這樣唱着。

幹嗎我要知道那些在伊太裏的人呢！
幹嗎我要知道他們那里也有愛和憎，
在那些外人的世界那里
像這世界裏一樣，也有上和下呢！

哥德是並沒有停止在個性的暴動主義上的。然而他克服了個性的暴動主義，也並沒有陷落到思想的保守主義，沒有在預定的世界

的和諧面前低頭，他仍舊是一切神秘的敵人，是一切用別一個不可知的理想的本質世界的“浮誇的窮乏”來掩飾這一個現實的現象世界的矛盾的企圖的敵人。對於青年的哥德，個性的暴動主義是反對壓迫人的偶像的抗議的化身，而在這詩人的成熟時期，仍舊是這個抗議在他的“古典主義”裏找着了新的化身。

詩人在異教思想的古代所創造的彫刻的形象和規模裏，重新把自己的肯定生活的宇宙觀，去對抗否定生活的基督教；對於他，基督教的形象是個吸取活人的血液的僵屍。關於基督教文化的代替古代文化，哥德這樣的寫着。

這里，小羊子
不再做犧牲了。
然而人的犧牲却是數不清的！

過了許多年，七十歲的老哥德關於自己的詩的事業寫了：

做詩——是個傲慢的勞動。
罵我什麼呢？
你們這些不按袈裟的和尙，
在這里說些什麼鬼話呢？
我仍舊我——即使
我由於你們而死！
你們的無爲的虛偽的空話，
我是不能夠容忍的！
硬把牠們像鞋底似的
穿得稀爛的了。

在哥德，古典主義代替了他的青年時期的暴動主義，這並不是偶然的。像馬克斯所說的，羅培斯比爾(17)和聖·儒斯德(18)們，‘在羅馬共和國的古典主義的莊嚴傳說裏面，找到了理想和人造的形式……爲的要在偉大的歷史悲劇的高處維持自己的興奮’，哥德也是一樣的，他在古代藝術的古典主義的莊嚴形式裏，尋找着那種手段，爲的要超越中世紀的宇宙觀的二元論，那宇宙觀是建立在地和天，肉體和精神，奴隸和老爺的對立之上的。爲着肯定人在地上的權力，哥德認爲並沒有用“天堂的力量”的必要。“人，爲着一切地上的需要，自己有充分的武裝，——他寫，——只要他相信自己的情感。並且這樣去發展這些情感，使得這個信心有所根據。”這種歌頌人的能力，拋棄對於超人力量的希望，反對中世紀的宗教，道德，哲學的抗議——那些宗教，道德，哲學，用人所不知道的力量來把人變成奴隸，爲的是更厲害的使得他服從封建諸侯的現實力量，——所有這些抗議正反映着新的宇宙觀的進步方面，而幫助着這種宇宙觀的廣泛的傳播。

“資產階級在歷史上發生了高度的革命作用，”——共產黨宣言書上這樣說。這一個從各方面來解放人類的偉大文件還接着說：“資產階級，把以前所敬重的，圍繞着恐懼上帝的戰慄的一切行爲上

(17) 羅培斯比爾 (Robespierre) ——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左派領袖。

(18) 聖·儒斯德 (Saint-Just) ——羅培斯比爾派的健將。

的神聖的光輝，都吹散了。” 哥德在自己的最好的作品裏，尤其是他的青年時期的作品裏，用自己的光輝的詩句，表現着資產階級的歷史上的青年時期，現在是資產階級自己早就忘記的了。他傲慢的勇敢的去進攻那些神聖，在他那時候這些聖神還暗示着“恐懼上帝的戰慄”呢；而他，在自己的詩歌裏，留下了那種毀謗舊世界的神聖的痕跡，這對於升到歷史舞臺上來的階級是多麼親近，而對於已經鞏定了自己的政權的資產階級是多麼難受呵。

我用自由的呼吸——

在我胸中灌注着力量，在我血裏灌注着新鮮。

——哥德可以勇敢的這樣說到自己的詩歌。這些“新鮮的血”和“自由的呼吸”，直到現在還在他的詩歌裏活着，然而對於資產階級的腐爛的肺葉已經是致命的危險了。

自然，哥德詩歌的能夠實行這種歷史作用，全靠關於這些詩歌裏的英雄，可以應用詩人自己關於其中的一個所說的話：

運命所給他的心靈，

是往前飛躍而不受羈勒的。

可是，如果在哥德的詩歌裏，對抗着舊世界而出現的，是個性主義旗幟之下的人對於生活和幸福，對於“土地和自由”的權利的革命的肯定，那末，這並不是說，這種肯定就一般的爲着個性而否認了世界。不是的！這是否認着封建的奴隸制度世界，基督教的奴才主

義世界，精神上屈辱和蹂躪人格的世界，而幻想那新的世界，新的宇宙，和改造了的人類。哥德永久在研究着個別和全體，人和社會的問題，而在他的成熟時期，這是他的主要題材。

“浮士德”第一次印行的版本（1790年），就是用這樣的語句開頭的：

人類運命裏所遇到的一切，
都應當嘗試，都應當知道！
我在自己的精神上的視線裏，
擁抱這整個的高處，整個的深處：
這人類的一切幸福和一切痛苦，
什麼都要包羅在我自己的胸中。
推廣我的眼界到它的這大……

這種同人類運命一致的感覺，滲透了哥德詩歌的全部。當他年老的時候，他關於自己的歌曲說了：這些歌曲“高升到那樣的時代，那時候，豐富的青春的倔強，自己同宇宙合一了，要使得宇宙被自己所充塞，甚至於把牠的一切部分來重新改造。這個勇敢的熱情，在我們的生活裏，留下了純潔的堅固的痕迹。”

哥德的偉大的光榮，就在於這種“豐富的青春的倔強”，反映着人類歷史運命的深刻的危機，宣告着人類在革命的震動和聲響裏準備着翻過已經完結的一頁的，直到哥德的老年時期也沒有離開他的，而且繼續的存在着作為他的創作的衝動，不管他實際生活裏的一切

妥協，不管他在實行上的反革命的立場。正是這種戰鬥的“青春的倔強”使得他的創作有了“預言”的性質。你們不要覺得這個字眼奇怪，這是恩格斯說的，而且有深刻的歷史的真實性。

無產階級宇宙觀的基礎，是在各方面毫無寬恕的反對宗教哲學和唯心哲學的鬥爭裏所建立下來的。在這個鬥爭裏，對抗奴隸哲學的，是那種鬥爭的哲學，是肯定人類的哲學，是“牠（人類）的不可阻擋的進步，是牠對於個別的人的反理性的永久有保障的勝利，是牠的克服一切所謂超人，是牠的殘酷的然而順利的同自然界的鬥爭，一直到人和自然界的統一，以及新世界的自由獨立的創造，這新世界的基礎卻是純粹人性的……關係了。”恩格斯在這些字句裏，描寫了新的宇宙觀的一般的基礎，而接着就加上了一句：“所有這些，哥德都是有的，凡是眼睛睜開着的人，都可以看得見。哥德很不願意同‘上帝’有什麼關係：提起這個字眼他就要覺得不舒服。他只有在人性裏，覺得是自己的家，而這個人性，這個藝術的脫離宗教桎梏，正是哥德偉大的所在。在這方面，古代人和莎士比亞都不能夠同他比較。然而，這個完美的人性，這個在整個歷史意義裏的對於宗教二元論的克服，卻只有了解德國民族發展的另一方面——哲學——的人，方才能夠達到。哥德所只能夠直接地，就是在某種意義之內‘預言地’說出來的，在最新的德國哲學裏就發展了，證明了，’就是在那些古典時期德國哲學的活的血脈裏，這是發展了，證明了，而那些活

的血脈，經過了批判的改造，已經作為必要的成份而加入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礎。

恩格斯說，這可以在哥德自己的著作裏讀到，然而他加上了一句：只有“眼睛睜開着的人”。但是眼睛睜開着看這世界的，卻只有向前進取的階級。注定就要滅亡的階級，在牠的肉體的死滅來到之前，就要把眼睛閉起來不敢再看這世界的。現代的資產階級的眼睛是閉着的，牠不能夠讀到哥德的這種精神。可是，哥德的藝術創作和科學創作之中的這些“預言的”成份，領悟預覺到人類先鋒隊的宇宙感和宇宙觀的，正是他的不朽，他的幾百年生命的權利，同時，這也就使得他的創作在今天的鬥爭裏仍舊找得着自己的位置。

哥德的一般的世界觀之中，滲透了他的科學事業和藝術事業的這些“預言的”成份，首先就是他的關於宇宙的概念：他認為宇宙是統一的整個的，在矛盾之中運動着，用不着任何超自然的或是超人的力量來解釋。

我決定要冒險的跳到這世界裏去，
地上的悲哀和地上的歡樂的命運，我都要擔當起，
在暴風雨裏勇敢的扯起帆篷駛去，
有顛覆的當兒，也不會懦怯的喪氣，——

浮士德這樣說。然而在跳到生活和鬥爭裏去之前，他想要知道生活的一般公律。他對於他所叫來的“地的精神”的回答是：

在‘行動’的暴風雨裏，在‘存在’的浪潮上，

我上升，
我下降……
死和生——
是永久的海洋：
生活和運動——
在這永久的大空。

哥德的片段的散文裏，還有關於自然界的話：“牠永久在創造新的形式：以前所不曾有過的；凡是有過的永久不會再回來；一切是新的，同時又是舊的……牠裏面是永久的生活，形成和運動……牠永久在變動着，一忽兒也不會站住的，牠不知道靜止，牠詛咒着停滯。”

假使記起列寧“關於辯證法問題”的札記上的話：“自然科學所指示給我們的……客觀的自然界，就在牠的客觀的質量之中：個別的變成全體，偶然的變成必然，過渡，交錯，相反性的相互聯系；”那末，你就要有特別的感覺來讀哥德的：“‘活的統一’的基本性質——就是分裂，聯合，溶化在全體之中，停止在個體方面，轉變，分化，表現，像一切活的事物的本性，總在幾千種條件之下，出沒和消滅，鋼定和消散，停滯和活動，擴大和縮小……發生和滅亡，聯合和取消，生和死，愉快和痛苦——這一切都在相互影響之中流動着，這一切都在同等的意義之中，同等的程度之中動作着：因此，即使是最部分的現象，也永久作為全體的形象和類似而出現。”

這種樂生的宇宙觀，用不着任何超自然的靠山，沒有絲毫殘餘

的消滅着那些鐵籠子——就是玄學思想所用來封閉宇宙現象的鐵籠子，也就是一切上帝和一切種種奴隸制度的靠山；——這種宇宙觀使得哥德成爲進化主義，一般發展主義的擁護者，使得他天才地猜測到這種發展的動力是在於一切存在物之中所包含着的矛盾原則。“聯合的分離起來——他寫——分離的就聯合起來，這就是自然界的生·活……一切存在——是永久的分離和聯合，因此，人在考察這些龐大的相互關係的時候，也要一忽兒分離，一忽兒聯合……辯證法——是矛盾精神的發展，這是給人學習認識事物的區別的。”

“思想和行動——他寫着——行動和思想，這就是一切道理的終結。誰要是認定自己的公律是用思想去試驗行動，用行動去試驗思想，他就不會迷惑，即使迷惑了，也很快就會回到正確的道路。”在這些字句裏，雖然還只是遠遠的，可是已經接近着馬克斯哲學的‘實踐是真理的範疇’的理論，就是那使得整個的認識問題革命化的提綱。不是枉然的，正是列寧非常之看重理論是行動的指導，他號召着黨和工人階級來極端注意的分析階級鬥爭之中經常變動的形勢，有時候，喜歡重複哥德的詩句：

理論，我的朋友呵，是灰色的，

然而生活的永久的樹兒，却是青綠的。（原註）

【原註】列寧所引的這句哥德的話，是反對我在1917年三四月間的錯誤的，見“文集”卷二十，102頁。（卡美尼夫自注）。

自然，沒有疑問的，哥德的這些觀點的總和，也還只是草稿，只是模糊的預感，只不過接近那種發展概念罷了。列寧關於這種概念說：只有牠“把鑰匙給了一切存在的‘自我運動’；只有牠，把鑰匙給了‘跳躍’，給了‘漸進的中斷’，‘相反的轉變’，舊的消滅和新的發生。”

“我幾乎自己也開始相信了：也許只有詩能夠表現那樣的祕密，在散文裏通常總像是無聊似的，因為這些祕密只能夠在矛盾裏表現出來，而這些矛盾是人的推理力所不能接受的。”哥德這樣寫着，沒有疑問的，這是關於“漸進的中斷”，“對立的統一”，“舊的消滅和新的發生”那些主要的哲學問題的，在這些問題上，他的同時代的人的思想費着極緻細的考慮，而直到辯證法的唯物論方才解決的。然而在詩這一方面，哥德比任何一個別的詩人都強，只有他能夠走近這些“祕密”的猜測。就在這一方面，也可以應用恩格斯的話：哥德所“直接地，就是在某種意義之內‘預言地’說出來的，在最新的德國哲學裏就發展了，證明了。”正在他的最後的詩歌裏，部分的說來，就是在他的“東西譚凡”裏——這在俄國文學界還不大知道，——可以找着主要的哲學問題的辯證法解決的非常之妙的詩的預感。

讓古來的鬥爭延長罷！

發生和變更——

只怕我們有時候無法跟尋。

‘永久’到處在動着，

一切都趨向着‘不存’。

爲的要聯結着‘存在’。

哥德在那首“一和一切”的詩裏這樣寫着，並且說：“這幾句詩裏面也許包含着，暴露着現代哲學裏的最黑暗的問題。”

誰是生活過的，他不會變成‘無’！

‘永久’到處在動着。

聯結着的‘存在’——還是幸福！

這是永久；公律在保護着，

公律是堅定的，善意的，

是奇妙的變更的保證。

.....

過去的不會成爲‘無’，

將來的預先就在招呼，

而一瞬之中就充塞着永久。

他也就給了一個非常之好的公式，說明新的代替舊的，死亡之中的發生生活。那首詩的最後幾行，使人記起黑格爾馬克斯和恩格斯的辯證法，的最鮮明的標本。飛蛾受着火燄的不可抵抗的吸引，而死在火焰之中的形象，使得哥德寫了：

我所歌頌的生物，

火燄的死亡是牠的趨向。

.....

要是你不能够達到

這“爲着生活的死亡”，

那末，你不過是個黯淡的賓客

在這黑暗的故鄉。

這句譯文(指俄文譯本——譯者注)並不完全精確的傳達原文的意思。哥德這幾行詩如果用散文譯起來，那就是這樣的：“你還沒有了解‘死罷並且生存罷’的教訓的時候，你仍舊是黑暗的大地上的憂鬱的賓客。”換句話說：只有懂得生活的基本公律是經常的變換和對立的統一，是經過消滅舊的來實現新的的人，才能夠做生活的光明和覺悟的參加者；只有對於他，這大地才不是黯淡的，黑暗的。

這些對於世界的‘辯證法的感受’的天才的標本，使得哥德的詩差不多成爲黑格爾解釋他的哲學系統的唯一文藝材料。

哥德在當時非常之憤慨的駁斥了哈萊(19)的詩的公式：

自然界的內在的實質，
人的智識是沒有力量去知道的；
要是他看得見認識表面的外殼的道路，
他就算是幸福的。

這是宣布人的理智的有限，這正是把哥德所憎惡的二元論合法化，這是一切宗教和無可動搖的人類奴隸制度的總前提的詩的說法。

哥德用非常之佳妙的詩回答了他：

“O，市僧！——他寫着——你對着我和我的弟兄們，不要來說這一類的話。我聽了這一套已經六十年了，我罵開了，我自己幾千遍的重複着：自然界很大量的很願意的給着一切，牠沒有什麼內心，也沒有什麼外殼，牠什麼都是一下子就給的……” “就算我們眼前的

(19) 哈萊 (Albert von Haller)

世界是無始無終的，就算遠的沒有界限，近的不可透視；這一切都是對的，然而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什麼人也不敢來限制人的智識。說牠只能夠滲透自己的祕密和世界的祕密到多麼遠，多麼深。”哥德的這個反駁，黑格爾在自己的“邏輯”裏，很明顯的表示着同情而引用了。而過了幾十年，哥德對於這種最精細的唯心論的擁護的非常之有力的抵抗，恩格斯在自己的“自然界的辯證法”裏也提起了。

這種對於人類理智的無限的信任，否認牠的占有世界有任何的絕對界限，認為過去的死亡只是經常復活的，更新的，擴張的生活的階段，這都是滲透了哥德的整個宇宙觀的樂觀主義的基礎。

這種樂觀主義，同現代資產階級的宇宙觀和宇宙感，已經深刻的分歧的了：現代的資產階級正在開着快步向衰落走去。然而這種樂觀主義卻深刻的同那個階級親密起來，這階級像朝霞裏的太陽一樣，升上歷史的地平線來，而要求着自己對全世界的權利。哥德的宇宙觀的一般的哲學基礎，保證了他的詩和他的藝術形象的深刻的哲學意義，滲透了樂生的，樂觀主義的，肯定生活的一切方面，而推翻任何超自然力量的情感。哥德的早期的個性主義，始終也沉沒在這種‘一般的聯系性’的情感裏面。“只有共同的人類才是真正的人類，而個性，也只有在有勇氣在這整個裏面感覺到自己的時候，方才能夠快樂和享受……人，應當認為是他們時代的機關。”這種宇宙觀，使得哥德有可能天才地猜測到技術是人對於自然界的統治和最後勝利

的工具。“技術傳播起來——他寫着——一切就有保證了：技術逐漸的使得人類超越自己，已經爲着更高的理智，爲着最純潔的意志，在準備着那非常之適應的機關。”

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夠產生和完成哥德的完美的創作，以及十九世紀的最偉大的藝術作品——悲劇“浮士德”。這部悲劇的思想占領了哥德六十年：最初幾幕還是他在十八世紀的七十年代寫成的，而這部著作直到一八二一年才寫完，在他死之前的幾個月；這著作的公布已經在他死以後了。

哥德的“浮士德”——是一個人的歷史，他決定要冲破舊世界束縛他的羅網，而跳進生活裏去，爲的要在地上，而不是在天上，在行動之中，而不是書本裏，找着生活的意義和幸福。他推翻並且詛咒現有的微薄的人類智慧的資本，那是不能夠滿足他的追求的理智和熱情的心的；他也就是推翻並且詛咒這種智慧的核心——上帝；他同“魔鬼”聯盟，這“魔鬼”是一切光榮和尊敬的，但是澈底腐爛的神聖的偉大的否定者。在追求新宇宙觀的支點之中，哥德引導着浮士德經過理智和情感的一切嘗試，經過生活的一切誘惑。幾百萬讀者在這一百年以來極端注意的跟着浮士德的這些鬥爭和追求。

結論是什麼？哥德是不是替自己的英雄同那傳統的智慧破裂辯護了呢？對於那些使得他痛苦的問題，是不是找着了答案了呢？是的！至少，他找着了唯一可能的答案的最初的字句。

哥德在這部悲劇的開始，就暴露了那個根本的幻想，這就是幾百年來作為人的思想和意志的奴隸制度的辯護和掩飾的，也就是一切種種宗教和唯心論的謊騙的根本公式。他在一切舊道理的正教教義的第一行，在一切偽善者和強暴者的聖書——福音經裏，找着了這個公式：

寫着的是：“太初有字……”

我可不能夠把‘字’估量得這樣高貴。

就在譯文裏，我也應當修改這句話。

正確的感覺暗示着我的時候，

我就寫：‘思想’是一切的開始……

寫着，我又游移起來了……

然而光明來了，我看見了解決。

我勇敢的寫：“太初有事”。

事業，行動，就是克服抵抗，就是鬥爭。這樣，文字藝術的偉大的作家，屢次在逃避生活，在服從現有的事實，在對於事實的馴服裏去追求救星的，終於讚美着行動，讚美着人的實踐，而走近了馬克斯的偉大的格言：“哲學家只不過各種各樣的在解釋世界，然而事情卻在於改變世界。”

只有像個戰士似的站在自然界前面的，

他才配得上人的稱號，——

浮士德終於這樣宣言了。

然而浮士德並不停止在這里，他還往下走。嘗試着，推翻着對

於生活意義問題的一切可能的答案，浮士德——哥德在墳墓的邊沿上，最後找着了生活之謎的解答：這就是勞動集體的勝利的鬥爭。

……生活的年代

不是枉 過去的：在我的前面，
那地上的智慧的最後結論是很清楚的；
只有每天爲着生活和自由而戰鬥的，
他才配享有生活和自由。
不論是孩子，是大人，還是老人，
在艱厲的不斷的鬥爭裏過這一生，
我要在他們，自由的民衆的人羣裏，
在自由的地上成一個自由的人。
那時候我要說：‘一瞬’，
你是這樣佳妙，延長罷，停止罷！

哥德悲劇裏的浮士德，是說着這幾句話死下去的；哥德也是說着這幾句話死的。這樣，這個文字家歌頌了事業。這個個性主義者——歌頌了人類的勞動集體。

這樣，在哥德的詩歌和科學創作裏，從對於舊世界的抗議之中，產生了關於新的改造過的人類以及被他們所改造的大地的原始形象的預感和天才的猜測。

哥德等待了這個沒有上帝和奴隸的新世界，在那里，強壯的和諧的人將要是和諧的社會的果實。然而從封建世界裏產生出來的，却不是和諧的世界，而是充滿着矛盾的世界，新的壓迫和新的奴隸制度

的世界。 這裏——正是哥德的矛盾和悲劇的原因，正是產生他的妥協的實踐和理論的基礎。 在他的許多‘英雄’之中沒有勝利的英雄，他的一切‘英雄’（葛茨，普洛美修，謨罕默德，愛格蒙德，(-0)塔索(21)）都是敗亡的，就是那摸索着勝利的道路的浮士德也是敗亡的。 這些死亡是詩人的投降。 勝利本來是不可能的，正因為在那崩潰的封建制度的廢墟上所生長出來的，並非哥德所幻想的和諧的人的和諧的社會，而是更深刻的更劇烈的矛盾的社會。

要知道在現實的歷史舞臺上，勝利的也不是巴白夫(22)，甚至於不是羅倍斯比爾，而是西愛斯(23)，塔萊蘭(24)，拿破崙，是那些國民財產的收買人之中的最狡猾的傢伙，是那些軍閥之中的最卑劣的東西，是那些附和革命的投機家之中的最沒有原則的人物。 哥德的創作是小資產階級的進行曲，他們進攻着中世紀的宗教政治經濟的野蠻制度的神聖。 也像對於我們是階級異己的“馬賽曲”一樣，這上面放着法國大革命的鉅大震動的光彩，在哥德的創作裏，放着光彩的，是對於壓迫個人的中世紀的熱烈的抗議。 然而正像“馬賽曲”一樣——這暴動的歌曲變成了凱旋的資產階級的正式的國歌，——哥德

(20) 愛格蒙德 (Egmont)

(21) 塔索 (Tasso)

(22) 巴白夫 (Babœuf) —— 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極左派，有些共產主義的理想的。

(23) 西愛斯 (Abbé Sieyès) —— 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投機家，贊助拿破崙的。

(24) 塔萊蘭 (Talleyrand) —— 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外交家，反對左派的。

的創作也就這樣被掠奪了，被撕碎了，去適應資產階級的需要。

資產階級同封建制度妥協：牠需要封建制度所鍛鍊出來的壓迫羣衆的武器。在思想方面，這是對於哥德詩歌裏的暴動主義，異教主義，解放主義的成份的反動，這是宗教，神祕主義，中世紀的哲學和中世紀的道德的復活，就是列寧所說的“思想上的僵屍化”。這種僵屍化對於這個詩人的精神是極端敵視的，然而他——我們的詩人竟在牠的社會基礎前面投降了。在他的實際生活裏，以及他的創作裏，不免要反映那資產階級世界和資產階級概念的限制性，反映那資產階級的從有限的革命性迅速過渡到無限的反革命性。反革命的資產階級馴服了這個“不馴服的，嘲笑和輕蔑世界的天才”（恩格斯的評語）。他沒有脫離自己的階級，反映着牠的思想上的飛躍，也反映了牠對於羣衆的反革命統治的實踐。

他詩歌裏的心愛的形象，是流浪人，是解脫了舊世界的思想上物質上的束縛的自由人，而詩人自己，卻在德國的小諸侯的宮廷裏安坐了五十年，受着諸侯和士大夫的寵愛。

不由自主的要記起別一個偉大詩人——普希金的形像。普希金經過了暴動主義的青年時代，也已經準備低下自己的熱烈的頭，去追求妥協，追求同俄皇的調和之中的安寧。

然而他沒有禁得起這個妥協，沒有禁得起俄皇的寵愛，受盡了磨折自己走到了鎗彈底下去——走到宮廷侍從的鎗彈底下去，而讓人

家把自己打死。

而哥德卻禁得起的，他適應了，忍耐了。所以恩格斯說：“窮乏戰勝了他”（原註）。

他並不知道達到真正的新世界的道路，在實踐上，他也沒有怎樣去追求。在他的理論和實踐之間，存在着極深刻的分歧。他的實踐，滲透着同統治階級妥協的精神，拒絕鬥爭，這是活生生的否定他的“理論”。他這個‘新的完美的人’的宣教者——正像恩格斯所說的——“在那鉅大的冰流前面——威嚇着他的詩人的和平的孤獨的，——他感覺到極端市儈主義的恐懼”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詩人的創作不可避免的要喪失行動性，而帶着旁觀的抽象的性質，變成了脫離活潑的生活的幻想，只在想“過了三四百年”“我們要看見鋪滿了寶玉的天”。其實，就是“浮士德”的結局的獨白裏，那關於解放的人征服自然的集體勞動的非常之妙的訓話，也不過是“鋪了寶玉的天”，也不過是抽象的公式，高尚的，然而沒有血肉的，因此，也就是無力的幻想。

【原註】 我們的別林斯基差不多和恩格斯同時寫了這個問題：“哥德是個偉大的藝術家，然而他又是一個極平常的人。不是藝術，而是他的個人的性格使得他永久在這地上的強有力者之間周旋着，用他們的微笑的賞賜來生活，來呼吸……”“他是個偉大的人物，——我崇拜他的天才，然而同時，我却一刻兒也容不得他。” 在“在暴的維薛里翁”那封私人的信裏，別林斯基又加上了這一句，反映着哥德之後的第一輩革命家的情感。

資產階級的世界壓死了哥德；同資產階級世界妥協，使得他滅亡。他同統治階級太聯絡了，使得他不能夠把自己的發展學說應用到社會上來，不能夠經過矛盾的鬥爭而達到發展的高度，不能夠認識革命是到將來的唯一道路，那將來其實就是他自己的浮士德所號召的。羣衆的歷史創造，對於他是異己的敵視的一種潮流。因此，他成了市儈主義的俘虜，資產階級的俘虜；而對於資產階級，他的創作只是放着光彩的，然而並沒有任何義務的玩具，不過用來點綴一下資產階級世界的憂鬱而黯淡的景象罷了

同哥德自己一樣，他的大多數的讀者，並沒有從他的詩歌和科學創作的總前提裏，做出什麼一貫的實踐的結論。大多數只把這詩歌當作消遣，彷彿“夏天的甜蜜蜜的檸檬水”，彷彿一種有趣味的，有時候很迷人的精神上的體操。離開了牠之後，就應當回到那種會計算的市儈的日常事務裏去。因為這些讀者，極大多數是資產階級的子弟，而要資產階級從哥德同人類精神意志的奴隸制度的戰鬥裏做出一貫的結論來，這是不可能的。這簡直是要他們在自己的房屋裏去扔一顆大炸彈。

然而生出了一個階級來了，牠卻能夠把哥德的宣傳想到底，牠應當爲着自己事業的勝利起見，澈底的消滅一切社會關係裏的舊心理的殘餘。哥德之中的最好的成份，在牠是這個偉大的肅清工作的非常之好的工具。

第十七次全蘇聯會議的議決案，說到“克服經濟上的和人的意識上的資本主義殘餘”的時候，這是說的當前的實踐的任務，這次會議在黨的前面提出了改造‘人的材料’的鉅大任務，這是馬克斯就預見的實踐問題，而在事實上，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領導者也的確不可避免的要碰見的。在他們前面，還存在着宗教的，宗法社會的，農奴制度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情感，情緒等等的可惡的遺產，而為着同這些東西鬥爭起見，哥德詩歌的光輝的武庫，可以供給非常之妙的武器，去實行廣大的射擊。這裡，又可以實現一次共產黨宣言書的天才的，充滿着辯證法意義的話：“資產階級所用以致封建制度死命的武器，現在向着資產階級自己了。”

只有我們共產主義者，完全拋棄了哥德之中的一切瑣屑的，一切妥協的，一切市儈主義的，一切反革命的，而把哥德之中的偉大的，從幻想，空想，抽象的思想，變成地上的實踐的生活，變成幾千百萬人的具體行動，把他對於人類存在的屈辱條件的抗議，實現在現實的鬥爭之中，把他的最好的想像，高貴的幻想，傲慢的熱情，實現在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之中。

在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裏，哥德還是活着的，不過，這已經是新式的生活了。

〔譯自蘇聯“鐘聲”雜誌第二冊——1933年；這篇文章曾經在“伊茲維斯啓

亞”報上以及其他報上發表過，那是在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哥德逝世百年紀念的那一天，但是，因為篇幅關係，在日報上發表的都不完全，多少都刪節了些。這里才是全文）。

【注】這篇文章的作者卡美尼夫 (L. B. Kameneff) 是個老布爾塞維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前，他曾經反對“無產專政”的口號，而抱住了“工農民協專政”的舊理論不肯放手，十月革命的前幾天，他同季諾維耶夫又反對暴動，後來，在列寧領導之下糾正了這錯誤；直到一九二五年之後，他又同託洛茨基聯合，以致於開除出黨 (1927)。一九三三年初，蘇聯共產黨承認了他的確拋棄了他的錯誤立場，而恢復了他的黨籍。在這篇文章裏，他也提起了自己的錯誤——參着他的自注。

伯訥·蕭的戲劇

M. 列維 它夫

導 言

英國著名的劍橋市，向來是以自己的大學出名的，最近發生了一件不這麼重要而始終登載了報紙的事變：在劍橋大學的物理數學科之下開辦了一個新的實驗室，將要進行大規模的科學研究，其中就有分解原子的實驗。關於這件事情，英國二月四日的報紙都記載了。

同一天，報紙上還有一個關於這著名的劍橋市的消息。這就是劍橋市議會通過了一個特別決議，叫劍橋市立圖書館取去伯訥·蕭最近的著作“黑女尋神記”，因為這部著作包含着對於宗教的譏笑。

在劍橋可以分解原子。然而在劍橋不准不信仰上帝。這一件本身很小的事實，在資本主義制度所產生的文化，倒是表現牠的特點的。

伯訥·蕭的全部創作生活，都是在指出，說明，分析那些構成資產階級文化的本質的矛盾，那就是產生像上面所說的兩件事實之類的矛盾。這一類的事實裏，難道不像一點水裏反映着整個海洋似

的，反映那文化的全部本質嗎？而蕭的全部創作生活，就在指出，說明，分析這些矛盾，卻並不是用外表的客觀主義去估定這些矛盾，也不是被自己的創作才能俘虜了而在鑑賞這些矛盾，他是完全爲着要同這些矛盾鬥爭，總之最後結算起來——就是同這個文化以及產生這個文化的制度鬥爭。

這樣，第一，蕭是個思想家，第二，蕭是個論壇。他在思想，是爲着鬥爭；他是用思想在鬥爭。蕭的戲劇創作就是鬥爭着的思想。

蕭的成爲戲劇作家完全因爲他是個思想家和戰士而並不是因爲戲劇的體裁合於他的創作性格。照他自己所承認的來說，他的開始寫劇本完全是因爲他覺得經過戲劇可以達到他這個思想家戰士的目的；如果他有別種更適當的可能，那末，他簡直會不再寫劇本的。因此，蕭的戲劇作品，在世界文學裏，是創作之中意識性和目的性勝利的唯一的標本。這裏是他的作品的優點和缺點的根源。



我們說——白葡萄酒。我們說——白種。而事實上，這所謂“白”葡萄酒卻大半是黃色的。那屬於所謂“白”種的人的皮膚也並非白的，而是淡紅而帶黃的。這是言語的條件性，言語的呆笨。假定有一個人，他跑到店鋪裏去要黃的葡萄酒，或是在科學研究上宣稱歐洲人是屬於淡紅種的。那末，大家一定會笑他，說他是蠢大。

然而你們想罷，現在這個人，不願意把黃的叫做白的，而從這種

觀點上去校正他當時的整個社會制度，因而發見了這個制度的社會風俗和倫理道德上的一切層次都充滿着那種條件性和呆笨性，他就公開的說出來。立刻，大家都會說他是 Paradoxalist —— “帕拉多克斯”家（怪僻家）。蕭就是這麼一回事。可是，關於蕭的唯一的“帕拉多克斯”，卻在於他是世界文學裏最不“帕拉多克斯”的作家。他祇是簡單地不願意遵守已經固定的“遊戲條例”，就是資產階級文化所造成的那些規矩。這裏可以看見他和託爾斯泰的奇怪的相像，不過應當說明：他在藝術的才能上雖然並不接近託爾斯泰，而在毀壞遊戲條例的勇敢方面，以及無情的把黃的叫做黃的的本領方面，卻比託爾斯泰強得多。

*

蕭的戲劇裏有些什麼？人們在衝突——在鬭爭——在受苦——在勝利——在死亡？不是的。人們祇在談論。就是借着這些人的嘴，蕭自己在同社會談論。因此，一些戲劇精髓的護法神就說，蕭的劇本沒有行動性，不真實，他的戲劇並不是戲劇，因為戲劇的本質——是行動，是衝突。

是的，他們說得對，可是蕭的戲劇也是戲劇。因為在蕭的劇本裏，也在衝突——鬭爭——受苦——死亡，不過這不是人，而是思想，觀念。蕭的戲劇裏，沒有人的典型，而祇是觀念的典型；這戲劇裏所展開的，並非人的運命，而是觀念的運命。正因為這個緣故，世界戲

劇作家之中沒有一個人比得上蕭，他真能夠在自己的創作裏達到不妥協和最大限度的一貫性：要知道他決不受外表的像真主義的束縛，他沒有戴上劇場條件性的腳鐐，他祇說他所要說的，而結束一本劇本的時候，也並不是因為他已經把題材寫週到了，的確要“解結”了，而是因為他把這個“思想的結”裏他所想要說的一切，已經都說出來了。任何一個戲劇作家都比不上他，他是自己材料的主人，他能夠把自己的任務執行到底，完全寫出自己的題旨。普通的戲劇作家，總有人物方面的無窮的麻煩，他們時常，太時常地，會把作家佔領，而牽着作家走到他所並不要去的地方。這在易卜生是時常會發生的。而在蕭就不會的。他所要打死的那個人物，就是一個觀念，他能夠很準確的打死牠，而他所要讚美的那個，他也能夠吹着喇叭打着銅鼓的頌揚牠的全部偉大。

因此，蕭的戲劇是最大的限度的有結果而又有行動性的。這裏又要說到蕭和易卜生的對比，這也是自然的，因為，易卜生和蕭是資產階級戲劇創作的頂點。然而這個頂點——易卜生——被濃密的永久的雲霧掩蔽着。易卜生——是個天才的問號“？”，沒有答案的問題，沒有解決的疑問。照易卜生的道理，提出倫理道德的疑問（別的疑問他是不知道的），就等於拒絕解決這個疑問，因為疑問越是提得激烈，真實，那就，越要發生更多數量的可能的答案，而唯一的，能夠解決的答案卻越發不可能。蕭——卻是個偉大的驚歎號“！”

——這一個頂點被鬪爭化的思想的燦爛光線鍍了金了；對於他，提出疑問，也大半是倫理道德的疑問，就等於解決這個疑問，因為疑問的解決就包含在疑問的正確的提出，像蝴蝶的包含在蛹裏面一樣。要知道易卜生，在他的創作的全部偉大上結算起來，他是個小資產者，被他當時社會制度裏的矛盾所嚇壞了的，弄慌了的。而蕭，結算起來——是個智識份子的合理主義者，嘲笑他當時社會制度裏的矛盾的。然而不止這一點。

因為如果是思想的鬪爭，觀念的衝突，那也可以寫哲學的對話，像柏拉圖，福祿特爾，萊南…… 幹嗎把這些思想人類化呢，幹嗎使得這些思想穿上人的服裝呢？這是因為蕭不但嘲笑，並且打擊，不但打擊，並且打死。因為蕭在思想是為着鬥爭。

同誰呢？同自己的看客。同整個劇場。在他每一本劇本裏所開展着的衝突之中，他都把劇場看客當做參加這個衝突的人。而且正是他所要攻擊的所要打死的那個觀念的一派人。在這方面，蕭也是世界戲劇作家之中的唯一的作家，因為劇場看客對於他永久是敵人，他要想說服他們，征服他們，俘虜他們。這卻是柏拉圖，蒙吞，帕斯卡爾，叔本華，尼采——這些道德思想家所沒有想到的，蕭也屬於這一批思想家；可是，對於他們，思想的世界是封鎖的自足的境界，他們也就不像蕭似的是個思想家的戰士。

然而無論什麼鬥爭都必須在鬥爭者之間有一點兒出發點上的統一性，有一點兒所謂共同的領域。蕭就在創造這種領域，使得觀念人格化，思想變成兩腳動物 彷彿是些活的東西。因為他知道他的看客一定要觀念是照着他們的形象和類似鑄出來的，一定要觀念從看客的觀點上看來似乎具體化的成了活人，然後才會接受這個觀念。‘似乎’——因為對於蕭，這種活人的存在，祇有在他扮演“桑德維支”，觀念的廣告者的脚色的時候，才有興趣。為着要說服你們——蕭正是這樣對付劇場看客的，——說你們在某某事情上做了錯誤了，說這是幻想，這是條件性的謊騙，說這是黃的，而你們倔強的叫牠是白的，為着這個單祇有觀念衝突的邏輯是不夠的，你們一定還要活的衝突的假情緒，舞臺上的劇情的條件性，戲劇式的糾紛的消遣。好極了，你們可以得到所有這些東西，你們享受罷，笑罷，哭罷，如果這可以幫助你們思想。然而你們始終是要思想的，無論你們怎樣想避免，而且你們一定會照着我所要的那樣去思想。

*

如果蕭強迫看客和他戰鬥，那末，自然，他總是勝利的，他用自己的辯證法的打破一切的力量，用自己的說服力的銳利的鋒芒，用自己的意志的力的無窮的能力得到勝利。

如果…… 他能夠強迫人家接受這個戰鬥嗎？ 他會有劇場看客嗎？ 如果他們很沉悶，如果他們打呵欠，如果他們覺得沒有興趣，

如果他們不激動，那就是看客不接受戰鬥，那就是蕭失敗了。而客觀上蕭的失敗的可能是很大的，因為看客很容易發見蕭的戲劇不是平常的戲劇，蕭的戲劇世界裏的人不是平常的活人。

可是蕭大半仍舊是勝利的。他四十年來的戲劇創作生活，已經得到了世界的劇場看客。這還不是說程度很高的智識階層之中的讀者和崇拜者（這位思想家戰士在智識階層之中引起的興趣最少）而是說廣泛的看客，“街道上的人”，他們到戲院裏去就祇是到戲院去，就祇是去看戲。

然而，蕭是用了很冒險的手段得到了這個勝利。這手段的冒險實在太厲害了，以致於使資產階級的混蛋和俗物有所藉口而說他是耶主爺派⁽¹⁾，估定他是“彷徨中的耶利米亞”⁽²⁾。

的確，不能夠不想一想：蕭的戲劇，這個高度的有思想的，貫穿着疑問性的，非常之聰明的戲劇，卻密密的蒙上了一大層，濃濃的摻雜着好許多很放肆的成分，放肆得很狂暴，狂暴得很低級的趣味。這些成分是那麼多，那麼喧賓奪主，以致於不能夠使人覺得：數量是不是變成了質量，作者的任務是不是變成了牠的反面呢？在那趣味背後還看得見強有力的辯證法嗎，在滑稽化的背後，還聽得見思想上的

(1) 耶主爺派是天主教的一派，非常之狂妄而不擇手段的。

(2) 耶利米亞是以色列民族衰亡時的哀歌作家（見“舊約”）。

疑問的鬭爭化的情感嗎？可以很輕蔑的走過那些混蛋的惡毒的譏笑，“高尚藝術”的崇拜者的譏笑，像蕭自己就是這樣的態度，然而這個問題還是有的。

而且不能夠無條件的回答這個問題說：沒有，數量沒有變成質量，是的，辯證法還看得見，疑問還聽得見。無條件地，一定數量的看客認為蕭是個“發笑”的作家，而從消遣這方面去了解他的戲劇的。沒有疑問的，這不但是看客不好，作家自己也不好，因為蕭有時候沉溺在趣味主義裏，把他當做目的的本身，而成了自己的手藝的犧牲。這是這樣的。

然而這個結果是什麼呢？每一個藝術家，而尤其是這一位藝術家，都必須在他的弱點上去研究他，在他的強點上去判斷他。這就是蕭的戲劇的弱點——他的弱點並不像通常所想的，說他的作品裏沒有“活人”，沒有“生活的衝突”，沒有“真正的熱情”（其實這倒是他的強點和特色），——他的弱點是在於他沒有一種限度的感覺，往往使得自己的戲劇過分的充塞了趣味。但是這些趣味成分——並非蕭自己發明的，並非他所造出來的，而是他從外面拿來的，從一些現成的體裁，印板的公式裏拿來，裝進自己的戲劇，差不多是機械地穿插進去的，因此，這在他是並非典型的，並不是他的特點。而他的強點——上面已經說過了，——這卻正是他自己的，正是他的特性，正是規定他的創作力量的。蕭在戲劇創作方面，弱點是他所採取了來

的，而強點卻是個性的，在這個意思上來說，他正是辟朗德洛(3) 的鮮明的反面，要知道辟朗德洛也是個劇作家的思想家，聰明戲劇的明星。然而糟糕的就在於辟朗德洛的強點——他的聰明——是從叔本華和蒿普德曼那裏租來的，而且這些叔本華和蒿普德曼已經被“歐洲日暮”的情緒所擴大了(或是縮小了)；至於辟朗德洛的弱點——是沉溺在形式的構成主義裏面，這是他自己的弱點，是辟朗德洛所專利的。而蕭呢，他的強處是他蕭自己，他的弱點——唔，像隨便那一個法國發鬆的滑稽戲的導演。然而關於“導演”我們可以忘記的，因為這個弱點，是蕭故意拿來放在自己的肩膀上的，為的要使自己的強點更加有行動性，更加有真正的感動力，更加達得到目的。如果蕭有時候使自己的人物顛倒的站着，頭放在地下，為的要使看客的腦筋攪動起來（蕭認為這是把腦筋弄清楚的必要條件），那末，你自然不會來反對他這個方法的。而資產階級的腦筋，蕭的確攪動了；這是他四十年的工作所達到的成績。

然而還有一個最後的問題：攪動是攪動的了，是不是弄清楚了呢？

這裏，歷史的過程就來干涉了；不管蕭的全部鉅大的例外的能力，簡直可以說是世界文學史上的唯一的作家，而歷史過程始終比這位英國劇作家要聰明些。

(3) 辟朗德洛是有名的意大利的戲劇作家。

這個歷史過程規定了蕭的創作的社會上的限制性，他的戲劇創作完全祇有破壞的作用。他想要造成什麼積極哲學的系統的企圖，把個別的“黃的就是黃的”的格言聯絡起來做成整個的練條的企圖，——通常總是得着很苦痛的失敗。然而應當說明：他也不堅持這些企圖，自己覺得這不是他的強處。蕭該着很大數量的槓桿，他用這些槓桿推動思想世界的各個個別的方面，而且很有效的；然而在統一的整個的過程之中去振作這個世界所必需的那個支點，他卻沒有找到，雖然他一直在這支點的週圍和附近繞着圈子，因為蕭對於馬克斯主義宇宙觀的態度永久祇是一種好玩的態度。對於這種關係為什麼沒有更加認真些的態度，這是不是由他自己決定的，——那是另外一個題目。可是，還用得着說蕭能夠成為什麼樣的人嗎？難道單是“蕭是什麼樣的人”——這個題目不已經夠廣泛，夠豐富的了嗎？

※

劍橋實驗室將要幹那種有世界的重要意義的工作，分解原子核的工作，這些原子核將要受着攻擊，受着特別光線的結合體的轟炸。而劍橋市議會禁止蕭的書又是什麼意思呢？要知道蕭也是一個實驗室，強有力的實驗室，他用他自己的創作的目的傾向性和目的射擊性的例外的貫澈一切的光線，在那裏轟炸和破壞資產階級文化的倫理道德和社會風俗的價值的原子。

這裏是蕭的偉大的革命意義，他是現代資產階級戲劇裏的唯一的思想家戰士。

✽

上面所說的一切，祇不過是說出來的，宣言的，規定的，還一點沒有證明，沒有指出根據，沒有描寫。這不是偶然的：這篇文章祇是研究伯訥·蕭的創作的導言和提綱式的摘記。沒有疑問的，這個研究是馬克斯主義藝術學的重要任務。這幾行文章就是寫給將來的研究者的。

這篇文章登載在 MORT（國際革命戲劇聯盟）的雜誌“國際戲劇”第五期，1933年五月。

高爾基——偉大的普洛藝術家

V. 吉爾珀汀

四十年前，在替弗里斯的“高加索”報上發表了馬克西謨·高爾基的第一篇小說“馬卡爾·楚德拉”。從那時候起，就開始了高爾基的豐富繁盛的文學活動，他的革命化的影響，也在俄國和歐洲的進步情緒的讀者之中，開始迅速而騷動的傳播。

前世紀的九十年代——是社會思潮活躍的年代，是革命運動高漲的年代，這是由於工人階級的力量，覺悟着積極性增長的緣故。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國內的革命運動都失敗了。鋼鐵似的農奴制度的專制妖魔不但沒有被推翻，而且，似乎得着了新的壓迫力量。革命運動初步的挫折，反動的陰黯散布着煩悶和灰心，產生着一種無能為力的感覺，造成了八十年代的重壓的氛圍。

前一輩的平民主義者⁽¹⁾，偉大的革命者不見了，代替他們的是——一輩合法的平民主義者；革命的鼓動不見了，代替牠的是“小事件”

(1) 平民主義者——Narodnik, 平民主義——Narodnitchesvo. 或譯“民粹主義”，“人民主義”。

的宣傳，機會主義，政治上，生活上，理論上和文學上的適應主義。

可是，無論政府的反動壓迫多麼厲害，無論八十年代社會氛圍多麼沉悶，不倦怠的“歷史老鼠”還是正確的做着自己的事情。1870—1880 十年之間，照最少的統計說，罷工工人的人數也有十二萬，大多數的罷工結果是工人勝利的，或是部分勝利的。這也是革命的高漲，——但是，當時的人迷戀着“民意黨”⁽²⁾ 同專制制度決鬥的熱鬧的景象，卻沒有了解，沒有注意這一種革命高漲。然而最主要的——是這個工人運動的高漲沒有受着失敗，沒有被打碎，牠在相當的沉寂之中生長着，擴大着，一直到九十年代，罷工就像暴風雨似的爆發出來，表現強大的力量，而顯露到外表來，這時候的罷工已經是開始自己的歷史事業的符拉狄米爾·列寧所組織的‘鬥爭聯合會’所領導的了。（很有意義的：高爾基最初同革命團體的接觸之一，是他參加了一八八七年卡贊的費多謝耶夫的馬克斯主義研究會）。

工人階級形成了，生長了，鞏固了；無產階級成了革命運動之中的領導階級。革命鬥爭從個人的無希望的事業變成了強大的勇敢的日益生長的羣衆運動，可以感覺到完全勝利的現實的前途。社會政治的氛圍開始澄清了。

革命鬥爭不再是無希望的了；勇敢的充滿着精力的工人階級站

(2) 民意黨 Narodnaya Wolla 七十年代的革命黨，以暗殺為主要手段，這就是中國人以前認為“虛無黨”的。

在運動的前線，勇猛的活躍代替了煩悶的黃昏，勇猛的運動產生了勇
猛的歌曲：

“我們歌唱勇士的瘋狂的光榮！勇士的瘋狂——這是生活的真理！O，
勇敢的老鷹！你在同敵人的戰鬥裏流了血……然而，時候是要來的——你
的熱血的點滴，要像火星似的，在生活的陰黯裏爆發出來，要燃燒着許多勇
敢的心對於自由光明的瘋狂的渴望！”

即使你是死了罷！然而在勇敢的，精神上壯健的人的歌曲裏，你永久
是活的榜樣，向着自由，向着光明的高傲的呼號！

我們給勇士的瘋狂唱着歌曲！”

關於‘勇士的瘋狂’的歌曲——這就是高爾基文學事業的最初階
級的浪漫主義小說的主要內容。這是高爾基最初的小說“老太婆
易塞基爾”的故事等等的政治上的壯健性；歸根到底，對抗着俄羅斯
皇帝亞歷山大第三和尼古拉第二的忠順的馴服的臣子，那種灰黯的
市僧的僵屍化、而把愛自由的不馴服的赤脚漢理想化起來，這個基礎
也正在這裏。

“潛水鳥也在暴風雨前頭哼着。”遲到的俄羅斯資產階級，正在
工業繁盛的時期之中，也需要意識上的武器，來反對仍舊統治着“社
會”的平民主義的傳統，反對那種禁慾主義，反對那種文化階級和統
治階級對於平民的責任觀念。對抗着平民主義，資產階級的智識階
層在尋找着意識上的花花綠綠的髒布，要想用來遮蓋自己對於俄皇
制度的奴膝婢顏，遮蓋自己對於工人的無限剝削和無所顧忌的滿足

自己的消費本能和淫慾的要求。資產階級爲着這樣的目的，企圖利用高爾基，這和“合法的馬克斯主義”在理論上和政治上所企圖執行的，正是同樣的任務。於是造出一種神話，說高爾基是尼采的超人的歌頌者，這種超人是絲毫不受限制的統治者和剝削者，把其餘的一切人都當做滿足自己慾望的手段。自然，平民主義派沒有了解，也不能夠了解革命運動中的領導權轉移到無產階級手裏所造成的新的歷史形勢，他們也就重複着資產階級對於高爾基創作的估量，不過資產者加上“正號”的地方，他們卻加上了“負號”，資產者所讚賞的，他們就加以責備。米哈伊洛夫斯基⁽³⁾認爲高爾基的創作不過是頹廢派的一種表現。布爾塞維克的文藝批評很早就出來反對這種對於高爾基創作的意義的曲解。瓦茨拉甫·沃洛夫斯基⁽⁴⁾估量着高爾基的初期作品，就痛駁了那種把這位青年作家當做超人的歌頌者的無用的企圖。爲着人類，爲着羣衆，爲着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而感受苦痛，——這是高爾基的全部創作的動機，從第一篇小說起就是這樣的。歸根到底，高爾基描寫着強有力的勇敢的性格，有着強烈的整個的熱情和勇氣的，這正像恩格斯在給保羅·愛倫斯德的信裏所說的，是要表現真正的人，這樣的人，對抗着那種卑劣的，在一切壓

(3) 米哈伊洛夫斯基——Mihailovsky，當時平民主義派的理論領袖。

(4) Wat-lav Worovsky，布爾塞維克的文藝批評家，後來做過外交人員，被白黨所暗殺。

迫和不公道之前發抖的市儈，“還有點兒脾氣，能夠發動，而且獨立的行動”（恩格斯的話）。革命的鬥爭永久在產生着這種真正的人。他們，在推翻專制制度的鬥爭剛剛開始的時候，在那陳舊的俄羅斯的沃勃洛莫夫（5）環境之中，就已經產生了；而在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裏所鍛鍊出來的這類的性格尤其多。高爾基生活的特點，使得他在最初一時期從赤腳漢或是古代吉普賽人的傳說裏去採取“真正的人”的形象。自然，高爾基後來就能夠觀察到赤腳漢世界是個什麼東西，知道這裏面是不能夠找尋先進的戰士的，爲着人類的真正人的生存條件而戰鬥的戰士，是不應當在這裏去找尋的。“底層裏”已經說着底層的無力和恐怖，表現着那流浪人魯加的聖教式的安慰，和調和的宣傳的機會主義。

高爾基的著作裏，可以找着反對那種披着藝術形象的衣服的資產階級的尼采式的個人主義的直接的反駁，老太婆易塞基爾的第一篇故事——如果你要這麼說——也正是關於受着了懲罰的尼采主義者的小說，是關於完全只爲着滿足個人的利己主義的自由和強大的，沒有人性’的小說。拉辣，一個女人和鷺鳥的兒子，他的生活真像個“超人”的生活；“像鳥兒似的自由自在，他跑到部落裏去搶掠牲口

（5）沃勃洛莫夫是賈察洛夫的一部小說裏的“英雄”，代表憤憤和強硬的貴族青年
的

和女人——搶掠他所需要的一切。人家射擊他，但是箭頭不能夠射穿他的身體。……他很敏捷，殘酷，強壯和狡猾，他不同人們照面的。”然而拉辣感覺到自己的孤獨的煩悶。他的高傲的孤獨的自由，即使同別人接近也不會暖和的，這變成了他的苦痛。他要想死，然而不能夠死，懲罰就在他自己的身體裏。他是長生不死的。“他沒有生活，而死亡也不向他微笑。人們之中沒有他的位置……這人的高傲是怎樣受着處罰的”。

高爾基的同情不在拉辣方面，而在但珂方面；這是老太婆易塞基爾的故事裏的另外一個神話式的英雄。但珂——也是個浪漫主義的形象，對抗着無能為力的大多數人的煩悶生活的；他們在潮溼的泥坑似的走不出來的森林的陰黯裏面，拖延着自己的可憐的日子。可是高傲的愛自由的但珂，並不在想發揮自己的利己主義的驕傲。他愛着人：“我要給人做什麼呢？”——這是感動他的問題。他把自己的同胞，從潮溼的黑暗的樹林裏，引導到太陽底下的廣闊地面。而在他所引導的人迷失在黑暗之中而抱怨的時候，他從自己的胸膛裏挖出了熱烈的心，把牠舉起在衆人的頭上，當作引路的火把，這樣他用自己的死亡的代價把困頓在陰黯之中的人引上了光明的道路。

關於但珂的浪漫主義的神話，是有政治上的意義的。這篇作品在“老鷹歌”之前。牠是有緊急性和積極性的，因為牠號召着鬥爭，號召着功績，牠創造了那種奮發的行動性的勇氣，那種為着公共事

業，爲着受難的和磨折的人們而犧牲自我的決心；沒有這種勇氣和決心，是永久不會有革命高潮的。

高爾基在自己的四十年文學事業的最初時期就很尖銳的提出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對抗性的問題。就是在高爾基關於赤腳漢的小說裏，也聽得見對於剝削者的憎惡和輕蔑的呼聲。

“喫得飽飽的人是畜生——一篇小說裏的老爹爹亞爾希教訓列尼卡：——他再也不會可憐餓肚子的人的。飽肚子和餓肚子的人互相是仇敵，他們永久互相看着是狗崽仔。所以他們不能夠互相可憐和了解的……”

高爾基所敘述的整個故事，從容不迫的用藝術家的手腕寫出來，在他的手腕之下，事變本身解釋着自己，整個兒都在反對着飽肚子的富人的“公理”，他爲着保障自己的私產而殘酷地送了兩個無家的流浪人的命。

高爾基的初期小說的浪漫主義的靈感，同普通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浪漫主義是絕對不同的，正因為普通的浪漫主義永久是以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私·有·財·產爲基礎的，而高爾基的熱烈的說教，不但是革命的，而且是反對私產的，反對私產的貪婪，利己主義，痴呆主義。“難道爲着錢可以糟踐自己嗎？”——徹勒·卡施叫着，這徹勒·卡施是高爾基的最鮮明的流浪人形象之一。

高爾基從自己的文學事業的最初時期起，就是強大的革命高漲

的描寫者和行動者，當時的革命高漲是革命鬥爭之中新的領導力量——無產階級的出現所引起的。在這方面的意義，高爾基的創作從最初時期起就具有緊急性和政治上的積極性的特點，而且不是那種庸俗的插畫式的意思，而是緊急性和積極性應用到藝術上來的最好的意思。高爾基創作的緊急性和積極性也就造成了他在文學上的空前迅速的成功。

高爾基創作的複雜，他所描寫的社會典型的豐富，引起了許多誤解和對於高爾基的社會同情的不正確的估量，甚至於在馬克斯主義者之中也有這種情形。例如，已故的弗里采寫了：高爾基“在赤腳漢之中，在資產階級之中，在智識階層之中尋找着這種光明的創造者，宇宙的建設者，而經常的失望。他在工人階級之中才找着了這種建設者，而爲着他——爲着這個戰士和創造者——樹立了不朽的紀念碑。”

然而我們已經說過，高爾基在自己的作品裏把赤腳漢的藝術形象提到第一等的位置，卻並沒有把赤裸裸的任性神聖化，並沒有把無政府個人主義的或是尼采主義的個性的不受任何限制的要求神聖化。關於受難的人類，關於真實，關於人類生活的美化的關心，就在高爾基創作的這個時期，也並沒有離開他的。至於經常引起馬克西謨·高爾基的注意的智識階層，那末，他也沒有把他們當做目的本身。智識階層也有個分別的——高爾基的“避暑客人”很明白表現

着這一點。有一種智識階層，他們滾在統治階級的污穢和卑劣之中，他們信仰他，真實地替統治階級服務；也有另外一種的智識階層，他們拋棄了那個“得意洋洋的，無聊地空談着，手上染着血腥的人”的營壘，而把自己的力量，完全交給了解放極大多數的人於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之下的事業。高爾基的同情正在這一種智識階層方面，雖然他有對兒過份估量這種智識階層的傾向。智識階層的引起高爾基的同情，是因為他們追求社會主義的勝利，而且不是烏託邦的社會主義，而正是馬克斯和恩格斯所建立了基礎的社會主義。高爾基實行了長期的堅決的鬥爭，爲着爭取智識階層，爲着使得他們拋棄舊世界的虛偽，爲着要他們變成工人階級毀壞舊世界而創造新世界的得力的幫手。高爾基對於智識階層的態度準備了特別清晰的提出這麼一個問題——這是不久以前他提出來問那些還有耳朵可以聽得見的人的：——“你們，文化的工匠，究竟同誰在一起——同着文化的苦力工人的力量，來創造新式的生活呢；還是反對這種力量，爲着保存不負責任的野獸的等級，那個等級已經從頭爛起，只剩得一點惰性的作用，因此，還在繼續行動罷了？”

至於資產階級，高爾基從來不曾把他當做“光明的創造者”，當做“宇宙的建設者”。通常提出來說明高爾基注重資產階級的那一部作品，其實非常之明顯的是反對資產階級的。自然，“羅瑪·高爾狄耶夫”裏的馬雅金——是高爾基藝術上的最好的成績之一。自

然，馬雅金很聰明。他的不平常的政治意義，明顯的表現在他清楚的提出國內的政權問題。“問題不在於錢——他解釋着——而在於權力。這才是我們弟兄們應當抱定的方針。”然而要知道這一部非常之好的小說，整個兒是反對資產階級的；要知道這小說表現着：福瑪·高爾狄耶夫的有才能有作爲的天性，怎樣被商人和工廠老板的全部日常生活束縛着，而在污穢之中躑躅了。“你們造出來的不是生活——福瑪對着資產階級說——你們造成了一個垃圾桶！你們散布了自己的醜態和醜惡。你們有良心嗎？你們記得上帝嗎？五分銅元——是你們的上帝。而良心，你們把牠趕走了……你們把牠趕到那里去了？吸血鬼！你們靠別人的力量生活……用別人的手做工！因為你們的大事業，有多少人哭出了鮮血？就是在地獄裏，也沒有你們這班混蛋的位置，因為你們的這些功績……。不是在火坑裏，而是在沸滾的糞坑裏，要煮爛你們呢。幾百年你們也受不完你們的罪呢……”

高爾基在自己對於被壓迫被剝削的人類的文藝上的服務的最初時期，就不會把“用別人的手做工的”資產階級，當做光明的源泉看待。他的呼聲，暴露着資產階級是黑暗，壓迫，醜態，窮困的源泉。資產階級的批評界正是從“福瑪·高爾狄耶夫”和“三個”起，就很清楚的看出了：要想爲着自己的目的來利用高爾基的創作是不行了，高爾基是資產階級的仇敵，高爾基是同無產階級和全體的勞動人

類在一起的。因此，從“福瑪·高爾狄耶夫”和“三個”起就開始了那種‘高爾基才能的低落’的叫喊，這種叫喊一直跟隨着高爾基後來的全部文學事業的發展；對於這些叫喊，其實結實的三十年，三十五年的文學事業紀念很可以對付得了。資產階級批評界的小狗仔叫得累極了，而無產階級文學的象儘管自己前進，從一次勝利進到另外一次勝利，完成着自己的工作，爲着創造無階級的社會而努力，在那無階級的社會裏，資產階級根本就要沒有了，無論在經濟裏，文學裏，文藝批評裏，都沒有了。

‘三個’就已經完全沒有疑義的表現高爾基估計着哪一種力量可以來改造這周圍的殘酷窮困的生活，他從第一篇小說起就暴動起來反抗這種生活的。不是伊里亞的道路，做生意和賺錢的道路，也不是那馴服的乖乖的雅柯夫的道路，而是無產者巴威爾的道路，經過困苦和血，經過長期的艱難的鬥爭，引導到勝利，引導到社會主義的生存條件的完滿和愉快。“市僧”裏的機器匠尼爾也是這樣的現實主義的形象，不但在多多少少只是將近來到的將來，估計到生活的革新，而且在今天，他那有創造行動的無產者和革命者的生活的豐富，就同俄皇制度俄國裏的市僧的庸俗主義的灰色生活對立着。劇本“仇敵”，甚至於普列哈諾夫，——我們在下面可以看見，他是懷疑而不贊成高爾基的社會主義的（因此，也就懷疑無產作家的高爾基的），——也承認這個劇本巧妙的描寫了“現代工人運動的心理”。

普列哈諾夫對於高爾基的小說“母親”的不贊成態度，那是更有意義，更有教訓的事情。形式上，這部小說裏的事變是根據1902年時期的索爾莫夫工人運動的事實的，而事實上，“母親”這部小說——是關於1905年革命的小說，這是在那次革命的新鮮印象之下寫成的。這小說的‘英雄’巴威爾和他的母親毗拉格雅·尼洛夫娜——是社會民主黨的布爾塞維克。這部小說的布爾塞維克的性質正是普列哈諾夫的不贊成的批評的原因。反對着孟塞維克的意見，“母親”這部小說一出版就流行到全世界的工人讀者之間，雖然有一些次等的缺點，而作者在藝術上是成功了的。牠到現在還感動着讀者，到現在還是全世界工人讀者所愛讀的書。孟塞維克的批評界只能夠吹毛求疵的來證明這部小說以及牠的‘英雄’的不真實和反藝術性。庫毗柯夫(6)提出了母親的歡樂的情緒——這是高爾基時刻着重的表現着的——作為反對高爾基，“打死”高爾基的理由。的確，老年的尼洛夫娜，還保存着宗教的情緒，而發見了積極的革命鬥爭之中的生活意義，就經常的感覺到歡樂的感動，甚至於在她自己受苦的時候——她看見爲着真實和公理的鬥爭越來越團結着更多的工人和農民，看見新的光明的生活的接近。這裡，沒有絲毫反自然的，因此，也沒有絲毫反藝術的。如果站在庫毘柯夫的觀點上，那末，就要承認“戰爭與和平”裏的尼古拉·洛斯託夫也是空想出來的，因爲託

(6) 庫毘柯夫——Kubikov, 孟塞維克。

爾斯泰也“在描寫他的心理的時候，死板的重複着”，着重的指出着他在打仗時候的愉快的特點。高爾基在那部小說裏，完全合於馬克斯主義的表現了工人階級被資本主義制度壓迫着，處於畜牲的地位，在齷齪，窮困，愚昧之中，怎樣在爲着消滅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的影響之下，在鬥爭的過程之中，取得了真正的人性：——感覺自己的身份的自尊心，積極性，發動性，對於壓迫的不容忍，對於剝削和不公道的反抗，集體主義的精神，對於婦女的尊重，對於智識和文化的追求。反抗物質上精神上的窮乏，反抗沙皇的俄國的日常生活裏的禽獸似的殘酷的高爾基，不在無產階級裏面——無產階級是不但爲着推翻帝制政體，而且爲着社會主義而鬥爭的，不在那個政黨裏面——那政黨的領導是要把一切民族，整個地球，都從資本主義和牠的私有主義的禽獸道德之下解放出來的：高爾基不在這裏來找着真正的人性，真正的人的態度，那還能夠在什麼地方去找着呢？並非虛偽的成見，而是藝術上的現實主義的正確道路，引導了高爾基到“母親”這部創作的。

高爾基真實地在小說裏表現了二十世紀俄國鄉村裏所發現的新現象：——積極的不滿意的精神，反抗的精神，對於皇帝，長官，以及舊制度的鞏固已經喪失了信仰，而對於革命的宣傳卻有了迎受的力量。高爾基表現了革命的布爾塞維克的社會民主黨建築着那個工人和農民的聯盟，這個聯盟在一九一七年保證了沙皇制度的推翻和

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這並沒有絲毫空想的，‘反藝術的’在內。恰好相反，政治上藝術上的真實的呼聲，在領導着高爾基描寫這種黨的革命工作。

“母親”這部小說已經是在 1905 年革命的結束時期寫的了。高爾基對於革命勝利的保證的堅定的不可動搖的信仰，他對於黨和黨的工作的欽佩的態度，恰好來得‘適當其時’。那時候，反動開始了，跟着就有那樣毒害的沉悶的空氣，失望，叛變，取消主義。而“母親”卻創造着黨的事業，準備着新的鬥爭，教育着神聖的忠實於祕密黨的精神。

既然有了這種情形，列寧和高爾基的接近和友誼是很自然的。列寧很高的估量着高爾基的藝術創作。“高爾基同志非常之鞏固的用自己的偉大的藝術作品同俄國和全世界的工人運動聯系着”——1909 年列寧這樣寫着，否認資產階級報紙所造的社會民主黨開除高爾基的謠言。“沒有疑問的——列寧在 1917 年又重複的說起這種估量，——高爾基是鉅大的藝術才能，他對於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運動已經給了，並且還要給許多益處。”

高爾基關於列寧的回憶，很鮮明的給我們描寫着列寧對於高爾基的親熱的關心的態度，他對於高爾基的友誼的幫助和贊助，他對於高爾基和高爾基的創作，經常不斷的贊助着。這創作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事業是極端重要的。普列哈諾夫和高爾基會面的時候，普列哈

譚夫的反應是客氣的，冷淡的，形式的；在這種背景上，列寧對高爾基的態度就格外顯露的表現出來。“人家把我‘同到’G. V. 普列哈諾夫跟前的時候——高爾基說——他把兩隻手交叉着放在胸前站在那裏，很嚴肅的，有點兒無聊的看着，像是疲倦的盡着自己的責任的教員又會見一個新學生似的看着。他給我說了一句很普通的話：‘我是你的才能的崇拜者。’除此之外，他所說的話，我絲毫都記不起了。在整個大會的期間⁽⁷⁾，在他和我兩方面都沒有再發生‘談談心’的願望。而那一個禿頭的健談的茁壯而結實的人，一隻手摸着自已的蘇格拉底式的額角，另外一隻扯着我的手，親愛地閃爍着他那異常活潑的眼睛，立刻就講起“母親”那部書的缺點——原來他讀了“母親”的原稿，大概是在I. P. 拉德日尼柯夫那邊拿去的。我說那部書寫得很匆忙，但是沒有來得及解釋為什麼匆忙。列寧同意的點着頭，自己解釋了：很好：我總算趕上了，這本書是需要的，許多工人不自覺的，自然而然的參加了革命，現在他們讀着‘母親’可以得到不少益處。”

高爾基不但像一個藝術家似的做了無產階級革命的事業。他對於黨有許多貢獻，參加了黨的出版部，幫助黨創辦幾種雜誌，幫助

(7) 1907年春天，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在倫敦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高爾基以‘發言權代表’的資格出席的。

建立秘密關係等等。

馬克西謨·高爾基的有些觀點裏，有一種很有趣的特點，使得他同別一個偉大人物接近，這個人，蘇聯的各民族很有理由驕傲的——就是尼古拉·加甫利洛維支·赤爾納塞夫斯基。高爾基在自己的一個人物的嘴裏放進了一句格言：“人——這個字的聲音是高傲的”，高爾基在舊時俄國的野蠻的日常生活裏，像在野獸窠裏似的，看着人的個性怎樣被束縛着，人的健全的天性怎樣在這裡躑躅着，他看得實在太多了，他所以時常戰鬥着，擁護被壓迫被蹂躪的人的個性，經常的提高自己的呼聲，主張創造人的正軌的理智的公道的生存條件。這個特點，譬如說罷，表現在高爾基的那首詩或是散文詩“人”裏面。再則，赤爾納塞夫斯基過分誇張着人類發展歷史裏的智識的意義（關於赤爾納塞夫斯基——可以說是唯心論的誇張）。在“沒有地址的書信”裏，赤爾納塞夫斯基，這個偉大的革命家無條件的站在準備下層民衆的反農奴制度的革命的道路上，卻表示了自己的一些恐懼：他怕那些愚昧的沒有擺脫野蠻偏見的農民羣衆也許會損害文化，科學，詩歌，藝術，智識階層的利益。高爾基也是這樣，不過是另外一種形式，他有時候擔心着高等熟練的智識階層，所謂“太陽的孩子們”（他的一部劇本的題目就是這樣的），會同文化程度還不夠的下層民衆分裂的問題。

俄羅斯的馬赫主義派(8)撤回派(8)就企圖抓住高爾基宇宙觀裏的這些特點，有時候還有簡直是反對革命的幸災樂禍的人，也在這方面來企圖利用偉大的普洛藝術家的極大的威信。可是，藝術家的巨大才能的真實性，政論家的警覺性，把自己的力量交給了一個目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凱旋，——這就永久克服了一切障礙。高爾基的這些勝利的戰鬥，極鮮明的照耀着人類現在所經過的歷史階段，以及高爾基在這階段上的作用。在過去，人類的燈塔，勞動者的理智，良心和希望，幾次三番舉起了暴動的旗幟，爲着要創造沒有人剝削人的制度。然而，當時工人階級沒有形成，沒有生長，沒有擔任起創造新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任務，所以以前的人即使推動着歷史前進，而他們的努力始終沒有開闢最後的出路——引導到歡樂的將來的光明道路上去的。甚至於赤爾納塞夫斯基，他的行動時期已經是馬克斯在西歐展開了科學的社會主義旗幟的時候，也沒有能夠了解：只有階級鬥爭，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才能夠引導到他的理想的勝利。甚至於史赤德林，他是整個心靈憎惡着自由主義派，半吊子辦法的空談家，以及在爲着創造新的社會主義形式的生活的艱苦鬥爭周圍糾纏

(8) 馬赫——Mach，奧國哲學家，所謂“經驗批評論”——一種新的唯心論，感覺論的領袖，俄國的馬赫派就是波格唐諾夫等。政治上就成了“極左”的撤回國會代表論的一派，這是一九〇七年後的布爾塞維克內部的一派，列寧有時說他們是“左的”取消派。

着的偽善者的，甚至於他，也會突然使得那可惡的偽善者——農奴主猶杜施卡·哥洛甫列夫(9) 的生活的結局，只是良心的呼聲的覺醒。

這種迷惑和迷誤，在工人階級還沒有開始自己的推翻階級社會的鬥爭的時候，即使是最好的人物之中的最好的，也不能免的。在高爾基，他過去的宇宙觀裏的這些特點——我們上面所指出來的——已經只是發育不全的殘餘的形式，這是以前，在推翻剝削者，解放被壓迫者的強大力量——無產階級沒有出現之前，人類的最好頭腦也不能夠克服的一些困難的反映的殘餘形式。高爾基開始自己的事業的時候，革命鬥爭的領導者已經是無產階級，他了解了，取得了無產階級的學說，他成了無產階級隊伍裏的戰士，他把自己的光芒歸併在工人階級的鮮明的烽火裏，照耀自己的道路，以及一切皮色，一切國家的勞動者達到共產主義的道路。所以，高爾基的事業，證明着人類總算已經走近了自己的解放，所以，他是最偉大的無產階級的作家，所以列寧說：“高爾基無條件的是無產階級藝術的最偉大的代表，他對於無產階級藝術已經供獻了很多事，而且還能夠供獻得更多呢……在無產階級藝術的事業上，M. 高爾基是個極大的‘正號’，雖然他對馬赫主義和撤回主義表示同情”（1910年寫的）。

高爾基——是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積極的參加無產階級反對

(9) 猶杜施卡·哥洛甫列夫是史赤德林的一篇小說裏的人物。史赤德林的真姓是薩勒特柯夫 (Shtchedrin-Saltykov)，是俄國十九世紀的最偉大的諷刺作家。

資產階級的鬭爭，他用政論家的資格，也用藝術家的資格參加階級鬭爭。對於他的藝術事業的其他一切定義，——不管是從那里發出的，從敵人方面或是可憐的朋友方面，——通常都不過表現着派別主義的褊狹，或是那些下定義的人自己的教條主義。普列哈諾夫說：“M. 高爾基自己很不行的消化了那無產階級給全世界的真理。這可以解釋他在文藝上的許多缺點……如果他好好的消化了這個真理，那末，他所委託來宣布這個真理的‘英雄們’，也就不會在每一個方便的以及不方便的機會，都出來說那種模稜兩可的廢話。”這個不公道的，不正確的判決的來源，一方面是他研究藝術創作時候的那種教條主義式的書生式的應用馬克斯主義的方法，別方面，是和他認為列寧並非馬克斯主義者而是巴枯寧主義者同樣的動機。孟塞維克的普列哈諾夫嫌惡着高爾基的布爾塞維克的同情。對於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敵視和不了解，就產生了對於高爾基藝術創作的敵視的估量。的確也不會有別一種的情形，因為高爾基正當的指出來：他這個藝術家和政治家，的確是同布爾塞維克聯系着的——“真正的革命性，我正在‘布爾塞維克’裏，正在列寧的文章裏，在跟着列寧的那些智識份子的言論和工作裏感覺到了。我在1903年就‘附和’了他們。”

固然，高爾基的傑作，像“沃苦洛夫城”，“兒童時代”等等出現的時候，孟塞維克企圖爲着自己的利益而利用牠們。辣飛爾·革里哥

里耶夫在自己論高爾基的那本書裏面，企圖說明高爾基的藝術紀錄的政論上的意義是反對右傾和左傾的政治烏託邦的，也就是反對布爾塞維克主義的，革里哥里耶夫(10)論高爾基的書上說：“不要忘記——‘莫斯科’不過是半裸的叫化子頭上的一頂海狸皮的帽子，在這‘莫斯科’的薄薄的一層外皮底下，還躺着沉重的，沒有改變的，會把一切都壓成碎塊的沃苦洛夫主義…… 這部作品的客觀上的意義是這樣的，不管作者是否把這一類的意思自覺的放進作品裏去……”

“沃苦洛夫城”，“兒童時代”，“人羣裏”以及其他絕妙的，完全現實主義的高爾基小說，的確有政治上的意義，這是這些作品的藝術布局的整個邏輯所暗示着的，然而這些作品的政論上的意義和邏輯，恰好證明着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正確，而並非相反的。這些作品裏的高爾基的現實主義——是真正社會主義的，有革命前途的現實主義。他不但敘說着沃苦洛夫式的俄國的可怕的真實，而且號召着反對沃苦洛夫主義的鬭爭，他的每一行文字都在號召爲着另外一種的，更好的，社會主義的生活而鬭爭。這些作品裏的這種號召的一貫性，正是反對高爾基所準確的稱爲‘社會耶主爺派’(11)的那些人的，這種人用自己的妥協主義，自己對於統治階級的奴膝婢顏的態度和行爲，去

(10) 革金哥里耶夫——Rafail Grgoriëff, 孟塞維克的文藝批評家。

(11) 社會耶主爺派——Social-jesuitist; 所謂‘耶主爺派’是天主教的一個派別，通常變成了“陰險任妄”者的意思。

鞏固俄國的“沃苦洛夫主義”，鞏固全世界的資本主義。

高爾基不但會愛好，而且會激烈的憎惡。高爾基的這些完美的藝術創作充滿着對於舊時俄國的陰慘的現實生活的深刻的憎惡。

“記起野蠻的俄國生活裏的這些鉛似的醜惡——高爾基在‘兒童時代’裏寫着——我有時候這樣問自己：值得說起這些事情嗎？而重新深信地回答自己：值得的，因為這是活着的卑劣的真實，牠到今天還沒有斷氣。這樣的真實，必須澈底的知道，為的把牠從自己的記憶裏，從人的心靈裏，從我們這艱苦的可恥的全部生活裏連根拔盡。”

“還有一個別的，更積極的原因，使得我要描寫這些醜惡。雖然牠們很討厭，壓迫着我們，壓碎着許多非常之好的心靈，——而俄國人始終還有年青的健全的心靈，足以克服牠們而且一定要克服牠們的。”

“我們生活的奇妙，不但在於這裏面有着繁殖的濃厚的一層一切種種畜牲生活的硬殼，而且在於穿過着這一層硬殼，始終勝利地在生長着那種鮮明的，健全的，創造的，始終在生長着善良的——人性的，驚醒着不可動搖的希望，使我們回復那光明人性的生活的希望。”

“善良的——人性的”在俄國已經經過工人階級的革命鬭爭而生長出來，高爾基用自己的巨大的才能幫助了這個鬭爭，參加了這個鬥爭。

俄國文學裏，這樣的書——像高爾基的自傳式的小說的書還太

少，這樣的書充滿着對於豺狼似的私有主義世界的憎惡，充滿着爲着新的反私有主義世界，社會主義世界而鬥爭的行動力量，那樣的憎惡後來使得高爾基提出那個“如果敵人不投降——就要消滅他”的口號。

高爾基在自己的四十年文學紀念的時候，站在我們國家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最前線。他的龐大的，還沒有結束的紀事詩“克里謨·薩謨京的生活”——是告發整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智識階層的罪狀書，那智識階層不能夠克服自己的自私的階級利己主義，而留在剝削者和戰爭的組織者的隊伍裏了。薩謨京——是那種“美人兒”之中的一個末代子孫，這就是世界文學和俄國文學裏的心愛的“美人兒”（高爾基的說法），是所謂“十九世紀的青年人”，“他多多少少畸形的生長着——催眠着自己的“我”，在市儉生活的條件裏找不着自己的適意的位置，卻也找不着任何力量和志願來企圖改變這些條件。”

“克里謨·薩謨京”——這篇紀事詩的中心人物——他的特點描寫得那麼淋漓盡致，他的形象描寫得那麼藝術，那麼完滿，以致於他的名字也可以像沃勃洛莫夫那樣，成爲一個普通名詞。這沒有通行的緣故，僅只因爲我們的生活，比較起“四十年”⁽¹²⁾的三大卷裏所描寫的來，已經是另外一個時代，已經是一個新的世界了。薩謨京

(12) “四十年”——是“克里謨·薩謨京的生活”的另外一個名稱。

們被歷史打死了。二月革命，如果照着孟塞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的“藥方”發展下去，那簡直會給薩謨京們大大的勝利的。然而二月革命之後又來了十月革命，生長薩謨京們的泥土重新耕種過了，撒下了另外一種的種籽。自然，薩謨京們還剩下了一些。他們在十月之後還弄髒了不少，現在也還在弄髒我們的社會，然而，他們已經不足以決定我們的現實的本質，就連我們現實的外表也不能夠決定的了。僅僅因為這個緣故，“薩謨京主義”這個字沒有像‘沃勃洛莫夫主義’那麼樣的意義，沒有像“沃勃洛莫夫主義”那麼流行。

是的，薩謨京在俄羅斯式的市儈生活裏找不到自己的適意的位置，這特別是因為俄羅斯式的市儈生活還沉溺在專制警察農奴制度的豬糞主義的氛圍裏面。他思索着改造日常生活的問題，他就生活在那樣的環境裏，他尋找着什麼更好的生活的道路。然而薩謨京同產生他的生活環境聯系得太密切了，他也太猥瑣，太利己了，所以不能夠得到什麼真正先進的見解。對於他，見解不過是一套空談的系統，人們用這樣的空談掩蓋自己的自私的低級的動機。而且，他，這個薩謨京律師本來就不這麼有智識，本來就不這麼有教養。他覺得，命運把他的生活期間放到了一些根本的歷史變革的時代。然而他所關心的，僅只是在這時代的大震動之中，自己去找着一個安寧的舒服的避難所，很像樣的，用一些適合于他和他那一羣的地位的意識形態的沒有害處的花朵裝點起來。他只愛他自己，他懦弱，他會做

出些卑劣行爲來：告發自己的同志，在憲兵審問他的時候‘幾乎’說出來；他喜歡安寧和舒服；他的結婚，他的家庭生活，以及他的離開自己的老婆，都是很善意的，很平凡庸俗的，他把一切都簡單化，他只想把一切偉大的有意義的東西上的“神光”都給抹殺，使這些東西像他自己一樣。然而同時，薩謨京會把自己扮成一個深思遠慮的很有意義的人的樣子；人家幾乎要把他當做一個黨外社會民主黨布爾塞維克。

然而薩謨京的心靈的深處所幻想的，卻不是什麼別的，正是一切必要的變革都要和平地，進化地，沒有震動地進行，保存着他的安全，安寧和財產。他想要在革命之中滑過“是或者不是”的問題，他想要在暴動的時候不站在防禦物的任何一方面。頑皮的人們，跑出了已經建立的範圍，革命的沸騰和那種緊張的等待着崩陷的情形，對於薩謨京是那麼不可容忍，他甚至於會幻想一下堅定的政權，即使是尼古拉第二的政權也好，只要能夠保證他那狹隘的小小的“我”不受騷擾，僅只是專制制度的無意識，甚至於單在表面上也絲毫不肯對時代精神讓步，這才推動他左傾。自然，怎麼不左傾呢，很沒有什麼罪過的克里謨都給逮捕起來，而他這個看客在一月九日幾乎沒有打死等等。而且，要知道大家都在左傾，而他這個“先進份子”可以落伍嗎？於是克里謨就幾乎要同情莫斯科的巷戰，在一九〇五年武裝暴動的時候。

然而薩謨京背着自己的“左傾”，彷彿是車轅，彷彿是艱難的強

迫的義務。他要的是進化，而不是革命，是安全，而不是砲火。他不知道羣衆，不知道工人和農民。暗地裏他在害怕着他們，不喜歡他們，等到有什麼機會可以歎息他們的時候，他是幸災樂禍的。

薩謨京們，以前永久是文藝界所讚賞的。藝術的文學，永久在引起對於薩謨京們的同情或是羨慕，這倒要看這些“美人兒”之中的某一個人的性格和地位而定。高爾基在藝術裏貶斥了薩謨京們，他暴露了他們的低微，他們的全部空虛，他們的脫離羣衆和在羣衆之前的無能爲力。高爾基用另外一種態度來描寫俄國文學和世界文學以前所崇拜的“美人兒”，他也就執行了偉大的教育工作。

但是，高爾基在自己的反對舊世界勢力而贊成新的共產主義的生存條件的鬥爭裏，並不只限於運用藝術的文字。他運用了自己的無產階級政論家的老武器。高爾基的政論文字高聲的號召着鬥爭而勇敢的相信着勝利。他在驚醒着世界的智識階層的優秀代表的良心，他們，世界的智識階層，在經濟危機的打擊之下開始了解真實在那一方面，將來是屬於誰的。

他非常之耐煩的鼓勵許多同他通信的人，從新的，意外的方面指出新的勝利的力量，指出資本主義文化崩潰的可怕的景象。他在自己的許多論文裏，暴露資產階級的根本敵視文化，而展開蘇維埃國家的文化革命的勝利的進行。

現在，那些不負責任的野獸發寒熱地準備着新的屠殺，高爾基的

呼聲是那麼需要的，那麼適當其時的號召着，他衝破着資產階級政府的國界和禁令，號召反帝國主義戰爭的戰爭，號召最後的決死的戰鬥——爲着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原則的勝利。

在上次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高爾基站着失敗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立場。現在，高爾基用新的力量，用青年的興奮精神，出來反對日益生長的戰爭危險。荷蘭政府不准高爾基去出席反戰大會。然而高爾基的言論——是個力量，他能夠克服障礙。俄皇的檢查官沒有能夠堵住他的呼聲；資本主義的奴才的努力也不能夠堵住牠的。高爾基的呼聲達到了每一個憎惡戰爭的人，鞏固那些反對產生戰爭的秩序的覺悟的人的立場，鼓勵並且引導一些動搖的份子，驚醒許多人的良心，在他們——這良心有時候還在磕睡呢。

高爾基在自己的反戰大會上所“沒有講的演講詞”之中，最後一段是號召無產階級和智識階層“出全力來組織最後的決死的戰鬥，去反對毀壞文化的階級敵人，這文化是體力勞動和智力勞動的工作人員幾百年來的努力所造成的。”然而，如果階級敵人還來得及再放出一場戰爭的野獸，那末，高爾基要給一個唯一正確的革命行動的榜樣。“如果反對這個階級的戰爭爆發起來，而這階級的力量是我所靠牠生活和工作的，——高爾基宣言：——那末，我也要跑到牠的軍隊裏去做一個普通的戰士。我要去的，這並不是因爲我知道牠一定要打勝，而是因爲蘇聯工人階級的公理的偉大事業，這就是我的事

業,我的責任”(“無恥的反人性”,1929年)。

四十年來,馬克西謨·高爾基站在爲着社會主義的鬥爭的戰鬥立場上,站在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老將的職位上。蘇維埃國家和全世界的工人階級,一切承認無產階級是自己的領袖的勞動者,都充滿着愛情和尊敬,慶祝偉大的無產階級藝術家,願意他長壽和得意的工作。

譯自“普拉夫達報論高爾基”集——1933年十月。

高爾基著作的英文名稱

因為中國的譯名不統一，所以我們把這篇文章所提起的高爾基著作的英文名稱排列在下面。也許，讀者可以因此找着英文本，或是漢文譯本而研究一下：

	英文名稱	原文名稱(用拉丁字母拏音的)
“ <u>馬卡爾·楚德拉</u> ”	“Makar Chudra”	“Makar Oh dra”
“ <u>老太婆易塞基爾的故事</u> ”	“Old woman I zergil”	“Rosskaz staruhi Izer, ilia”
“ <u>底層裏</u> ”(夜店)	“Lower Depths”	“Na dne”
“ <u>避暑客人</u> ”	“Summer Folk”	“Dachniki”
“ <u>福瑪·高爾狄耶夫</u> ”	“Foma Gordeyev”	“Foma Gordeyev”
“ <u>三個</u> ”	“Three of Them”	“Troje”
“ <u>仇敵</u> ”	“Enemies”	“Vragi”
“ <u>市儈</u> ”	“Smug Citizen.” (?)	“Meshchane”
“ <u>母親</u> ”	“Mother”	“M t”
“ <u>太陽的孩子們</u> ”	“Children of the Sun”	“Deti Solntsa”
“ <u>沃苦洛夫城</u> ”	“Okurcy Town”	“Gorodok OkuroA”
“ <u>兒童時代</u> ”	“Child hood”	“Detstvo”
“ <u>人羣裏</u> ”	“In the World”	“V liudi ih”
“ <u>人</u> ”	“Man”	“Ochelovek”
“ <u>克里謨·薩謨京的生活</u> ” (“四十年”)	“The Life of Kim Samgi” (“Forty years”)	“Zhezn Klima Samg na” (“Sorok let”)

譯者誌。

高爾基的文化論

A. S. 布勃諾夫

我受着蘇俄政府的委託，到這紀念大會上來說幾句話。在 A. M. 高爾基的文學的和革命的四十週年的日子，我用蘇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名義，慶祝我們的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鼓掌）。

四十年前，俄國文學裏開始了一個強有力的支流，這支流是和 A. M. 高爾基的名字聯系着的。

高爾基的鉅大的才能，偉大的藝術作品，以及有絕對意義的藝術活動和社論家的活動，使得他同俄國文學的最高的頂點並列着。

他在文學裏開始建立新的派別，因為，用列寧的話來說吧，他“無條件的是無產階級藝術的最偉大的代表，他對於無產階級藝術已經供獻了很多，而且還能夠供獻得更多呢”⁽¹⁾。

然而在高爾基的龐大的形象裏，還有一點非常重要，非常有意義的特點，我想在這里來說一說。高爾基自己說的：列寧關於他的作

(1) 原註——見列寧文集，卷十四，298頁，

品“母親”親自同他說了——“很適當其時的一部書！”關於高爾基，也可以這樣說——“很適當其時的”作家。

高爾基的這種絕對的，非常重要的特點：“適當其時”，以及他的最重要的作品，都有極深刻的根源。這種根源是在於高爾基和他的才能極端鞏固的同當代的歷史轉變聯系着，這些轉變使得俄國的歷史高升到了具有世界史意義的事變的水平線。

俄國歷史裏的兩個時代，兩個具有鉅大的歷史意義的事變的鏈環，是牠的頂點：——一是反對和推翻專制農奴式的沙皇制度的時代，二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代，俄國革命的歷史用這兩個飛躍加入了世界史。

高爾基的道路正是同這兩個時代聯系着的。我們國家歷史上的這些鉅大的革命高潮，也就是高爾基創作的頂點。

1913年，列寧寫了：高爾基“用自己的偉大的藝術作品同俄國和世界的工人運動聯系着”(2)。

1928年，高爾基在回答蘇聯的“機械的公民”裏說着他自己，他寫了：“布爾塞維克已經占領了我二十五年。公民們，我也是‘坐過監獄的’，不過沒有像任何一個老布爾塞維克坐得那麼久，那麼艱苦的監獄”(3)。

(2) 原註——見列寧文集，卷十五，上。

(3) 原註——見高爾基：“我們守衛着吧”，第14頁。

高爾基極密切的同無產階級和牠的政黨聯系着，經過了許多年，那些年代還是俄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時代。我上面所引的那篇1928年的高爾基的文章說：“我正是在‘布爾塞維克’，在列寧的文章，在跟着列寧的那些智識份子的言論和工作裏，感覺到了真正的革命性。”

這個“同俄國和全世界工人運動的”聯系，這個同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布爾塞維克黨的聯系，就決定了高爾基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年代，也同着無產階級和牠的政黨一起前進，這些年代充滿着偉大的勝利，也充滿着巨大的困難。

對於沙皇制度的革命的襲擊，那三次日益生長的高潮和力量，向前進行着，表現了1905年的強大的革命。這就是九十年代的工人運動的高漲，九十年代初期的革命前夜的高潮，和1905年的革命的暴風雨(4)。

高爾基的藝術活動，正是在俄國革命史上的這些最好的年代，發展了，前進了，生長了，而在藝術上和政治上鞏固了。在九十年代，高爾基寫了好些短篇小說，充滿着革命的浪漫諦克的。在“老鷹曲”裏，這是1895年寫的，他歌唱着“勇士的瘋狂”，而深信的宣告着：“然而時候是要來的——你的熱血的點滴，要像火星似的，在生活的

(4) “九十年代”是十九世紀的一千八百九十幾年，而“九百年代”是二十世紀的一千九百〇幾年。

陰黯裏爆發出來，要燃燒着許多勇敢的心對於自由光明的瘋狂的渴望！”

1901年，他寫了“海燕”曲。“讓暴風雨來得厲害些吧！”——他發出這強有力的號召。而形容高爾基這幾年的藝術活動的最鮮明的字眼，也正是——“海燕”（“暴風雨的報告者”⁽⁵⁾）。

之後，就出現了他的好幾部偉大的藝術作品。1906年出版了劇本“仇敵”——1907年，在國外出版了他的兩卷的長篇小說“母親”。

1912年，列寧在寫給高爾基的一封信裏說：“你不寫張五一的傳單嗎？或是寫張五一精神的小傳單？短短的，‘振作精神的’，a？來點兒舊調頭——回憶一下1905年”⁽⁶⁾。

現在，難道還不是收集高爾基的“振作精神的”傳單，來發行一本專集的時候嗎？這些傳單，還是他在第一次革命的時候寫的。這可以補充他這個藝術家和革命家的傳記裏的缺陷。順便的說吧，我有一次需要高爾基在1906年所寫的一張傳單，題目是“不要把錢給俄國政府”，可是，結果還是在一本很舊的舊雜誌“紅旗”裏找到的，那種雜誌是圖書館的珍品了。

最近十年，這是我們國內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和深刻的進展的

(5) 俄文的“海燕”——Bureveitnik，正是“暴風雨的報告者”的意思。

(6) “列寧集刊”卷三，523頁（原註）

十年，高爾基的創作升到了更高的頂點。

1923年他發表了“我的大學”，這裡，除開那些過去的專制農奴式的剝削者俄國的景象以外，除開描寫“仇恨和殘忍的無窮的鏈條”以外，還表現了“勞動的英勇的詩意”，“勞動生活的音樂”；高爾基說，這種詩意和音樂“直到今天還很舒適的陶醉着我的心”。

1925年，發表了“亞爾託馬諾夫家的事業”——在藝術形式上是非常之美妙的一部三代的歷史，這是“那正在走過去而且很快就要走完的階級”的三代的歷史，——高爾基在1928年，在莫斯科的一次共產青年團的會議上，自己這樣說的。

高爾基在自己的非常之好的關於“列甫·託爾斯泰”的回憶錄(1919)裏，提起過這件事情：“我給他（託爾斯泰）講了我的熟人，一個商人的家庭的三代的歷史，這段歷史裏退化律是特別的，毫無憐惜的起了作用。”

在1927年，高爾基開始發表他的第一等的藝術的紀事詩——紀念碑式的“克里謨·薩謨京的生活”。

昨天，在華赫坦哥夫劇場的舞台上，我們看見了非常之好的戲劇——“蒲雷曹夫”(7)，在這個劇本裏，高爾基用尖利的，打擊的，鮮明的滑稽戲的形式，描寫了俄國資產階級的“世紀末”。

(7) “蒲雷曹夫”——原名是“耶哥爾·蒲雷曹夫和其他”，漢文譯本已見“文學”第四期至第六期，這是高爾基新著。

最近幾年，高爾基的具有絕對力量的社會論文的發表，他那種鋼鐵的堅硬和打鏗的譏諷，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這使得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 M. 高爾基同革命的工人階級和共產主義更加密切，更加親近的聯繫起來。

我們國家歷史上的兩大時代，也就是藝術家的高爾基和社論家的高爾基的創作高峯的兩個時期。這使得高爾基同俄國和全世界的革命運動永久的聯系着，這使得高爾基成爲工人階級的偉大作家。M. 高爾基親密的整個的屬於無產階級，因此，他也屬於人類的歷史。

而且，這種情形很明顯的反映着高爾基對於文化的態度，以及他對於這方面的各種問題的態度。我講到這個題目的時候，首先就要指出高爾基的特點：他非常之高貴的估量到文化的價值，文化的前進，文化的成績。而且，這裡所謂文化是最廣義的，包含一切的意義的。

高爾基的看重文化，首先就在於他認爲文化是人類偉大的創造的工作的表現。高爾基對於這方面的觀點的根本態度——是非常之高貴的估量着對於生活的積極的，行動的，戰鬥的，如果可以這麼說，那簡直是建設的態度。高爾基認爲不調和和“生活的意志”是高於一切的。他知道那偉大的公式——所謂“整個以前社會的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的價值和意義。

幾年以前，有人說高爾基對於“資產階級的文化”抱着一種“市

僧式的崇拜態度”，這是造謠誣蔑。

高爾基在最早的九十年代的小說裏，就已經表現了對於舊文化，奴隸性的，剝削者的文化的憎惡，以及熱烈的要求新文化的傾向，要求革命階級的文化的傾向。高爾基的第一時期的“英雄”的自發的無政府式的抗議，其實暗藏着一種還沒有完全自覺的，對於新文化的極大的渴望，這是創造者的新文化，也是高爾基自己這種典型的新文化。

1930年，高爾基在“論叛徒”裏說：“三十年前我就寫過‘過去的人’，然而我並不曾擁護他們，我不過表現了他們。”

1903年，高爾基寫了“人”。我們在這裡可以讀到：“我的來，是爲着要照耀全世界，溶化這世界的神祕的隱謎的黑霧，找着世界和自己之間的和諧，創造自己之中的和諧；在這苦難的大地上，像皮膚上的疥瘡似的，蓋着一層不幸，悲哀，苦痛，惡毒的硬殼，要照耀這大地上的生活的全部陰黯的混亂——而把一切兇惡的污濁，全都掃進過去的墳墓！”

高爾基的一生一世，受盡了苦痛而得到了對於文化和文化問題正確了解。只要記起他的自傳式的著作，像“人羣裏”和“我的大學”，就很可以正確的了解：高爾基是因爲什麼緣故而這樣高貴的估量文化，估量文化的前進和成績，以及爲什麼這個人要來確定對於所謂文化的最重要問題的正確了解。

高爾基憎恨剝削階級的文化，他憎恨資本主義，憎恨資本主義的熱心的奴才，當差的，幫兇和那些可憐的拍馬屁的傢伙。然而他永久在慶祝着，貪心的注意着真正文化價值的發展。

因為熱烈的憎恨着剝削，壓迫，奴役和屈辱，這都是勞動的人的境遇，所以高爾基到處對於真正文化的根苗，都有極深刻的興趣和高貴的估量。

1913年，高爾基出來反對“魔鬼”(8)的排演，這在當時是一個著名的抗議。他關於這件事的第一封信(1913年九月二十二)裏說：“我們應當仔細的審查一下混亂的過去所留給我們的一切，而挑選出有價值的，有益處的東西，——至於無價值的，有害的，都應當扔開，放進歷史的檔案裏去”(9)。

當時，因為這封信引起了辯論，俄國智識階層之中的“路標”(10)派責備高爾基，宣佈了他的“罪狀”，說他反對朶斯託耶夫斯基，說高爾基否認朶斯託耶夫斯基的偉大的藝術才能，這才能彷彿就可以隱

(8) “魔鬼”是朶斯託耶夫斯基的一篇小說，內容是有點誣蔑革命者的，而排演劇本的人，在1905年之後，又顯然帶着反動的用意的。

(9) 原注——見M. 高爾基：“1905—1916 論文集”，1916年的“Parus”書店出版，第163頁，170頁。

(10) “路標”是一種雜誌的名稱，1905年革命失敗之後，斯德魯維等創辦了這個雜誌，以召智識階級“不要發革命狂已，好好的替高尚精神服務吧。”

(11) 吉百林是英國的帝國主義的作家。

鹿一切，那時候高爾基的回答是：“吉百林⁽¹¹⁾很有才能，然而印度人不能夠不承認他的宣傳帝國主義是有害的，而且有許多英國人也同意這一點”(9)。而在這第二封信的末了，說起“卡辣馬左夫主義”(12)，他寫着：“朶斯託耶夫斯基也偉大，託爾斯泰也是天才，所有你們這些先生們，如果你們覺得有趣，都是有才能的，都是聰明的，然而俄羅斯和牠的民衆——比託爾斯泰，比朶斯託耶夫斯基，甚至於比普希金，不用說我們大家了——都要更有意義些，都貴重些”(9)。

說起高爾基對於剝削和壓迫的抗議來，我倒要提起列甫·託爾斯泰抗議的性質來講一講了。

高爾基的抗議和託爾斯泰的抗議之間，有很深刻的區別。這個區別，使得後來成爲無產階級藝術家的平民高爾基，同貴族託爾斯泰絕對的不同，託爾斯泰表現着被資本主義所吞噬的宗法社會的農民的幻想。“託爾斯泰的思想——列寧說——是我們的農民暴動的弱點和缺點的鏡子，是宗法社會鄉村的軟弱和‘經濟的鄉下人’的懦怯的反映。”

託爾斯泰對於奴隸制度，教會，“審判的滑稽戲”，貴族和他們的文化的抗議，並沒有跳過宗法社會的鄉村小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式的抗議，這種小資產者在農奴制度的剝削條件之下被資本主義打

(12) “卡辣馬左夫兄弟”是朶斯託耶夫斯基的一部小說，帶點宗教的神祕主義的反動傾向的。

着嘴巴，壓迫着，絞緊着，蹂躪着

而高爾基的抗議——卻是強有力的革命的抗議，是同無產階級一起前進而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理論的立場上的人的抗議。

用馬克斯關於烏託邦社會主義的話來說，託爾斯泰的抗議是“站在歷史發展的反面的”。高爾基的抗議卻同歷史的發展完全符合，照馬克斯那個說法，這就是“站在歷史發展的正面的”。

因此，高爾基的抗議在原則上是不同的。這種抗議升到了無產階級宇宙觀的高度，無產階級宇宙觀認為無產階級的文化，是過去一切形式的階級社會的文化之中的有價值東西的“規律性的發展”。而託爾斯泰對於農奴制度和資本主義的抗議，不但要把剝削階級文化之中的一切應當毫無顧惜的摧毀的東西扔掉（大家知道的，託爾斯泰就在這方面也沒有澈底），而且，他還要把這種文化之中的必須保存，占有，而在新社會制度的內心加以批判的改造的東西，也給扔掉。

這裡，必須再三的說明，高爾基寶貴着過去文化遺產裏的最重要的東西，他同時用極大的力量和毫無顧惜的態度，扔開過去文化裏的一切無用的沒落的東西，當智識階層走上資產階級的反動和頹廢主義的道路的時候，他屢次出來堅決的，激烈的反對這種智識階層。這裡，我要再提起他在 1913 年對於排演朶斯託耶夫斯基的作品的抗議。

他在關於這個問題的第二封信裏（1913 年十一月十四），毫無

顧忌的揭穿了路標派的“作家階級”的假面具。

有一個文學家“大聲疾呼”的宣布了“自己無限制的愛好自由”，高爾基就向他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而你願意擺脫什麼而自由呢？可不是要擺脫人和公民的一切義務嗎？”(13) 而在第一封信裏，他說智識份子的號召回到“精神的高尚需要”方面去，只不過是“避開活的事業的遁辭”。

在高爾基的文學活動和革命戰鬥的活動裏，這一次論戰很明顯的表演着高爾基對於文化問題的態度的特點。

1928年，高爾基在“論文化”裏，指出文化的意義和因此而來的“新的道德”，應當“使得工人武裝起來，去堅決的鬥爭，反對工人自己之中的可恥的舊世界遺產的一切……(14)”。

高爾基的文化問題的主張，離得所謂“文化主義”遠得很呢。對於高爾基，爲着社會主義文化的鬥爭，只是國際無產階級的偉大的解放運動和牠的爲着共產主義的鬥爭的組織部分。

高爾基的文化觀，就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吧，充滿着“生活的意志”和“理智的大無畏精神”。

幾十年來，高爾基一直是社會主義文化的宣告人，報信人，和戰士。高爾基仔細的緊張的追求着新文化的最小的萌芽。他非常之

(13) 原注——見 M. 高爾基：“1905—1916 年論文集”第 166 頁，版本同上。

(14) 原注——見高爾基“社會論文集”，49 頁，1931 年 GIHL 版。

注意，並且極端的讚賞着“文化苦力”的工作

“我們時代的英雄——他寫着——是‘羣衆’之中的人，是文化的苦力，普通的黨員，工農通信員，兵士通信員，在鄉村之中工作的讀書室職員，選拔的工人，鄉村教員，青年醫生和農學專家，以及農民的“試驗家”，積極份子，工人發明家，總之——是羣衆的人！最應當注意的，就是羣衆，就是在他們之中去教育出這樣的英雄來”（15）。

這種對於創造的勞動，對於新文化的萌芽的高貴的估量，對於建設者的工作的讚賞，也就產生了，決定了高爾基對於兒童和青年的極端注意的態度。

我們的作家之中，再沒有像他那麼注意，那麼內行的關心兒童文學問題的人。

他要求新階級的文化的建設者去取得過去的文化價值，無窮的勤懇的工作。部分的說，他對於作家的的工作，也當做是堅決的，緊張的，有系統的，有組織的創造勞動。

“文學家——高爾基說，——應當知道得很多，然後，他才會好好的描寫他個人所經驗的那不多的一點，才會用充分簡單的，鮮明的，圖畫似的肯定的形式形容出來。”在這方面，很足以表現高爾基的特點的，是他的組織文藝高等學校的提議。高爾基在“關於列寧”裏說着：列寧問他，高爾基，所希望於無產階級的文學的是什麼。“我

（15）原注——見同上，111頁。

說——高爾基寫着——我所希望的多得很，然而我認爲非常必要的是組織一種文藝高等學校，要有言語學，外國文——西方的和東方的，民間文學，世界文學史，俄國文學史的講座”(16)。

這並不是簡單的組織文藝高等學校的一個實際提議。在高爾基，這是他的收集工人階級的作家幹部的計畫的一部分，而這種計畫又只是創造工人階級的智識階層的鉅大的歷史任務的一部分。

1914年“Priboy”書店出版了一本“無產階級作家集”，有高爾基的序。高爾基在這篇序言裏說：“我們已經可以說，雖然俄國工人的生活條件非常艱苦，然而他始終逐漸的在創造自己的智識階層。”

這里，很重要的，必須指出這篇1914年出版的工人作家的藝術作品的第一本集子的序言裏，高爾基就說了：“很可能的，將來要提到這一本小書是俄國無產階級建立自己的藝術文學的第一步。”他接着就宣言：“我深信無產階級能夠創造自己的藝術文學。”

順便的我又要說起，這本有一篇很好的高爾基的序言的“無產階級作家集”，也已經成了圖書館裏的珍品了。而且，高爾基這篇序從沒有再版過。我們的出版家應當收集高爾基給工人作家的這類指示和通信，而重新印行，尤其因爲其中一部分沒有疑問的已經成了圖書館裏的珍品。

高爾基對於文化問題的態度，也是一個具體的證據，證明他在這

(16) 原注——見 M. 高爾基：“V. I. 列寧”。

方面的觀點是根據于馬克斯列寧主義的理論的。而且正因為這個緣故，他站在世界智識階層的最好的代表之中的前哨地位，世界智識階層的最好的代表，像羅曼·羅蘭，亨利·巴比塞，特沃多爾·德萊賽等等，都認識現代真正文化的負擔者是工人階級。

高爾基——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藝術家。我們知道他是這樣的一個藝術家，我們在他的文學活動和革命活動的四十週年紀念的時候，看見他在這光榮的地位上，我們驕傲着他，我們慶祝他。（鼓掌）。

親愛的亞歷克西·馬克西謨維支！請你准許我代表幾十萬文化工作人員，文化戰線上的戰士，以及我們無產階級的學校來慶祝你，——在我們的學校裏幾百萬正在生長起來的青年，都在學習着高爾基的對於事業，對於學習，對於勞動的共產主義的態度！（鼓掌）。

譯自“普拉夫達報論高爾基”集。按：這篇是蘇俄教育人民委員長布勃諾夫在高爾基文學事業四十週年紀念大會上演講的速記錄。

綏拉菲摩維支“鐵流”序言

G. 涅拉陀夫

綏拉菲摩維支要能夠創造他這一部詩史，必須要先有一百年來的文學的文化。“鐵流”這一部藝術的著作，裏面包含了自己時代的人的磨難和懷疑，鬥爭和痛苦。看綏拉菲摩維支的詩史，就可以知道：比較起我們文學典籍裏所反映的生活，現代的生活是已經走得多麼遠了，十月革命在人的智識和心靈上，已經給了什麼樣的根本轉變和震動。歌歌爾在“Via”和“Taras Bulba”裏面所描寫的哥薩克，比起綏拉菲摩維支的哥薩克來，真是久遠的混沌的過去時代的原始狀態的人兒；綏拉菲摩維支的哥薩克，結算起來，卻已經是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鬥爭，——就算離着社會主義還遠罷。普希金所寫的普加赤夫運動(1) (“甲必丹的女兒”)，比起十月革命來，真只算得

(1) 普加赤夫 (Pugacheff) 運動是俄國十八世紀的一次農民大暴動，他的首領是普加赤夫，東河地方的一個哥薩克。他發動暴動是在一七七三年秋天，利用嘉德璘二世 (女皇) 殺死他兒子彼得的事實，自稱彼得三世，同時，宣布準備廢除農奴制度。參加這次運動的人很多，地域也很廣，失敗於一七七五年。——譯者。

小小的爆發；而十月革命的巨大的火燄，卻用牠的輝煌的光芒來照燦“鐵流”裏面的活的人和死的巖石了。安得列葉夫（“紅笑”）和迦爾洵（“四天”）的人物，在血和霧之中走着，只是些該做犧牲的砲灰，並不知道資本的祭師把他們往什麼地方送，也不知道送去幹什麼。“鐵流”之中同樣是死，是喪失，同樣是極嚴重的痛苦，然而這裏已經沒有羊子似的馴服，已經沒有儼人家躑躅的個性。正相反，每一個人裏面都是十月時代的勇敢的呼吸。

“鐵流”詩史的時代是二十世紀的初期，而且內容上也常常使人想起十九世紀初期的託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綏拉菲摩維支的題材——羣衆運動和這個運動的目的——比較的廣大，可是他的藝術化的形式卻比較狹小。託爾斯泰所反映的封建時代，需要廣大的佈景，單單來講“戰爭與和平”裏面的羣衆的反映，本來就只能夠做一個背景，在這背景上開展着各個人物的詳細的心理圖畫。“戰爭與和平”之中，羣衆的行動，對於作者老實說不是主要的事情；作者所最注意的是彼愛·白朱霍夫，恩德雷·波勒孔斯基，洛斯託夫等⁽²⁾的內心世界和他們對於一切事變的態度。而且和封建制度的懶散時代相稱的，託爾斯泰所寫的行動發展的速度也是很慢很懶散的。我們在“鐵流”之中所看見的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社會革命的目的和速度非常之偉大。革命把個人的動機推到最遠的地方。

(2) 這些人名都是“戰爭與和平”之中的主要人物。——譯者。

“內心的經過”退到了最後的地位，顯得很瑣屑很無聊的了。最主要的——是集體。藝術家完全沒有可能來寫各個“英雄”的內心的情緒。可是，郭如鶴的形像在這部小說裏面仍舊是顯現得很清楚的。雖然藝術上的修飾有時候是很少的，有些地方簡直是很隨便的寫幾筆，很粗淺的，然而描寫出來的景象卻是凸出的，充滿着深刻的動象的。他能夠在小小的一部小說裏面表現整個的時代，指出革命在羣衆心理之中起了什麼樣的根本轉變。託爾斯泰，他是忠實於他的階級的，他對於一般現象都從崇拜封建制度的觀點上去觀察，所以描寫得羣衆是一個馴服的無知無識的羊羣。綏拉菲摩維支忠實於自己的時代和歷史的真理，他所描寫的羣衆就完全是從另一方面着筆的，他寫出羣衆革命意識的生長，寫出羣衆走近十月的道路。郭如鶴所領導的鐵一樣的隊伍行動着，走去和布爾塞維克的主要力量聯合，這比較枯土左夫將軍(3)帶着去上屠場的沒有面目的“灰色畜生”起來，有多麼大的區別呵！

託爾斯泰這個藝術家，基本上就和封建制度聯繫着，他所寫出來的羣衆不能不是“砲灰”，不能不是指揮階級手裏面的盲目的工具。至於綏拉菲摩維支，基本上就和工農羣衆聯繫着，就和他眼前正在進行的社會革命聯繫着，他寫出來的鐵一樣的隊伍，極有力量的行動着，走向布爾塞維克的主要力量，在道路上形成他們的革命意識。

(3) 枯土左夫將軍是“戰爭與和平”之中的人物。——譯者。

綏拉非摩維支的羣衆，可並沒有理想化：他們還很保守呢。十月革命的探海燈照耀着古班的難民。

當革命放出無窮的火燄的時候，革命以前的文學界暴露了真正的反動面目。工人和農民的革命鬥爭，資產階級制度的極深刻的革命崩潰，在舊文學界是沒有回聲的，是沒有支點的。社會革命對於俄國舊文學是外人，——俄國的文學，地主貴族的和市儉資本主義的文學在全世界上也佔着第一等的地位呢。

而無產階級的文學，還只在烟火之中剛剛生長出來，——有些人不大相信會有無產文學，有些人對於無產文學痛恨之至，有些人對於無產文學是老爺式的冷淡態度，——無產文學還正在很艱難的開闢自己的道路呢。

那些脫離羣衆的孟塞維克化的智識份子很自信的宣言：沒有無產階級文學，也不會有無產階級的文學。

正在這種時候，綏拉非摩維支給無產階級文學出版了自己的“鐵流”。

真是出於意外的，這本著作不是十月革命戰鬥之中鍛鍊出來的青年無產階級作家做的，而是藝術之中的舊派老手做的。這是新舊藝術的交叉點。舊藝術從他自己的內心，分泌出上升着的階級的新創作的成份。

“鐵流”這部著作，從他的內容和形式來看，都只能夠產生在蘇

聯，只能夠是十月革命的果實。舊時的文學家說，對於藝術家必須有“朝代的靈感”，只有已經事過境遷的事變才可以反映在藝術裏來。但是“鐵流”裏的英雄身上沒有平復的創痕還是新鮮的，還聞得着沒有停止的國內戰爭的火藥氣。同時，這並不是急急忙忙寫的日記，而是真正的藝術作品。

綏拉非摩維支很急激的脫離舊的創作方法。說是傳奇——又不是傳奇，說是演義——又不是演義，說是平話——又不是平話。說是歌行——又不是歌行⁽⁴⁾。這是一本藝術創作裏從沒有見過的形式，完全破壞了一切文學派別所規定的形式和傳統。

首先是開展着的事變非常急遽，“鐵流”的首領郭如鶴鐵一樣的堅決，他要求幾千游擊隊員和幾千難民：“走呀，走呀”。綏拉非摩維支所開展的敘說，正是這壓迫不住停止不下的行動，這個革命的速度，絕不容許停頓在思索，懷疑，動搖之中的。他一開始就一分鐘也不停止的，絕不削弱讀者的注意展開那一幅一幅的圖畫。羣衆的生活表現在絕不休息絕不靜默的行動之中。

(4) “傳奇”等等的名稱都是“借譯”的。傳奇——俄文是 Roman，意思是長篇小說，必須是一大部錯綜複雜的小說。演義——是 Povesty，字意是數條敘說，可以是長篇，而大半是中篇。平話——是 Rasskaz，字意是講故事的“講”的意思，大半是短篇小說，而且用第一人稱的時候居多。歌行——是 Poema，本來必須是韻文，長篇詩的形式的小說或戲劇。這裏借幾個中國字眼，當然是“望文生義”的夾二摺的譯法，和中國原來的這些東西並不相同。——譯者。

綏拉非摩維支確定了一種創作的方法，就是只把行爲和動作做重心的方法。他藝術上所寫成的人物，並非經過瑣屑的內心分析的方法，而完全是表現在這種人物的具體動作和行爲之中的。

“鐵流”之中，很深刻的足以決定綏拉非摩維支創作源泉的另外一個特點，——就是並非描寫各個的孤立的個人，而是描寫這個人和羣衆的相互關係。每個人的面目決定於他在集體之中所處的地位，決定於他對於羣衆生活行動的參加。這是無產階級的創作方法，——綏拉非摩維支在“鐵流”之中所運用的。

沙洛霍夫的“靜悄悄的東河”，照創作方法來講，和“戰爭與和平”更相像些，——同樣是敘說之中有幾個題材平行的發展着，——尤其是同樣把“英雄”放在第一等的地位。“靜悄悄的東河”裏面，心理的觀察顯得更凸出更明白些。而“鐵流”這部小說裏的動像和比較的沒有英雄，在內容上和形式上，都要更革命些，更革命而更粗魯些。綏拉非摩維支的“鐵流”沒有藝術上的詳細描畫的技術，譬如像描畫美列霍夫那家人家⁽⁵⁾的那樣驚人。可是，革命時代的公律和規模，在這裏卻感覺得更清楚更加充分，人物並不是主觀的個人內心經過的描寫，而是從第亞力克諦的⁽⁶⁾生長和環境影響方面着筆

(5) 美列霍夫是“靜悄悄的東河”（或譯“寂靜的頓河”）裏面的主人翁。——譯者。

(6) “第亞力克諦”是 Dialectic 的音譯，日本文譯作“辯證法”，其實如果意譯，不如用“互辯法”，而最好還是音譯。——譯者。

的，而且這些人物，是在遊擊隊員轉變速度加強的過程之中——國內戰爭的整個環境所引起的轉變之中出現着。

“鐵流”裏面最根本的藝術結構上的原則是統一的羣衆心理。

“沈重的脚步聲音衝破了寂靜，整齊的平均的充滿着那蒸熱的大地，好像只是一個說不出的高大，說不出的沈重的人在那裏走着，好像只是一個極大的，大得不像是人的心在那裏跳着。”

還有：

“幾千幾萬個人走過去。已經沒有什麼排，連，營，團，——有的只是一個極大的叫不出名字來的整塊兒的東西。無數的脚走着，無數的眼睛看着，許多個心變成一個偉大的心在那裏跳着。”

革命以來的十年之間，那一個文學家能夠把羣衆內部的一致，鬥爭所鍛鍊出來的一致，革命所鍛鍊出來的一致，表現得這樣有力量。

甚至於小孩子也同着所有的羣衆撲到敵人方面去，叫着：‘死！死！……’

教堂的地主的統治，用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想使勞動羣衆停止在“一盤散沙”的狀態之中，使他們完全分散，完全沒有組織。工廠和工場很沈重的血腥氣的鍛鍊，可是，的確鍛鍊了無產階級，使他成爲整個的有組織的集體。農民的細小的個人經濟，就使農民沒有組織的可能，雖然地主階級剝削得非常嚴重。只有無產階級的獨裁真正決定了勞動農民的歷史命運，農民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團結成了不

能摧毀的革命隊伍，去和中心聯合起來。而綏拉菲摩維支所寫出來的所肯定的，就是無產階級文學之中這種羣衆的鐵一樣的統一。

革命時代的第一個十年，有了不少鮮明的藝術著作——無產階級的和同路人的，——反映着國內戰爭的各種景象，反映着革命勝利的前進和革命的建設。然而這些作品所寫的革命，大半也是用英雄來表現的。英雄對於作家是有興趣的。在英雄身上，來表現革命怎樣訓練出人才來，怎樣改變他的宇宙觀，怎樣磨礪他的階級本能的鋒芒，怎樣根本翻轉他的舊習慣，這是有趣的重要的。然而更有趣更重要的是：發露那個動力，第亞力克諦的表現極巨大的羣衆的行動，從藝術上來表現他們的改造，而且這不是在個人自我認識的有限的範圍裏面，而是在統一的意志，統一的目的的形成過程之中，這個過程是集體的努力用集體的方法來實現的。就是各個人的改變和改造——這也是極大的成績。然而從藝術上來表現，從藝術上來證實那向着總的革命目的前進，在革命鬥爭之中鍛鍊出來的幾萬個人的完全改造，——這種任務直到如今還是資產階級的藝術家所不能夠擔任的。只有革命能夠產生並且實現這種任務。

“鐵流”裏面有他的並不故意拿出來給人看的革命哲學。託爾斯泰和陀斯託葉夫斯基的這種哲學，有的時候表現於作者的論文式的推論，或者放在“英雄”的嘴裏，叫“英雄”代替作家說法；——而在綏拉菲摩維支，這種哲學卻沈默着從行動的本身裏面流露出來，從

進行着的隊伍的目的，期待，成就的本身裏面流露出來。這部小說的敘說發露了十月的根底，這十月的根底已經預先決定了這個隊伍的階級道路。託爾斯泰用他的人物的“出身名貴”來說服讀者，然而他常常打斷了藝術的敘說，例如在“戰爭與和平”裏面，往往寫了好幾章哲學論文；陀斯託葉夫斯基就要叫“罪與罰”裏面的拉斯珂爾尼珂夫，叫“卡拉馬左夫兄弟”裏面的老和尚左西馬，叫“白癡”裏面的美史金公爵，叫他們嘴裏說出整篇的學術論文和長篇演說，來擁護某種主張。至於綏拉非摩維支，他一點兒也不在高尚的個人性格上想辦法。他寫的是革命的動象，這是容許不了拉斯珂爾尼珂夫的那種侵蝕一切的懷疑的：——懷疑着能不能夠踏着血跡走過去，“究竟是蟲子還是人”；——革命的動象很自信的犧牲了不止一個沒有罪過的小孩子，不怕負責任，因為革命是要求犧牲的；郭如鶴以及整個的隊伍都非常之明白：調和是不能夠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

綏拉非摩維支在“鐵流”之中所描寫的並不是革命的勝利，也不是革命的失敗；甚至於也不是描寫革命的建設，不是描寫革命建築的蔭架和灰塵的平常日子；他所寫的革命，是從人人的平常日子方面着筆，是在母親的痛苦之中，在還沒有散盡的過去時代的黑暗之中，在普通的戰士的不可避免的嚴厲和真正的英勇之中，——這些極平常的戰士到了必須拚命的環境裏面，用自己最後的一滴血去爭取站在太陽底下的地位。”比較起資產階級的藝術家，——在靜悄悄的書房

裏面開展着修飾着瑣屑的個人幸福，或者個人的不幸的題材的，——無產階級的作家在這樣的創作任務之中是多麼高超多麼靈感！

“鐵流”裏面有一個主要的思想貫穿着：游擊隊和難民的羣衆開始行動的時候是一種人，可是等到達到目的時候，就已經完全是另一種的人，一點兒也不像原來的樣子了。

隊伍開動的時候，演說的人起來說：“同志們！”他就可以碰見惡意的叫喊：

“……滾你的蛋！…… 我們聽也不要聽…… 打倒！”

羣衆是無政府主義的，不了解集體的意思的；他們完全只在關心許多小資產階級的日常生活。郭如鶴是他們的領袖——也就是他們的玩具。有的時候，幾幾乎要把他亂鎗戳死。而走到臨了，已經經過了想都想不到的痛苦，克服了神奇古怪的障礙，羣衆也就鍛鍊成了不可侵犯的有組織的力量。現在，游擊隊和難民叫着：

——“萬歲，我們的爸爸！…… 長生萬歲 跟他走到世界的盡頭…… 只要是擁護蘇維埃政權，我們總去打。打老爺，打將軍，打軍官！……”

他們對他絕對的忠實。他們無條件的服從他的命令。郭如鶴爲着搶劫要打他們，他們不做聲的躺下來。他叫一聲：

——“大家躺下來！……”

於是大家躺下去，把屁股和脊背對着那灼熱的太陽……”

然而，這種無條件的服從只繼續到一定的時候，就是郭如鶴的確還是他們的階級領袖，領導他們和階級仇敵去鬥爭。“……他們順從的躺下，等着棍子……都順從的躺著，但是如果他（郭如鶴）要口吃的說一句：‘弟兄們回到哥薩克和軍官那裏去罷，’——那麼，馬上就會舉起刺刀把他結果了的。”

在這樣團結的人的基礎上，革命可以自信的樹立起自己的鉅大的建築。經過了這樣的道路，這個隊伍不是湧到革命的潮頭，就只有同着革命一起去死。應當要注意，“鐵流”裏面所反映的革命還並不是在中心地點，而是在南方廣闊的平原上，在遙遠的邊疆上，在大多數是農民羣衆的地方。如果在這種遙遠的地方，革命尚且能夠這樣的改造羣衆，那麼，無產階級直接組織引導這些羣衆的階級鬥爭的地方，又要開展出怎樣鉅大的革命遠景呢。

應當指出來：“鐵流”裏面並沒有無產階級的直接的組織上的領導。這可以說是作者的錯誤。要知道小資產階級的農民和手工工人羣衆不會“自然而然的”自己改編成爲鮮明的階級隊伍。

只有在無產階級的影響之下，只有在無產階級的思想上的照耀之下，貧農羣衆能夠組織成功革命的階級的隊伍。

然而這種影響，這種無產階級的熱忱對於農民羣衆的思想上的照耀，可以用各種不同的方法表現出來，事實上也的確是這個樣子。

“鐵流”裏面沒有政治委員（黨代表），沒有無產階級的幹部，然而

游擊隊的整個羣衆都受着無產階級的革命思想的影響。這散在小說之中的各處地方。這是農民所認識的。譬如：

——“工人們到我們那裏來了，帶着自由來了，……在各村裏組織了蘇維埃，叫把土地都沒收了。

——帶着良心來的，把資本家一下子！……”

而貧農也認識自己和無產階級的關係：

“——難道工人不是農人做的麼？瞧一瞧水門汀工廠裏有我們多少人在作工的，就是在油坊裏，在機器工廠裏，在城裏各工廠裏，都有我們的人在作工。”

農民和手工工人的羣衆，雖然被白黨軍隊攔住了，使他們和無產階級的中心隔開了，可是，永久是在想要和布爾塞維克的力量，就是無產階級的力量重新聯絡起來。經濟的必要使他們要和無產階級聯合。在壓迫者的哥薩克和解放者的無產階級之間，是用不着選擇的。問題是已經決定了的。所以農民和手工工人的羣衆這樣留心的聽着那一邊響動着的蘇維埃無產階級的運動。這些羣衆雖然離着無產階級很遠，可是他們的意志和思想是同着那個無產階級的，他們極清楚的感覺到自己是服從無產階級的，自己和無產階級是分割不開的。他們只有一條路——這條路雖然是悲慘的，但是是極偉大的，將要創造出新生活的道路：到無產階級的路，同着無產階級的路。無產階級雖然不在這裏，可是，他對農民和手工工人的羣衆，給了組

像他們的影響。

以前，民族守舊主義的批評家，曾經承認“戰爭與和平”這部著作反映着民衆的思想情感的“神聖的深處”，在那祖國受着極大的震動的年頭。託爾斯泰自己也說枯土左夫是民衆的代表，是民衆的思想期望的神聖的表現者。現在關於“鐵流”，當然有更大的權利可以說，這部著作照牠的波動的情緒固然是很別緻的，可是的確是一部真正的革命紀事詩，這部著作留在文學史裏，的確是一幅肯定十月的圖畫。枯土左夫不能夠是民衆的代表，因為他的出身，他的全部生活完全是和平民羣衆脫離的，單是這一個原因已經夠了。而郭如鶴卻是暴動起來的貧農的真正領袖。以前，託爾斯泰的羣衆只是一羣牲口，要用棍子鞭子趕他們上前去。現在的羣衆卻已經很知道：到什麼地方去；幹什麼去，跟着誰去。羣衆的領袖，只有表現羣衆的意志和要求的時候，方才能夠繼續做領袖。

革命以前過去時代的急進民權主義的作品裏面，羣衆或者是憐惜的對象，或者是愛民的領袖的革命試驗裏的工具，或者是灰色的羊羣被這些領袖趕着走向新生活去。梭拉非摩維支也描寫了灰色之大半是農民的覺悟很少的羣衆。然而，歷史過程之中的一切客觀條件已經把這些羣衆訓練得完全能夠迎受十月的理想，而且爲着自己的經濟政治利益而開始深刻的行動。

這些羣衆堅決的走上危險的道路，他們的一切努力，都是要想去

聯絡布爾塞維克的主要力量——這都是無可轉變的歷史環境和階級環境所決定的。每一次磨難達到最高點的時候，推動着隊伍向前去的都是那尖銳的階級意識。事實上，回轉身又能到什麼地方去呢？

——“去挨哥薩克的鞭子嗎…… 去受那些軍官們，將軍們的壓迫嗎？…… 又去受他們的羈絆嗎？”

或者像郭如鶴的話：

——“同志們，現在我們沒有路走了：前後都是死……”

“鐵流”所寫的階級的分劃非常之有力量，這是革命以前的文學裏面所找不着的，那時候這種形容的描寫是沒有的。

革命在社會上分化了古班地方的村鎮。革命對於那地方的“外鄉人”，就是階級關係上受壓迫的階級，燃着了燈塔上的火光。“外鄉人”做了幾十年的低等等級，沒有土地和權利，被人叫做“哈木賽爾”（坐在哥薩克頭上的奴才），現在，他們很堅決的希望和哥薩克平等的分到土地，而且要得到那些權利，——以前俄皇政府和亞塔曼(7)所堅持不肯給他們的那些權利。別方面，哥薩克的富豪，及比較富裕的中農不能夠不反對十月革命——因為他們知道：如果十月革命勝利，那麼，他們一百年來的舒服生活就要完結了，就要把一部分肥沃的黑土，讓給“外鄉人”的貧民，關於這種黑土，他們說，“簡

(7) 亞塔曼 Ataman 是哥薩克的軍官的一種職位，是一種帶着封建性的職位，每一個亞塔曼有一定的地盤，管理一定的區域，有些是世襲的。——譯者。

宜是塗着黑油可以喫的…… 經濟的基礎這基是只有一個，沒有變更的——這是土地：一邊要牠，一邊不肯給。

“鐵流”裏面混和了階級的酵母，牠的基礎——是堅定的階級基礎。這並不是故意製造出來的鼓動材料，這是活的生活的現實的描寫，在藝術上也是完全可信的。

“鐵流”在藝術上表現了：十月革命怎麼樣把小資產階級也吸引到自己的軌道上來，使他們不能不成爲積極發動的革命力量。事實上，這裏所表現的，也和露俄的“九十三年”，法朗士的“天神渴得很”一樣，是小資產階級，這就是那在法國大革命的舞臺上的小資產階級。然而十月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在心理上和行動上都已經經過了根本的變動，這個變動是歷史過程的條件所預先決定的。小手工業的工人——箍桶匠，銅匠，錫匠，皮匠，木匠，漁夫，——在十月革命的新形勢之中不能夠不和無產階級革命混合起來，走上牠的軌道，找尋紅軍的保護，請無產階級的領袖來領導。昨天“鐵流”的難民還只知道瑣屑的關心着自己的私人生活和成敗，只知道那種平底的個人主義的小世界，有這麼一隻小牛，一隻羊子。走上危險的長途的時候，老婆婆郭必諾還在禱告：“上帝的神聖，強健的神聖，長生不死的神聖，饒恕我們罷！”她整個兒還充滿着古舊的帝制政體之下的小資產階級的迷信，她的意識真正只有這麼一點兒邊緣，碰着了當時開展着的事變的意義，她只懂得：如果布爾塞維克早些來了，也許不

會有這一場可恨的戰爭，她的兒子——“現在躺在土耳其的”兒子——也許還活着呢。然而她心上還充滿着對於布爾塞維克的許多懷疑，她認爲的確是“德國皇帝把他們派到俄國來的”。可是，革命的風暴始終連她也不準中立。革命教育着，從階級關係上決定着一切。甚至於“鐵流”裏面的老婆婆郭必諾也開始認識革命的階級真理在什麼地方。她幾十年來好像在夢裏，說着夢話，不知道怎麼樣脫離那種不自由的勞動和壓迫。革命的電閃很光明的照出了一條道路，指出來：往那裏去。當臨了動身走上長途的時候，郭必諾還在禱告着舊的上帝，充滿着許多迷信，討厭那隻革命歌“你們在偉大的鬥爭裏犧牲了”。而在這長途終了的時候，“胸膛裏面逼出來了一聲沉重的歎氣，再也忍不住了，沿着鐵一樣的臉淌下孤獨的眼淚，慢慢的，沿着互相看着的風吹日晒的臉，沿着老年人的臉淌下，那女孩子的眼睛裏也閃爍着眼淚了……”“長生萬歲！……你好，蘇維埃政權！……”

“我們是爲着這個挨餓，受冷，喫苦的，不單是爲着自己的一條命！……”

這不是什麼好聽的空話，這不是什麼鼓動的演說！這是羣衆的口號，這是革命的雷電之中改造過的羣衆的口號；這在藝術上是那長途之中的一切磨難所肯定的口號。

深深的印到腦筋裏面去的，還有這樣的景象：母親手裏抱着的小

孩子已經僵了，已經爛了，可是她還不肯放。在全世界的文學裏面，這樣震動讀者的景象，並沒有多少呢。

羣衆的悲劇，因為並不是空想出來的，所以更加飽滿：這裏所描寫的一切，都是事實：“鐵流”的隊伍就是達曼紅軍的隊伍，的確幹過這樣長途的著名征戰；郭如鶴並不是空想出來的人：他到現在還活着呢。無產階級的讀者應當知道這個，然後他可以記起爲着擁護十月曾經有過何等嚴重的犧牲。

資產階級的“女英雄”，甚至於高超得像愛達，馬爾加里特，安娜·卡列尼娜的痛苦，在這些革命風景捲起的難民的痛苦之前，顯得多麼猥瑣渺小呵！資產階級的干涉政策者是在蘇聯勞動者的枯骨上跳了幾陣狐步舞；因爲國際資產階級的武力干涉，所以蘇聯勞動者不能夠不把自己的小孩子，餓死的熱死的痛苦死的，扔在大路上，埋在山洞裏面！

當長途終了的時候，郭如鶴的演說裏提起：“小孩子丟在山洞裏了”，那聽衆的人海立刻波動了，在這個沉寂之中浮動起低低的女人哭聲：“我們的小孩子！……我們的小孩子！……”這是蓋棺時候的紀念，這是墳墓上的花朵。

這一幅景象，讀起來是不能夠不發抖的，將來一輩一輩的人，已經來的以及還要來的，來代替受過這樣痛苦的人的，——永久要在自己的眼前看見這些不會凋落的墳墓上的花朵，這些花朵使他們記

着；不惜一切犧牲來擁護和保障經過如此之殘酷的痛苦而得來的勝利。

“鐵流”是這麼一種的藝術作品——深刻的可信而真實，這種作品從第一頁讀起，從第一行讀起的時候，就要相信牠的。“鐵流”之中最主要的感動人的——就是藝術的真實。寫出來的是整個的人，他的好處，他的壞處，他的善，他的惡，他的聰明，他的笨，凡是她所有的，都表示出來。所寫的羣衆，沒有絲毫的理想化，就是哥薩克也一樣勇敢的戰鬥。革命的仇敵並沒有描寫成一些膽小鬼，捨不得犧牲的。革命的仇敵時常也是有力量的，勇敢的，他趕着布爾塞維克經過整個的古班，也是拚命的堅決的擁護自己的地位到底。階級仇敵也是這樣大量的流血，他們自成其為一種理想的。然而作者能夠形容出誰是爲着什麼而鬥爭的。他用無產階級藝術家的階級的明燈照清楚國內戰爭。

藝術家描寫起殘忍的地方，有些時候簡直是用自然主義的方法，然而，如果他們那些“畜生的景象”要想稍微輕化一些，尤其是如果有意把戰鬥的兩方面之中的一方面寫得比較溫和比較文明，那麼，誰也不會相信他的。這部著作的價值正在於歷史的真實。革命是這樣的，國內戰爭是這樣的，這不是戴着白手套幹的事情，牠是染着血的，真正的活人的血。幾百年來的階級仇恨沸騰起來了，問題是在整個腐化的制度的崩潰，這種地方不能夠避免殘忍的。這個殘

忍，結算起來，是要產生出幸福和愛情的。這是爲着生的死，爲着恢復的破壞。歷史舞臺上兩種衝突的力量之間，有牠的鬥爭公律；革命的道德起了作用，這是另外一種道德的尺度，這是階級戰鬥時期之中的人所有的尺度。……革命不知道寬恕和情面：消滅別人，爲的自己不要被人消滅，一切能夠達到消滅敵人的方法和手段，都是好的，都是合法的。

陀斯託葉夫斯基的拉斯珂爾尼珂夫殺死了一個放印子錢的老婆，自己難受得不得了。而梭拉非摩維支所寫的人物，有的時候簡直殘忍得像禽獸，看着血不當什麼一回事，同時，這些人物一點兒也不像是殺人犯，他們的革命作用一點兒也沒有暗淡。誰也沒有什麼懺悔的情緒。爲什麼？因爲歷史的真理領導着他們的手，要他們去消滅階級仇敵，爲的是不要他們被階級仇敵所消滅。

革命的偉大的時機，產生出神奇的羣衆的高潮。就是脆弱的人，也極快的受着傳染，他們的英勇在平常日子的範圍之內是想都想不到。推動着大家向前去的，是總的目的。鬥爭的緊張之中，現實的和希望的之間的界綫消滅了。

這裏，再來和陀斯託葉夫斯基比較一下，也是很有趣的。陀斯託葉夫斯基的人物也常常忘掉現實和幻想之間的分別。例如“白夜”的英雄，他那種悶在自己內心的病態心理，使他把現實和幻想混合爲一，造成神奇的景象。這在陀斯託葉夫斯基，只是悶在內心的

孤寂的幻想的創痕——充滿着喪失信仰和懦怯的毒氣。綏拉菲摩維支的活的“鐵流”是不知道這種病態的，是不知道這種孤寂的幻想家的創痕的，因為這裏的人依靠着集體，整個兒都包含在集體之中。而在這種革命的集體的環境裏面，幻想的更容易變成現實的。故事更容易變成事實。郭如鶴同着自己的馬隊衝過那很狹的橋，——這難道不是講故事麼？然而這竟是事實。兵士穿着破爛衣服，赤着腳，一個人只有兩三顆子彈，有一大半簡直只有一支空鎗，——這樣的“亞洲式”的軍隊居然打下了全副武裝的城池，擺着十六尊大砲對着他們呢。可是，事實上的確是這樣的。郭如鶴說：

——“同志們！……簡直是克服不了的困難：沒有子彈，沒有砲彈，我們只有赤手空拳去佔領，而敵人那面有十六尊大砲看着我們。但是，如果大家能夠萬衆一心的……——如果大家萬衆一心，衝上去，就可以打開一條生路！！”

大家都叫着：

——“萬衆一心！！……或者我們打出去，或者都打死在這裏！”

沒有出路，只能夠真正往牆上爬，只能夠硬碰。變成功“英雄”，爲的是要無情的攻打敵人。

羣衆所供獻給革命的不但是自己的性命，而且還有集體的智識和經驗。郭如鶴接到各方面的報告·消息，解釋，計畫·向他提議各種各樣可能的異想天開的出路；集體的腦筋不斷的工作着。郭如鶴

的軍事會議——在敵人力量超過好幾倍的情形之下的軍事會議，完全不像“戰爭與和平”裏面枯土左夫的軍事會議：枯土左夫的軍事會議上是文飾，虛偽，暗算，互相猜忌，諂媚，陷害，不忠實，對於幾千幾萬人的死亡完全是隨隨便便的態度。枯土左夫的顯問不想着羣衆的。枯土左夫自己胖得滿身是肥肉，飽滿得放光呢。他只在希望掛在牆角的神像，跪在神像前面，像個鄉下老婆婆似的禱告着，求上帝給他打勝敵人。實際上，枯土左夫並沒有什麼計畫，只在希望天神的保佑。至於郭如鶴，他充滿着精力，只希望團結得鞏固的集體。他的利益極密切的和環繞着他的團體的利益聯系着。他表現得何等敏捷，何等靈活，何等的鋼鐵似的堅決！他和舊時代的將軍領袖是完全不同的。他的傳記是很不複雜的。“母親……——好像是疲憊的老馬；……父親一輩子是哥薩克的雇農，筋骨都做斷了……他自己從六歲起就是一個公共的牧童。曠野，山谷，牛羊，森林，雲在天空浮動，影子在下邊奔走。——這就是他的教育。”大戰的時候，軍官們作踐他，以爲他是個笨畜生，鄉下人，可想當軍官呢，他幾次考不上的時候，很輕視的笑他。然而，他卻成了真正的領袖。

郭如鶴很清楚的知道，如果沒有鐵的紀律，整個的隊伍要變成沒有方針的匪徒。他知道，沒有這樣的紀律是不能夠克服當前的障礙的，不能夠爬過山，不能夠和布爾塞維克的主要力量聯絡。郭如鶴和大家一樣，穿着破爛的衣服，滿身都發黑了，同樣受着沿路的痛苦。

並且他身上有極嚴重的責任。他一刻都不能夠安靜的。他什麼時候才睡覺？他什麼時候才休息？他要有多麼精明，多麼遠見，他怎樣靈敏的避開那些要想打死他的水兵！“車子裏面的機關鎗很快的轉動了，而死神對着了水兵的帽子。”有時候，他像個石頭的魔鬼。人倒下來，像蒼蠅似的；沒有氣力再往前了；把馬都丟在路上了；人就怎麼騎到馬路的沙塵裏；——然而他不饒恕自己，不饒恕任何人，堅決的要求“走，走”，向前，向前。實際上，他不過整理着整個隊伍的意志，使牠結晶起來，這個隊伍自己也在收集着最後的一點兒氣力向着願意達到的目的走呢，在最困難的過渡時機，力量已經要完全用盡了，可是郭如鶴仍舊能夠使人家服從：

“已經沒有什麼排，連，營，團，——有的只是一個極大的叫不出名字來的整個兒的東西。無數的腳走着，無數的眼睛看着，許多個心變成一個不可名狀的心在那裏跳着。”

藝術家要能夠描寫這樣駁雜的集體，必須他完完全全能夠運用他的筆。綏拉非摩維支達到他藝術上的完滿，首先是因為他的簡單，不做作的偉大的簡單。他很注意許多小關節目，然而在這些小關節目之中革命的心靈也在跳動着。沒有什麼“內在的人”（Men “in themselves”）：人和東西都溶解在環境之中，在革命的形勢之中。

豐滿的風景照耀着活的人物。讀者簡直是“身歷其境的”感覺

得到事變開展的時間。一切環境都是非常緊張的革命的。“整個的古班簡直是燒了起來了。…… 娘兒們，孩子們一天到晚在菜園裏在果園裏掘，從地底下掘出鎗，機關鎗，從草堆裏拖出整箱子的鎗彈，砲彈。” 舊世界響了一下，電閃閃了一下，灼着了：“村子裏的哥薩克都動手起來了，磕磕碰碰統刑架子搭起來了，一批一批的人大家都絞死了，卡傑特⁽⁸⁾也來了，大刀砍起來，絞死的絞死，鎗斃的鎗斃，馬都趕到古班去。” 在可怕的國內戰爭的背景上，人和東西都顯得非常之高大，他們的說話和姿勢都有了異乎尋常的意義；他們的內心世界，他們的一切行爲都被革命形勢的火山似的爆裂從外面照耀着。各個的個人消失了，感覺得到個性的沒有力量。因此，很自然的藝術家要集中，磨礪讀者的注意於羣衆方面。一刻也不安靜的說話，叫喊，狗叫，小孩子哭，馬嘶，鐵器響，一片罵娘的聲音，娘兒們的叫應，啞着聲音的淫蕩的叫喊，在醉鬼拉的手風琴的音調之中，——集體的掙扎，集體的心願。在描寫這樣的情形時候，藝術家寫出羣衆的節奏；他能夠運用羣衆行動的節奏，真本領寫出廣大的布景，寫出極豐滿的許多人物行動着的景象。只有無條件的把自己的手筆服從了無產階級革命的規模，然而藝術家才能夠堅決的離開那種個人主義的描寫方法，離開那種波倫諾夫式的個人主義的心理（“平原裏的城市”），而一些兒也不膽怯，一些兒也不怕難的來寫這個行動

(8) 卡傑特——Cadet，貴族子弟學校的軍官學生。——譯者。

管的集體。

綏拉非摩維支到處都着重的寫出集體的創造作用。他所表示的是個人的沒有力量，而這可並非藝術家故意要寫的題目。這是時代的命令。個性的確消失了。個人的作用的確是非常微小的了。可是在集體之中個人卻有最大限度的創造力來表現自己。

這裏，不但題材是十月的，而且描寫題材的手段也是十月的。“鐵流”裏沒有個人主義的心理主義，沒有所謂內省功夫。本來，這種全身都是暴露着的精力，正在行動着的人物，能不能夠在自己個人的模糊的感覺和願望之中去做內省工夫呢？沒有功夫，用不着，沒有用處！大地燃燒着，一分鐘的遲緩就等於死。

藝術家所寫出來的是羣衆心理的電流，羣衆心理的骨幹——是羣衆的心理。羣衆的道路上堆滿了障礙物，羣衆的思想是要戰勝這些障礙。

以前資產階級的著名文學家描寫的時候，這種障礙總是由各個的個人英雄來排除，時常是在鬥爭之中遇見周圍的社會上的頑固。“鐵流”裏面障礙的排除卻是走的階級鬥爭的道路，衝突着的，並非老鼠打架似的各個的個人，而是幾個整個的階級。各個英雄的心理無論怎麼複雜和細膩，藝術家始終是容易描寫的。至於整個集體的心理，舊文學家之中卻很少有人寫過的。在這方面，革命以前的舊文學家簡直沒有給什麼比較有意義的榜樣；所以綏拉非摩維支在

這方面就要完全用自己的力量和階級的感覺，去開闢前進的道路。他應當去尋找刺探那羣衆的團結力，羣衆的互相控制力，羣衆的迎受力的特殊的心理系統。共同的受苦，產生那共同的悲憤。共同的勝利，同樣產生那共同的快樂。羣衆像海一樣波動着，他們心理上的迎受公律是服從集體的意志的。

十九世紀末年的頹廢派藝術家，常常一方面採取個人與社會的衝突做題材，別方面又採取個人內部理智和意志的衝突做題材。在意識和意志之間的衝突上，陀斯託葉夫斯基開展了他的大才。他的那種二元人物，——內心世界是支離滅裂的，他們的情感和思想是二元化的，——這種人物的藝術上的形成，就是從這些矛盾的細膩心理上着筆的。十月的時代一些兒也不可惜的從藝術界之中掃蕩了這種猥瑣的二元人物，以及他們那種猥瑣的內心分裂狀態。“鐵流”之中，爲着革命的勝利，那集體的理智和意志完完全全的混合爲一。綏拉非摩維支在“鐵流”裏指示出來：在集體運動之中理智和意志是怎樣調和的混合，而這種混合正是革命勝利的保障——這是對於散亂的資本主義矛盾所形成的二元人物的幻想家的勝利，是對於資本主義的競爭和威嚇所蹂躪的，愚昧而孤獨的個人的勝利。

某些資產階級的浪漫主義者，口味是太講究了，他們看着羣衆的情感和心緒，也許可以認爲太單調了太簡單了；然而綏拉非摩維支能夠證明：羣衆的心靈波動實在是很偉大很良善的。集體的理智，集

體的情緒，比“英雄”的內省，來得更細膩，更活潑，更純潔，更鮮明。

同時，我們並不能說，“鐵流”是沒有英雄的，並不因為有了羣衆，他們中間就顯現不出各個的個人。郭如鶴，老婆婆郭必諾，那個年輕女人，喬治亞的軍官，——這些人物，難道不是描寫得很仔細，難道不是只要幾行文字，就顯得他們都直立起來的嗎？描寫的稀少和平坦，是有理由的，這理由就是他的題材。不能夠很長久的來講一個人的事情。只有資產階級的藝術家才能夠這麼辦，他可以像雕刻匠一樣，把他的英雄細細的琢磨，寫得個精疲力盡。綏拉非摩維支所要寫的卻是很多的人物，他要寫集體的動象。他寫的——都是極快的運動。這裏，不可避免的是迅速的移動現象，不可免的要經常的變換情緒，思想，計畫，人物，色彩。藝術家也不能夠像以前的“莊嚴的”藝術家似的，把一件什麼事情寫上好幾頁。這裏，每一種色調是有用的，每一件小事裏的每一個運動都是有關係的，——革命的命運。所以，應當把最重要的最鮮明的拿出來。

“沿着平原，一匹黑馬放開了脚步跑來了，牠的身體簡直拉成了一條直線，肚皮差不多要着地了；牠上面一個人，衣服上灑滿了紅色的斑點，頭和胸膛都倒在馬鬣毛上，兩隻手垂在兩邊。”

藝術家並沒有集中的描寫這個人物——被哥薩克亂刀砍着的古班人，逃到自己家裏來死的。但是，雖然描寫得很少，可是很親切的看得見那幕後的極端緊張的階級鬥爭，在這兩個營壘之間的鬥爭裏

面，兩方面都在無情的互相消滅。藝術上的描寫這樣稀少，同時所描寫的周圍環境和集體運動又是這樣“鉅大的規模”，——這種成績也是革命以前的文學裏所沒有的。當時也沒有人這樣用心的來表現羣衆的緊張的。

背景的有意義，時代的偉大，人物的緊張和異常高大，——立刻使讀者受到觸電似的感覺。題材的鉅大克服讀者，目的的厲害，道路的複雜，人心的耐苦，人的意志——跟着障礙的增多而更加增長的意志——的容量，都吸引着讀者。敘說之中沒有漸進的發展，可是，對於這種敘說的趣味一刻都也不削弱的。而且引起興趣的，並不是作者耍的手段。“鐵流”的吸引讀者就只是牠的題材，——集體的行動向着牠那唯一的目的，爲着達到這個目的而戰勝路上的一切障礙。

寫出羣衆的改造的文筆，造成色調鮮明的言語的詩境。形式和內容互相符合的；沒有那種故意誇張的個人主義的體裁上的做作。全部敘說之中充滿着烏克蘭的言語。藝術家和他自己所寫的人物這樣溶合起來，以至於不但在對話裏面，而且在他自己的描寫裏面，也用烏克蘭的言語。譬如，他很喜歡用“raskhristanny”這個字。他描寫着兩個同在一個村莊裏生長的人，在國內戰爭的肉搏之中互相扭住了打起來了，他就問：

“一塊兒同姑娘們唱着故鄉烏克蘭的歌；一塊兒去當兵，一塊兒

在那種無盡的開花彈壓下和土耳其人拚命，這種時候過去的有多久呢？”

我們不能夠罵作者把俄羅斯文弄糟了。難道以前的著名文學家在對話裏面不用平民的俗話，以及他們的方言和特別的腔調嗎？只要想一想歌歌爾，烏斯平斯基，沃斯德洛夫斯基，列塞德尼珂夫。綏拉菲摩維支比他們更進一步。他彷彿把兩種言語混合了起來，自己敘說的時候，也時常用起烏克蘭文來。可是，“鐵流”的這種烏克蘭化，在敘說裏面增加了很多的藝術的真實和藝術的色調。

這裏，自然而然的要想起歌歌爾。有點兒是學歌歌爾的。然而生活往前走得多麼遠了，革命把牠改造了！……整個的小手工業貧民的日常生活的地平線在對話的“字裏行間”顯現出來，例如郭必諾說：

“把我嫁給這老頭子的時候，媽媽就告訴我說，把這火壺給你，你要保重牠，像保重自己的眼睛一樣；你死的時候，就把牠交給你的孩子們和孫子們罷。將來安迦嫁人的時候，我本來想把這給她的。可是，現在統統都扔了，一些牲口也都全扔了。布爾塞維克在想什麼？蘇維埃政府又在幹什麼！讓這政府死了罷，像我的火壺一樣。”

對話是有味得很。這裏可不能夠像託爾斯泰說范斯託葉夫斯基似的，說小說裏的人物和作者講着同樣的言語。每一個人物的說

話，在一羣人的聲音裏面，立刻可以分辨得出來的。譬如，安迦的說話，就和郭必諾的不同了，一點兒也沒有她那種暗淡的沉思的哲學氣息了。安迦的對話裏面就是一種淘氣的嬌媚，青年人的好奇和狡獪。卜利合吉科叫她“到花園跟前去吧，去坐一坐，”她對他說的是：“你在夜裏總是跑來跑去幹嗎？”

“鐵流”裏面，對話是常常有的。其實也非這樣不可：集體行動的地方，不會是沉默的。綏拉非摩維支的對話，是很節省的，有正經事情的：大半是講幹過了什麼，還要幹什麼，不要幹什麼。這裏，沒有以前貴族資產階級文學的對話的那種說得口裏要冒出白沫來的情形。這裏，也不禁要想起九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文學裏的對話——很漂亮的很尖利的像爭論似的對話，例如柴霍夫，安得列葉夫，梭羅古勃，美列日珂夫斯基。那是些閃爍着金剛寶鑽的字句，然而，牠有牠的裝飾的用處，要來表現英雄的情感思想的深奧。至於綏拉非摩維支的對話，卻總有正經事情的，平常的，“灰色的”，然而是在行動的，所表現的不是個人，而是集體的要求和情緒。在集體之中每一個普通份子身上，所擔負的責任太大了，容不得他用閑談來糟蹋寶貴的時間而自己鬆懈下來，大家正要“走，走”向前走呢。因此，綏拉非摩維支永久總是在報告着必須的和重要的。對話是用來說明那個目的，所以對話裏面有許多解釋的表現的成份。對話表示羣衆日常的共同在一起生活，緊張的向着目的行動，所以牠是在團結這個集體。

對話，結算起來，也是一種行動，牠產生着以後的行為。

英雄和物件的描寫是簡短的，確定的：

“瘋狂似的灰塵落後了。馬胸口濺着雪白的一片片的白沫。兩肋的汗流着，像洗過了澡似的。”“那些銅的嗓子慘淡的慢慢的響着，太陽也像銅似的亮着。”

對於人或者東西的描寫，很緊湊的，很親近的，分割不開的粘在那些人或者東西上面。藝術家只指出最模範的，最看得見的，最時常的，最記得起的。在郭如鶴的身上，藝術家一開始就提起他的“鐵顎”。彷彿這個人的絕不搖動的力量都集中在他的顎上；後來藝術家並不要提出什麼名字，只要他說起“鐵顎”，你就已經知道是郭如鶴來了。藝術家並不害怕勇敢的歸納。郭如鶴講話的嗓子“是鑄鐵的嗓子”。鐵是不講話的，也沒有嗓子，可是“鐵”和“鑄”聯在一塊兒恰好很清楚的形容得出這個嗓子的聲音”。郭如鶴的確是硬化了，他全身滿是帝國主義戰爭和國內戰爭的老繭，他在血裏面洗過了澡，他全身都生了鏽；藝術家的表現在這裏是準確的。

“鐵流”裏面，自然界只是人物的一付鏡框子。自然界也同着人一塊兒暴動起來了，彷彿同着人一塊兒參加着革命的過程。自然界並不是死的，完全不是冷淡的。彷彿自然界之中隱藏着同情的或者反對的意志，自然界並不是空閑着的，而是很有興趣的看着向前行動的隊伍。一開始就是：“那塔頂似的白楊樹頂，尖尖的在窺視”。

彷彿在傾聽着許許多多人的說話聲音，吵鬧聲音；“海上強盜的鳶鳥在閃爍着的熱氣裏很詫異似的游着…… 從沒有看見過這樣的。”

綏拉非摩維支所寫的，甚至於海也是“人所想不到的鉅大的野獸，臉上帶着親熱的聰明的綉紋，在那裏悄悄的親熱的舔着活的岸邊。”

自然界對於人也會是很殘酷的：

“蒸籠似的熱氣燃燒着，人都疲憊得倒下來，郭如鶴下了個命令：‘蓋起’。太陽的熱氣使馬也倒下來，撞破了好些車杠，小孩子的發黑的嘴都不會動了。”

而雷雨的描寫：“水在咆哮着，又像是風，又像是烏黑的掀動着的天或者山倒下來了，”甚至於天天要碰見死的人也要叫：“救……命……呵！…… 世界的末日！……”

“一切——在這以前裝在無邊無際的夜的黑暗之中的一切，都在那青隱隱的寒戰裏，尖厲得極難受的抖動着。遠山的波紋，倒掛着的岩石的鋸齒，山壑的邊沿，馬的耳朵，都抖動得青隱隱的刺目……”

“山……震動了一下；就從地心裏迸出了這樣的一個霹靂，使那龐大的整個的黑夜都容納不下，牠崩裂成圓滾滾的碎塊，繼續的爆裂着，向四而八方滾出去，越滾越響，充滿着那看不見的山谷，森林，豁壑，——人都震聾了，孩子們死死的躺着。……”

自然界有時候是牧田詩的詩境似的沖淡和親愛，有時候又像雷電似的可怕。自然界和牠的周圍的人物混合起來，和革命的羣衆有

共同的生活：“和這些人同其哀樂，山的邊沿也很細膩的染着了金黃色。”人的說話聲音沉默下來的時候，“山也隨着暗淡，露出黃昏時節的蔚藍。”

綏拉菲摩維支沒有無目的的對於自然界的唯美主義的欣賞。

自然界——這是一種力量，直接參加大小事變的力量，是不疲倦的證人，善良的朋友，或者是兇惡的仇敵。對付自然界，時常要用殘酷的鬥爭，要加上鐵的羈勒，要戰勝牠，要馴服牠。牠也時常給人舒適的休息，——在牠那青綠的胸膛上，休息着是爲着新的鬥爭，新的努力。然而自然界，一般的講來，永久是生活的源頭，靈感的源頭，鬥爭的源頭。

自然界的描寫，並沒有那種深沉的個人的細膩的主觀觀察的色調。自然界的描寫，也是從羣衆迎受方面着筆的。自然界的神氣很年輕，很新鮮，能夠給那克服一切戰勝一切的人以深刻的快樂。

“鐵流”之中的人，海，山，馬都聯合成一個合奏隊。這裏有吸引人家的集體生活的諧和。“鐵流”給了合作生活的藝術上的表現，這生活裏面，人，馬，自然界都互相親密的結合着。這裏，一切都互相結合着，你要分割也分割不開的。要拋棄也拋棄不掉的。在這樣的意義上來講，可以說“鐵流”是歌詠羣衆襲擊的詩歌。綏拉菲摩維支不但是舊文學形式和傳統的破壞家，而且是真正的羣衆革

命傾向的詩人。他不用什麼崇高的神韻，而歌詠了粗暴的勇敢的人，——這個人在破破爛爛的衣服裏面，爬過了山，用自己的和兒女的血染紅了大地，這是爲着新的生活——爲着社會主義。綏拉菲摩維支的人物，和他類似的人聯合起來的時候，實在是高大而名貴；他在集體之中，筋肉也緊張起來，智慧也偉大起來，脈搏也急遽起來。

從國內戰爭的噴火口的地心裏面，唱出對於犧牲了的戰士的光榮的紀念歌，而對於活人是勇武的紀念歌。對於將來的子孫，這是發着火星的古代故事裏的模範人物了，這個故事裏面講着充滿了苦難的心靈，講着郭如鶴的咬緊着的鐵顎。震撼着的蒙着沙塵的羣衆，脫離了舊的生活，像鐵流似的行動着，向着從沒有看見過的布爾塞維克的將來走去，這種羣衆對於革命的創造力量的信仰叫人五體投地的傾倒；甚至於這個隊伍原來的愚昧狀態也不使人討厭，因為他們的真正是荆棘的道路——是向着共產主義燈塔的火光走的。

“鐵流”裏的人全身都是血和灰塵；他僅僅向着將來公社的門檻，走了第一步。這和將來一輩的人的聯系，都是很明顯的，差不多可以用手摸得到的。開始爲着爭取新的生活的羣衆，他們的節奏和將來共產主義的人的節奏是混合爲一的。綏拉菲摩維支的面前有着偉大的目的。將來並不是空的。這部敘說，在以後的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幾十年的時間之中，高聲的很有力量的呼號着。

蘇聯十五年來的書籍版畫和單行版畫

A. D. 楷 戈 達 耶 夫

蘇聯的版畫藝術承受了很多的革命以前的遺產。革命前的二十五年之間，版畫界的最偉大的老前輩，是渥思德羅烏摩華·列培台華 (A. Ostroumova-Lebedeva)。她的作品在革命後並未發生變動，也沒有什麼新傾向。但她的創作裏，集中了資產階級藝術所能給與的一切寶貴的成分。她那嚴肅的，完全是回憶的唯美主義的，然而又是綜合的樂生的風格，的確是革命前版畫之中的最好一部分的代表。後來出名的庫普列雅諾夫 (Kupreyanov) 是她的學生；而法復爾斯基對她也很稱讚。

革命前的版畫，——“藝術世界”的轉變在軍事共產主義時期就開始了。這一時期的版畫裏，契訶寧 (S. Chekhonin) 很起了一些作用。他在革命後就左傾了。但他的作風其實還帶着許多頹廢的，唯美的裝飾主義的成分（例如盧那察爾斯基的“浮士德與城”的插畫等）。“藝術世界”的回憶主義 (retrospectism) 和唯美主義在革命期間已經喪失了自己的社會基礎。雖然到了新經濟政策的開始

時，有一種“藝術世界”派復活的嘗試，然而，並沒有得到什麼積極的結果。只是作風上顯然起了變動：舊時的學院主義衰落了，新起的作風是情欲的印象主義。明白的線條主義消逝了，只剩下寫意的佈景主義的風景畫和人影畫。這種佈景主義的，極端風格化的風景畫到處占着第一等的地位。倘是書籍的插畫，那麼，插畫的精神間，和那書的實在內容大半是分離的，而僅有一點讀者的主觀的聯想。有時簡直沒有表現性。這種作風的最明顯的代表是密德羅辛（D. Mitrokhin）。

更深刻的對於“藝術世界”派的革新，是克拉甫兼珂（A. Kravchenko）。從“藝術世界”派所遺傳下來的，只剩得一點藝術形象的整個結構上的主觀情緒主義和唯美化的性質。但情緒性的發展達到了極尖銳的程度，而成了傳奇的羅曼主義。克拉甫兼珂的早期的作品，雖然是回憶主義的，表現着主觀的幻想和強烈的修飾；然而常常很有力的反映着革命初期的羅曼譚克。可惜的是，這種羅曼譚克不能極迅速的克服，在那作品裏，新的現實主義至今還常常受着這種羅曼的幻想成分的牽累。他的最好的東西還是一九二六至二七年的，那時他自己的情緒的唯美主義表現到了極精妙的繃賦的頂點（例如珂羅連珂的“盲樂人”的插畫）。現在，他正在轉向新的作風，而還沒有成熟。

宇宙觀方面的深刻的改變是必須的，否則，藝術方法的轉變總不

能十分發展到相當的程度。例如真正放棄“藝術世界”派的，法里列耶夫 (Falileev) 式風格的尼文斯基 (I. Nivinsky) 就不同了。他能將個別各種各樣的事物，很好的在情緒的聯想裏配合起來，這種配像 (photomontage) 的表見是很新穎的，例如“亞茲煤油” (1930)。

畢斯凱來夫 (N. Piska ev) 也經過這樣的轉變。他最初也是學着“藝術世界”派。他那盧那察爾斯基的“解放了的董·吉訶德”的插畫，就充滿着風格化的象徵主義，雖然這種象徵主義是很熱情的。此後，“藝術世界”派作風裏的那種佈景主義，在畢斯凱來夫的作品上就完全消滅了。但是，主觀的唯美主義的風格化和豐富的象徵，卻仍然保存着，例如“鐵流”的插畫，就表示着這種象徵主義和濃烈的表現性的互相龢和。然而，他的缺點始終是“靜止性”，小說之中的強烈的戲劇性對於畢斯凱來夫好像是不相關的，他只在用抒情詩的興奮來傳達田園風景的這一面。

和“藝術世界”派正相反的，是各種各式的左派。

新的左派和“藝術世界”派的共同點，只在他們互相聯合着反對革命前藝術之中的保守派，別的方面，幾乎是絕對相反的。

但是，形式上的左傾，並不會保證“左派”藝術家的革命性。

一切形式主義上的左派（從立方主義到構成主義）和革命的真實的內容的分歧，很快的暴露了出來：最初蘇俄教育人民委員會方面由

左派”當權，不免“欺騙”了一些“非形式主義左派”，而後來的反響——卻是“藝術世界”派的復活（1921—23）。這些“新左派”的作品中，只有斯台倫培克（Sternberg）的石刻版畫和列培台夫（V. Lebedev）的“洗衣工人”還值得認真的留意。但立方主義等等不過是這些藝術家的過渡的技術上的練習，他們都迅速的走到現實主義了（例如 S. Gerasimov 和 N. Chernyshev）。

列培台夫，馬亞珂夫斯基（V. Mayakovsky）的宣傳畫和法復爾斯基（V. Favorsky）的木刻版畫，才真正對於革命前藝術作風的餘波給了致命的打擊。

法復爾斯基的作風已經形成了一大派別——蘇維埃版畫的主要派別。

法復爾斯基的“新主義”在於將重心從旁觀移到行動，從消極的印象移到現實的揭發，從主觀的唯美主義移到具體的表現力。這真正的蘇維埃版畫，自然也是在鬥爭的過程之中，逐漸形成的。就是法復爾斯基自己也經過好些階段的發展：他曾經偏向過抽象的合理主義。這種抽象的合理主義以及舊派藝術的主觀唯美主義的情緒，或是公式的消極靜止的記錄事實的作風——許多版畫家都曾經努力的克服過。現在只剩下少數版畫家還沒有“取消”這種陳舊的作法和立場。他的作品很多，而十五年來，最好的版本是“科隆納的小屋”，“革命的年代”，“遠東特別軍中的勃留赫爾”，以及果戈理

(N. Gogol) 的小說“斯朋加”的插畫等。不是回憶主義，也不是考古主義和印象主義，而是深刻的表現時代或是書籍內容的一切最精細的特點。

保夫理諾夫 (P. Pavlinov) 是和法復爾斯基接近的。但在革命初期的作品，恰好代表着革命前的智識分子的動搖和追求。新起的青年——在蘇聯美術學院裏學習出來的版畫家，卻大半是在法復爾斯基的直接影響之下。法復爾斯基派中已經有許多很著名的有才能的青年版畫家，他們在學習院裏的練習作品就有些很有價值的（例如克拉甫佐夫——Kravzov 的“老人”，弗拉謨——Fram 的“克龍斯達叛變的克服”等）。近年以來，這派的作品出得很多，其中許多新起的版畫家（最多是木刻版畫家），能夠溶化法復爾斯基的作法，而發展出表現方法複雜和內容豐富的作品——如畢珂夫 (M. Ptkov) 的“革命戲院”集的插畫，都岡諾夫 (G. Tuganov) 的“黨史”畫冊等等。法復爾斯基的學生之中，最著名的版畫家是岡察羅夫 (A. Goncharov)，他早——1922年——就在繪畫之外，同時開始木刻版畫的工作。他的作品，從一九二四年作勃洛克 (A. Blok) 的“十二個”的插畫，一九二六年作葉遂寧 (S. Esenin) 的“蒲加采夫”的插畫，到一九三一至三二年作葛爾森宗 (L. Gershenzon) 的“戈舍克的兩個生活”的插畫和裝幀，現實主義的傾向逐漸的鮮明起來了。

至於兌內加 (A. Deineka) 的創作，所受的法復爾斯基的影響卻比較是間接的。他的現實主義和表現主義配合着，綜合的方法之中，加以表現主義的着重顯示客觀上的主要行動。十年來最好的宣傳畫 (agitplakat)，正是他那 中國——在從帝國主義之下解放出來的道路上”，是並非偶然的。

此外，還有許多過渡的，中間的版畫家——他們既不是“藝術世界”派的直接繼承者，也不屬於法復爾斯基派，或是蘇維埃兒童圖畫的創始者列培台夫等的一派，而站在這些派別之間。例如墨斯科的烏薩采夫 (A. Usatchev) 等，列寧格拉的莫察羅夫 (S. Mocharov) 和希仁斯基 (L. Khizhinsky)，雖然還沒有確定的創作傾向，但是，無疑地是蘇維埃版畫的極好的成績。

[摘譯“藝術”雜誌，第一二期合刊。]

高爾基論文續補

冷 淡

蘇聯現在非常之神妙的迅速發展着勞動民衆的舊式生活的改造過程，這是深刻的各方面的改造，——而且蘇聯以前的勞動民衆的舊式生活，比歐洲其他民族的生活，更加是畸形的，困苦的，可恥的。資產階級的新聞記者，經濟學家，以及資本主義的其他的幕友，他們來參觀蘇聯的時候，主要的是注意蘇聯的工業化的工作。他們差不多很均勻的分成兩派：一派是安慰派，一派是恐嚇派。

那些安慰自己的主人的人，完全只着重在消極性質的現象，他們根據一些傳說和表面的印象，就證明：五年計劃是不會成功的。而恐嚇派卻說：工業化很有成績，而且歐洲因此要有破壞的危險；這裏所說的歐洲，自然是銀行家，工業家，政治家，以及過去的“社會主義者”，——這些所謂“社會主義者”爲着資本主義匪徒的齷齪利益而服務；直到現在還在服務着，雖然這些匪徒的罪惡的不人道的行爲，到現在已經明顯得叫人惡心，這個匪徒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牠掠奪了勞動平民，還在繼續着掠奪，造成了幾千萬工人和農民的失業——使他們簡直只好活活的餓死。

資本家的幕友不能夠了解蘇聯的工業化是蘇聯民衆復活的條

件，是要把勞動民衆從幾百年的俄皇制度的影響之下完全解放出來的條件，——俄皇制度之下民衆是沒有權利參加文化生活的，沒有權利參加文化的建設的；蘇聯的工業化是要把勞動民衆從極端愚蠢的沒有智識的教會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的條件，——這種教會用盡各種方法贊助俄皇制度，宣傳消極的服從上帝的權力和財主的權力，服從地主和工廠老板的權力；蘇聯的工業化是要把勞動民衆從那種一半像畜生的生活裏解放出來的條件，——這種生活是窮困的農民的個人經濟所造成的，所以農民不能夠知道理智克服自然界的權力的勝利。

這個目的是：解放羣衆的內含的精力，復活他們的創造力，使他們共同的來建設新式的社會；這種目的，是歐洲資產階級的幕友所看不見的，也是他們所不能夠看見的。

他們之中只有很少幾個人，而且只在最近的兩三年，方才開始猜到蘇聯所開始的工作，進行得很有成效的工作，的確有全世界文化上的意義。

對於這個世界上最富饒的國家裏的工農羣衆的內心的改造，對於這種改造之中的極豐富極複雜的現象，居然這樣的不注意；——這種不注意，可以用這些資本家的幕友的假裝的和天生的盲目來解釋。

假裝的盲目——是他們主人政治上的“定做”的結果；天生的盲目——是他們自己的愚蠢的結果；這些對於蘇聯生活的資產階級

的“觀察家”，完全不知道這個國家的人民的過去，雖然他們是在這個國家裏“觀察着”呢。

可是，在這兩個原因之上，還有第三個原因：就是對於勞動的人類羣衆的生活的“冷淡”正在畸形的一天天的生長起來。我自然不否認：這個人類，當做掠奪的對象，當做強暴政策的對象，還是沒有喪失他們的興趣的；我所說的是對於全世界人類的文化的覺悟的“冷淡”。

看起來，似乎這種“冷淡”是不應當有的，因為現在的時代——在歐洲正在開展着幾百年的社會基礎的極鉅大的破壞的悲劇，而在蘇聯正在強烈的生長着新式生活的創造的敘事詩。

這種“冷淡”明顯得無可爭辯的一方面——就是歐洲的資產階級文學。問題不在於這種文學早已沒有那種偉大的人物，譬如說：左拉(1)，海涅(2)，薩愷萊(3)，也不在於這種文學需要史惠夫德(4)，莫

(1) 左拉，Emile Zola, 1840—1902, 法國自然主義的小說家。

(2) 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 德國詩人。

(3) 薩愷萊，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11—1863, 英國小說家，和狄更斯同時。這是一個很偉大的文學家；不知道為什麼，中國簡直沒有人介紹他。

(4) 史惠夫德，Jonathan Swift, 1688—1772, 英國的諷刺小說家，生在愛爾蘭的。

利哀(5)，等等，問題是在於一般的聲調。資產階級的文學已經不是以前那樣的文學了——已經不是實際生活的回聲了。這種文學顯然沒有力量反映現在歐洲的衰落和破壞的悲劇。

自然，這種文學不能夠描寫工人的英雄，然而，爲什麼不描寫別一種“英雄”呢？——爲什麼不描寫這種文學自己的主人和魔王，描寫他們那樣暗淡的兇狠的形象，——資產階級的銀行家，被資本主義的危機所炸碎的，在自己積聚起來的沉重的黃金底下喘着氣的，現在已經痛恨機器，痛恨一切技術的，其實這些技術以前是使他們發財的，——爲什麼不描寫這樣的“英雄”呢？

或者，還有智識份子的形象，這種智識份子觀察着，認識着資本主義病根的沒有辦法可以醫治，明明知道全世界勞資衝突的大崩潰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強姦着自己的良心和理智，仍舊繼續着替那個大強盜服務？或者，還有女人的形象，對於這種女人，“國家基礎”的家庭已經喪失了吸引她的力量，這是色情狂的女人，被資產階級生活的無恥所無政府化的女人，同時，她又使她周圍的一切都無政府化？爲什麼不描寫這樣的“英雄”呢？

生活不斷的創造着許多新的題材，可以做悲劇式的小說，做鉅大

(5) 莫利哀，Moliere，他的真姓名是 Jean Baptiste Poquelin，1622-1673，法國戲劇家。

的戲劇，做悲喜劇，生活要求新的巴爾扎克(6)；然而馬塞爾·普魯斯特(7)跑出來，給你低低的講一個極長的極無聊的夢，做這個夢的人是沒有肉沒有血的，這種人是生活在現實之外的。

蘇聯的文學運動都是有羣衆性質的運動。幾千百個散文家和詩人——工人階級之中所湧現出來的——正在奮鬥着，做着把理想溶化到形象裏的工作，做着把事實表現在典型裏的事情，幫助着勞動者的文化上的自我認識的發展。一般的來說他們的工作，可以指出現在已經是創造出‘鉅大藝術’的前夜；然而暫時，這種工作還是往廣泛方面的發展比往深刻方面的發展大得多。

蘇聯的一切民族的無產階級文學擔任起了極困難的任務——要用文藝的方式造成現實主義的敘事詩的藝術，這種藝術之中要儘可能的運用文字的力量完全反映工人階級——新社會的建設者的英雄主義，就是從工業上去武裝國家，爲着反對過去時代的一切種種殘餘而戰鬥的英雄主義，這些殘餘尤其在俄國鄉村之中是根深蒂固的。

無產階級文學的最好的最有才能的幹部很正確的了解：敘事詩是現實主義的，而現實主義並不妨礙想像。

(6) 巴爾扎克, 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 法國小說家。

(7) 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現代人, 法國新派的所謂心理分析主義的小說家。

問題當然不在於要創造像“卡勒瓦拉”(8)，“哀達”(9)，“尼白龍歌”(10)那樣的文字創作上的紀念碑；然而這裏很應當提起這一類的紀念碑——也是在口頭的集體的創作材料所造出來的，所鑄成功的。蘇聯的這種材料，就是上面所說的文學的原料。我們並不大誇張這些材料的質量，可是，始終要估計牠的量的意義；這樣多的數量，正足以表示幾千萬人熱烈的要想創作散文和詩的意志。這種過程，是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過的；這樣鉅大的規模，這樣強烈的力量，都是過去所沒有見過的。

唯美主義者可以說：——寧可少些，可是好的；不要許多，而是壞

然而唯美主義者，不但對於羣衆在藝術方面的意志的表現，是冷淡的；而且這種意志對於他們是值得仇視的，因此他們的估量是站在新的歷史的意義以外的。

自然，蘇維埃文學創造自己的美學的基礎，是勞動過程和階級鬥爭的敘事詩的英勇主義；而在階級鬥爭勝利之後——美學的基礎將要是對付自然界的鬥爭。

(8) “卡勒瓦拉”，Kalewala，芬蘭的民間敘事詩，倫洛德把牠集合起來做成了一部著名的史詩。

(9) “哀達”，Edda，古代史干狄納維亞的民間傳說集。

(10) “尼白龍歌”，Nibelungen，德國傳說裏的一種民族，民間敘事詩的歌謠，文學家的創作，音樂家的製曲……有許多人拿牠做題材的。而“尼白龍歌”(Das Nibelungenlied)，還是1150年前後傳下來的古代民歌。

羣衆在勞動方面和創造方面湧現出來的天才的豐富，——真叫人驚奇和興奮。然而在天才的正軌的生長和深入發展的道路上，必須要反映和描寫當前的現實生活。

蘇聯的青年文學家，正在精力的洶湧的潮流之中生活着。這種精力是用在改造世界的事業上的；他們都要趕着實際生活的步驟，這就使他們不能夠不很匆忙的工作。

因為匆忙的緣故，有許多人沒有充分深刻的了解那種理想，而這種理想，照耀着過去的歷史經驗，用革命的手段組織意志和理智，正要無情的實行反對過去的遺傳和守舊派的鬥爭。這個缺點是智慧上情感上的組織力量的缺點，是內部的智識和感情之間的調和上的缺點，這是時常可以發見的。然而資本主義國家的崩壞的過程，以及這些國家裏的個性的崩壞的過程，都在幫着取消這種缺點，一天天的更加進步，更加有成效了。現在這種嚴厲的時代，對於每一個個人都提出一個堅決的簡單的問題：你向那兒走，你同着誰走？

現在的時代提出了這個問題，並且指出來：——向後轉的路是已經堵住了，而想在過去和將來之間的一小塊地方上跑圈子，這是不會有什麼別的結果的，只會弄得頭暈眼花。

我認爲自己沒有權利把我個人對於某某同志的作品的社會上藝術上的意義的估量，勉強要讀者同意。這是批評家的權利和責任。

某某同志——就是蘇維埃文學每一年要提拔出來的幾十個作家之中的一個。他們和工廠裏的工人都有很密切的聯系，簡直是肉體上的聯系。他們在沒有把自己的稿子去付印之前，常常先讀給工人聽，把自己的作品給讀者去批評。這種方法可以使文學和生活密切的結合起來；我以為這種方法，還可以引起工人羣衆對於文學的興趣，也就不能夠不促進羣衆的文化上的發展。我一般認為作家和讀者的直接關係，同志似的親近，——是理想的；這種親近使兩方面都可以得到教訓。

蘇聯需要幾千幾百個散文家，詩人，批評家，戲劇家，新聞記者；這種文學專家的軍隊，應當立刻訓練出來。蘇聯的文字的藝術應當贊助文化革命的事業，贊助“新式的個性”的創造，這種“新式的個性”是自由的——脫離了過去時代限制人的精神上的發展的一切束縛的。而整個人類的生活，現在處於階級仇恨空前緊張的時代，世界上的仇恨的創造者正是資本主義的惡魔；蘇聯工人階級的幹部認為自己的目的就在於消滅資本主義的階級世界，當然，蘇聯的工人階級的藝術在政治上也就應當是革命的藝術。

高爾基這篇文章的原文，是登載在列寧格勒作家協會的機關報“進攻”

上的，見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六日出版的第二期。

1932, 5, 6, 譯。

编号	8 3533
金額	1.50

高爾基雜感集

定價一元貳角

魯迅譯

文學生活社版

